HCJ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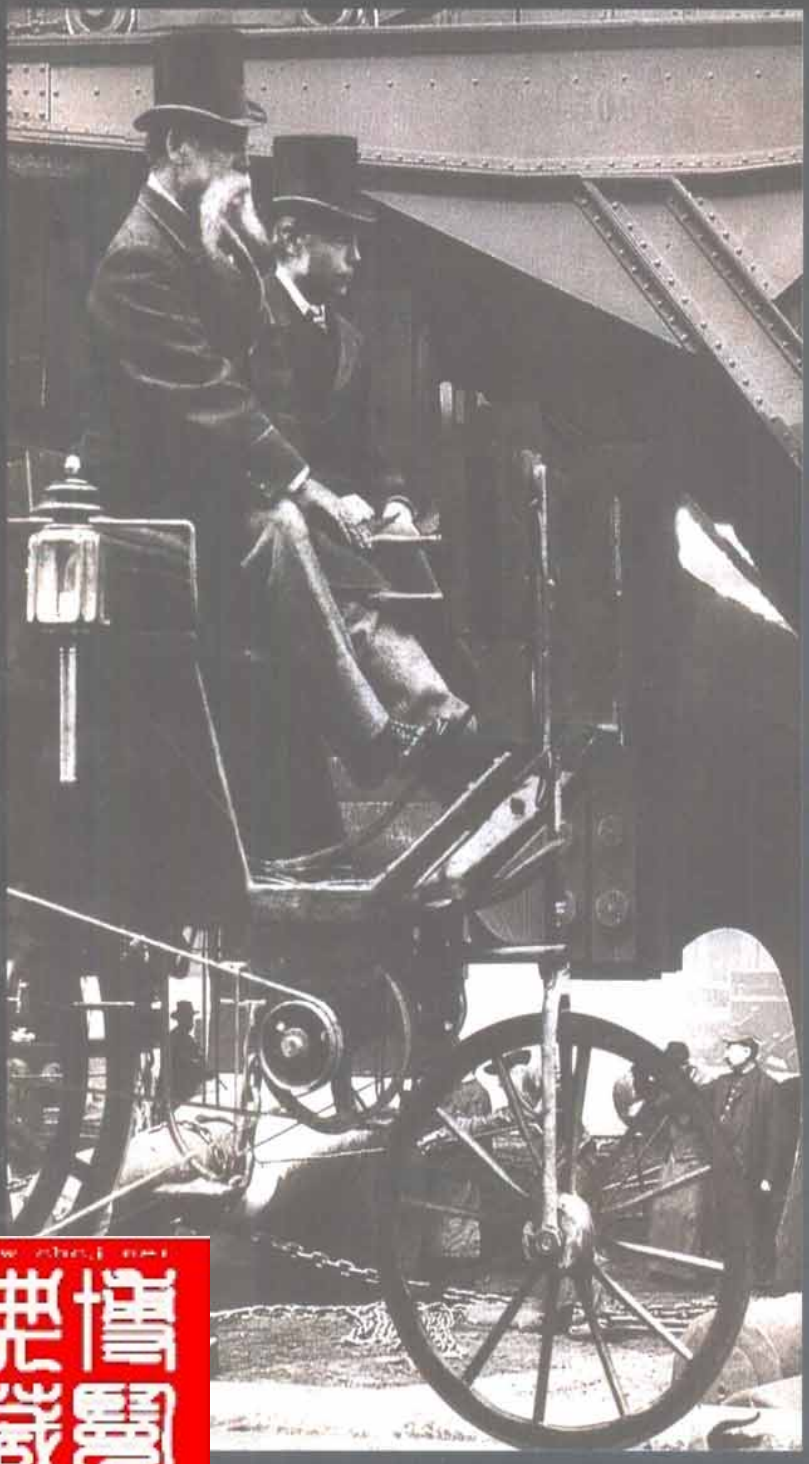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殖民时代

公元1850年—1900年

拉贾的全盛时期／铁血宰相俾斯麦／角逐非洲／澳大利亚的形成
美国的分裂







www.xhcj.com
华博藏书

人类文明史图鉴

殖民时代

公元1850年——1900年

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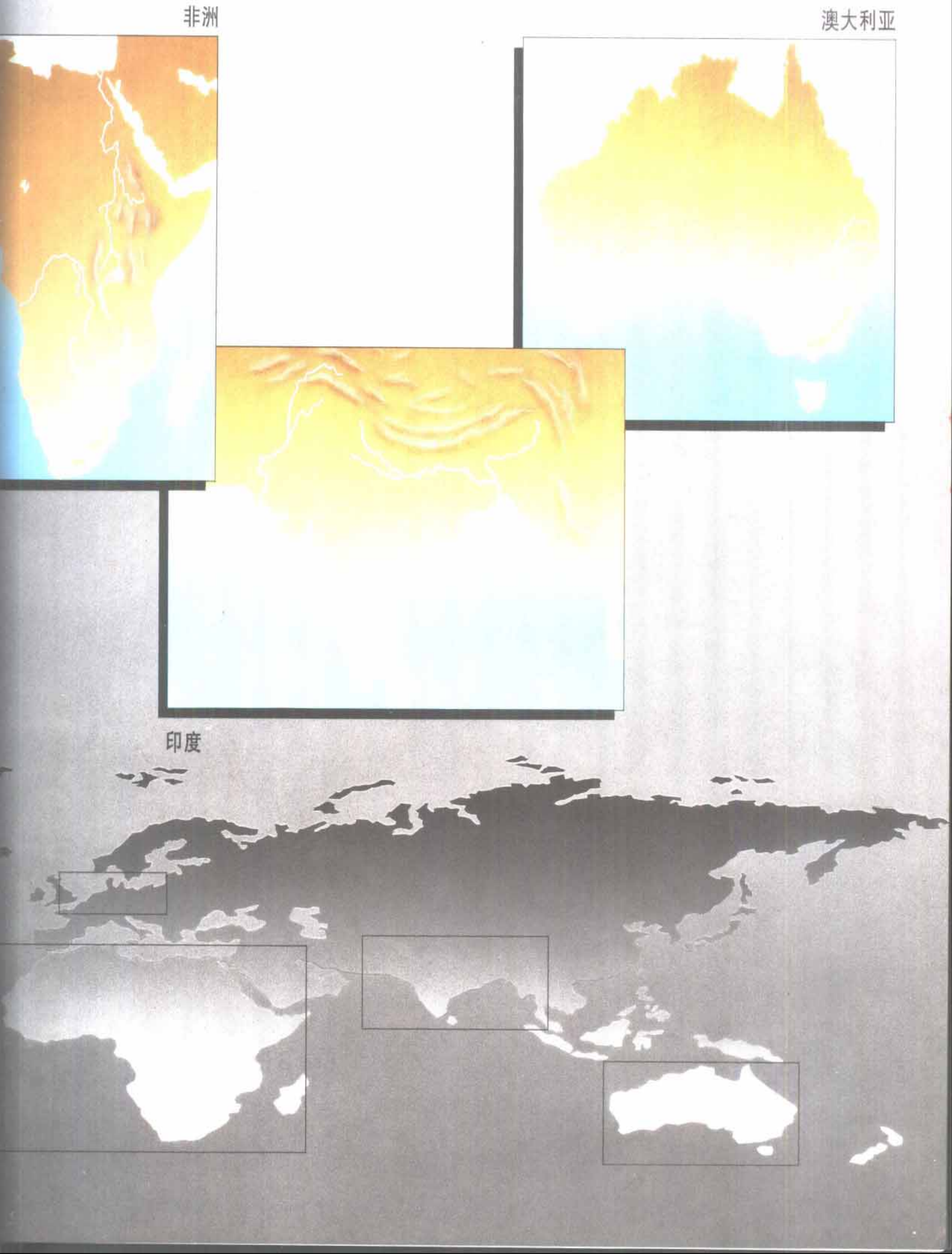




德国



公元 1850 年 – 1900 年


非洲
澳大利亚
印度

人类文明史图鉴

殖民时代

公元1850年—1900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吉里安·穆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策划主任助理：玛丽·斯特普尔斯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殖民时代》编务

编辑：查尔斯·波埃勒
策划：里恩·布朗
研究人员：卡洛林·卢卡斯
审稿：弗朗西斯·维拉热
策划助理：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莫利·萨德兰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辛得利
图片统筹：热罗昂·伯格曼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塔·希尔
制作助理：艾玛·维斯
编辑部：塞莱莎·约翰
德布拉·赤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伊利诺大学历史学教授，厄巴纳－香潘，伊利诺
克里斯托弗·贝利，剑桥大学圣卡特琳学院现代印度历史讲师

印度：

克里斯托弗·贝利，剑桥大学圣卡特琳学院现代印度历史讲师

德国：

约翰坦·斯坦伯格，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学讲师

非洲：

理查德·拉特伯恩，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非洲历史讲师

澳大利亚：

卡尔·布里吉，新英格兰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美国：

休·布罗干，埃塞克斯大学历史高级讲师，科尔切斯特

特约撰稿人：

尼古拉·贝斯特，约翰·科特雷尔，温德森·克尔顿，尼尔·弗尔贝尔，埃伦·卡尔弗德（文字）；
谢拉·科尔（审定）

联系人：

伊利莎白·克拉梅尔－兴格（波恩）；
玛利亚·文森查·阿罗西（巴黎）；
安·纳坦森（罗马）；克里斯蒂娜·利伯曼（纽约）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安吉·雷迈尔（波恩）；约翰·杜恩（墨尔本）；伊利莎白·布朗（纽约）；安·维尔斯（罗马）

中文译者：

徐家玲

责任编辑：

范中华

目录

1 拉贾的全盛时期 9
短论:进步之光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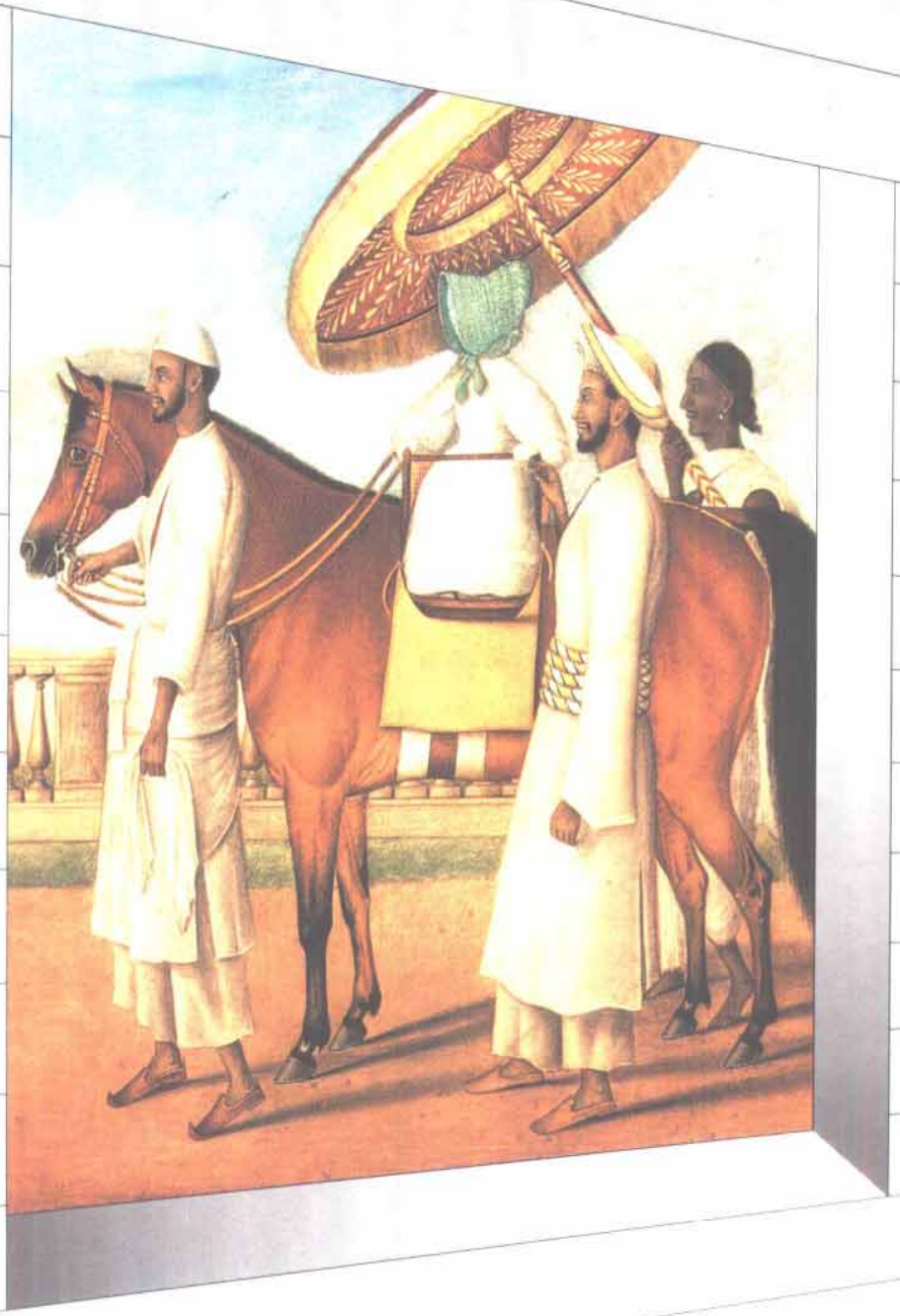
2 铁血宰相俾斯麦 43
短论: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65

3 角逐非洲 75
短论:民众的艺术 103

4 澳大利亚的形成 111

5 美国的分裂 131
短论:焦虑的潜流 163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4



拉贾的全盛时期

1

“统治世界的秘密就在于不列颠人所拥有的一切之中，只要他们能了解这一点就好了。”寇松勋爵的这句话，是他于1898年担任印度总督之前4年时所写的，这句话明确地号召他的英国同胞全力支持人所共知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他毫不怀疑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地区的命运都是由上帝交付给英国的，英国所担负的职责就是把英国统治的文明传播到整个世界。

寇松曾两次环游世界，他的上述信念就根植于他对许多不同社会的直接经验中。他知道，他不是代表自己的所有的同胞说这番话的，因此，在他的语气中带有遗憾。在他的同胞中，许多人对殖民事业漠不关心，或者只将其视为促进短期投资的手段。但是，寇松的信念——即坚信这个帝国就是促进人类社会改造的一支十字军——却是执着的，而且有强大的说服力。在19世纪后半期，它鼓舞了许多英国以外的殖民帝国的建设者。

每一个国家都派遣军队推进自己的目标。在阿富汗的各高山隘口，在中国的冲积平原，在苏丹的沙漠地带和东南亚的沼泽三角洲，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战斗。在军队进驻之前或军队进驻之后，大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政治家、艺术家、哲学家、工程师、教师和科学家蜂拥而入。由于他们的不断进取，到1900年，欧洲国家已经控制了全球4/5的土地。英国控制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阿拉伯南部和非洲大部；法国在西非和东南亚建立了殖民统治；俄国努力在亚洲北部稳步扩张；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早期帝国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争夺那些还没有被英国和法国攫取的部分。而美国不仅把其西部边境伸展至太平洋，还夺取了正在衰落中的西班牙的海外领土。甚至在遥远的南太平洋的孤立岛屿玻利尼西亚，苏格兰作家路易·史蒂文森也感到了“一种时代与种族、野蛮与文明、道德与犯罪相互冲撞的激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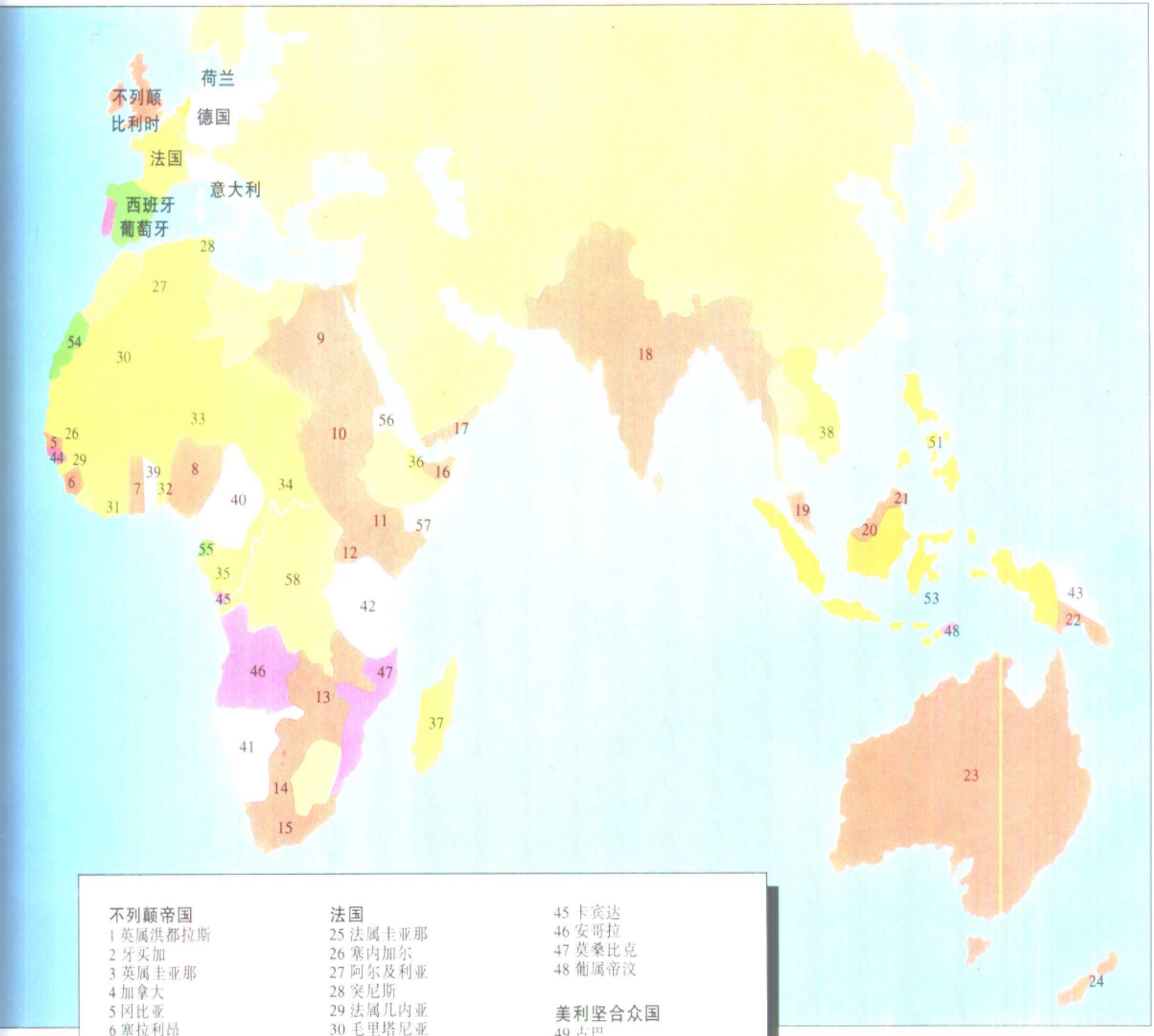
鼓励欧洲势力大规模扩张的动机远比寇松或其他任何参与这类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人所能理解到的更加复杂。许多欧洲人的这种道德优越感起源于工业革命后巨大的物质进步，这种进步使欧洲在金钱、技术、专家等方面远远多于世界其他地方。欧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他们更需要外部市场，对进口农产品的需求欲望也同时增强。而且欧洲已经被分割成各民族竞相角逐的战场，哪一个国家领先，它的对手就要走得更远。刚刚被俾斯麦首相统一的德国尤其如此，它决定与英国在工业力量和海外势力方面进行竞争。所有

左图是一位印度画家的绘画，这是19世纪40，图中的英国孩子在3个仆人的陪伴下在加尔花园中骑马。当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几乎整个印度，加尔各答已经成为次大陆的行文化中心。10年之中英国政府已经直接控制了，大约2.5亿印度人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拉贾)之下。

欧洲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占领地先前大部分由一些孤立的商业殖民地构成。在19世纪最后25年，它们开始在这些大陆上深入内地，并为了统治全球而你争我夺。最大的帝国，如图所示，是不列颠帝国（红色阴影）和法国（浅绿色阴影），德国、葡萄牙、美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也都有海外领土。到1900年，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

印度，它的地形图在一个英国行政官的女儿眼中，恰似一个蛋卷冰淇淋，但它却是不列颠帝国的关键部分，它的领土使其英国征服者感到骄傲。1857年印度起义后，只是在西北边界和缅甸一带发生了几次战斗；在印度次大陆的其余地区，不列颠帝国只依靠1000名左右受过高级培训的公务员的勤勉敬业精神和他们对印度土邦君主的谨慎监督维持其统治。





不列颠帝国
1 英属洪都拉斯
2 牙买加
3 英属圭亚那
4 加拿大
5 冈比亚
6 塞拉利昂
7 黄金海岸
8 尼日利亚
9 埃及
10 苏丹
11 英属东非
12 尼亚萨兰
13 罗得西亚
14 贝专纳
15 南非
16 英属索马里
17 亚丁
18 印度
19 马来亚
20 沙劳越
21 北婆罗州
22 英属新几内亚
23 澳大利亚
24 新西兰

法国
25 法属圭亚那
26 塞内加尔
27 阿尔及利亚
28 突尼斯
29 法属几内亚
30 毛里塔尼亚
31 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32 达荷美
33 法属苏丹
34 法属赤道非洲
35 法属刚果
36 法属索马里
37 马达加斯加
38 法属印度支那

德国
39 多哥兰
40 喀麦隆
41 德属西南非洲
42 德属东非
43 德属新几内亚

葡萄牙
44 葡属几内亚
45 卡宾达
46 安哥拉
47 莫桑比克
48 葡属帝汶

美利坚合众国
49 古巴
50 波多黎各
51 菲律宾群岛

荷兰
52 荷属圭亚那
53 荷属东印度群岛

西班牙
54 里奥德奥罗
55 木尼河

意大利
56 厄立特里亚
57 意属索马里

比利时
58 刚果(利奥波德)

这些因素的结合，开始了一个殖民运动的过程，而且它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帝国的欲望将改变被征服国家数百万人的命运，它形成了20世纪的主题。

最大的欧洲殖民帝国是不列颠，它最重要的领地印度是以补偿英国18世纪失去美洲殖民地的损失。印度的土地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它有多种古老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它还有过长期受到外族入侵者统治的体验。早期的征服者通常都得翻越印度西北方那些将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分割开来的高耸山脉，才能进入印度。不列颠则采用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他们作为商人从海上来到印度，敲开了它的后门。

当1600年东印度公司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特许证，它的首选商业目标是经营马来群岛的香料，并且它很清楚，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都在与它竞争。1612年，托马斯·罗代表东印度公司与印度进行谈判，请求准许公司在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港口建立第一个贸易据点时，曾经警告：这一举动将会是印度的一个错误，它将“导致英国在印度驻军和进行陆地战争”。东印度公司在早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的贸易网络。随着其控制地区的增加，它的野心也大大增加。1640年，公司从一个印度土公手里租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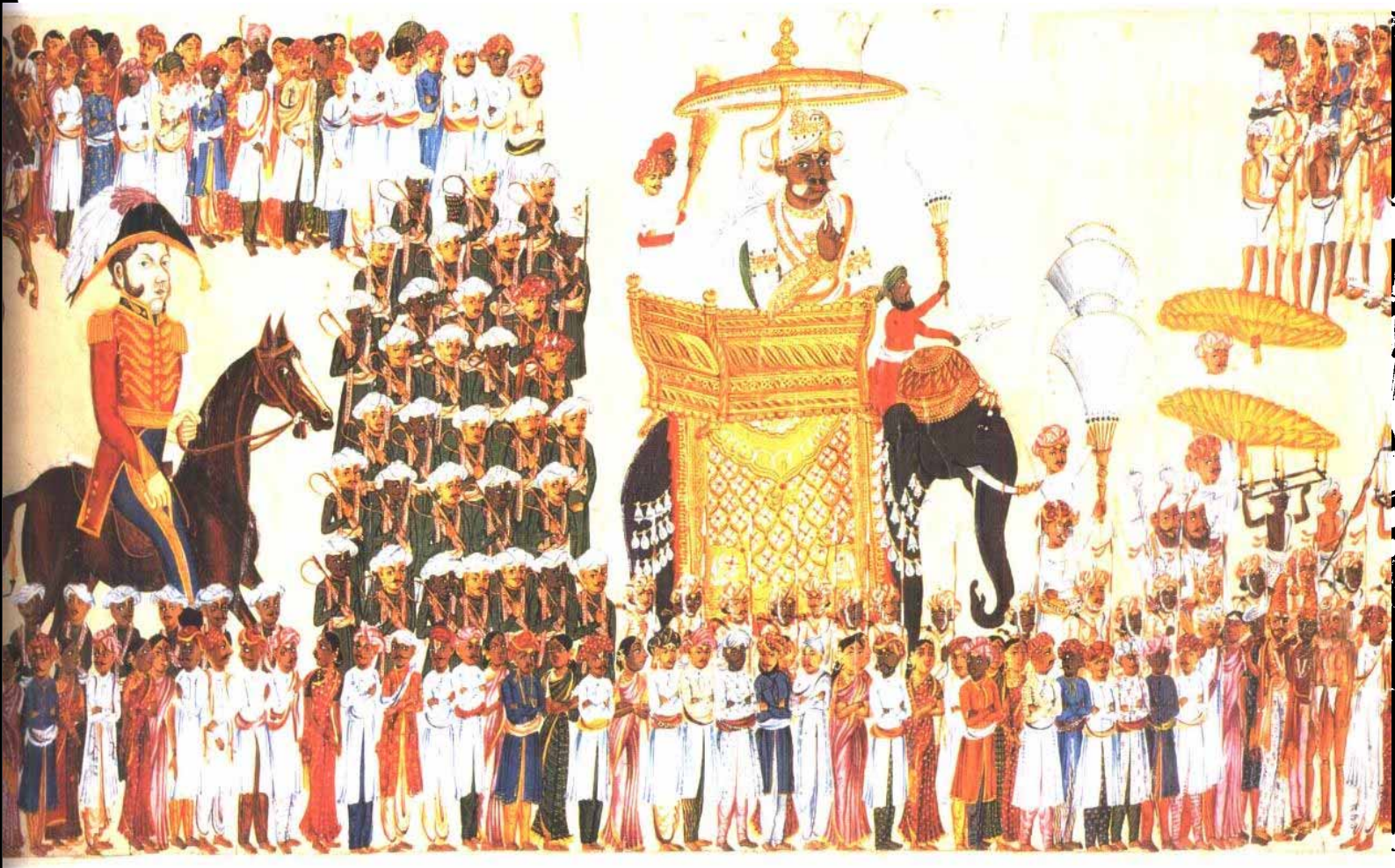
这幅画是一位印度画家大约于1830年绘制的。画中，南印度拉贾坦吉拉王，乘坐在一个豪华的象轿上，一个不列颠公使骑着棕红色的马紧随其后。在印度，许多土邦王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的协议中，都有一个被强迫接受的条件，即英国的公使必须出席土邦王公举行的各种活动。尽管这些公使原则上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但是他们仍然密切关注印度统治者的行动和英国在印度领土上的利益。



了一块土地，建立了要塞；这一殖民中心后来就被称为马德拉斯，而且它后来发展为英属印度的3个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1668年公司取得了孟买岛，这个岛屿原属葡萄牙，英国的查尔斯二世与葡萄牙公主联姻后，作为一份嫁妆归并于英国王室。东印度公司就开始以这个位于印度西部海域上的岛屿作为新的基地，觊觎着东部行省孟加拉和它的硝石及纺织品市场。

时机终于成熟了。1681年，被指定为东印度公司总裁的柴尔德爵士宣布，他将致力于“为一个庞大的、稳固的、确定无疑的、永远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奠定基础”。一支远征军被派往孟加拉。当时，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正忙于与一个新近崛起的印度教国家马拉塔作战，无力分心，遂授权东印度公司控制自孟加拉湾溯河而上，直入内地160公里处的3个村庄。该地是一个瘴气肆虐的沼泽地带，但有一个可以停泊深水船的河港。很少有谁能想像到，它将成为英国殖民势力的第三个据点，即人口稠密而且繁华的港口加尔各答——一个烟气弥漫、混乱不堪的“恐怖夜之城”，诗人吉卜林曾经如此形容它。

此前，不列颠在印度的主要欧洲商业竞争对手是法国人。18世纪中期，



两国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导致了它们在印度次大陆上的冲突。不列颠获得了胜利，并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原来想象的战利品。前任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职员罗伯特·克利夫，在驱逐了法国人后，于1757年取得了对地方穆斯林统治者的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主要政治力量。后来，克利夫和他的同僚们劫掠了孟加拉，迫使当地人缴纳沉重的贡赋，并在贸易中谋取暴利，导致公司财政上的混乱，不列颠政府不得不规定了公司职员对公司财产的相应职责。1773年的一项《管理法案》指定瓦伦·黑斯廷斯继任克利夫的职位，做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总督，由英国国会直接指派4位幕僚充实黑斯廷斯的议会。11年以后，在首相威廉·皮特主持下，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印度法案》，该法案使公司的总裁处于一个董事会的监督之下，这个董事会由3至6名行政人员组成，它有“发动战争，维护和平或与印度政府及王公们协商”的全权。



这是一幅19世纪的水彩画，画上的3个印度盗匪在抢劫之前勒死了受害者。这种宗教性的犯罪行为被称为“图吉”（窒杀），犯罪者是一群专奉伽厉女神（印度教中的毁灭之神）的宗教狂徒。在莫卧儿帝国衰落以后，又有许多普通罪犯参与了这类犯罪行为。1830年以后，不列颠统治者在一些守法的印度人的支持下，对边远地区旅行者所受到的这类威胁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由于皮特不相信公司的职员们，遂将自己的一名亲信安排在总裁的位置上，他就是科威利斯勋爵，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深地在印度打上了不列颠帝国的烙印。为了根除腐败和不忠，他将东印度公司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经商，另一个部门从事政治活动，并提高了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从而创造了一个忠诚的专业机构——一个典型的文职官员管理机构，但印度人被排除在外。为了资助这一改革，他改革了孟加拉的税收和土地制度，确立了东印度公司对税收、买卖和食盐经营方面的垄断。

尽管皮特曾经申明他反对在印度攫取土地，但是，科威利斯勋爵却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在南方的战争。在那里，马德拉斯城受到了提普·赛义德的威胁，提普的绰号是“迈索尔的老虎”，后来因其与拿破仑的勾结而被戏称为“提普公民”。1792年提普被打败，被迫割让了土地。为保障其边界安全，并将其占领地连成一片以利于其贸易的全面获利，不列颠帝国现在开始了扩张，而印度社会的分裂有助于这一扩张进程的发展：统治了北印度将近3个世纪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势力现在迅速地瓦解了，而印度各独立的土邦王公们之间的争斗使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不列颠人。

1797年，莫宁顿勋爵，即后来的威莱斯莱侯爵被指定为东印度公司的总裁，他受命根除法国在次大陆的一切影响。在他的兄弟阿瑟即后来的莫

宁顿公爵的帮助下，威莱斯莱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征战，最后，他几乎兼并了迈索尔的一半。然后英军继续攫取奥德省北半部，并强迫其他印度邦国与之签约，东印度公司承认他们的独立，同时控制他们的外交权。在对马拉塔继续进行战争的进程中，西印度出现了一个印度土邦的联盟，不列颠则控制了德里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已经退化为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跟班”。对马拉塔的战争直到1818年才最后结束。但是，当威莱斯莱于1805年被召回国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已经确立无疑。

180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总裁担心地说：“当我考虑到人数不足3万的欧洲文官和军队在管理5000万臣民时，我不能不担心我们民族人口的

印度的寺院集中在印度东北方的圣城贝拿勒斯，该城坐落于拥挤不堪的恒河岸边。不列颠对印度教和次大陆上其他几种宗教的无知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引发了印度人对英国统治者的怨恨，导致了1857年的暴动。结果，英国推行了一种不干涉政策。在弗里尔给第一任英国总督的建议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让政府擅自对它最下贱的国民说明他将信仰什么宗教。”





发展无法与属地的膨胀同步。”但是不列颠几乎不能停止攫取，也不可能离开印度，他们已经占有了如此之多的领土，发展了盈利如此丰厚的贸易，因此，他们现在必须统治印度。

建立军事控制是必要的，因为印度中部已经被肆无忌惮的士兵和强盗破坏了。到1824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已包括170个印度兵团（人们称其为印度兵）和16个欧洲人兵团，总数大约20万人，形成了亚洲最大的现代化军队。商业是另一个特权，除了鸦片（英属印度主要向中国出口）和食盐外，公司的贸易垄断被废除了。然而自由贸易显出了不公平，很快孟加拉省涌入大量廉价的英国布匹，使这个省的巨大的纺织工业崩溃，数百万人失业。

与新的商业精神并行的是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它的最善辩的拥护者——威廉·威尔伯福斯宣布，英国能够“逐渐介绍和确立我们自己的原则、意见；我们的法律、制度和行为方式；而首先是以我们的宗教和道德准则去促进其他各个方面的完善”，并为其印度臣民造福。这些建议，在威廉·班廷

克勋爵于1828年到1835年出任东印度公司总裁时，被付之于行动，他废弃了印度教的殉葬传统：即死去丈夫的妻子要在葬礼上与丈夫一起烧死，并采取强硬措施抵制"图古"的发生。"图古"，即成帮的印度强盗打着为伽历女神服务的旗号，以宗教仪式杀害路人的行为。更值得注意的是班廷克建立了一些中等学校和大学，用英语传授西方文化知识和科学。

在抵制殉葬运动中，班廷克得到了孟加拉省公司前任职员拉姆·莫衡·罗伊的支持，罗伊发动了印度教改革运动，以迎接英国人对他的宗教的挑战。他建立了许多中等学校，创办了第一份由印度人经营的报纸。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常常在报上发表关于如何改革印度使其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观点。

除了罗伊，其他印度人极少能接近权力的边缘，在理论上，公司的高级职位对印度人开放，但从1806年开始，要进入公司工作必须在英国通过考试。然而印度宗教却禁止印度人到海外去(即使他们能负担得起)，因此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一直由来自英国的年青人补充，他们对印度一无所知，却相信自己天生的优越性。

此外，这些新来的英国人生活风格与其前辈有很大不同。18世纪，公司职员已与地方上的印度统治者频繁往来，总的来说他们能够平等相待。东印度公司的人从没有试图将他们的文化强加给印度人，相反，他们自己却接受了印度人的风俗习惯：许多人有印度朋友，穿印度式样的服饰，抽水烟，喜欢舞女们的表演或斗鸡斗象的娱乐。他们中间的学者与伊斯兰教贵族们讨论波斯文化，或与印度教权威讨论哲学。他们距英国有6个月的海上航程，可说是相互隔绝，一些人娶了印度女人，更多的人养有印度情妇。但现在，不论怎样总有一些士兵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到印度，让她们在印度做太太，称为"memsahibs"(这是英语的"ma'am"与印度语"sahib"的结合，sahib一词是对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人表示敬意的专有名词)，以保持男人们的身心健康。1840年官方禁止公司职员参与印度宗教节日。不列颠人总是使自己远离他们的印度臣民，两个社会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之间产生许多偏见，互不了解，互相怀疑。

与此同时，不列颠获得了更多的领土和国民。1824—1826年不列颠在与缅甸的战争夺取了印度东北边界和阿萨姆地区。由于预见到俄国的威胁，英国企图占领阿富汗，进行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惟一幸存者独自骑马通过了开伯尔山口后，人们才得知一支1.6万人的大军覆灭的消息。于是英国征服了印度西北的信德和旁遮普等省，以补偿他们在这一次打击中所受到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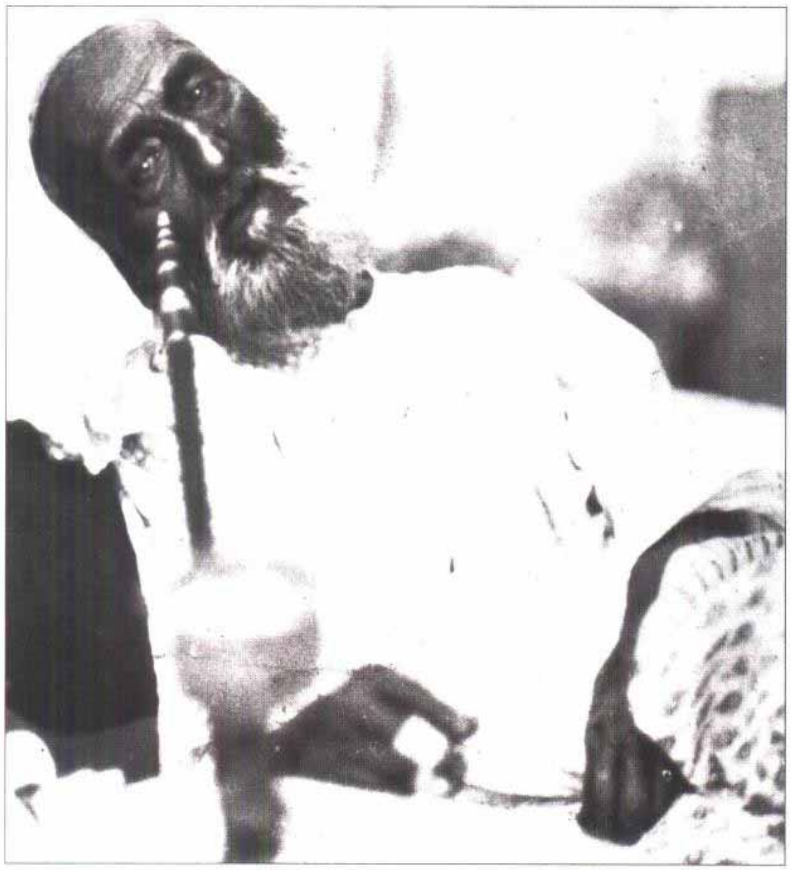
为了扩大在印度的版图，增加税收，大贺胥勋爵兼并了许多名义上保持独立的领地。在随意编造的"遗嘱失效"这则法令下，如果某印度土邦王没有合法的儿子，或者被英国判为放荡、堕落者时，都可以被剥夺继承权。1856年奥德的被兼并尤其引起了震动，因为东印度公司与这一土国一直有长期的联盟关系。

实行这种侵略性的领土兼并的一个原因是要向印度人示威。在阿富汗惨败后，一位资深的公司官员查尔斯·特莱维纳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我担心的是，虽然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但我们是不受欢迎的统治者。我们不能再承担失败了，第一次失败将是一次普遍起义的信号。"他继续写道：

图中杂乱地堆积着破布条和破碎瓦罐的地方，是坎普尔的比布加尔大楼。1857年，就在这个地方，有200多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一伙印度起义者杀害。受害者的尸体被扔到附近的一口井里。7月，詹姆斯·尼尔将军控制了坎普尔城，按照他的命令，比布加尔大楼的地面没有被冲刷，保持着其"被血浸透的样子"。这一暴行激怒了不列颠人，他们在印度人民起义的最后阶段，以同等残暴的行为对印度叛乱者进行了发泄式的报复。

"印度人视我们为外国人，是如此多的种族与地区独立的破坏者。这种政治意识是很强的。……宗教意识也反对我们，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是更为危险的因素。"

但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坎宁勋爵的注意，他在1856年，即他担任总督的第一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强调孟加拉军队此后招募的新兵必须接受到海外出征的命令，这是一则与印度教限制人们出国的传统相冲突的法令。当坎宁一反印度所有的传统信仰，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允许印度寡妇再婚时，不满情绪在印度滋长起来。加之传教士狂热地工作，大智胥义兼并了一些独立的土邦国家，这一切都使人们感觉到英国是在集中力量对印度加强基督教的道德教化。



年迈的巴哈都尔沙二世吸着水烟筒斜倚在长椅上。他是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自16世纪以来这个王朝就一直统治着印度。这位皇帝是一个学者型的隐士，喜欢音乐、诗歌、书法，1857年，他被起义者劝服，以其皇帝的权威领导反英起义。起义遭镇压后他被流放到缅甸，1862年死在那里。

谣言开始四处传播。人们听说，印度兵在集会游行时被地雷炸死；印度领主被迫娶克里米亚战役中的英国士兵遗孀，以使他们的财产永久转入基督徒手中；猪肉、牛肉被扔进井里污染了水源等。对伊斯兰教徒来说，猪肉是不洁净的东西；对印度教教徒来说，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857年初，一个印度工人被安排装配新型的恩菲尔德步枪，他被怀疑对一个印度士兵说，发下来的弹壳被涂上了牛油和猪油，结果他很快就被解雇了。这个不真实的故事像野火一样蔓延，4月初它第一次与可能发生暴动的消息一起传入不列颠人的耳中。

1857年5月9日，星期六，2000名欧洲骑兵和稍微多一些的印度士兵立正站在距德里东北70公里处的不列颠军事基地米路德的操场上，毫无表情地看着85名第三轻骑队的印度穆斯林骑兵被强制脱下制服戴上手铐脚镣。还是在17天前，这些新兵已拒绝使用发给他们的新子弹，于是，军事法庭确定这些人叛乱的罪名成立。要求对他们实行宽恕的劝告被当局拒绝，叛乱者被判入狱10年。

卫兵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犯人们上了枷锁。一些人顺从地接受了他们的耻辱；另一些人恳求他们的指挥官、陆军少将W·H·尔伊特给予怜悯。当他们的恳求得不到回复时，就开始责骂同伴们没有帮助他们。在他们被命令赤脚前进时，一些人把他们的靴子扔向曾命令向他们发放弹药的陆军上校。第三轻骑兵团的一个年青的英国军官休·高夫记载道："当时在我们这层军官中有很多人对此不满，由于这种事在不列颠骑兵中还没有发生过，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当天晚一些时候，一个印度军官秘密通知高夫，骑兵团意欲解救他们在



维多利亚女王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的书桌前，陪伴她的是她的两个印度仆人之一——阿布杜尔·卡里姆。从1887年到1901年她去世为止，维多利亚女王一直雇佣这两个人做秘书。维多利亚是英国王室中第一个凭个人志趣统治帝国的人，虽然她从未到过印度，但是在1876年，按照她的意见，她被尊为印度女王。

监狱中的同伴。当高夫将此事告知他的陆军上校时，上校却指责他只是“听到了一个愚蠢的故事”。第二天，米路德营地里的欧洲人议论他们营地中的印度人全都不见了，人们猜测这与城里号召穆斯林起义屠杀英国人的布告有关。但是上、下午都在平安中度过，为晚上教会游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在照常进行。当高夫正在为游行更衣时，一个仆人冲进来告诉他英印士兵营地燃起了大火。

驻扎在米路德营地中的3个印度士兵团全部发动了起义。大约下午5点钟，第三轻骑兵团的人袭击营地监狱，并释放了被拘押在这里的同伴。另一些印度士兵大喊着英国人要解除印度士兵的武装，袭击了弹药库，打死了一个英国陆军上校。当高夫赶到兵营时，遇到了“一群疯狂的、凶神恶煞般的人，要向他们的军官和所有的欧洲人讨还血债”。印度城市的市民很快加入



乌代布尔大君



班提大君



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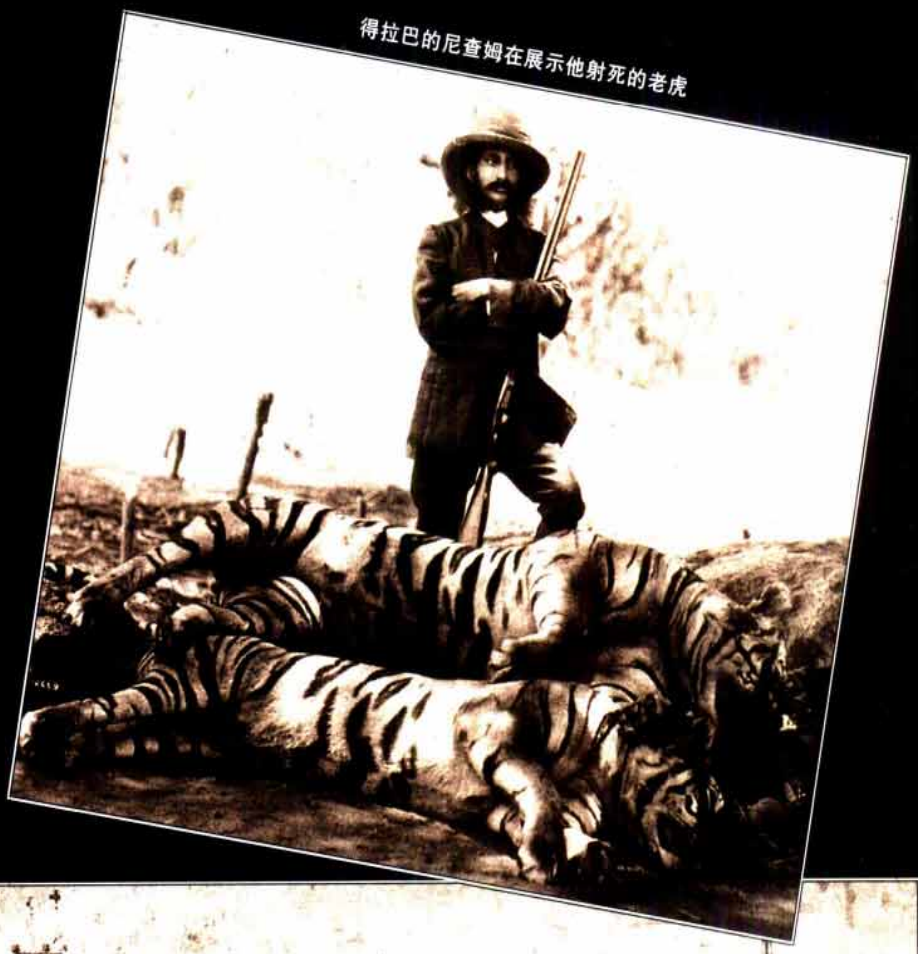


巴洛达盖克沃尔的大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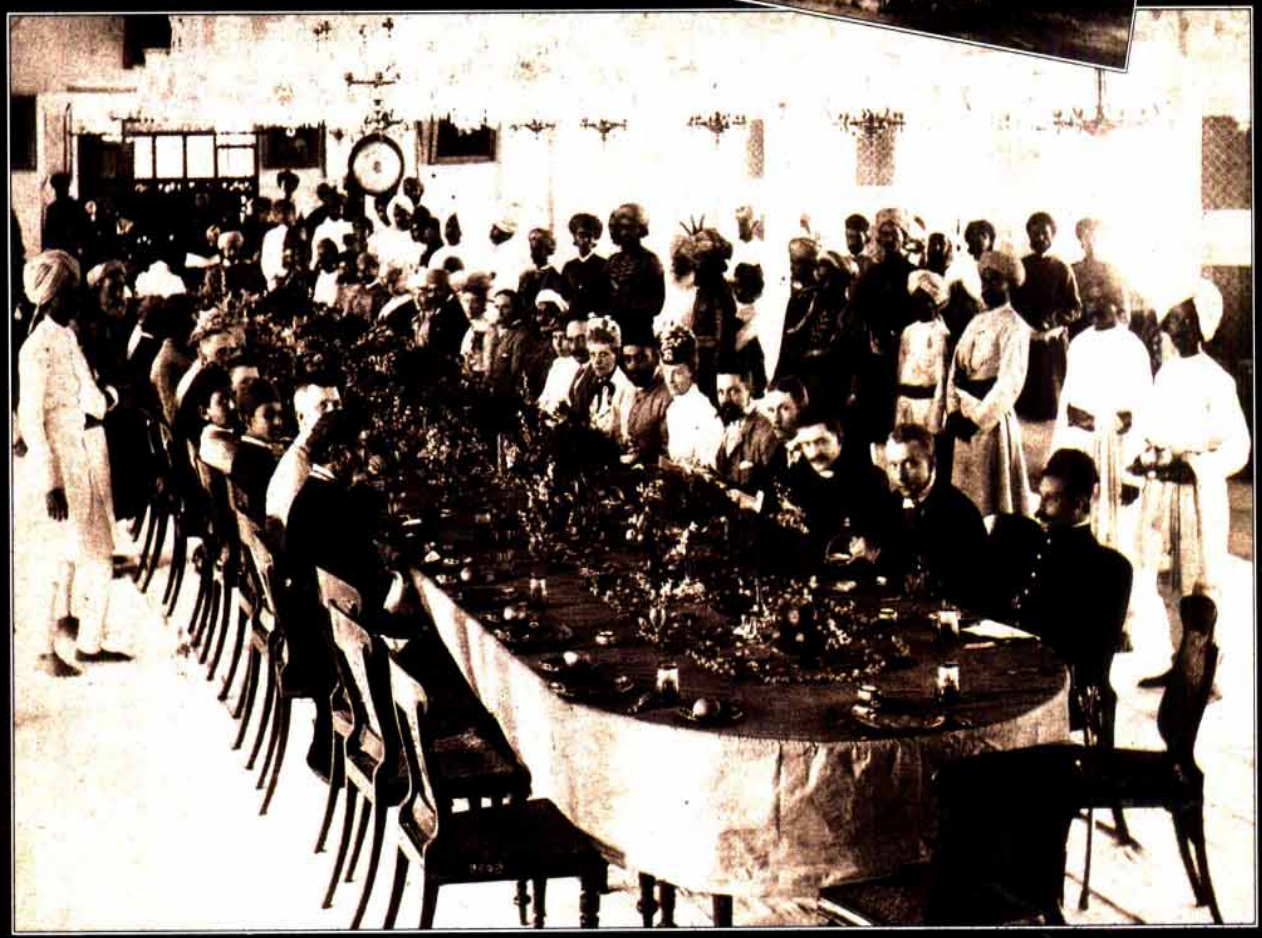
王公们的骄傲

英国诗人、小说家吉卜林写道："上帝创造大君，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奇观。"但作为印度统治的古老传统的保护者，他们也拥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1857 年暴乱之后，不列颠允许近 600 个印度土邦王公对大约占印度人口 1/4 的人群保留其统治权。

尽管祖先的古老习惯仍束缚着一些印度王公，但另一些人逐渐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海得拉巴的尼查姆是最大、最富有的土邦统治者，他穿着剪裁考究的羊毛套装，以猎虎来款待外国统治者，并专设了一位宫廷照相师。一些土邦王公的儿女选择了在伦敦定居，他们在伦敦的豪华生活成为报纸上随笔专栏作家一个迷人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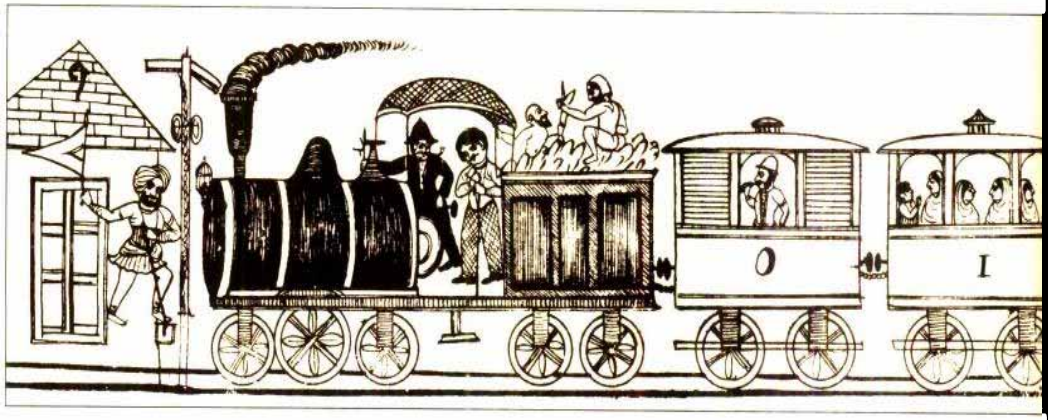
得拉巴的尼查姆在展示他射死的老虎



印度与欧洲的上流社会成员在尼查姆的宫廷宴会上

暴乱队伍，叛军向着欧洲人的生活区进军。一些印度士兵和欧洲居民的家仆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但这时，起义者处于狂热的精神状态下，他们烧毁和掠夺别墅，无视年龄、性别地杀戮欧洲人和印度人。一个英国官员的怀孕的妻子被穆斯林暴徒杀死，这件事常成为英国人在事后解释其报复暴行的口实。当晚，大约有50名欧洲人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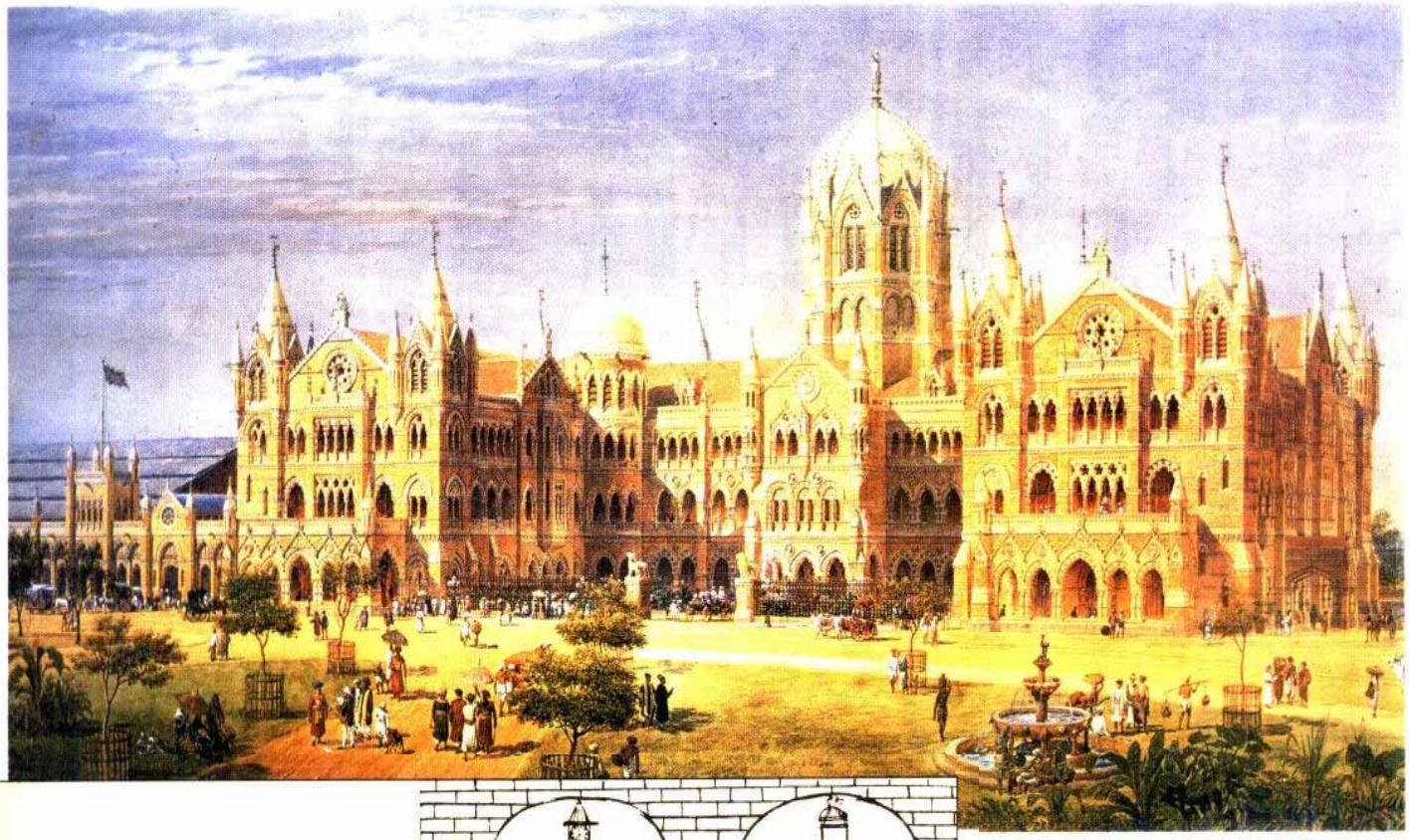
大多数叛乱者相信，英国人会很快进行反击，因此，他们逃离米路德，向莫卧儿王朝的首都德里进发。5月11日清晨，骑兵先锋们在红堡城东部城墙下停下，开始喧嚷着要觐见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巴哈都尔沙。巴哈都尔沙已80多岁了，靠不列颠的年金生活，由于他的服从，不列颠人对他极度信任，即使城内有一个巨大火药库，他们也没有在德里派驻欧洲骑兵。根据巴哈都尔沙的命令，他的警卫司令官命令叛乱者解散。但穆斯林士兵打开城门，一大群起义群众冲进红堡，杀死了他们遇到的一些欧洲人，进入王室辖区。在那里，叛军杀死了警卫司令官和另外几个英国男女，最后在皇帝的禁宫内遇到了受惊吓的皇帝。他们拜倒在巴哈都尔沙脚下，请求他出面领导一场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战争。皇帝尽力推诿搪塞，希望这次起义会在几小时内被镇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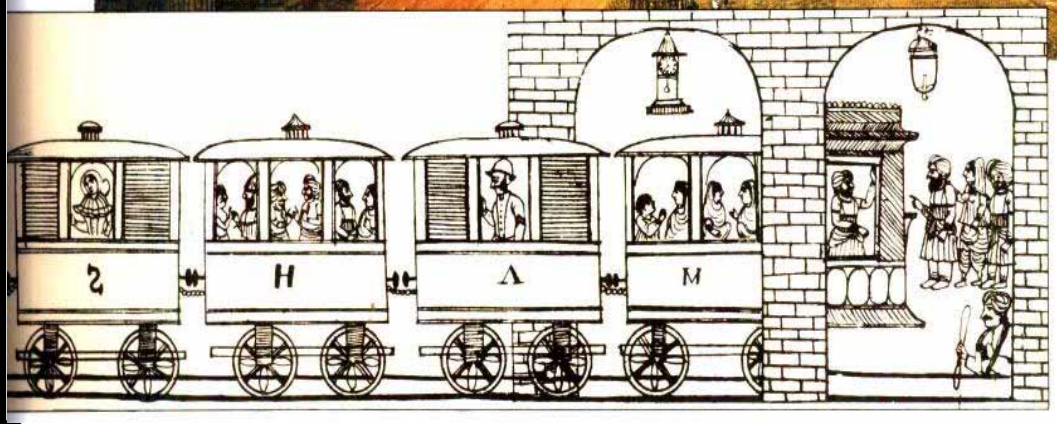


一幅大约制作于1870年的印度木刻画表明，在一辆火车上，印度的男人和女人及不列颠人分别乘坐不同的车厢。孟买维多利亚终点站的富丽景象（对页）表明了不列颠在整个次大陆建设铁路网的规模和重要性，铁路网的建立使纵贯印度南北的旅程可以在几天内完成而不再需要几个星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列颠骑兵没有接到追击叛乱军队的命令；肥胖年老的休伊特将军只担心米路德会更加混乱。整个下午，营地内的幸存者听到了英国军官炸毁德里火药库的隆隆爆炸声。这种消极的反应和夜晚的降临使德里城外的印度兵团深信英国人不会很快发动进攻。他们继续战斗，对巴哈都尔沙施加更大的压力，巴哈都尔沙很害怕、很慌乱，最终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在午夜，21声礼炮宣布，巴哈都尔沙已恢复了他作为皇帝的光荣地位。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说，这似乎应验了一个预言。预言说一支外国力量将统治印度100年，1857年正是普拉西战役后英国人成为孟加拉主人的第100年。对于一些英国人来说，德里的失陷和叛乱的迅速扩大似乎标志着他们在印度统治的迅速垮台。在整个印度只有3.7万不列颠骑兵在与23万印度士兵作战。在孟加拉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英国人逃到船上，以躲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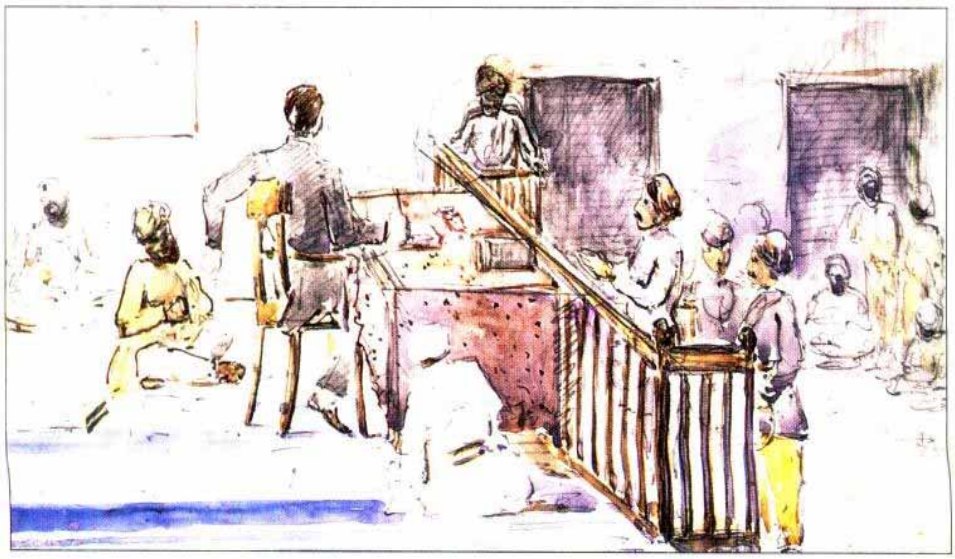
能发生的进攻。在西姆拉，即不列颠人设在喜玛拉雅山脚下的夏都，欧洲人听到古尔哈的印度兵团已经叛乱的谣言后就逃跑了。

然而印度暴乱并没有变成一场革命。起义的最主要支持者是农民和地主，不列颠于19世纪早期进行的土地改革破坏了他们的生活，高额课税和永久契据的使用，使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被银行家和高利贷者占有，这些银行家和高利贷者并不关心他们的佃农，因此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这些不满情绪在起义的冲击下激起了暴力行动。但这些非正规的军队纪律松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方针，也没有得到印度社会其他方面的支持。新近被兼并的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仇恨印度教徒，愿意为不列颠作战，改变古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半独立的王公和受过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了个人利益支持不列颠。总的看来，起义限制在恒河附近的印度北部和中部，而在坎普尔、勒克瑙、德里这几个城市里，起义者的斗争尤其激烈。

6月初，坎普尔的不列颠司令官受命保护在恒河附近的临时露天营地上的900名英国侨民（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任务。他们坚持了8天，在极其猛烈的炮火中损失了60名射击手，更多的人

在58℃高温下中暑。6月23日，防御者打退了一次进攻，他们被劝诱放弃抵抗，条件是叛乱者将使他们安全到达阿拉哈巴德。但当他们刚刚登上等在那里的船只时，炮火就对准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被打死，幸存者大约有200个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带进城，关押在一幢有两个房间的楼房里，该楼房被称为比布加尔，即“妇女楼”。印度领袖担心英军主力会随后而到的，命令他的部队杀死犯人；但士兵们拒绝执行这项命令，于是，起义领袖派来了带着刀剑的刽子手。在这次大屠杀后仅一天，英军的主力部队到了。一个英国官员报告说，在比布加尔的“石灰墙上印下了刀剑的划痕，有些划痕不高，看出来有人在那里战斗；有些却很低，而且在角落里，看出来是有人蜷在那里躲避刀剑的伤害”。

6月底，起义军到达勒克瑙，在那儿，几乎有3000人（其中一半为印度人）在英国统监官官邸里固守。6月30日，固守者派一支部队出击，在与叛军交战后遭受重大伤亡，丢失了5支枪。两天以后，一颗子弹射进统监官府邸内，统监官中弹受了重伤。进攻者以持续不断的猛烈炮火封锁受庇护者，将楼房炸得碎石纷飞，同时，工兵又在防御工事下挖地道试图炸毁墙壁。在里面，被庇护者忍受着疾病、各种害虫和令人恶心的腐败物的臭气。许多印度士兵逃亡，妇女们在爬满老鼠的地窖里讨论她们是否应该自杀，以免落入进攻者的手中。



这是一幅作于1888年的水彩画，在印度西部行省旁遮普任职的一位印度民政公务署的地区行政官在主持法庭审判，他的职员盘腿坐在他的身后，原告和证人站在一个栏杆后面。这个只有20多岁的英国官员可能是这片拥有100万居民的领地的管理者。提交他审理的案件有杀人案，有呼吁反对重税或控诉违法者的案件，他老练地操纵着不列颠法律和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习惯法。这些地方官最终要给所有的英属印度国民一个公正的审判。

9月25日，一支由穿褶裙的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援兵冲入官邸中，但他们无法使守军撤出。因此，封锁一直拖延到10月底，这时，又一支援军在科林·坎普培尔将军率领下已经上路的消息传到了勒克瑙。一个名叫卡瓦那的文职职员自愿请命穿过敌人封锁线去接应援军，并带领他们穿过城市，进入统监官官邸。8天以后，他带着坎普培尔的4000名精壮士兵回到了城内。持续5个月之久的勒克瑙围攻战结束了。在援兵进行的报复性战斗中，被杀死的印度人不计其数，仅在一个要塞中，就有2000名印度士兵被杀，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成为战俘。

与此同时，德里也落入英国人手中。尽管夏季的气温仍然很高，皇帝的顾问们也还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但叛乱者早期的热情却已经丧失殆尽。当巴哈都尔沙坐在他房间里忧心忡忡地写诗时，一支援军已经迅速地接近了德里城。经过一周的流血巷战后，大多数叛军和德里居民在黑暗的掩护下逃跑了。巴哈都尔沙也在其中，但他没有与叛军一起逃亡，而是自己撤退至距德里约10公里的一个墓地中。印度锡克教非正规骑兵团的领导人霍德森得知国

王所在之处后，赶到那里，以他的生命起誓，将国王护送回到德里。第二天他回来迎接巴哈都尔沙的两个儿子和孙子。这时，他却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在城郊亲手杀死了这三个人。

这一行为被他的战友们所赞赏，然而，同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流血报复相比，这一举动还是温和的。在德里，一个目击者吹嘘道："当我们的军队进城后，所有被发现的人都被当场刺死……这些人并不是叛乱者，而是城市居民，他们相信我们一向以温和、宽容的统治而著称。我很高兴地说，他们失望了。"在坎普尔，那些英国妇女被屠杀的地方，英国人让印度战俘们舐干地上已经凝固的血迹，然后将他们绞死。这场战争一直到1858年末才算结束，但死刑执行一直持续到1859年，叛乱者未经审判就被绞死或枪杀，被宣告有罪的叛乱者被捆在炮口上炸成碎片。坎宁勋爵无力控制他同胞的这种

图中是马德拉斯和西印度饥荒中的饥民。在1876—1878年间的这场饥荒中，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这张照片是为了给饥民募捐而拍摄的。英国人在印度挖掘了灌溉运河网，以减轻洪水、飓风和夏季暴雨及次大陆上所有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一系列关于饥荒的法案促进了援助中心的建立，铁路把谷物运往各地，为有能力的人提供有酬工作的计划也有所发展。





不同风格的欧洲建筑装饰着喜玛拉雅山脚下2000米高处的西姆拉主街。在炎热夏季的几个月中(从4月到10月中旬)，印度政府——总督和他的高级官员都搬到这个清凉的山城里。在这里，传言和阴谋在无休止的歌舞和宴会中间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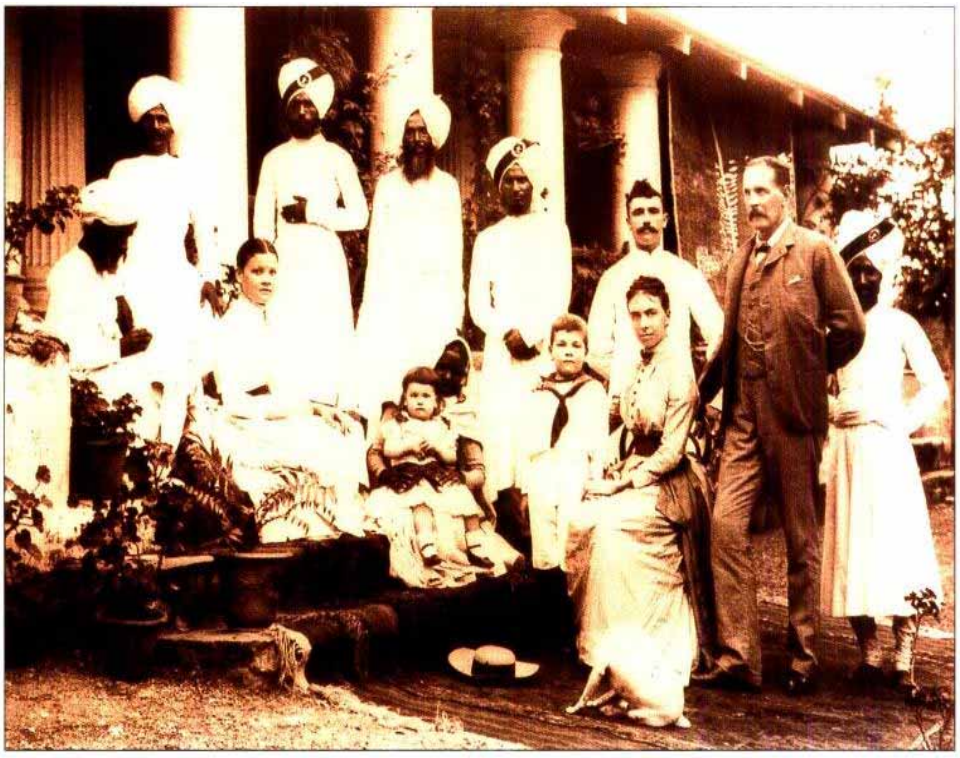
“激烈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行为”。他指出：“政府盲目的、复仇式的惩罚将失去臣民对它的尊敬。”

东印度公司也被判了“死刑”。国会谴责该公司错误估计了印度公民的意愿，1858年的《印度法案》取缔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权力都转给王室，由一个国务大臣负起统治印度的全部权力，并组成一个15人的印度参事会辅佐他。东印度公司的总裁升格为总督，成为英国王室在印度的私人代理，他拥有特权，却没有权力。不列颠的“拉贾”（Raj，印地语意为“统治者”）时代开始了。

权力的转移是相对明确的，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已不仅仅是一个纯商业组织，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已把自己视为女王和公司的臣仆。很明显，为了安全的原因，军队被完全重组，在公司军队中服役的所有英国士兵已被遣散或吸收加入英国军队，印度军队中的大炮被取缔，英国人在印度军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

战后的第一项新政策是废除了前述的“遗嘱无效”法令，承认印度土邦王公是英帝国统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如坎宁勋爵所说，他们是“风暴中的防波堤”。这项政策除了是对那些在叛乱中忠实于英国王室的印度土邦主们的回报，也是不列颠改变其对印度政策的转折点。由于英国保留了约560多个土邦王公对大约占全部印度人口1/4的人群继续实行其专制统治，从而保证了处于分裂中的印度国家在文化上的延续。英国已决定稳妥行事，放弃了他们试图改变印度人民的传统宗教文化的打算。官方禁止干预印度人的信仰，并通告传教士们要减少他们的传教活动，把其精力集中于发展教育方面。从那时开始，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是追求的目标，社会制度则处于次要地位。

英国所承担的公众事业，更多地集中在发展铁路系统上，这一举动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就已开始了。10年后英国人在印度已铺设了700公里长的



一个英国家庭的全体成员——包括他们府上的侍从——站在别墅前草地上留影。1878年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在加尔各答一个小康家庭中有27个仆人，一个单身汉有14个仆人，尽管厨师、佣人领班、花匠和奶妈都很多，但在印度居住的英国妇女，由于她们的丈夫常常因服公役而长期不在家，她们的孩子亦被送往英国的寄宿学校，常常感到孤单寂寞。

铁轨。到19世纪末，大约有4万公里长的纵横交错的铁路在印度境内出现。与铁路同时发展的是有线电报，到1880年电报线路已长达3万公里。同时期，在联合行省、信德和旁遮普地区有300多万公顷的土地由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完备而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

刚开始，印度的铁路使英国经济颇为受益，而对印度经济的贡献远逊于对英国的贡献。因为次大陆铁矿石和煤炭资源丰富，铁路的建设和运行为印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所有铁轨和机车都是在英国生产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大大减少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航行时间，从3个月缩短到3周，甚至用于开动火车的燃煤也是进口的。而且，由于铁路把自英国运来的

廉价商品输送到印度乡村，加速了当地工场手工业的衰落。

铁路、灌溉工程和其他计划由印度民政公务署(缩写为ICS)协调管理，该机构只有1000名勤勉敬业、足智多谋的英国人。赞美这些高层职员的人称其为“天才”，而诽谤他们的人叫他们“小上帝”。他们监视着印度国家和各省的事件，管理着被分割成几百个地区的印度。通过与一位有经验的地区官员学习之后，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可能在他20多岁时就已经负责管理上百万人，并集税收官、警官、法官等多种角色于一身。但这些角色决不是他们的全部职责。他还可能被命令追捕一只食人虎，处理土地纠纷，组织饥荒救助，检查屠宰场和发给学校奖学金。他实质上是一个天才的非专职人员，他被选做管理人不是由于他的智力，而是由于他在英语公共学校中学会了领导的才能和权威以及作为领导人的个人品德。大多数官员都在那种学校受过教育。

地区行政官员也需要有一种对工作永不疲倦的能力：他的特殊责任使他每天要工作24小时，并经常如此。“我们在早上5点钟已经骑在马上，”一个地区行政官回忆说，“在马背上工作2至3小时，骑马检查警察局、马路、桥梁、公共建筑、树木、渡船，处理居民关于土地和财产的纠纷，诸如此类的事情。”从10点到黄昏，这个官员作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很少依赖现成的法律条文，而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机智。“我们通过直觉的启发和自身的公正感判断所有的案件。”

大多数民政公务署的官员都被深深地卷入印度国家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学会了赞美和尊敬印度国民的美德，作为回报，他们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暴乱后仅一年，英国反印情绪仍广泛存在时，一个官员写道：“尽管一切已经发生，我还是无法估量自己对印度人民的兴趣，我喜欢经常在他们之中。”地方官投入艰苦的工作之中，不是为了个人获得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领会到了自己有责任促进国家的发展。“你问我为什么总是思考和讨论灌溉问题？”巴托尔·弗里尔爵士在给不列颠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有人像我一样看到在路边还有没得到掩埋的尸体，或者在进入某一个村庄时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人租地耕种，你就会了解这一点。”

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英国人却毫不妥协地保持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刻板风度，并不向不同于英国的环境让步。在一个孤立的丛林小站上，他们要穿着考究的衣服就餐，而他们的妻子却穿着由英国带来的盛装而汗流浃背。多数人已结婚，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在印度并不缺少英国妇女；每年，还可以看到那些将会成为英国侨民妻子的英国妇女组成的“捕鱼船队”(意指她们来寻找未来的丈夫——译者)来到印度。她们热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年薪300的男人，不管他是死是活”，这指的是ICS职员开始工作时的薪金和死时的



一个印度军队中的不列颠骑兵(左)和印度步兵(右)展示他们的团队制服。不列颠在印度的许多兵团都由来自英国的正规军和在印度当地招募的印度人两部分人员构成。在印度军团中的所有高级官员都是不列颠人，但一个忠诚的印度人可在军队中被提升为由英国总督任命的军官，指挥一个连队。印度人民起义之后，英军中有印度骑兵13.5万人，英国骑兵6.2万人，比例大约为2:1。

抚恤金。为了安置军官们的家属，当局建立了新的城郊住宅，在其楼上修筑了伸向街心的平台，下面是宽阔的街道，便于军队的行动；这些军营中有他们自己的购物中心和教堂，以及英国士兵的营房，他们与附近印度人社区的亲善行为，常受到官方反对。当假期到来时，他们喜欢回到英国度假。

各级文职人员之间在行政关系上有严格的规矩准绳，在英国人和仰慕英国社会的非欧洲人之间也有严格的界限。在那些仰慕英国社会的非欧洲人中间有一些人是盎格鲁－印度混血儿，尽管他们几乎没有看见过英国，但他们大都是基督徒，把英国视为自己的家。说英语的印度人可以在政府中当雇员。事实上任何种族等级的印度人都不像这些职员和那些玩笔杆子的书记员那样更遭人轻视。人们称他们为“巴布斯”(babus)，这是一个含轻蔑意义的专有名词，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格外受保护的皮鞋，他们处事的英国方式，只能证明他们在这两种文化间的尴尬地位。



尽管1853年英国官方发表声明，管理印度的文职官员将采用考试选拔的方法，并对所有在印度出生的男孩开放，事实上，它仍由伦敦支配——从19岁到23岁的狭隘的年龄限制，有效地把印度人排除在外。到1869年为止，只有一个印度人萨兰得拉纳斯·巴内杰亚成功地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却被取消了被选拔任用的资格，因为他的年龄与4年前在一所学校中所报的年龄不吻合。在他反对这个决定的诉讼取得胜利后，他担任了3年文职人员，后来因一个小失误被解雇。因为被解职，他无法找到合法的职业，遂回到加尔各答。在那里，他当过教师、记者，1876年他成立了孟加拉第一个民族政治组织——印度联合会。

在巴内杰亚的联合会发行的刊物中，集中批判了文职人员参加考试的年龄限制，反对关于禁止印刷印度文方面的立法，批判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兰开夏的棉布商品占有了印度棉布市场。但这个组织并非民族主义组织，巴内杰亚也知道，民族主义者只有建立一个能将全印度人的呼声统一起来的论坛，他们的要求才能被英国人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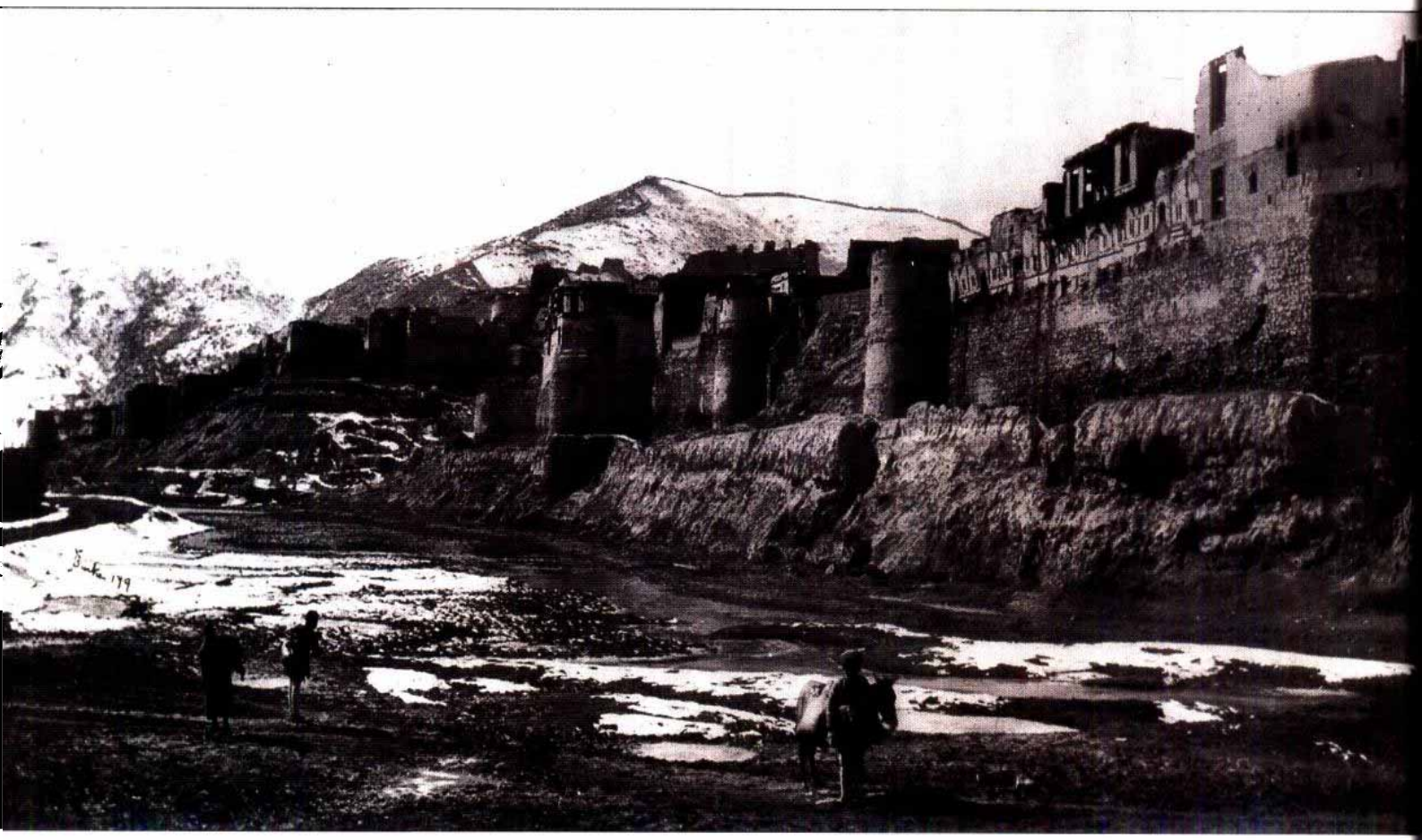
英国人已为印度的统一去除了一个明显的难题：通过在培训律师、教师和低级官员的学校里教授英语，帮助印度人打破了原来使印度各地区处于分裂状态的语言障碍。也是英国人向民族主义者揭示，统一的行动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功。

188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里庞勋爵试图允许在英国司法机关工作的印度职员参与审理与欧洲人有关的刑事案件。早在一年前，具有改革头脑的里庞勋爵就试图建立自治都市和地方政府委员会，任用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官员和商人。他认为，不去使用一个人的才智“不仅是错误的政策，也是能力的纯粹浪费”。这项改革在文职人员中立即引起反感，遭到反对，而且新措施在印度的所有英国人社区内引起强烈愤慨。

对这些建议的公然抨击者是那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你喜欢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吗？”一家英国报纸写道，“在那里，你的妻子随时可能因为打了一个仆人（印度的保姆或女仆）受到被判监禁3天的责罚。那个古铜色皮肤的，可能是尊奉林伽神的异教徒法官，一定喜欢任何一个可以侮辱白人而不受惩罚的机会。”答案当然是“不”。里庞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被人们所唾

弃；性情鲁莽的人阴谋策划欲将他绑架起来送回英国；文职人员们也宣布反对这一政策。在压力下，里庞屈服了，与反对者达成了妥协，最终保证印度人将不参加对英国犯人的审判过程。

对于孟加拉的知识界，这一结果使他们在政治上大开眼界。如果只是10万欧洲人就能通过公众呼声打败英国的印度统治当局的决定，那么由更多的2.5亿人组成的民族怎么会得不到决定性的胜利呢？两年以后，从印度各地选出的73名代表在孟买集会，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些人中，大部分为印度教、祆教的律师、教师和记者，只有两名伊斯兰教徒，没有贵族。最有名的赞助



者之一是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姆，他是一个绅士，25年前因对于叛军“过于宽大”，曾遭受同胞轻视。

另有一些不列颠人支持国民大会党最初的温和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当局更广泛地雇佣印度人任公职。但殖民政府受命保持古老的王国秩序，因而认为这个代表新的职业阶级的国大党没有代表性。这是很多非印度人共有的态度。著名人士赛义德·艾拿默德·汗爵士——一个亲英派知识分子建立了穆斯林的盎格鲁东方大学，努力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引进政治和经济权力的

范围内。他说“印度是由不同民族共同居住的国家”，他认为国大党的行动“对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穆斯林，是充满危险和苦难的”。在他建立的大学中滋生了分离主义情感，这成了1906年建立的伊斯兰同盟的基础，并最终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分治。

印度国民大会党内部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很快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分别以温和派领导哥帕尔·克利希那·哥克海勒和极端主义者波尔·干加哈·铁拉克为代表。虽然哥克海勒是一个印度爱国者，但他敬佩西方文化，他相信英国人是有益的改革力量，将帮助印度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与此相反，铁拉克



图中展示的是位于阿富汗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堡垒，在1878—188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它遭到英军猛烈进攻。在印度西北部边境一带，战争不断爆发，英国企图通过战争控制阿富汗，以抵抗俄国的扩张，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场激烈竞争，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大竞赛”。阿富汗部落，特别是阿夫里迪人部族（右图）的猛烈抵抗，使英国人屡遭打击。1887年，英国与阿富汗签订了边境条约，此后不再更多地干预阿富汗事务。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动员大批正宗的印度教徒去恢复马拉塔时代的光荣。例如，1891 年，他怂恿传统主义者极力反对一项关于保护童养媳的议案，该议案主张将童养媳的最低年龄从 10 岁提高到 12 岁。1897 年，当一场瘟疫在他的政治基地浦那流行时，他激烈地攻击英国人建立患病者隔离营的措施，开始明确宣布暗杀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武器。几天后，他的两个追随者打死了一个英国官员和一个陆军中将，这两个人是出席了庆祝女王即位 60 周年的宴会后在归途中被打死的。铁拉克与凶手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因煽动反叛罪而被判入狱 18 个月。

尽管在最终目标上温和派和极端派有很大不同，但印度国大党仍能团结一致，因为两者在一些最直接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尤其是在英总督政府不



仅未能提高印度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没能对饥荒和自然灾害提供有效的援助措施这一问题上——这场灾害导致了1895—1905年印度人口的下降。印度政府每年全部收入的大约25%被用来维持政府机器，尤其是当年的军费。几乎公共费用的1/3用于军事，在世纪之交，这支军队正在边境上从事着劳民伤财的战争。也有许多钱被铁路网吞没，它的大规模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用于铁路建筑的资本主要是在伦敦筹集的，但这投资的利息却要由印度纳税人来偿付。对许多国大党的成员来说，英国似乎只关心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印度。



图中是1903年的一次觐见仪式，印度土邦王公们列队穿过德里。英国采用了印度的一个传统觐见仪式作为笼络印度王公使之忠诚的手段，总督寇松勋爵（上图）为这次觐见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把它作为帝国主义者理想的庆祝会。寇松甚至禁止人们在此期间唱一首特别的教堂赞美诗，因它不适当地提醒人们帝国"有盛有衰"。

印度人的不满情绪在1898—1905年寇松担任总督期间沸腾了。他的任期在开始时很有希望：他消息灵通、工作勤奋，全身心地投入一次多方位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他调整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改善治安服务，并将西北边境改成一个省以使其和平安定，还使当地的帕坦部族承担该省治安工作。他一天工作14个小时，亲自监管每个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卓有成效的指挥下，铁路网增加了1万公里，灌溉网覆盖的地区增加到400多万公顷。他对印度古老遗迹正在被破坏而感到震惊，因而提出了一项保护计划。

但寇松的管理天赋掩盖了他缺乏基本的政治判断这一弱点。作为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来到印度是"禀承上帝的旨意，使千百万人民长期受益"；而且，也许同许多英国人的普遍看法相同，他认为印度是一个不变的社会，英国统治者只要小心不触怒土邦王公和其他印度传统的上层社会，它将能保持它在印度的长久统治而不受任何势力的挑战。这个观念使他看不到真实的变化已经发生。他低估了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受其他各阶层人民欢迎这一事实。在孟买和孟加拉，棉布和黄麻纺织工业正快速发展，商业企业也开始反对英国人的不公正统治，工厂中产生了新的工人阶级。领导宗教复兴运动的组织已出现。这些组织的基本信仰与政治抱负已结合起来。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和被关在狱中的铁拉克的暗示，组成了秘密的恐怖主义者团体。

1904年寇松派一支远征军到西藏首府拉萨，在英国政府挑战式的命令下，他强迫西藏人接受英国作为其统治代理人。对印度人来说，英国好像倾向于用他们国家的税收去成功地统治整个亚洲。寇松提出的在政府严密控制下建立大学和私人院校的建议，被印度知识分子视为试图限制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抑制民族主义增长的措施而流产了。到了

1905 年，当寇松开始他的第二届任期时，他的支持者已经相当少；在几个月中对他的反对变得很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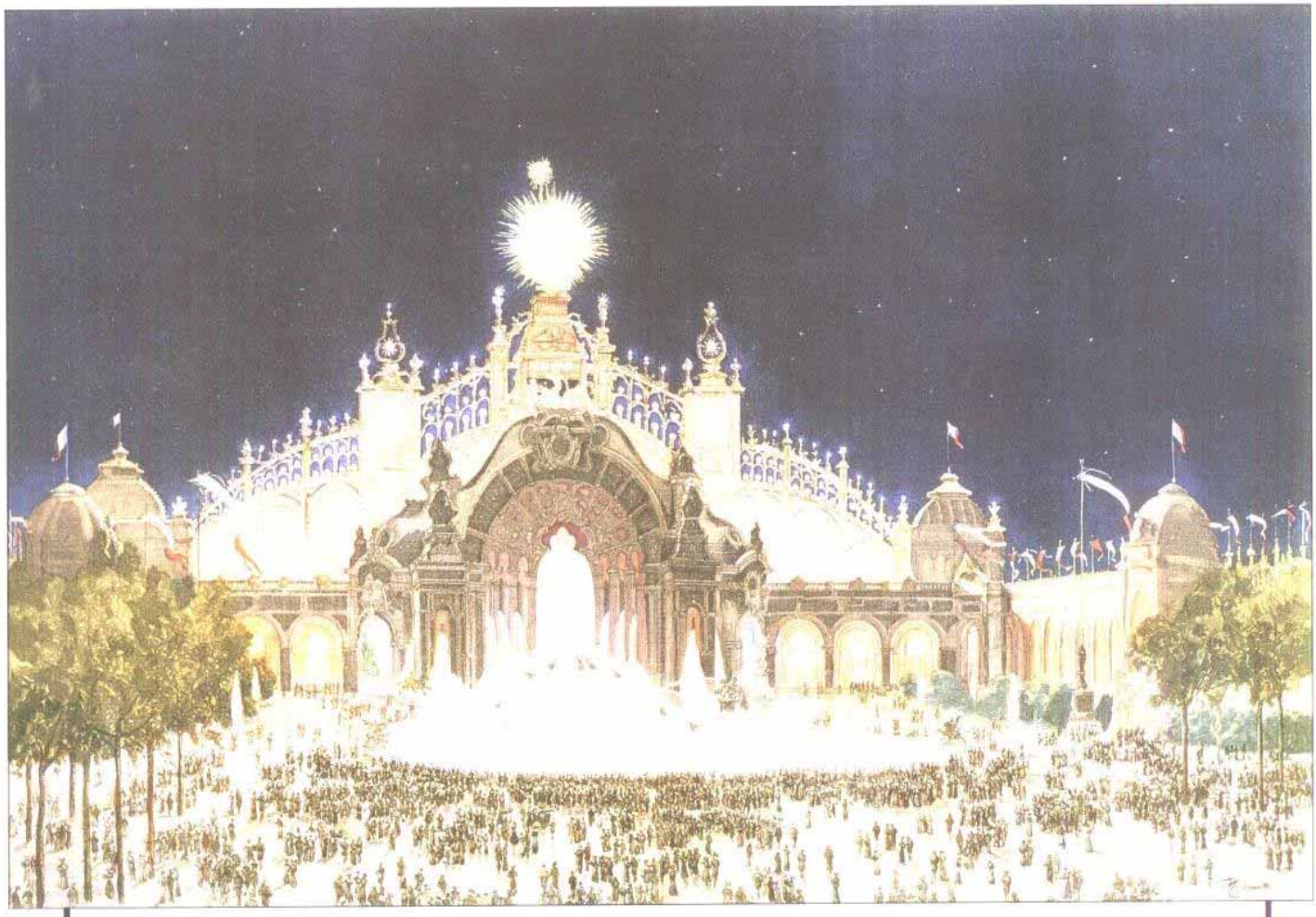
孟加拉是反抗的焦点。这里大约有 8000 万人口和 50 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块土地面积太大，人口太多，乃至于很难由一个省督有效地统治。寇松没有征询印度人的意见，就决定通过划分行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孟加拉省东部的 3 个人口稠密地区划分出去与阿萨姆省合并，形成新的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首府设在达卡。寇松进行分治的理由是要加强行政管理的效率，但他也了解，这种改划政区的举动将使统治者在政治上占有优势。他的一个前任官员写道："统一的孟加拉是一种力量，孟加拉的分治将使这股力量分散开……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分裂它并削弱反对我们统治的实体。"

确切地说，分治是如何对待主要集中在孟加拉省的信奉印度教的中产阶级——即印度民族主义领导者——的政策问题。新的省区以教育落后的伊斯兰教徒为主体，而在孟加拉西部地区，印度教徒人数将大大少于那些不说孟加拉语的人群。印度国大党主席戈卡莱(他一年一度召集的会议现在吸引了 1000 多代表)攻击这一分治计划是"官僚统治现有制度的最坏特征的完全说明——它完全无视民众的意见，狂妄自大地自视为最高智慧的代表，粗暴地蔑视人民最珍贵的感情"。

寇松毫不动摇，坚持说分治"不会引起任何困难，是在人们普遍同意下实现的"。他错了，在苏兰德拉·班纳吉(他以"决不屈服"而著称)的领导下，孟加拉人举行了大规模抗议集会，并开始了抵制英货运动，尤其抵制兰开夏的棉布，并提倡使用印度产品。这项运动是有效的，1908 年棉布的进口下降了 25% 以上，印度的纺织工厂以最快速度进行生产以满足人们对布匹的需求。国大党第一次显示出它能得到人民支援并组织有效行动抵制英国统治。

人们的抵抗并不限于非暴力行动。从 1906 年起，恐怖主义团体把他们的信仰投入实践，他们两次企图谋杀孟加拉代理总督，而在 1908 年，两个英国妇女被一颗意欲炸死英国地方长官的炸弹炸死。一次冲击开始了，在英国的长期统治中形成的墨守成规的管理方式无法灵活地面对这样的一次挑战。

英国的拉贾统治将再持续 40 年，但很多人已明白它正进入最后阶段。英国的统治并不是完全不公平：在 19 世纪，印度已获得了很多物质利益，从铁路、灌溉工程到学校、医院；而英国的公正统治，尽管不尽完善，却为千千万万的印度臣民带来了和平、稳定。但更多的思想敏锐的英国官员知道他们的长期统治将结束，这是必然的。1838 年查尔斯·特里威廉写道："英国和印度这两个相距这么遥远的国家之间的现存联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没有任何政策能够妨碍这里的民族最终重新获得独立。"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能重新改造印度，但不是占有印度，当帝国主义模式变得僵化、易碎的时候，英国的拉贾统治将被打得粉碎。



1900 年的巴黎，人们惊讶于电的宫殿所展现的耀眼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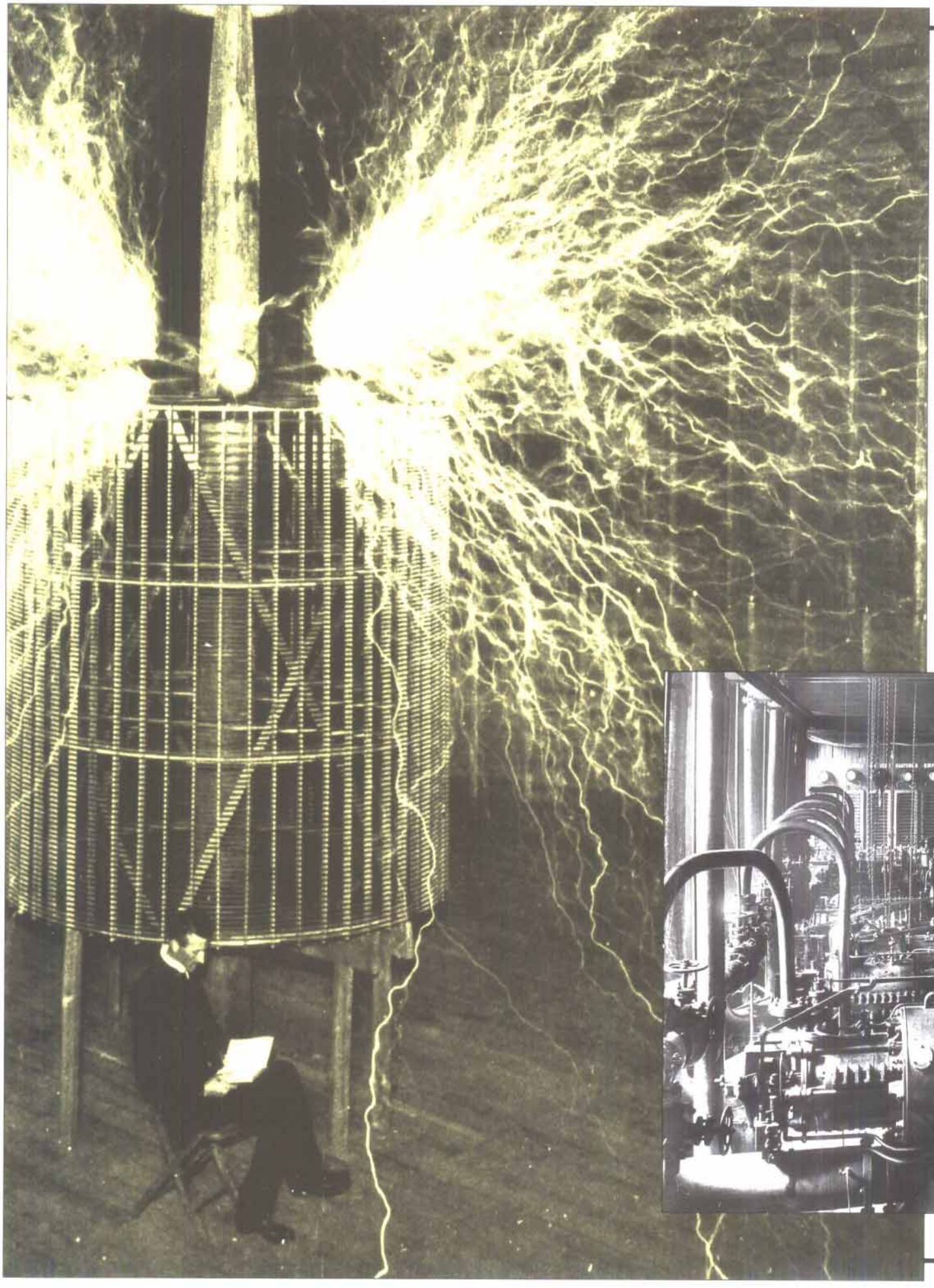
进步之光

对于 19 世纪末的繁荣的工业世界来说，进步及发展是沐浴在耀眼的电灯光下的。从戏剧舞台上耀眼的弧光灯，运动场上普照的探照灯，使用电力的海上灯塔，国会辩论讲坛中的辉煌灯火，到光怪陆离的百货大厦及明亮舒适的个人住宅，电把一种新的能量带入人们的生活中，它将以此前人们未曾想像过的方式改变世界。

很久以来人们就认识了静电现象，但如何产生持续电能的课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科学家。在前人发现了磁力与电力的联系之后，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在1831 年展示了电磁感应原理，使金属传导体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电流。到 1850 年，几个国家已生产出简单的发电机，这些发电机能将机械能转换成电流。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西门子发明了实用发电机。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接过发明的接力棒，在 1879—1882 年申请了225 项新装置的专利——电灯保险丝、插座、开关和电表等。到 19 世纪末，美国成为电力发展的先锋。

1900 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了大型展览，整个展览的戏剧性场面都仰仗这种新近被驯服的力量。一个评论员写道："没有电，这个展览会仅仅是毫无生命力的一堆展品……只须将一个手指在开关上一按，魔术倾泻而出，电的宫殿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光和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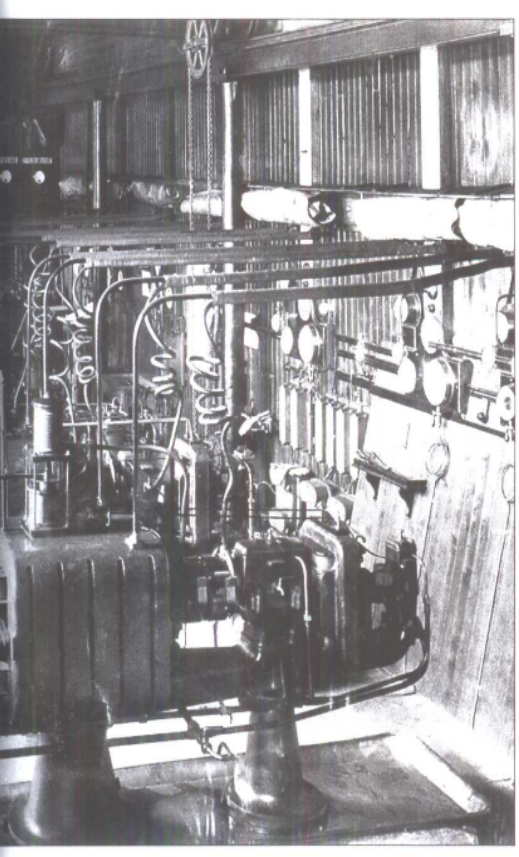
用线路输送电力

在建立起商业性的电力工业之前，必须先保证电力的产生，并将电流输送到用户那里。早期电力公司从水流中获得能量，但 1844 年以后，高效率的石油汽轮机能够产生发电机所需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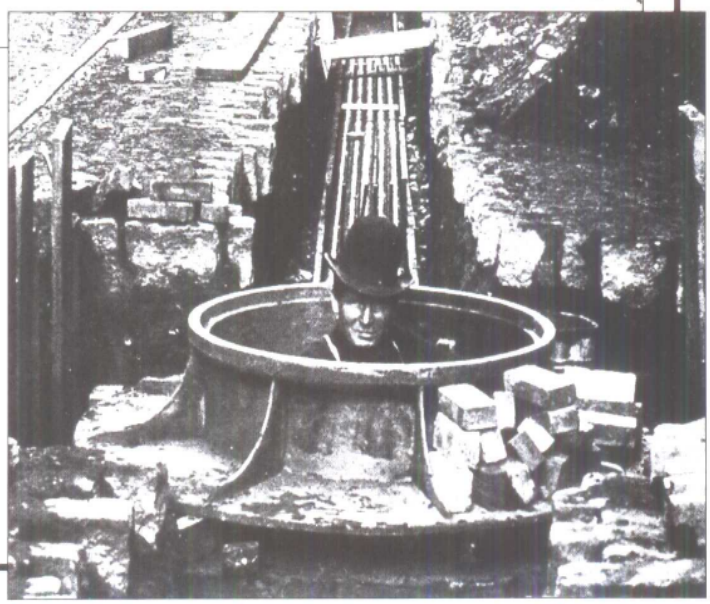
最早的照明系统使用当地的发电机，但是，人们发现了提高电压将电送到远处的方法后，电站就可以迁出城镇，电缆则能够把电流传递到日渐增多的用户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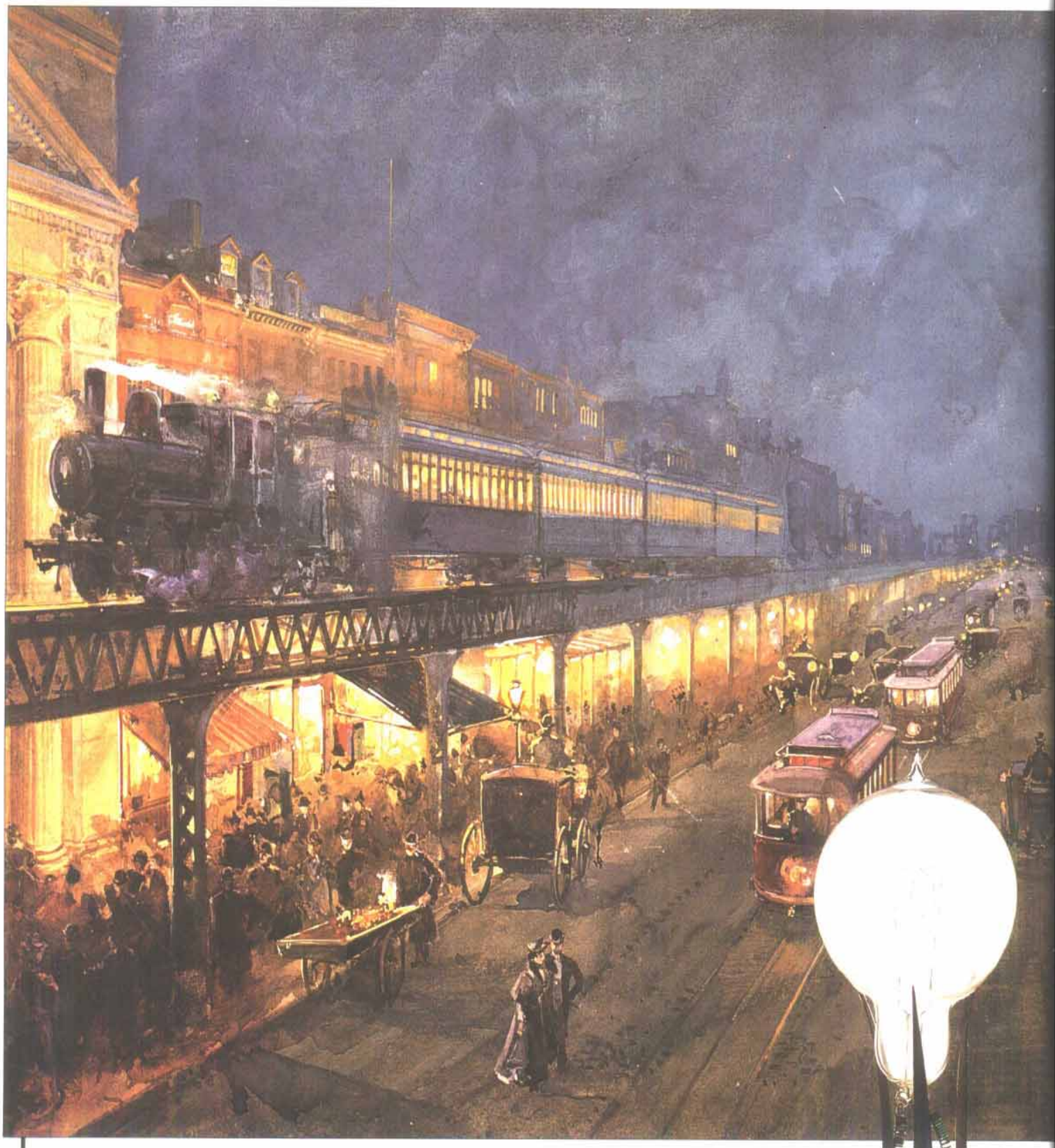
尼古拉·特斯拉是一个十分有天赋的美国人，他是爱迪生的合作伙伴。他沉着地在 1200 万伏放电的爆鸣下指挥一次达到美国最高电压的试验。



1888 年，纽约的电话线网在无数线杆间悬挂摇曳，它们几乎无法承受大风雪的袭击（上图）。爱迪生认为地下干线是惟一安全的电力输送方法，他训练他的技工在街道地面下铺设干线（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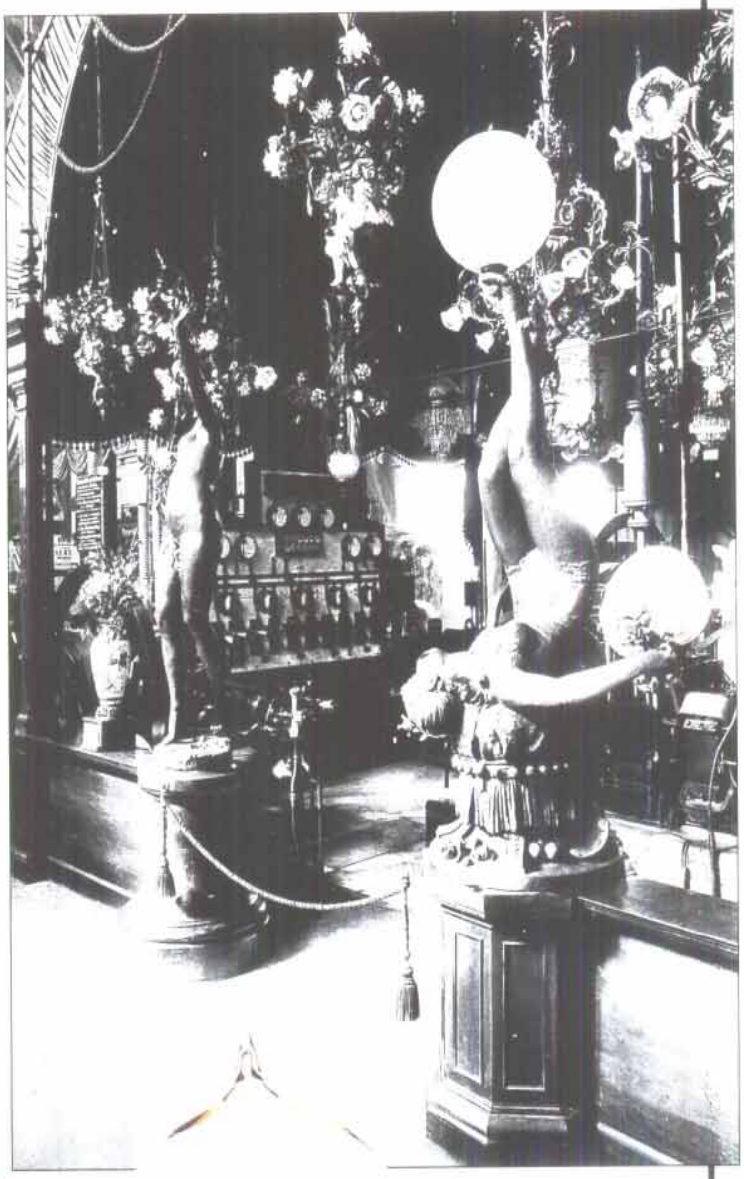
1892 年，英国蒂恩河畔纽卡斯特福斯班克电厂的汽轮发电机组为发电机提供动力。



这是路易·松塔绘于1895年的画，当明亮的电灯驱走了人行道上的黑暗时，纽约波威里区充满了活力。在街道中心驶过的缆车于1899年实现了电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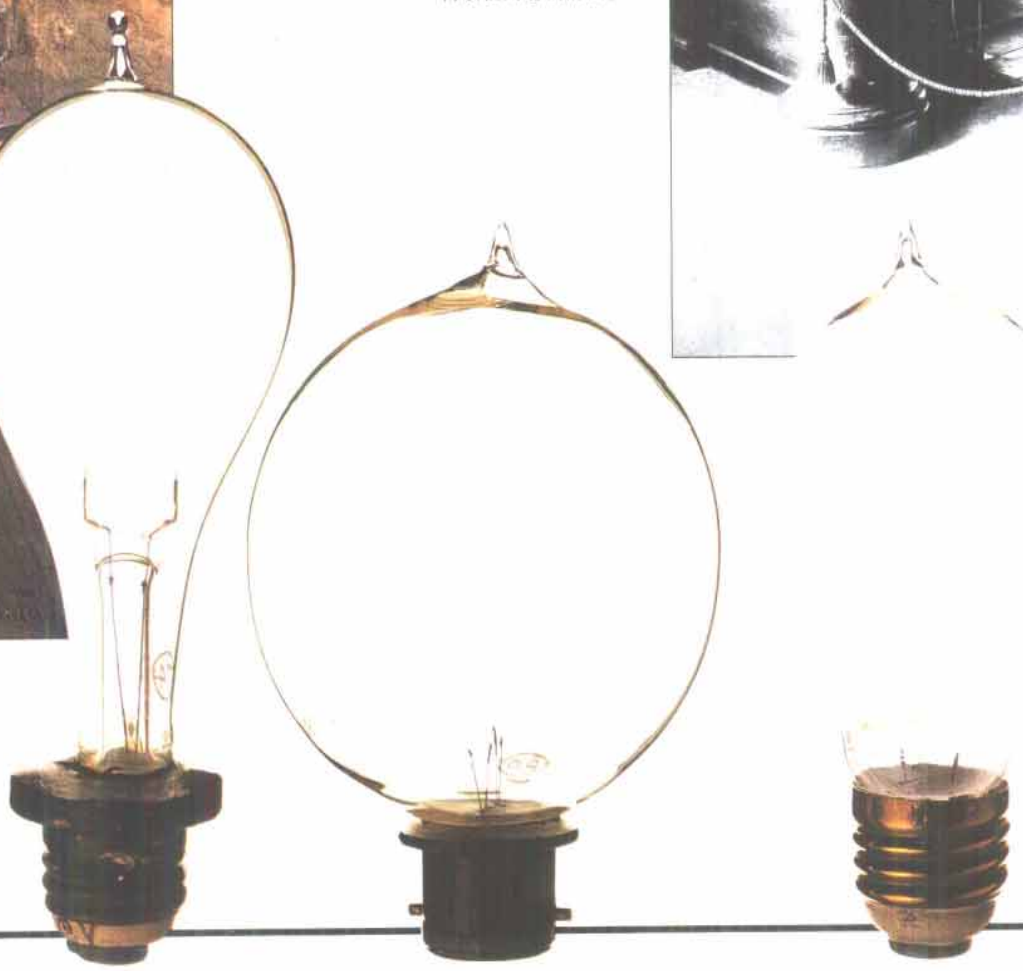
使夜晚亮起来

由电力这一新的方便能源引起的最早、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街道、电影院和家庭照明。最先出现的一种弧形灯泡是使电流在两个弧形碳棒之间交叉跳跃而发光，但它发出的光太亮，不适合家庭使用，却在门外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恰似半打满月在斯特朗大街一下子放出光芒，”一个当时的伦敦评论者说道。接下来是经过改造的白炽灯泡，灯泡内的细丝在电流通过时发出光亮，提供了干净方便的光源，也使那些有能力安装电灯的人们为追求时尚而消耗其存款。



1891 年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电器展览会上，各种富有魅力的灯具在展示中吸引了喜欢使用它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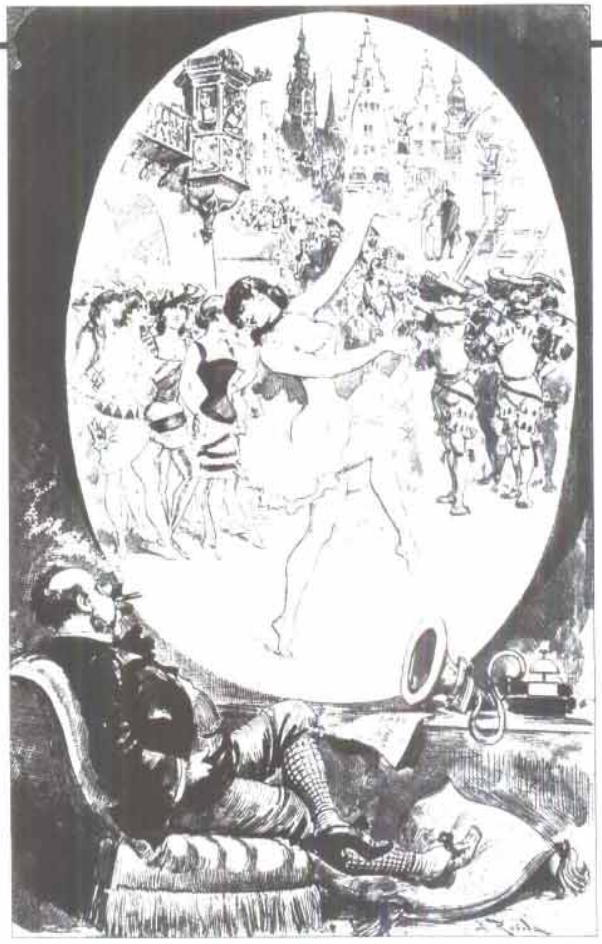




美国的爱迪生和英国的约瑟·斯万于 1879 年发明了灯泡，图中所示的 4 个白炽灯泡揭示了此后其形状的变化。从左到右：嵌在一个金属框架上的斯万灯；1880 年用爱迪生喜欢使用的竹丝材料制作的灯泡；由相连的两个灯丝照明的、可使用高压电的灯泡；1890 年爱迪生设计的带螺旋帽的灯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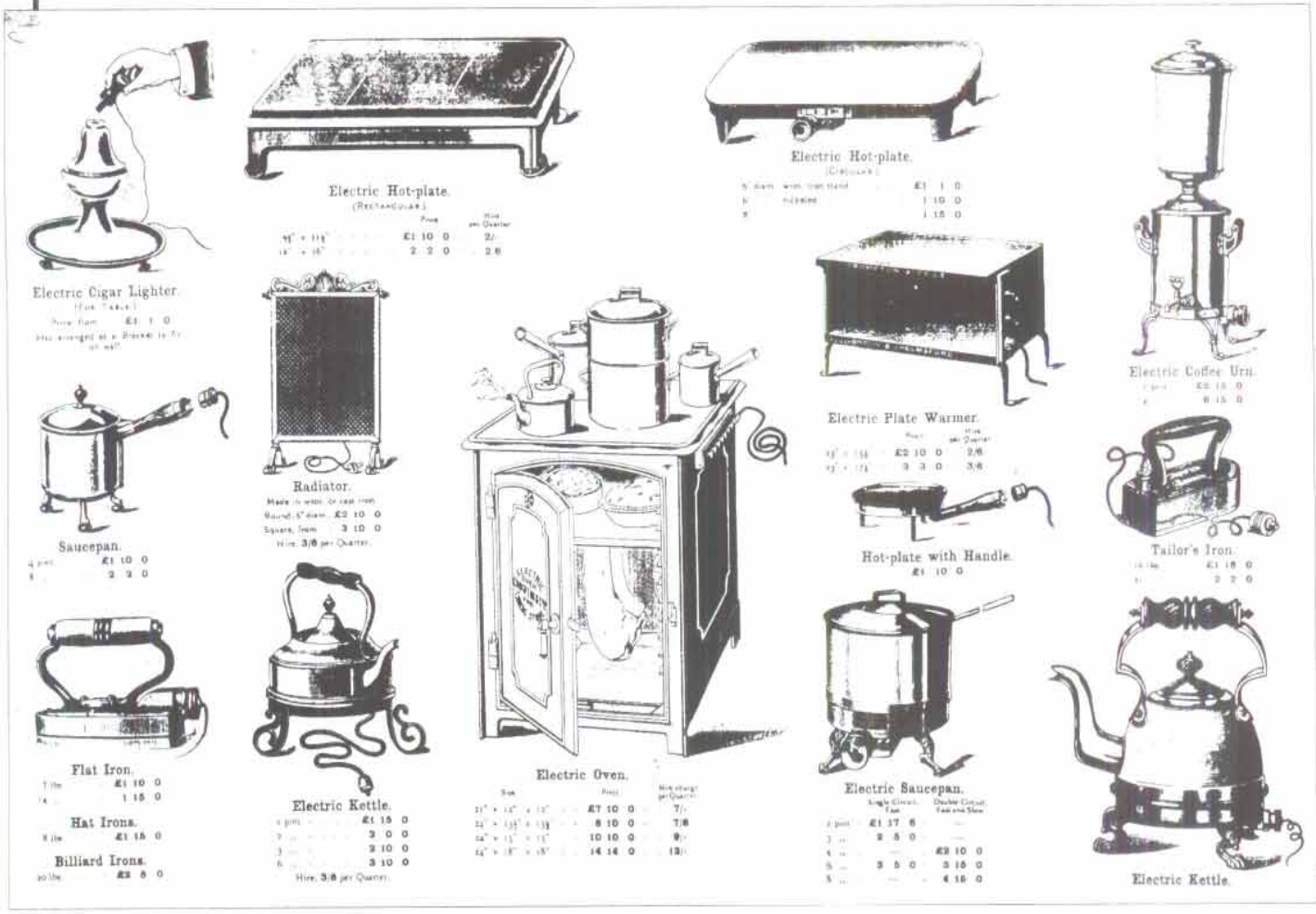
1863年，这一古老世界的图片通过电报从马赛传送到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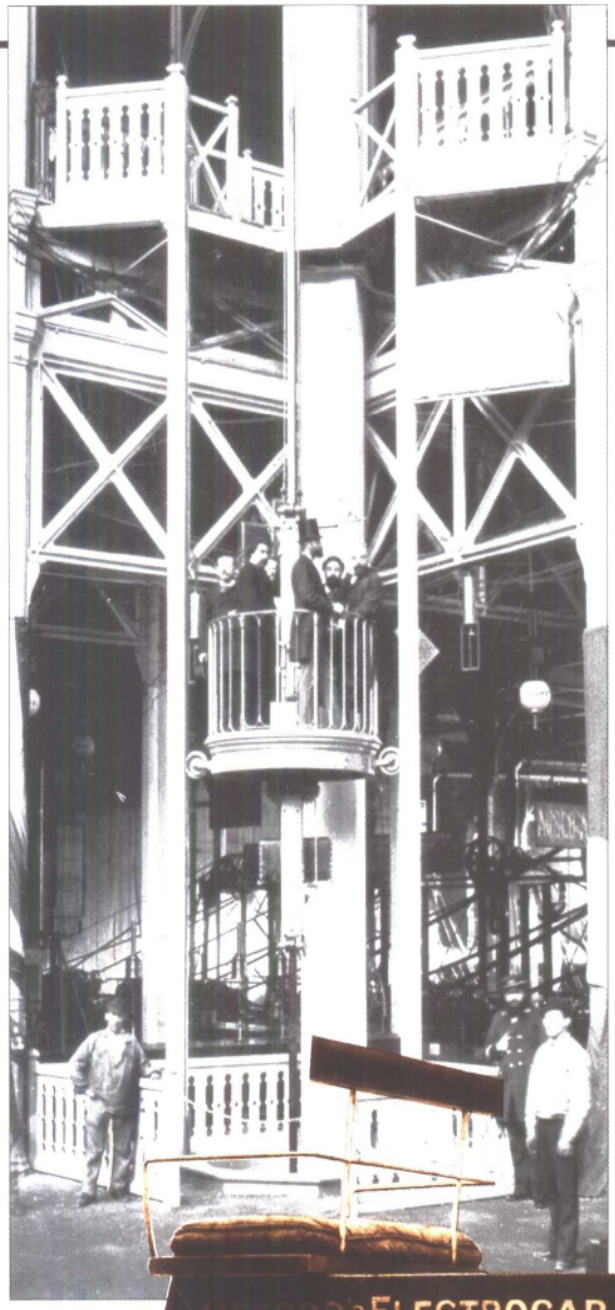


这是法国的幽默作家阿尔伯特·罗庇达于1883年作的一幅画，它描绘了一个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的幻想：图像和声音直接传到坐在家中壁炉旁边的观众面前。

伦敦电力供应公司1894年发行的货物价目表，上面登有一大批供出卖或出租的家用电器广告，目的是以此方式促进人们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对电器的需求。



未来的资源



1881年巴黎电器展览会上，参观者高兴地乘坐电梯上上下下，这种电梯是西门子公司为住宅楼和商场而设计改进的。西门子公司是第一个生产大型电动机、电车、电梯和工业机械用电动机的公司。

干净、安静、可靠的电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许多发明者努力使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早期电器装置并非没有危险：19世纪90年代电暖炉的控制仪表板上严格标明："必须警告使用者，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要把开关浸入水中。"由于人们对家庭中简单便利生活的不断需求，加之对通讯、交通和一些对后来的发明者有特别启发的理论（其中有些已被后来的发明者证实），电力工业在20世纪呈现出很强的上升趋势。



1896年的一台奥福德电车。它的速度很有限。尽管电车干净、无噪音，但它在速度和行驶距离方面无法同靠汽油驱动的交通工具竞争。



铁血宰相俾斯麦

2

“威廉皇帝陛下万岁！”高昂的欢呼声在距巴黎20公里外的凡尔赛宫的镜厅上空久久回荡，这些呼声宣告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的登基，这是1871年1月18日。600名来宾——王公、公爵、大公、将军、各部部长和外交官员突然打破了庄严肃穆的气氛，齐声欢呼起来。弗里德里希王储在日记中写着：“大厅内，雷鸣般的欢呼声至少重复了6次。鲜艳的旗帜在德意志的新任皇帝头上拂动。”

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已于1806年放弃了帝位，而且，事实上，他的王国即神圣罗马帝国，早在200年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现在，将各片讲德语的地区统一为一个新的帝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战争的推动，这场战争以1870年法国失败和德意志军队进入巴黎而宣告结束。然而，德国的统一首先是那位身材高大、强壮、留着灰白胡须的俾斯麦的坚强意志和精明的政治手腕的结果。为了出席这一庆典，他特地穿上那身普鲁士将军制服，独自站在排列于镜厅中的达官贵人们的最前面。

当加冕典礼接近尾声时，威廉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重要人物。他走出大厅时，与俾斯麦擦肩而过，同其他将军们一一握手。然而，奥托·冯·俾斯麦并没有因威廉的这一举动而愤怒。对于他来说，政治野心的实现已使他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威严，他已经主宰德国政治将近10年，并将在以后的20年中继续这样做。俾斯麦自己一直否认其个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退休后的岁月中写道：“人既不能控制时机，也不能引导它的方向。人惟一能做的，只是凭借着或多或少的技巧和经验跟随它前行。”但历史证明，俾斯麦是欧洲最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不论是成功的政客，还是被他激进的政策挫败的政敌，都从他对待成功的这种谦虚的态度中受益匪浅。

19世纪40年代，讲德语的地区有39个各自为政的邦国，其中有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公爵领地和大公爵领地，它们的名称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要的影响。在这一系列邦国中，屹立着两个巨人：奥地利和普鲁士，它们也各自由若干块领地组成。幅员辽阔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着许多不同民族的居民，其中包括大量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以及伦巴第的意大利人，还有其他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居民。普鲁士王国分为相互独立

奥托·冯·俾斯麦画像，他于1862—1890年任普鲁士首相。1871年起担任德国宰相。由于他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念，德国最终由一个分裂、落后的国家变成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俾斯麦还是一个善用手腕的机会主义者，他运用战争和外交双重手段，最终实现了统一德国的目标。

的两部分。一部分包括普鲁士首都柏林，沿着波罗的海向东延伸，囊括了现在的波兰西北部地区以及格但斯克港南部边境，包括矿产丰富的西里西亚地区。另一部分为莱茵河畔的西普鲁士区，由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兰的各行省组成，面积比前一部分小得多，但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一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它在德意志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时期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815年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会议企图通过监管德意志联邦组织而在这片混乱的地区建立秩序，此时的德意志联邦还只是政治上的联盟，其疆域包括奥地利的大部分和普鲁士以及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所有联邦成员国都派代表参加奥地利在法兰克福主持召开的会议。这一联邦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将四分五裂的中部欧洲团结起来。在奥地利保守派政治家梅特涅公爵的领导下，德意志联邦有效地控制了其成员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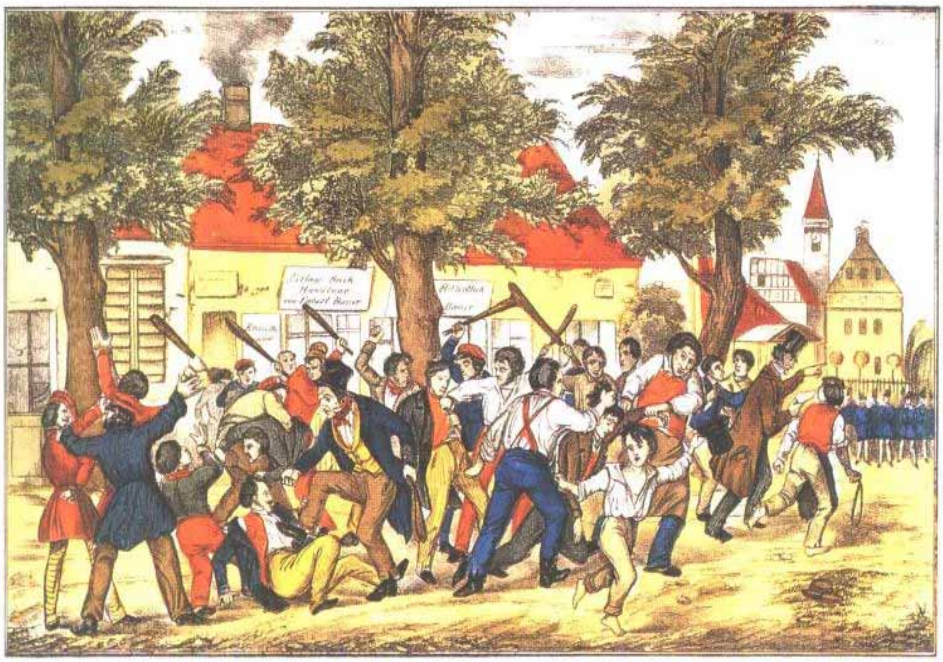
梅特涅极其热衷于镇压民族主义运动。在他眼里，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对已建立的秩序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好在欧洲中部国家的民众，多数仍处于一种愚昧无知、毫不觉醒的状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应该保护他们的

俾斯麦依靠其祖国普鲁士的军事、工业力量去实现其扩张目标，他于1866年使美因河北岸的德意志诸邦加入了北德意志同盟。5年后，美因河南部各邦也加入了北德意志同盟，从此形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下图黄色部分）。而奥地利因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国内叛乱，在经济上被普鲁士远远地抛在身后。从此，它再也无力阻止普鲁士这位老对手的势力扩张了。



地区文化和建立独立的国家。例如，在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所拥有的政治抱负仅局限于在现存的帝国内部拥有自治权。而在普鲁士这个十分保守的社会里，孩子们在学校中学到的最基本美德便是爱国主义，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忠诚在人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显然排斥了任何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展的可能。

在那时，普鲁士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只有不到1/4的城市人口住在一些2000人以上的小镇上。国王的统治权威通过世袭的容克贵族而贯彻到整个国家，这些容克贵族占据了军队和政府中所有的高级职位。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在容克和农民阶层之间出现了一支不大的、但却是在不断发展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然而，他们的所有政治改革希望都被国家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有效的警察系统扼杀了。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古老的社会制度开始逐渐改变。1818年普鲁士发起成立了一个商业同盟，即“关税同盟”，到1834年为止，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邦国都加入了该同盟。他们制定了贸易条约，其成员国享有统一的流通市场和商业利益。“关税同盟”成功地刺激了各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在农村，农产品数量逐步增加，城市里的新兴工业开始逐渐代替传统的手工作坊。在经济现代化的刺激下，普鲁士同其他北欧国家一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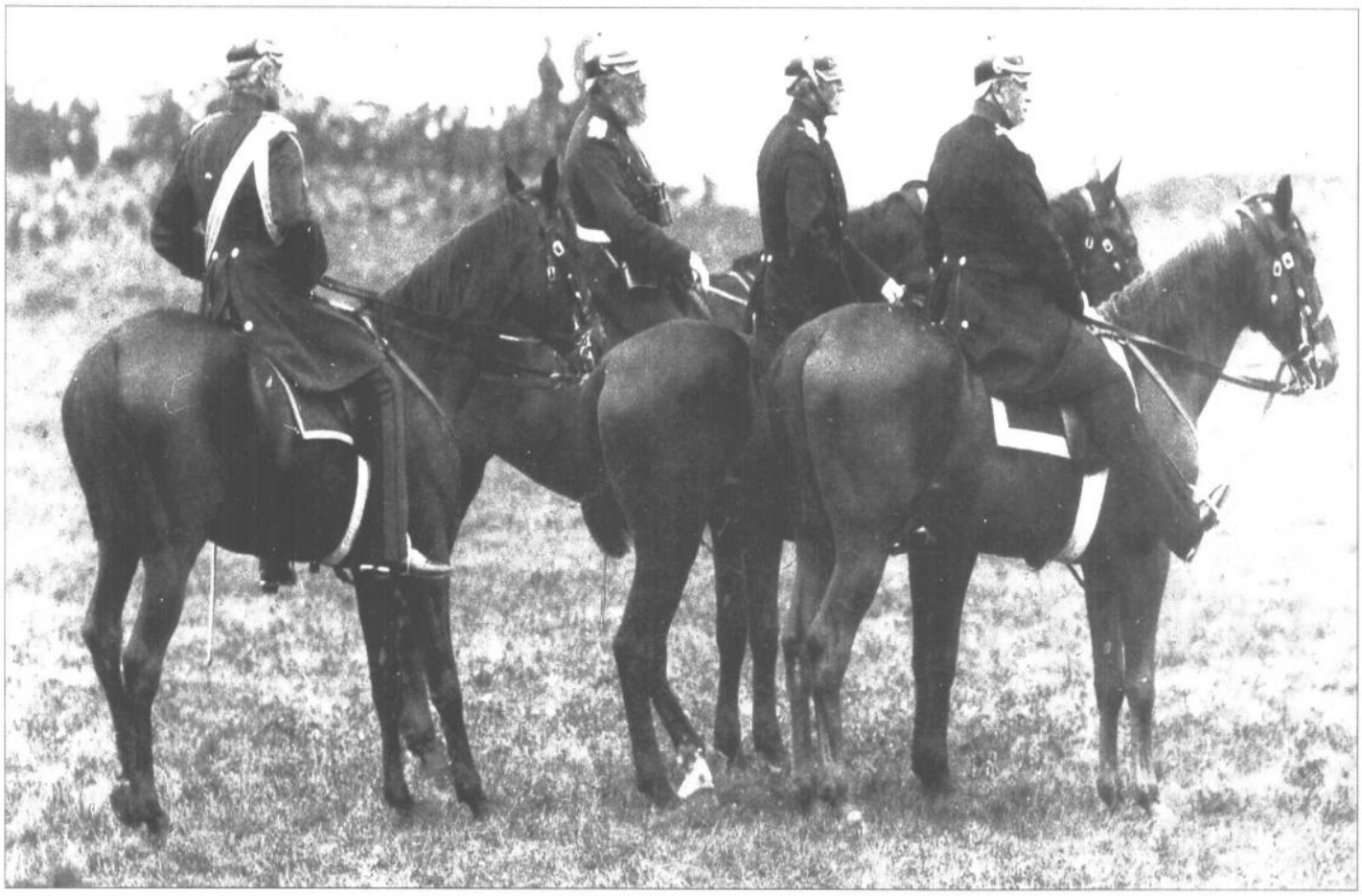
1848年普鲁士首都柏林，挥动着警棍的警察驱散了人们的一次游行示威。下图是自由主义改革家们印发的宣传单上的插图，他们要求国家制定一部成文宪法。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而且，他在目睹市民与政府冲突中的殉难者的尸体运经王宫前面时，当众流下了眼泪。但是到了11月份，当全欧洲反抗保守政体的革命被彻底镇压后，国王立即使军队恢复了对城市的控制。

184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打破了欧洲的宁静。在巴黎，法国国王路易斯·菲利浦刮掉胡子，乔装打扮，与两个随从仓惶逃至英国，同时，奥地利公爵梅特涅也避难到英国。奥地利皇帝斐迪南因害怕学生们占领皇宫而逃出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迫任由革命者占领其首都柏林；德意志联邦议会解体，让位于新组建的法兰克福议会，该议会成员开始努力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制定新的宪法。

但是，仅有好的革命目标是不够的。强有力的反动潜流，以及俄罗斯军队的不怀好意的进军，以最迅速的方式，恢复了旧世界的秩序，但是，恰如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将旧秩序冲翻在地时那样，对革命的镇压也付出了更大的流血的代价。在法国，短命的共和国政府被路易·波拿巴所控制。他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尊贵的侄子，后来取得了皇帝头衔，称为拿破仑三世。一场对维

也纳的猛烈攻击，使奥地利帝国重新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柏林的改革者内部发生了分裂，也使普鲁士军队逐渐地恢复了控制。在欧洲的后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军队在镇压了波兰的叛乱后，正向匈牙利方向挺进。一位惊恐的普鲁士人写道："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行省。"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恢复统治后，开始以大量的免税和政府馈赠回报容克的忠诚，因为在革命期间，容克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保皇立场。与此同时，似乎是对于这场失败的改革运动的一个补偿，弗里德里希·威廉



向他的臣民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但这部宪法决不是一个自由的法案，国王仍然掌握着他曾许诺给人民的各项权利。但是，现在毕竟有了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议会有权讨论政府的议案，干预国家预算，这是一项必将影响到德意志日后历史的特权。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想要实现的、把所有的德语区人民团结在君主立宪制统治之下的目标。他们将一个统一的德国的王冠授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但威廉轻蔑地拒绝了这一授权。他回答说，议会没有权力授予他王权，"每当想到自己竟是由一些面包师和

屠夫选举出来的，我简直不寒而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国其他各主要邦国纷纷撤回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支持，德意志试图实现统一的乐观愿望只维持了一年多一点就破灭了。

普鲁士企图在埃尔福特召开新的同盟议会统领德意志事务。为了反击普鲁士，奥地利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联邦议会，奥地利与普鲁士似乎在几周之内就会诉诸武力。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并不想对奥地利这个数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中欧的帝国发动战争。1850年12月，普鲁士谦卑地、并不愉快地签署了《奥尔默茨条约》，重新成为德意志联邦的一个成员。

局势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只是1848年到1850年间两年的紧张局势使旧的秩序有所削弱，其内部出现了许多察觉不到的裂痕。在德语区诸国间，激进的和自由的呼声平静下来，但他们还是在呼吁要结束多重边境和多种政体造成的分裂局面。旧的力量平衡正在一步步地发生变化。

1848年后，奥地利渐渐将注意力放在哈布斯堡领地，忽略了与德语地区其他小国的关系。1849年，匈牙利和北意大利人的起义被帝国艰难地平息下来，但是大部分占领军又不得不在此后的几年内驻守这些地区。奥地利军队虽然在检阅场上仍可引人注目，但其装备过时，官员的委任都是靠家族关系而非个人功绩。帝国财政陷于无序状态。由于普鲁士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将奥地利排挤出关税同盟，因而奥地利只能妒忌地观看其北方敌手在经济上的发展。

在鲁尔河谷，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大的煤矿，工业持续高速发展。1848年到1857年间煤产量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生铁产量增长250%。为了服务于新兴工业，普鲁士加速发展铁路网，但这一措施只是部分地出于货物运输和民众交通的需要。从军事战略上考虑，普鲁士意识到本国疆域辽阔，与俄罗斯、法国和奥地利帝国接壤，遭到进攻时易受挫折，因此，它更积极地大规模修建铁



在一群军官的前面（左图），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参谋长冯·毛奇将军正在观看军事演习。毛奇是个天才而又沉默寡言的语言大师，人们说他是“7种语言的沉默者”（意为他懂得7种语言，却很少说话——译者）。毛奇将军认识到铁路能够迅速运送大军和军事供给，从而改变战争的指挥方法。他将普鲁士军队改造成为欧洲最有效的战斗力量，配之以训练有素的军事战略家，并配备了后膛填装的轻型阵地炮。

路，以便于快速运送军队和相应战争装备。1858 年成为普鲁士军界主要首领之一的赫尔姆斯·冯·毛奇将军曾写道："用几百万资金来修筑铁路要比用这些钱去修建新堡垒更划算。"

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普鲁士更重视军队。一个世纪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挫败了奥地利，从而确立了普鲁士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最强国地位。自 1806 年败给拿破仑后，普鲁士一直急于重振其军事雄风，在技术上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设计和冶金方面的发展为普鲁士提供了一些欧洲最先进的武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德利士撞针枪，它因其撞针而得名。由于这种枪管内刻有凹槽状的来复线，因而要比欧洲其他国家仍在使用的滑膛枪准确率高。这种枪从后膛装子弹而不是直接在枪管中上子弹，所以它的开火速度要快。

然而就人员和训练而言，普鲁士军队的发展与上述技术发展并不同步。虽然普鲁士人口已经从 1100 万增加到 1800 万，但是每年应征的新兵人数却没有变化。由于与奥地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西部与其接壤的新的法兰西帝国也越来越强大，普鲁士重新组织其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就变得越来越紧迫。

根据当时的制度，普鲁士的士兵在国家军队中服役 5 年之后即被纳入战时后备军，这是一种后备的国民自卫队，在危急时刻可以应召参战。思想较自由的政客将战时后备军视为使普鲁士人民参与卫国战争的重要手段，但是，容克贵族却看不起战时后备军和它的中产阶级的军官。1858 年，中产阶级与战时后备军成为强有力的盟友。长期以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精神上一直不稳定，如今他更疯得不可救药。他的弟弟，61 岁的威廉亲王宣布摄政，事实上他已经成了未正名份的国王。威廉亲王是个直率而又老派的普鲁士人，他将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了军队。他瞧不起战时后备军，将其视为"肮脏的民兵"。他提出增加军队预算和扩增常备军的建议。另外，他还要求延长士兵的标准服役年限。

最后的这个要求是普鲁士下议院无法接受的，他们中一些人担心战时后备军将会因此而被取消。面对那位被影响极大而又极端保守的容克贵族所包围的倔强国王，政客们决定动用他们手中把握的有效权力——他们拒绝批准新的军事预算，并将其推迟至一年之后。

争论仍在继续。1861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后，摄政的威廉亲王即位。他的谋士们建议他进行一场军事政变，搞掉国内所有的自由派对手。但不喜欢民众参与统治的威廉亲王，并不赞成用暴力手段解决普鲁士的困难，他提出主动退位，此举的结果便是将王位留给他的有些自由倾向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无疑会满足一些民选的下院议员提出的要求。威廉的军事顾问们为了使事情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在位国王继续保持其权力，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这一着他们以前从未准备使用，因为他们本身也害怕它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利后果。1862 年 9

月，柏林的国防大臣给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奥托·冯·俾斯麦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快!慢则有祸!"

俾斯麦步入政坛纯属偶然。他1815年出生在柏林以西80公里处的一个庄园里，父亲是容克贵族，母亲是个有影响的文职人员的女儿。他曾在汉诺威王国的格丁根大学学习法律，做了短期令他厌烦的公众服务后，回到庄园过了8年悠闲自得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得到了诸如"豪饮者"、"好色鬼"等绰号。1847年，他作为地方代表的替补者参加了一个省级国民会议。由于一位正式代表的退休，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向公众发表演说。但是，他的演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表演说时一直用十分高亢的语调，以强有力的雄辩攻击那些他认为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议案。1851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但他说，上帝会使他理解。

在法兰克福，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激烈地反对奥地利的一切动议。当他发现，依照惯例只有奥地利代表可以在会议上吸烟时，他就挑战似地掏出哈瓦那雪茄大口大口地吸。更有甚者，他将奥地利拒于关税同盟之外，并与他在柏林的上司探讨与法国结盟——甚至在战时结盟——的可能性，使上司大为震惊。他在写给柏林的一位军事顾问的信中说："维也纳的政策使德意志联邦对我们和奥地利来说突然变得太小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迟早要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

俾斯麦相信自己对政治形势作出了客观的估价，但是有一些人却认为他们的这个口无遮拦的代表俾斯麦是潜在的危险根源。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流血的对抗和血腥味只是暴力统治的手段。"威廉亲王在共摄政之时，就任命俾斯麦为驻俄公使，因为他认为在俄国俾斯麦不会制造太多的麻烦。3年后，由于军事预算危机的加深，俾斯麦被调往巴黎。但是，在柏林，有许多人认为只有俾斯麦有能力解决国王与议会之间发生的这场可能使普鲁士陷入内战危机的冲突。

这次被召到柏林，俾斯麦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国王，他可以拯救国家。威廉国王并不欣赏俾斯麦的鲁莽言辞及他的政策，王后奥古斯塔也不喜欢俾斯麦。然而俾斯麦的人格魅力如此之大，他的言谈举止如此迷人，他只是在柏林城外的夏宫中与威廉国王进行了一次会谈，就使威廉撕毁了退位诏书。离开王宫时，俾斯麦已经成了普鲁士宰相。

俾斯麦以其特有的激情参与了反对议会的斗争，他要求通过增加军费的议案。普鲁士必须强大，因为只有军队才能解决普鲁士问题。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他以一种可怖的预言警告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演说和简单的多数便可解决，那不过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问题。"

自由主义者们拒绝改变其反对国王威廉的军事改革的立场，俾斯麦于是未经授权便夺取了所需的金钱。他认为，既然宪法没有提及如何解决君

主与议会之间的僵局，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就应拥有最终表决权。他更直言不讳地说："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就按谁的意愿行事。"

自由派政客对此非常愤怒，但是，1848年失败的经历仍记忆犹新，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一些人已开始默默崇拜这位专横的宰相。如果会有某种因素促使普鲁士统一，那么这就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且，即使俾斯麦对于军事预算案采取了反民主的立场，也已表现出他知道如何对付奥地利。一些人可能仍相信普鲁士与奥地利可以在德意志联邦内平分秋色。然而，对于那些富有斗争精神的人来说，只有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美因河的德意志国家联邦才是合理的。

俾斯麦也长期持有上述观点。他也知道，只要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从外

意大利的复苏



德意志统一的呼声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意大利各个分裂的国家中产生了影响。在那里，意大利的"复苏"运动正在努力摆脱外国统治的枷锁。

在意大利北方，独立的王国皮埃蒙特－撒丁的总理大臣卡米罗·狄·加富尔伯爵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于1859年将奥地利人从伦巴第赶走。托斯卡纳和北方的其他国家投票赞成与皮埃蒙特联合。在南方，革命领袖朱塞皮·加里波第解放了西西里，使其摆脱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国王的统治。左图为加里波第率领他的军队——1000名红衫军志愿者于1860年5月在海岸登陆的情景。在向意大利腹地进军途中，加里波第与同时向教皇国挺进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军队会师。加里波第向他们的君主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致敬说："我向意大利第一位国王敬礼。"意大利的完全统一直到1870年才大功告成，此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掩护教皇撤离罗马，意大利将罗马吞并。

部威胁这个民族，民族内部问题就会退居为次要地位。根据这一看法，他继续排斥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为了刺痛奥地利，普鲁士与法国订立了贸易协定。为了减少俄国帮助奥地利的可能性，他还支持沙皇亚历山大镇压波兰的民族起义。

奥地利为了维持对普鲁士的控制作出了最后的努力。1863 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召开德意志联邦所有的君主会议，修改联邦宪法。他派出萨克森国王以私人身份邀请普鲁士威廉国王出席。俾斯麦劝国王拒绝赴会。他认为这是个阴谋，企图使普鲁士及其军队归属于奥地利统治下的德意志。

虽然普奥之间的敌对仍在继续，但二者意外地发现他们已成为盟友。1863 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宣称，位于丹麦半岛南部的石勒苏益格公爵领地是丹麦国的一部分。丹麦国王长期以来一直是石勒苏益格及其南部的荷尔斯泰因名义上的封建领主，但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数都操德语，因此，克里斯蒂安国王的声明激起了众怒。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高涨之时，普鲁士不能袖手旁观。奥地利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让普鲁士独揽此事，这样会增强其威望，扩大其潜在的领土。因而，看来不可能的同盟却意外地形成了。俾斯麦这个机会主义者随时准备伸手抓住机遇。

丹麦人一触即溃，1864 年 10 月签订的《维也纳条约》，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作为普奥的共管领土。至此，俾斯麦认为与南部强大的奥地利彻底分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此后的两年间，俾斯麦努力与法国和意大利建立同盟，以此方式孤立奥地利。法国含糊地表示中立，意大利承诺，如果普鲁士在 3 个月内进攻奥地利，它也照办。忍无可忍之下，奥地利向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提交议案，强烈要求联邦动员起来反对普鲁士。

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速战速决。由于普鲁士一直在备战，经过 4 年的违宪财政，毛奇的军事机械装备显示了它的威力。许多德意志小国与奥地利结成同盟，但它们在冲突中的作用不大。6 月底，普鲁士战胜了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等小国的抵抗。巴伐利亚及其南邻各邦只给奥地利以道义上的支持。当普鲁士军队以 3 路纵队挺进，在离奥地利边境 80 公里的村庄——萨多瓦集结时，只遇到哈布斯堡军队的抵抗。

1866 年 7 月 3 日，50 万大军在萨多瓦附近的雨季湿漉漉的树林中相遇，展开了一场决定两国前途的战斗。俾斯麦和威廉国王一同观战，他们在马背上并肩观看了约 13 个小时。国王只是名义上的总司令，曾在后备军中担任中尉的俾斯麦头戴普鲁士钢盔头盔，身着少将军服，俨然一个名副其实的主帅。奥地利军队顽强抵抗，在最后 20 分钟的战斗中损失近万人，但是普鲁士人的来复枪以一敌五，最终战胜了奥地利。俾斯麦目睹战士死伤的场景非常忧伤，他后来评论说："如果外国的大臣们常跟着其君主来到战争第一线，历史上就不会有多少战争可谈了。"但是，没有什么



1871 年，普法战争后期，胜利的德国军队群集在巴黎城墙外的伊希堡废墟上。在德军包围法国首都的 4 个月间，如左图中法国报纸的一幅漫画中所示（左上插图），城内饥饿的市民被迫从下水道逮老鼠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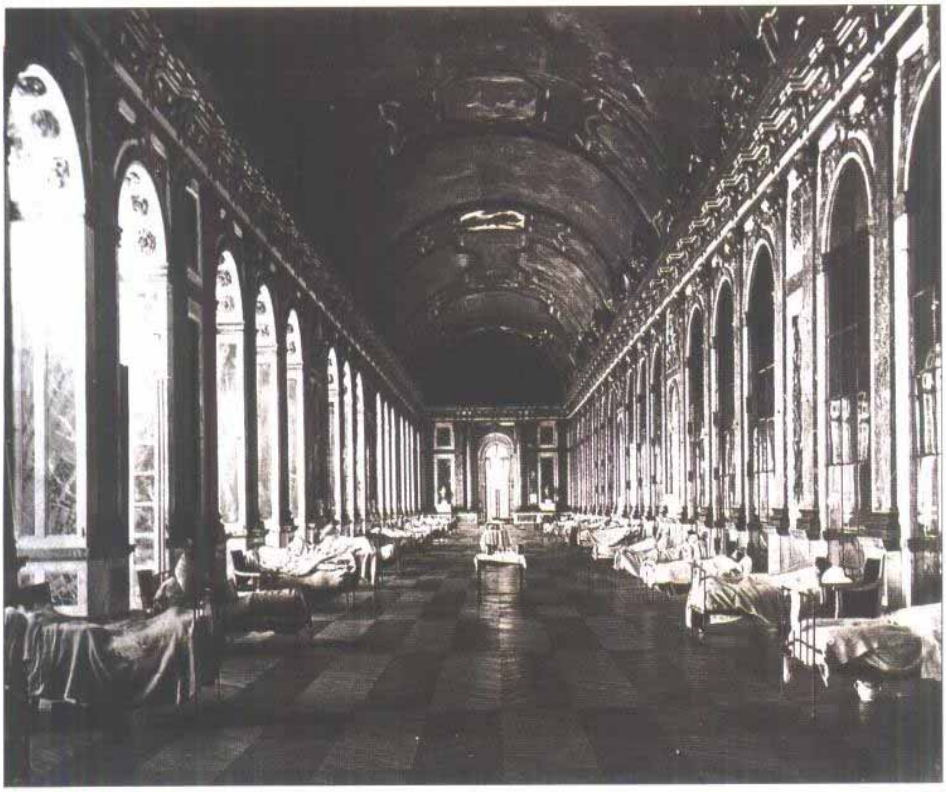
可以隐藏他对胜利的喜悦。他在胜利后不久曾敲着桌子狂喜地嚷着："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部！"

普鲁士弥漫着欢庆的气氛，只有一小撮人敢怀疑对奥地利的战争是否明智。曾经抱怨俾斯麦实行独裁统治的自由主义者和曾经怀疑其对君主忠心程度的保守主义者都对俾斯麦高唱赞歌。糊涂的议会一反常态地认为挪用财政收入从事军事改革是合法的，还发给俾斯麦巨额奖金。俾斯麦用这笔钱在波美拉尼亚的瓦尔津购置了 6000 公顷的地产，它是退隐的理想居所，而且该地的造纸厂和酒厂是相当可观的私人收入的财源。

最后，俾斯麦还是说服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国王和将军们降低媾和条件，他认为法国和俄国都不会容忍普鲁士侵吞奥地利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众所周知的 7 周战争永远地结束了德意志联邦。现在，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建立了奥匈帝国，根据《布拉格条约》，它同意承认一个"没有奥地利帝国参加的新的德意志"。普鲁士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并吸纳了从前与奥地利结盟的汉诺威和其他 3 个小国，从而在它的东部和西部领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梁”。这时，横亘于美因河南岸的一些德意志小国被允许保持“独立的国际存在”，作为普鲁士与法国间的缓冲地带。

俾斯麦1866年胜利后建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包括22个邦国，但是这里的人们只说普鲁士语。各独立的邦国仍保持他们自己的统治，但是外交和军事问题由联邦控制。编撰新宪法的任务几乎由俾斯麦一人独揽。新宪法要求建立两院，包括联邦委员会（即联邦议院）和民众议会（即国民议会）。联邦议院的成员是各邦国的外交官。普鲁士是目前最大的邦国，在议会中有17名代表，而第二大邦国萨克森则只有4名代表。简单的多数对于作出决定来说是必须的，因而普鲁士自有它的办法。国民议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它的成员成功地维护了自己所应该有的权利，尽管俾斯麦起初并未想给他们这些权利。然而，军费支出和外交政策却不允许他们干预。



在包围巴黎的时候，法国凡尔赛皇宫的镜厅中排满了一行行的德国伤兵。皇宫的其他房间则由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居住，他们的餐桌上有甲鱼汤、野猪头、在香槟酒中上下翻滚的泡菜等——这与不幸的巴黎人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民可以有一些发言权，但德意志决不是民主制国家。新联邦议会的主席就是普鲁士国王，其首相即联邦总理就是普鲁士首相，因此，俾斯麦的签名对于所有法律的生效都是必要的。

宪法问题并不能使俾斯麦从他所关注的国际问题中分散太多的精力。目前他最关心的就是在法国滋长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普鲁士情绪。俾斯麦本人并不想与法国开战，但毛奇和其他一些军界要员却渴望继续展示德国的国力。而且，促使向法国发动战争还有个很好的政治理由：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三国曾在1867年与普鲁士签订了防御协定，但是现在这些邦国仍反对普鲁士的任何企图将它们与北德意志联邦结成一体的做法。一场与法国的战争可能成为使分裂的国民团结在一起的必要前提。

俾斯麦可能未参与1870年春与法国的实地战争，但是无论如何，他却是在故意与他的易怒的邻国“玩火”。1868年西班牙革命中女王伊丽沙白二世遭到放逐，翌年，空缺的王位拟传给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个远亲——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俾斯麦支持这一提议，他认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利奥波德亲王可以被西班牙人接受，与此同时，他与德国的关系将有助

于使位于法国的另一端的西班牙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当法国外交大臣要求普鲁士对卷入这次事件作出解释时，威廉国王不愿与法国继续对抗，收回了利奥波德的候选人资格，整个事情就该终结。然而，法国大使与威廉国王在埃姆斯会晤中，要求普鲁士承诺不再使霍亨索伦王室成员作为国王候选人。国王再次重申候选人已经撤下来，并坚决拒绝向法国作任何低下的承诺。

在这些危机接连发生之时，俾斯麦仍留在离柏林有6小时路程的瓦尔津庄园。当他到达首都时，接到了一份关于国王与法国大使发生冲突的电报，知道控制时局的机会来了。他校订并压缩了电文，尽量保持其原貌，但是将国王生气地将大使打发走这一细节表现得更为突出。俾斯麦指示，为了让埃姆斯电文为人所知，应将其分发到全欧各处的使馆和报社。他向冯·毛奇将军骄傲地说："这样产生的效果就将如公牛面前的红旗那样。"几天后，法国命令全军动员，普法战争爆发。

法国军队精神抖擞，装备精良，他们的来复枪比德国的德利士撞针枪的射程远得多。他们还拥有一种早期的机关枪——后膛装填机关枪。但是法军

巴黎公社：一个破碎的梦



在人数上远逊于分为3路纵队进攻法国的50万德军。8月末，法军在梅斯镇被包围。另一路由拿破仑三世亲自率领的军队在比利时边境附近、巴黎东北250公里的色当镇被围。

1870年9月1日，威廉国王和他的随从们从刚收割完庄稼的平顶山上远望德国军队向陷入包围圈的法军靠近。有人听到国王对法国人企图突围的一次自杀行为表示叹息："唉，这些不幸的人们！"下午的晚些时间，炮声平息了。一位法国军官带了一个便条："由于我不能死在我的军中，我能做的只是投降，我将我的剑交给陛下，我是陛下的好兄弟——拿破仑。"

两天后，在冰冷的细雨中，法国皇帝从色当来到英国，开始了其流亡生活，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英国，他的10万士兵被他抛弃，成为德军的战俘。

虽然已经失败，法国人民仍坚持战斗。在被德军围困的日子里，巴黎人民每天遭受400发炮弹的袭击。许多人饿死，富人们被迫以动物园里的动物充饥。在各省，民兵仍在进行无望的抵抗，反抗的行为迫使德国军队有时实行报复性的劫掠。

与国王同住凡尔赛宫的俾斯麦越来越害怕公众舆论会使他的南德意志盟国与法国单独缔结和约。鉴于发动普法战争的第一目的是实现普鲁士与南德各邦国的统一，俾斯麦迅速行动以保证它们与自己保持永久同盟关系。但这一目的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即使巴登渴望被纳入一个已经大大扩展了的德意志，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仍不想这样做。但是，俾斯麦给了他们极大的政治让步，并且使用了贿赂手段，用他在并汉诺威王国时非法没收的金钱收买奢侈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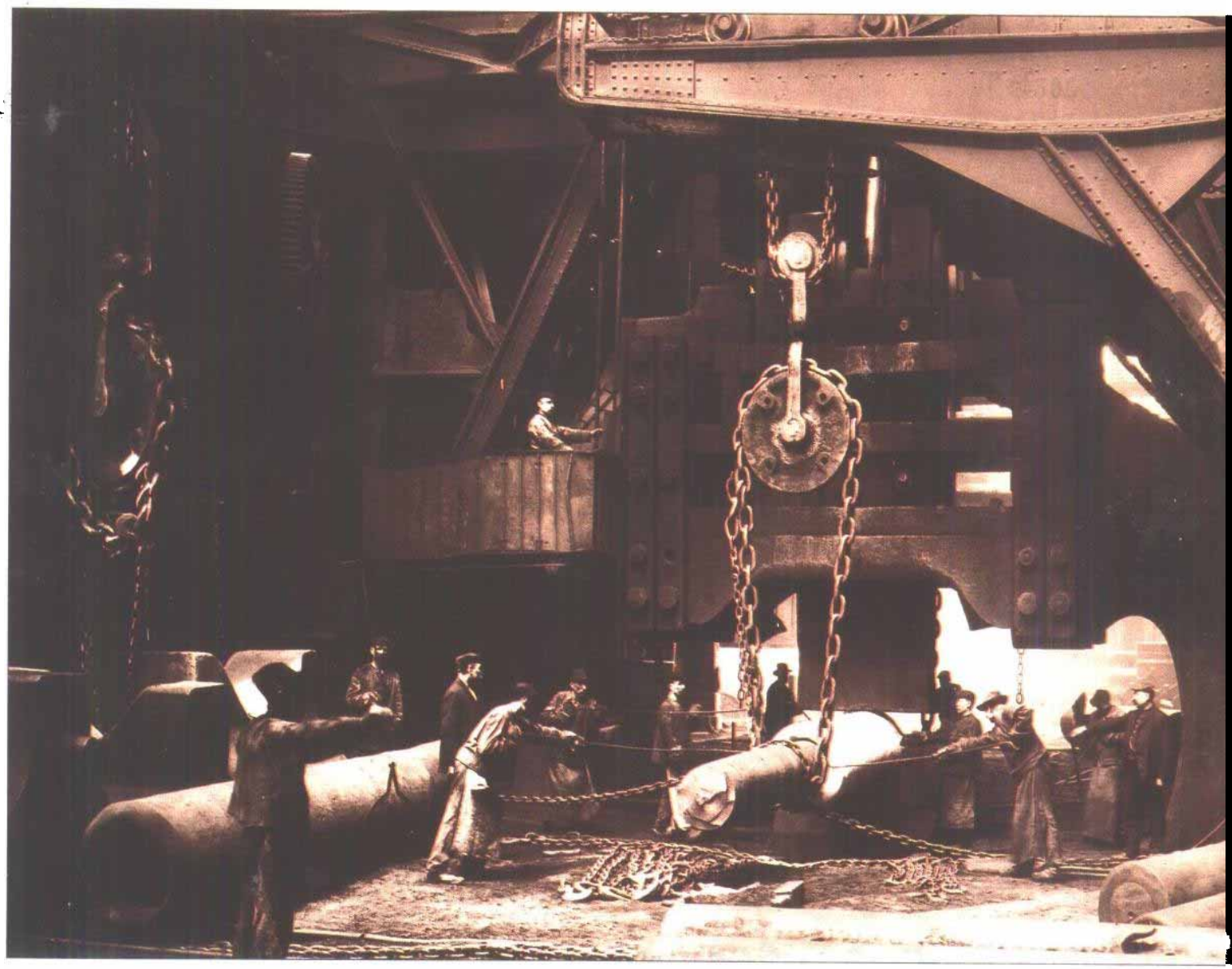
以作为普鲁士国王而自豪的威廉最初也不愿做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帝王，不愿接受"皇帝"的称呼。但是谈判最后终于结束了。1871年1月，威廉国王加冕典礼在镜厅举行，宣告第二帝国的诞生，新的德意志帝国比它的前身——神圣罗马帝国更团结，更强大。

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累利在评论德国重新在欧洲大陆上居统治地位时指出，"力量均衡被彻底打破"。在德国国内，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于1871年写道："如果德国认为他们有能力将来复枪搁置到墙角去求得和平的艺术与幸福，那它就错了。""铁与血"不再令人震惊，它已成为帝国的正统信条。

在将军们和报复心理极强的德国公众的双重压力下，俾斯麦制订了一项苛刻的对法媾和条约。根据1871年3月签订的

对于那些抵抗德国4个月之久的英勇的巴黎人民来说，法国国民公会认可俾斯麦提出的苛刻的和平条件意味着莫大的耻辱，因此他们决定将巴黎变成自治公社。1871年3月，他们选举一些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代表执政。

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巴黎公社社员企图复苏1789年法国大革命精神，被视为帝国象征的、身着罗马长袍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塑像被从基石上推翻(左图)。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雕像的位置上。但是激起全国范围内革命的希望很快被击碎。5月，临时政府首脑阿道夫·梯也尔命令军队粗暴地镇压巴黎公社。一周之内2万市民被血腥屠杀。左图照片被用做其实行粗暴镇压的口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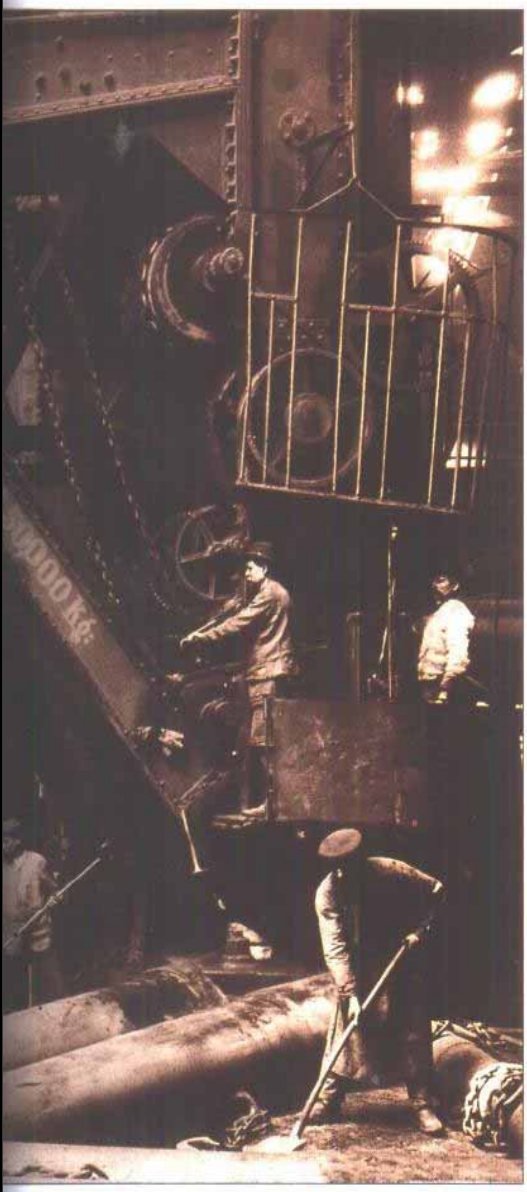


图为德国工业家克虏伯在埃森建立的工厂，工人在巨大的铸模蒸汽锤之下显得十分矮小。阿尔弗列德·克虏伯首先制造铸钢铁轨及设备，接着为普鲁士军队生产武器和弹药。1887 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开发了一系列不同的高效炮弹和防弹盔甲，销往 30 多个国家。

《法兰克福条约》，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工业省移交给新的德意志帝国。除此以外，俾斯麦还提出了足以削弱法国经济的惩罚性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德意志国内，1867 年的联邦宪法现在顺理成章地发展为 1871 年的帝国宪法。跟从前一样，联邦议院掌握在普鲁士手中。国民议会虽然有些人吵闹着批评俾斯麦及其政策，但是也不愿向这位统一德意志的人提出尖锐的挑战。

威廉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却不得不屈从于他的宰相俾斯麦提出的一些要求，当俾斯麦每次以辞职相威胁时都表示妥协。这位老人说："有这么个大臣，做皇帝真不容易呀！"但是被战争与和平弄得筋疲力尽的俾斯麦更加古怪和烦躁。他抱怨说自己得了各种各样的病，从痛风到血管静脉曲张，但他还是猛吃、猛喝、猛抽，病也越来越严重。俾斯麦的一位管家惊



讶地写道："他们每天都吃得昏天黑地。"狄斯累利也对这位伟大的[illegible]行为表示惊异，他记载道："他一手捧着樱桃，一手拿着虾，左右手交替着往口里送，还抱怨着睡不着觉。"

俾斯麦有比睡觉更好的事儿要做。有一次他说："我整个晚上都在恨。"暴躁而又极端自我的俾斯麦被联邦议院中的一群中央党人所激怒，中央党是以保护天主教徒在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帝国中的权利为宗旨的党，于是，俾斯麦将天主教会和它的德国支持者视为政府的威胁。1870年，教皇庇护九世曾指责民族主义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俾斯麦看来，这就意味着天主教企图诋毁帝国。他吼叫道："我们现在进行着自古已有的教权与王权之争!"

为了利用许多德国新教徒根深蒂固的偏见，俾斯麦发动了一场反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他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如坚持要求国民实行民俗婚礼(即不通过教会——译者)，政府向各教会学校指派巡视员等。从此，牧师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承担教职，修道院被取缔，成百上千的天主教徒或被流放，或被监禁。

但是，俾斯麦误解了德国民众的情感，许多人对于迫害同胞感到羞愧。1874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中央党得到了多数席位。俾斯麦还企图在反对德国的国际天主教阴谋活动中寻找法国人的活动，但事实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错误的。他大谈战争的可能性，以使其他大国向法国施加压力，因为当时的法国已付完了战争赔款，正在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备。但是现在邻国们害怕的并非法国。1875年，俄国和英国坚决要求停止鼓吹战争。一直不愿听取他人意见的俾斯麦不情愿地照办了。

文化斗争结束后，新的敌人又出现了。俾斯麦讨厌任何性质的理想主义者，但认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是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1875年社会民主党建立之初，俾斯麦就决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他想确定反社会主义立法的第一次尝试受到国民议会的阻挠。议会的多数党民族自由党已被俾斯麦挟制了5年，但是他们仍有足够的勇气对待反社会主义立法，认为它可能被轻易地利用来对付帝国的其他批评者。但这时，形势向着有利于俾斯麦的方向转化。

1878年5月，一位失业的管道工向正在驾车的国王开枪。俾斯麦宣称这位管道工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并借此机会再次要求通过反社会主义立法。国民议会坚持其成见，但是就在一周后，威廉国王在第二次有预谋的暗杀中受了重伤。俾斯麦幸灾乐祸地说："现在我可抓住那些恶棍了。"虽然俾斯麦未能找到这个刺杀者与社会主义者的联系，但他还是立即解散了国民议会。在此后的选举中，虽然社会民主党仍保护着原来的地位，但民族自由党却从此失去了近1/4的席位。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镇压法令。这些法令剥夺了社会主义组织集会和出版的自由，并禁止从事包括

“危害阶级和谐”的各种非法活动。俾斯麦取得了这一胜利，但它惟一的不足之处是国民议会坚决要求反社会主义党的立案每三年重新修订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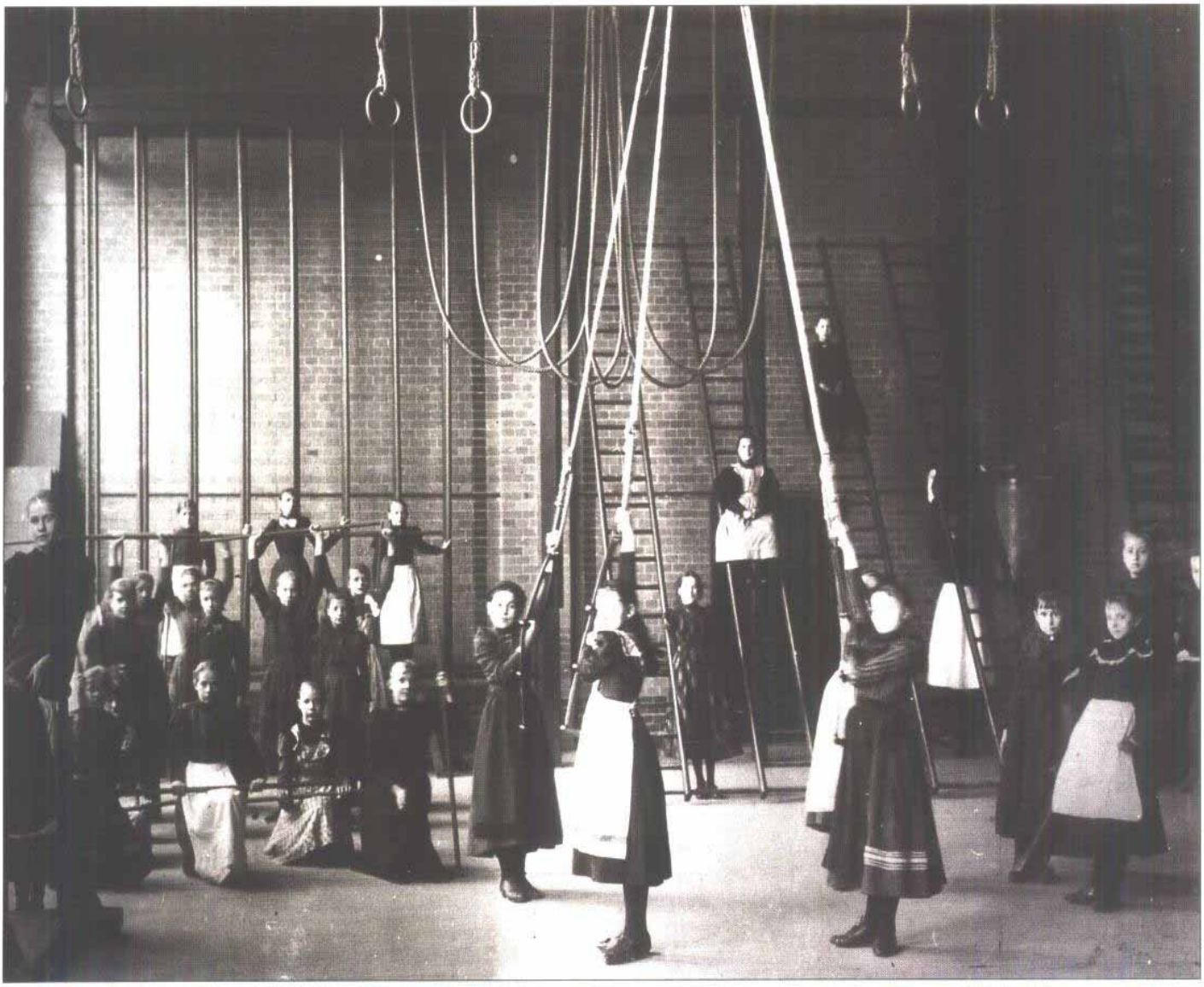
接着俾斯麦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发展德国经济。而经济问题正是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对法战争胜利的随后几年中，货币改革以及法国所付的巨额战后赔款为普鲁士带来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投向了工业和银行业：1871 年至 1873 年，德国成立了 726 家新股份公司，而此前 80 年间仅成立了 276 家股份公司。后来，到 1873 年，由于在议会中指控政府高层人员受贿的事件频繁发生，投资者们失去了信心，随着 5 月份维也纳股票交易市场的崩溃，柏林的证券交易所也倒闭了。

此时，整个欧洲已陷入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因此在这次股灾中遭到损失的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从海外涌入的大量廉价商品——俄国、美国的谷物，澳大利亚的木材和冷冻肉——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的农业生产。铁路修建的延缓，导致了钢铁工业的衰落。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克虏伯工厂裁员 1800 人后，又将其财产抵押给银行，才得以维持下去。

这次危机导致了一种引起社会混乱的思潮，在民众办的各种小报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犹太人阴谋反对德意志国家的“神话”。在 19 世纪里，一些犹太家庭逐渐在汉堡、柏林、法兰克福的商界和艺术界崭露头角，其中一位著名的犹太人金融家格尔松·冯·布里奇罗德，就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但是，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德意志人的社会圈子，现在他们又成了德国经济危机的替罪羊。

在富有的工业家和地主的压力下，俾斯麦对其以往的政策作出调整。在鼓吹了多年的自由贸易后，他突然变成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在 1879 年的国会发言中，俾斯麦说道：“我国的经济几乎要被这种不保护政策拖垮了。”为了击败民族自由主义者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空谈，俾斯麦竟然转而向他曾不屑一顾的中央党寻求支持，使国会通过了进口税和间接税法案。这两项法案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工业和农场主的利益。经济势力逐渐衰退的容克，再一次成为国家谷物的供应者，政府机关的整顿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恢复了传统的统治地位。但是，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从这些措施中得到任何好处，因而继续支持社会民主党。至于民族自由党由于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妥协，其影响力已日益丧失。没有俾斯麦的庇护，他们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难以重新占据有利的地位。

俾斯麦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甚至对工人的困难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一次，他对一位学者说：“我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引起那位学者的震惊。他这句颇令人费解的话，在 1881 年以他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得到了诠释，这一年，他制定了一则意外工伤保险法案以保障工人利益。尽管他宣称这一举措的目的是“维护人的尊



女学生们在体操课上为摄影师摆好了姿势。德国的义务教育提高了全民素质，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强调遵守纪律，服从权威，增强了现存阶级结构的稳定性。在德国，妇女被禁止接受大学教育。一个女学生写道，她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她的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气氛”。

严与品格”，但是他没有掩饰自己更为直接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在广大的穷苦人民中树立保守思想”。为了赢得工人阶级对政府的支持，19 世纪 80 年代，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安全保障体制。但是社会主义者们识破了俾斯麦的诡计，他们清楚地看出这种政策只不过是俾斯麦的狡猾伎俩，并不意味着他将会改变反社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方向。因此，社会主义者在接受新政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继续反对日益专制的统治。

在外交政策上，俾斯麦一改以前机会主义的做法，通过一系列的多边协议，确保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1878 年，俄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俾斯麦说服柏林的国会，使德国在妄图争夺俄国的胜利果实的各方势力中充当调解人，俾斯麦自己称之为“诚实的掮客”。在随后的几年中，俾斯麦与普鲁士长久以来的劲敌奥匈帝国谈判建立双头同盟，几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对伙伴所建立的同盟。1881 年，德意志、奥匈帝国、俄国成立“三皇



这张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肖像是在他死后完成的。肖像充分展现了这位自负且华而不实的国王对戏装及一切装饰物的偏爱。

这只瓷制天鹅原珍藏于纽施凡斯泰恩城堡，即“新天鹅崖”城堡，证实了路德维希对瓦格纳歌剧《洛亨格林》的偏爱。这部歌剧描写天鹅骑士冒险营救被囚禁的女主人公，结果，因为天鹅骑士的离去，女主人公悲痛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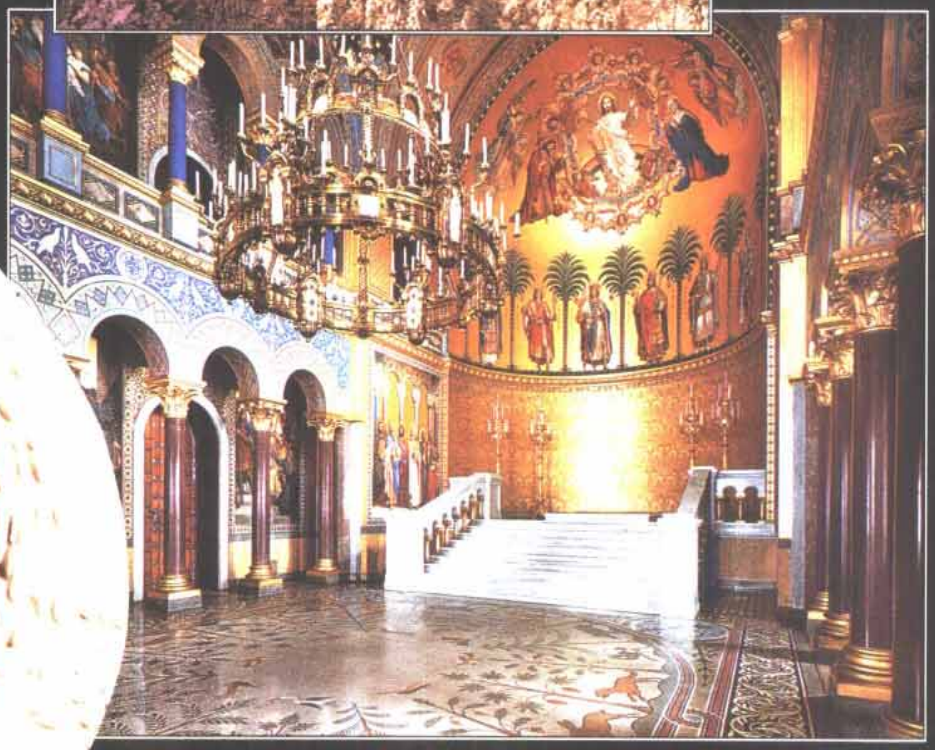
奢侈浪漫的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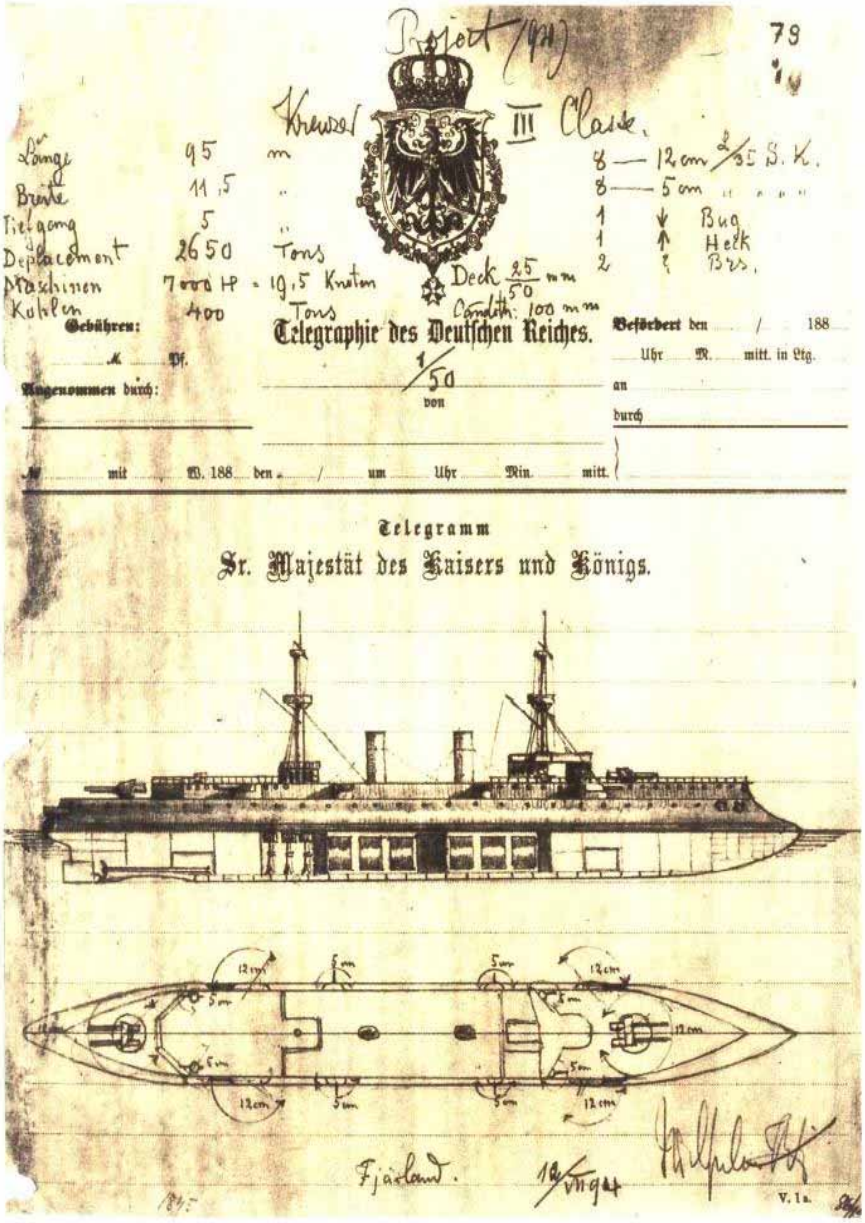
面对迅速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却沉溺于他那浪漫的情趣中。他对古代传奇故事的极其迷恋，是由于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作品的影响。1864 年，瓦格纳成名后没有多久便被路德维希邀请到慕尼黑。在歌剧中，瓦格纳褒扬德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并把音乐、台词和民族个性三者结合起来，融入英雄史诗中。而路德维希的浮华设计却表现出更多的个人风格。他建起三座各种建筑风格混合的宏伟壮丽的城堡，在城堡内建立了一个封闭且浪费、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路德维希这种古怪的兴趣，后来发展成一种疯狂的行为。1886 年，路德维希自杀身亡。



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上，纽施凡斯泰恩城堡的那些令人炫目的尖顶，体现了路德维希对于中世纪的神话般的幻想。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其城堡内的仿拜占廷式的辉煌的皇室正厅的装饰。







1894 年，威廉二世皇帝在一张空白电报纸上，绘制了这张战争巡洋舰的草图，尽管专业的海军设计师们一致认为这个设计是无法实现的。威廉皇帝坚持德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以向英国在公海的制海权挑战。

同盟”，通过这一同盟，三国同意，当其中任何一国受到第四国侵犯时，其他两国将保持中立。俾斯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战争远离德国的后门。俄国和奥匈帝国既迫切希望从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中瓜分领土，又要帮助德国防止满腔仇恨的法兰西帝国东山再起。虽然到现在为止，法兰西还一直未从 1871 年的战争阴影中恢复过来，但它始终都是一个潜在而危险的敌人。

俾斯麦全神贯注于德国在欧洲的安全，无暇顾及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的活动。然而，随着英法两帝国势力的日益强大，他开始关注德意志在国际外交中的地位。1884 年，俾斯麦宣布：德国将对本国的私人公司及冒险家们在海外所签署的一切条约和贸易协定实行保护。通过这一规定，德国立即在海外获得了 250 万平方公里的势力范围，其中包括非洲的广大地区和太平洋一些岛屿。然而俾斯麦希望由私人公司而不是由政府去经营管理殖民地的打算却落空了。组织这些无利可图的冒险事业的负担，最终落到了政府的头上。因此，在 5 年内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海外扩张的兴趣。他在 1889 年对外公开宣布：“我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

在欧洲大陆的统治秩序上，俾斯麦实行一种“棋盘式”管理的方法。他希望整个欧洲都是整齐划一的，因此绝不能允许在他的家门口发生任何意外。他的这种家长般专制的做法遭到国内人民的公开反对。为了确保其法律的顺利实施，他不遗余力地强迫人民按照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因担心“红色威胁”再次发生，俾斯麦准备重新制订一部反社会主义立法，却因此使自己重新陷入尴尬处境。

1888 年 5 月 3 日，俾斯麦悲痛地宣布威廉皇帝逝世。他一直担心着有自由思想的弗里德里希王储和他的十分有见解的妻子（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的长女)的登基会对自己不利，但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不到3个月便死于喉癌。他那不满30岁的儿子威廉继承了皇位。威廉二世是一个自负、冲动的理想主义者。俾斯麦认为自己能像当年控制其祖父一样控制这位新皇帝。

现年75岁的俾斯麦处理起政务来，仍感到精力充沛。一位年轻的医生为他制定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健身方案，使其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适度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使他的体重由114公斤减到了89公斤，但其政治热情和冒险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要以一部强制性法律和政府福利相结合的办法来粉碎社会主义的企图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选



这幅威廉皇帝的肖像，完成于1890年。就是在这一年，威廉迫使俾斯麦辞职。画中的他极力想表现出自己便是普鲁士武士国王的理想化身。他把那只出生时受了伤的左手巧妙地隐藏起来。一位法国将军在批评威廉皇帝的造作姿势时说："这不是一幅肖像，简直就是一个战争宣言。"

举产生的议会将继续反对他。因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取缔宪法。首先他将劝说威廉，使其相信国内即将发生一场叛乱；然后他会将法律控制在自己手中，其实他始终认为这本应该是他的权力。当然，这必将导致一场暴动，但这只不过是他曾经历过的许多动乱中的一个小场面罢了。他在与一位德国驻外大使谈话中说："最后，你将不得不把瓦罐砸碎。""这些问题就像德国的统一一样，只能通过血的洗礼才能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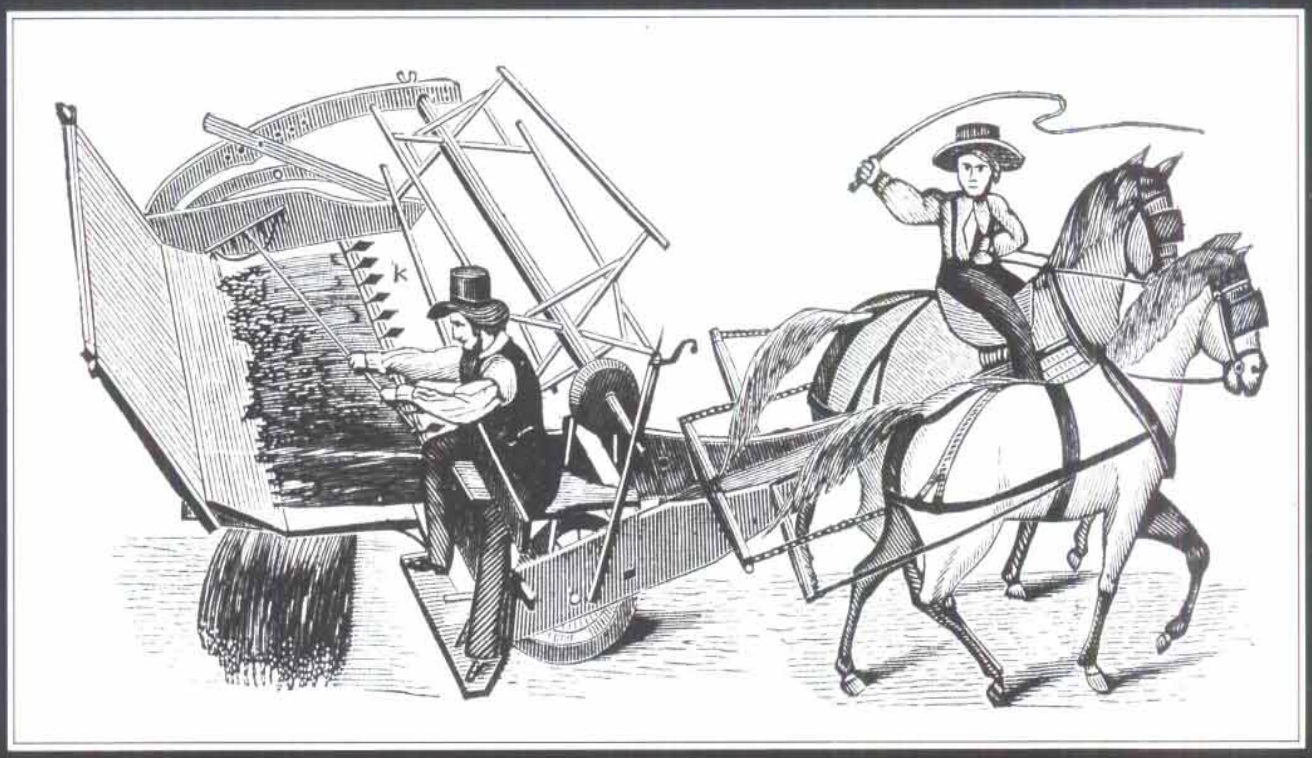
出乎俾斯麦意料的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威廉却拒绝以内战作为自己统治的开始。威廉十分同情德国的工人阶级，从来不想对他们动用武力。仿佛在做梦一样，俾斯麦感到他作为德国宰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890 年 3 月 18 日，他在给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十分痛心于中止我与陛下和普鲁士及帝国的长期联系。"

没有人反对他的辞职。俾斯麦退居乡间，在那里度过了苦闷而极其无聊的 8 年多时光，写着自己的回忆录。1895 年，在他 80 岁生日的时候，威廉皇帝亲自对俾斯麦进行了一次十分正式但却并不令人愉快的拜访，而心存积怨的国会却拒绝向俾斯麦祝寿。

1898 年，俾斯麦逝世，此时他一手创立的德国已经历了 27 年的风雨。像是要反驳人们对俾斯麦的批评一样，德国的物质实力有了长足进展。除了在少数经济危机时期外，德国工业一直持续繁荣。鲁尔、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地区强大的钢铁工业是全欧洲生产能力最强的。德国的化学工业从人工合成染料到炸药等各种产品在世界都居主导地位。德国成为欧洲发电量最大的国家。军队不断对外扩张，强大的海军力量开始挑战英国的海上统治权。

但与经济的发展相比，德国的社会还十分不成熟。在政治制度上，德国始终保持着落后的古典式制度与现代制度相互交叉的不稳定状态，这是一种封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劳动阶级要求政治权力的斗争，使地主阶级和企业家构成的统治阶层感到极度的不安和焦虑。俾斯麦用来保持他自己和皇帝的绝对权威的做法，加深了社会的紧张状态，以至于他所能使用的惟一方法就是专制。

尽管俾斯麦主张保持欧洲和平，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国会中强调外部势力对国家的威胁，以迫使国会屈服于他的各项决定。即使在他退休后，军队仍然受到人们特别的崇敬。市民们会在人行道上给一位过路军官让路，而他们的那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十分迷恋于他的军队，总是穿着一身戏装式的军装。无论从物质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看，德国都是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国家，他们不可能放弃俾斯麦所激起的、在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时表现出的帝国主义情绪。在俾斯麦所建立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联盟和重迭交叉的和平协议中，一股猜忌和仇恨的情绪在欧洲不稳定的和平帷幕后上升。于是，1914 年，巴尔干战争打破了欧洲的宁静。那长久以来便埋藏下的，一直为俾斯麦所担心的战争的种子，终于在 20 世纪发芽了。



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19世纪中期，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欧美工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饥饿问题，越来越多的饥饿的人们需要食品供应。19世纪初欧洲人口大约为1.87亿，到世纪末几乎翻了一番多。美国由于移民的增加，人口从1840年的1700万增加到1900年的7600万。城市的这种危机更加严重，因为那些过剩人口大部分都涌向了城市。

本来就有责任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延长人类寿命的新兴科学及工业技术，解决了很多的紧迫问题。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被上图所示的居鲁士·麦克科密克式机械收割机所取代，一台这样的收割机的效率相当于用镰刀收割的5倍。畜牧业的发展提高了世界上肉食供应的数量与质量。越来越多的氮肥、钾肥及天然肥料的使用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也给原来贫瘠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孩子发育期需要的牛奶经过加热灭菌的消毒法保证了卫生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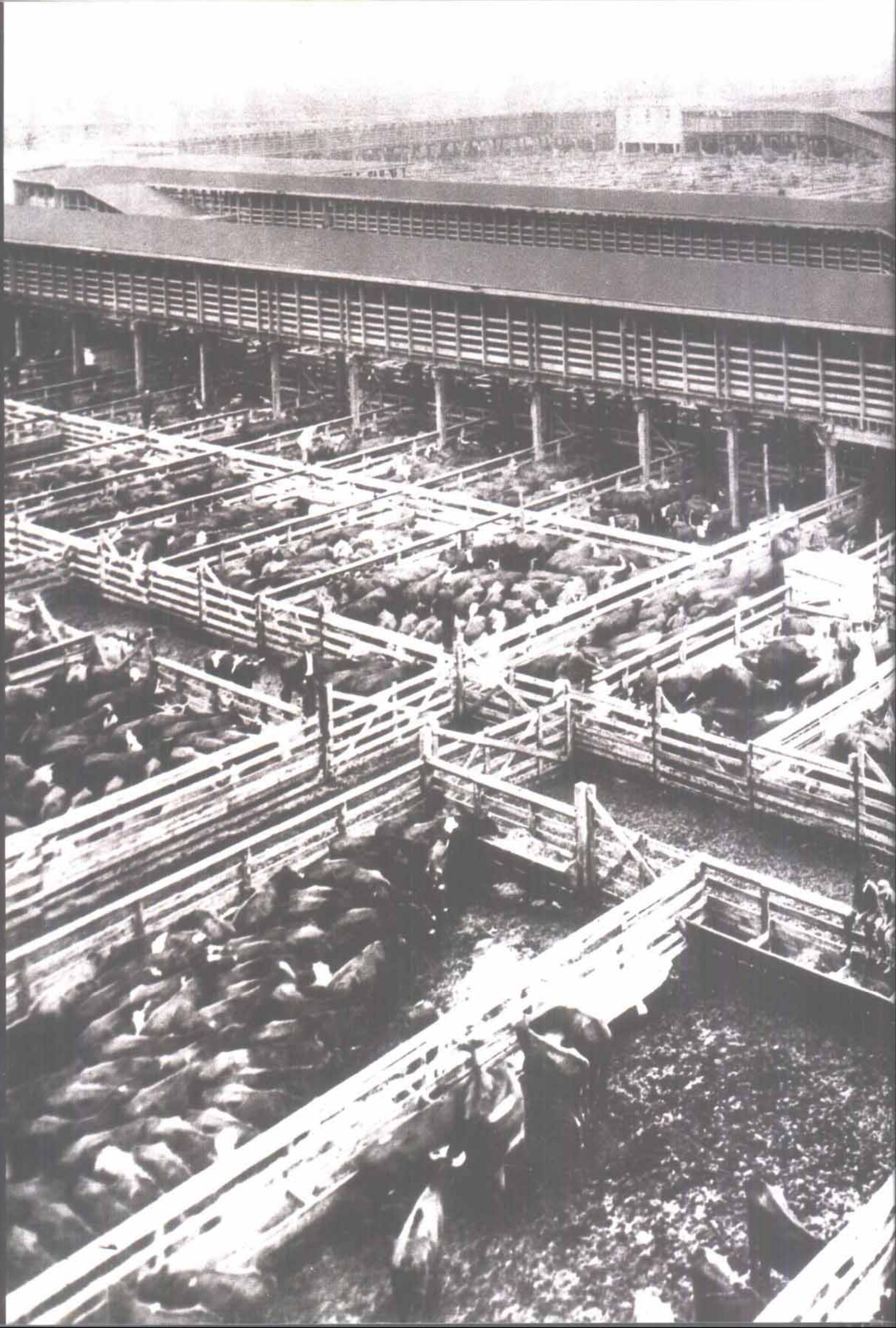
食用肉在进入市场之前便已变质的问题，也因罐头食品和冷藏技术的发展而解决。制罐头的过程包括将食品高温加热、然后封于密闭容器中，这样食品就可以从澳大利亚和南美的偏僻农场由铁路运往海岸，再由船运到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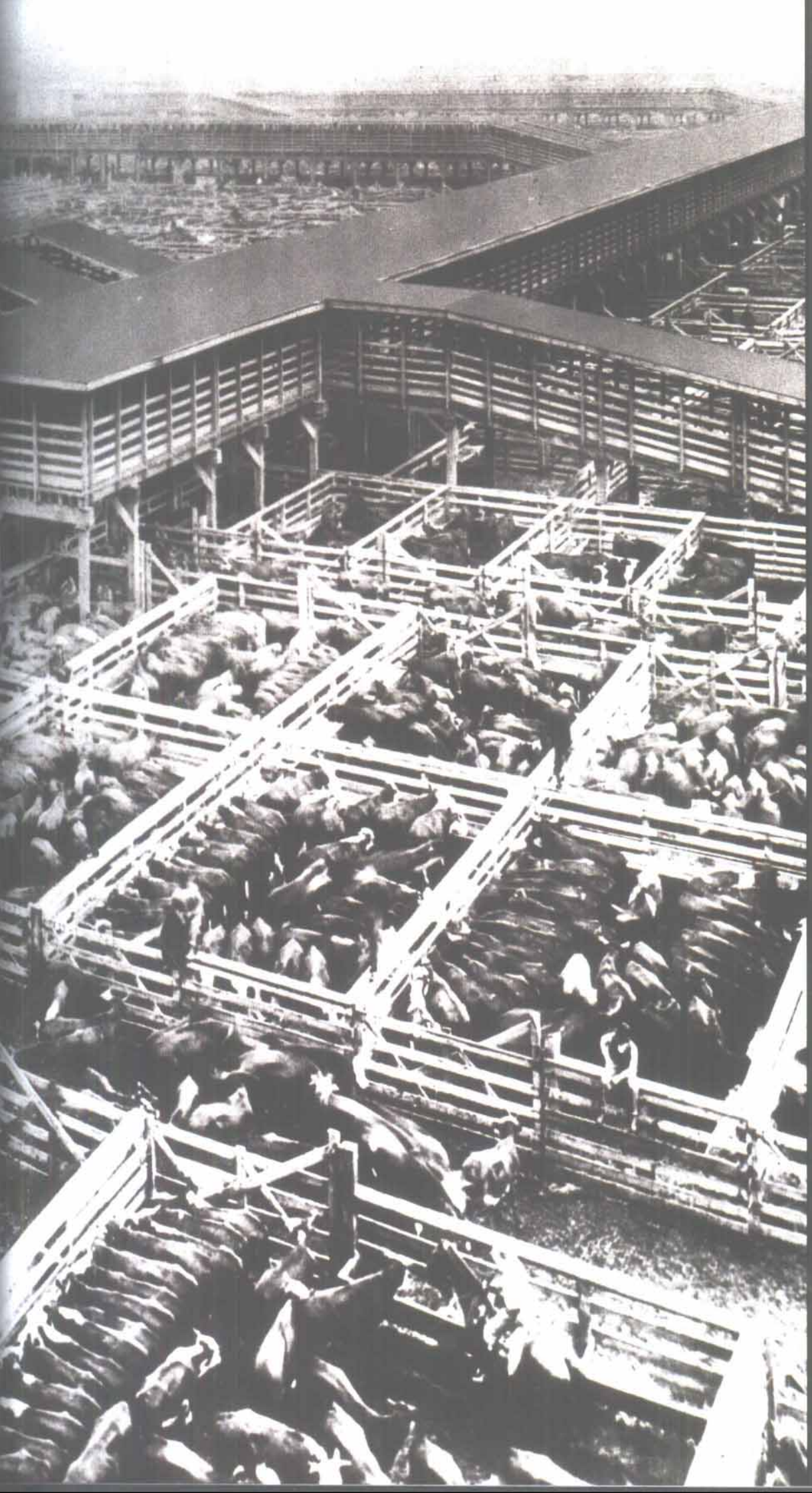
1900年，城市人口仍在上涨，新的全球性食品工业本身也带来了政治和生态问题。但是农场主、科学家和企业家在19世纪的共同努力，已经表明他们完全能够应付这种挑战。

由32匹马拉着的脱谷机正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平原上收割麦子，麦秆从机器中喷出，麦粒落入袋子中。北美、俄国、东欧的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上千公顷的农场比比皆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20世纪，美国每年收获的小麦达26.66亿蒲式耳。小麦存储于铁路沿线的巨大仓库中，再由此运往全国各大城市。1830年，芝加哥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沼泽地，世纪末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肉类市场，人口超过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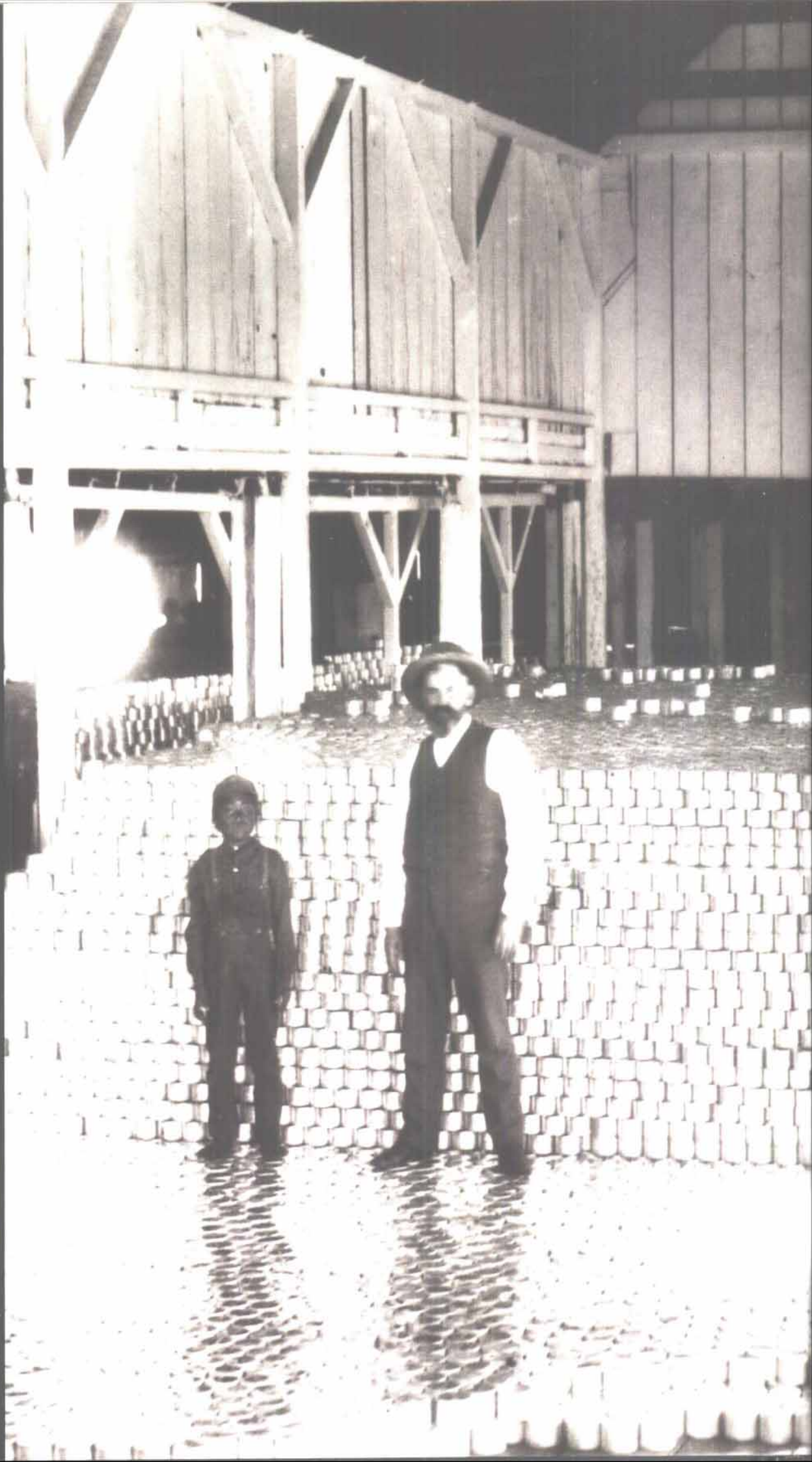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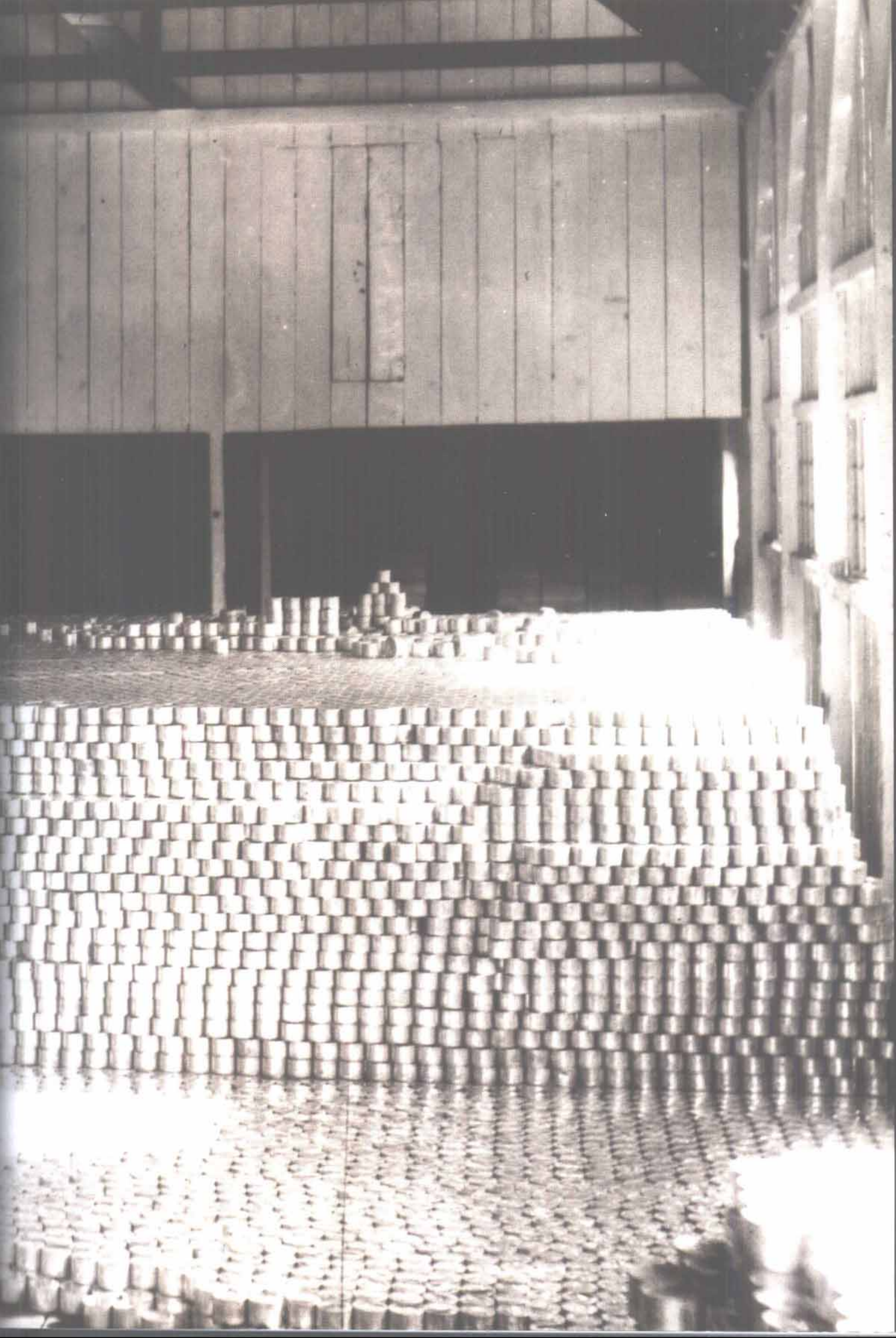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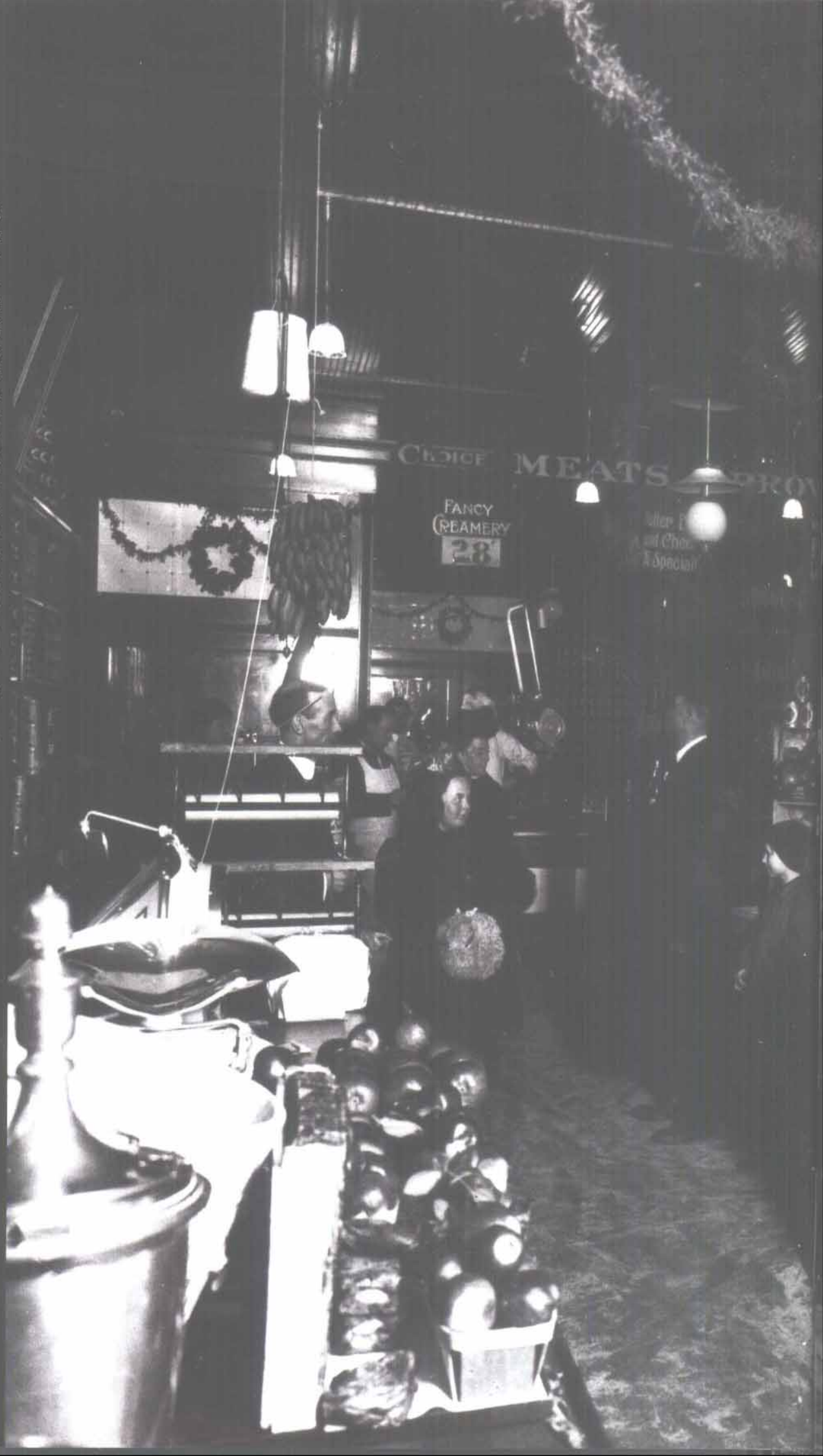
19世纪80年代，供屠宰的生牛塞满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野生长角牛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3年从加那利群岛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野牛的后代，自16世纪起它们漫游于美国南部地区，牧人发现它们比较耐寒就将其驱赶到北方。19世纪80年代，在落基山东部有4500万头这种牛。80年代末，由于干旱和过度放牧，数量锐减。但是在南美洲大草原上，长角牛数量仍在增加。到20世纪初，阿根廷和巴拉圭经济主要靠肉类出口。

英国建于加拿大哥伦比亚的工厂中，堆积如山的沙丁鱼罐头正待销售。据一位消费者说，虽然沙丁鱼罐头味道不错，但是“触摸罐头，总觉得这是油而不是鱼”。罐装和冷藏过程避免了浪费，增加了美洲和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阿根廷，60% 的生牛肉在食用之前便变质了。19 世纪 70 年代，阿根廷销往英国的罐装羊肉和腌制牛肉比当地产的鲜肉价格低一半以上。1877 年第一艘阿根廷冷藏船开往法国，3 年后，澳大利亚第一艘装有冷冻牛羊肉的船开往英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杂货店的柜台中、货架上都摆满了各种外国水果、蔬菜、新鲜乳制品、各种罐装、瓶装的食品以及诸如“冰淇淋粉”等特殊食品。欧美的城市居民现在能够吃到许多他们的父辈从未见过或无力购买的食品。面对新的食物商品潮水般地涌入，零售商们开办各种各样的杂货店，其中既有为富人准备的消费品（如图所示），也有一些种类不多，价格便宜，可以成批购买的商品。烹调大师们，如美国的范尼·法默和英国的伊萨贝拉·比顿还向家庭主妇传授如何用她们的火炉和适当的火候煎、煲和焙烤各种食品。




JELL-O
ICE CREAM
JELL-O



角逐非洲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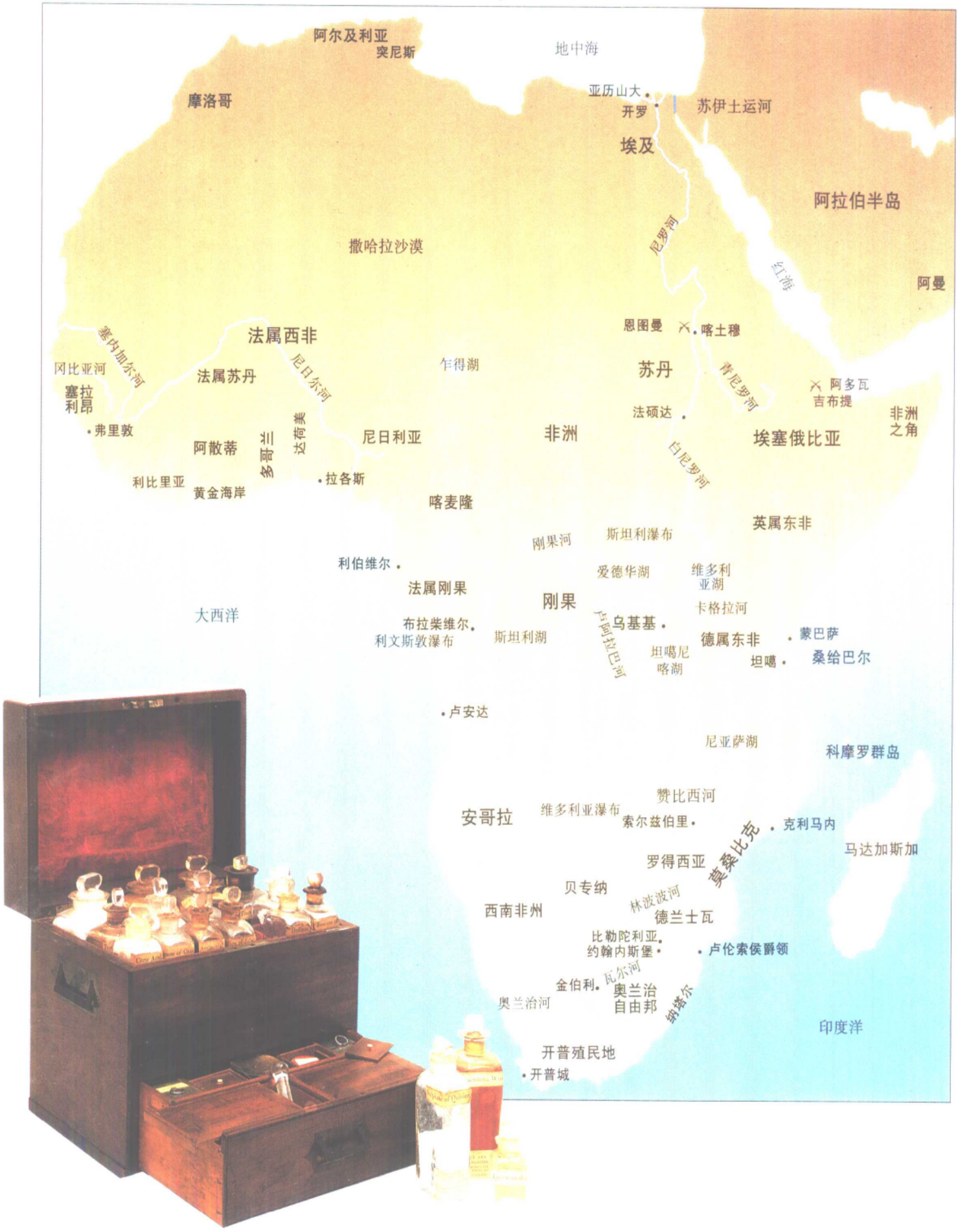
1856 年 5 月 25 日，一个消瘦的苏格兰中年人被非洲挑夫抬着来到葡萄牙属莫桑比克的小镇克利马内。他发着高烧，因几个月来慢性痢疾和周期性发作的疟疾的折磨而异常虚弱，他跪下来祷告，感谢上帝使他能活着完成这一有纪念意义的旅行。在长达 20 个月的步行、间或借助于牛、驴和独木舟的旅行后，大卫·利文斯敦博士，作为非凡的传教士及探险家，成为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欧洲人。

利文斯敦自大西洋岸的葡萄牙属安哥拉的卢安达港出发，勇敢地横穿非洲，行程近 4000 公里，在赞比西河流入印度洋的入海口北岸结束了这一旅行。途中，他击退了武装士兵的袭击，平息了挑夫们的叛变，他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他目睹了主要由阿拉伯商人操纵的兴旺的非洲奴隶贸易：阿拉伯人从非洲内地买出大量非洲人，卖到北部或印度洋彼岸的穆斯林统治区。并且，他穿越了非洲腹地大部分地图上从未标识过的地区，详细记载了他的许多地理发现，其中包括一个伟大的世界风景奇观：被非洲人称作“雷烟”的巨大瀑布，利文斯敦为表现不列颠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其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

12 月，当利文斯敦回到不列颠时，发现他已被誉为民族英雄，他所作的关于这次旅行的第一手记录改变了当时英国人对非洲的普遍印象。《伦敦周刊》1856 年 12 月评论：“欧洲总听说南非中心地带是极度寂寥、寒冷而且贫瘠的，毒风掠过，蛇群出没，而且只有一些散居难驯的野蛮人部落四处流浪……但利文斯敦先生发现他站在一片高地上，这里种满果树，其地形复杂多变，有极完善的河道灌溉网络。”更使人感到新奇的是，利文斯敦强调了，他要在精神传播领域和商业贸易领域向非洲挑战。他在全不列颠各地向聚集起来听他演讲的专注的听众宣传的“福音”，完全是世俗性的：在非洲的传教工作只有与商业计划齐头并进才能获得成功。同时，他极力主张，基督精神与商业是文明的源泉。

利文斯敦是在 1841 年第一次到达非洲的，当时，他被派驻于不列颠“开普殖民地”北部前沿的传教站。在几个月内，他开始确信，劝说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于是开始计划到欧洲人从未到达过的非洲的未知地区探险。对药物知识的学习在利文斯敦的传教训练中占很大比重，他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给非洲人民带去基督教，还

一组西尼日利亚的小型雕像反映了一个约鲁巴艺术家对天主教传教士到达他的国家的印象。19 世纪下半叶，这些传教者为了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做了很多工作，但同时他们也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并非奉行无私信条的欧洲人开辟了通往非洲之路。他们身后追随而来的有欧洲的开矿者、商人和士兵，他们的使命并不是如维多利亚女王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为了保护贫穷的当地人并促进文明”，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掠夺这块大陆。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地中海
摩洛哥
亚历山大
开罗
苏伊士运河
埃及
阿拉伯半岛
撒哈拉沙漠
尼罗河
红海
阿曼
恩图曼
喀土穆
塞内加尔河
法属西非
尼日尔河
乍得湖
苏丹
青尼罗河
阿多瓦
吉布提
冈比亚河
法属苏丹
塞拉利昂
弗里敦
法硕达
非洲之角
阿散蒂
多哥兰
达荷美
尼日利亚
非洲
埃塞俄比亚
白尼罗河
利比里亚
黄金海岸
拉各斯
喀麦隆
英属东非
刚果河
斯坦利瀑布
利伯维尔
爱德华湖
维多利亚湖
法属刚果
刚果
大西洋
卡格拉河
布拉柴维尔
利文斯敦瀑布
斯坦利湖
乌基基
卢阿拉巴河
德属东非
蒙巴萨
坦噶尼喀湖
坦噶
桑给巴尔
卢安达
尼亚萨湖
科摩罗群岛
赞比西河
安哥拉
维多利亚瀑布
索尔兹伯里
克利马内
马达加斯加
罗得西亚
莫桑比克
贝专纳
林波波河
西南非州
德兰士瓦
比勒陀利亚
约翰内斯堡
卢伦索侯爵领
瓦尔河
金伯利
奥兰治自由邦
奥兰治河
纳塔尔
印度洋
开普殖民地
开普城

应包括药物和现代科学能提供的物质帮助。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太超前，竟然要求政治家们在制定不列颠对非洲的正式官方政策时要有责任感；但他的建议要求英国人的责任要广泛扩展到不列颠岛之外，这一观点对于帝国主义“主宰”殖民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殖民主义正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的。

1807 年不列颠曾单方面废止了跨越大西洋的非洲奴隶贸易，并于 1833 年在它的殖民地释放了奴隶。对于利文斯敦所揭露的仍在非洲继续进行的奴隶贸易活动感到大为震惊的传教界人士，现在发起了把“文明之光”带入非洲大陆的探险活动，这片大陆被当时的人们公认为“黑暗的大陆”。野心勃勃的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寻找新的贸易机会。冒险家们逃离西方社会习俗的种种限制去追求未知的一切。但是，没有政府的支持，对于非洲的殖民化进展得很缓慢。然而，一旦私人公司迈出了第一步，政治家们就不得不支持，欧洲人对非洲的介入逐步形成了一种趋势。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里，对非洲土地和财富的掠夺呈现出一种欧洲纸牌游戏那样的排他特征：因担心他人会乘机大捞一笔，没有一个游戏者敢离开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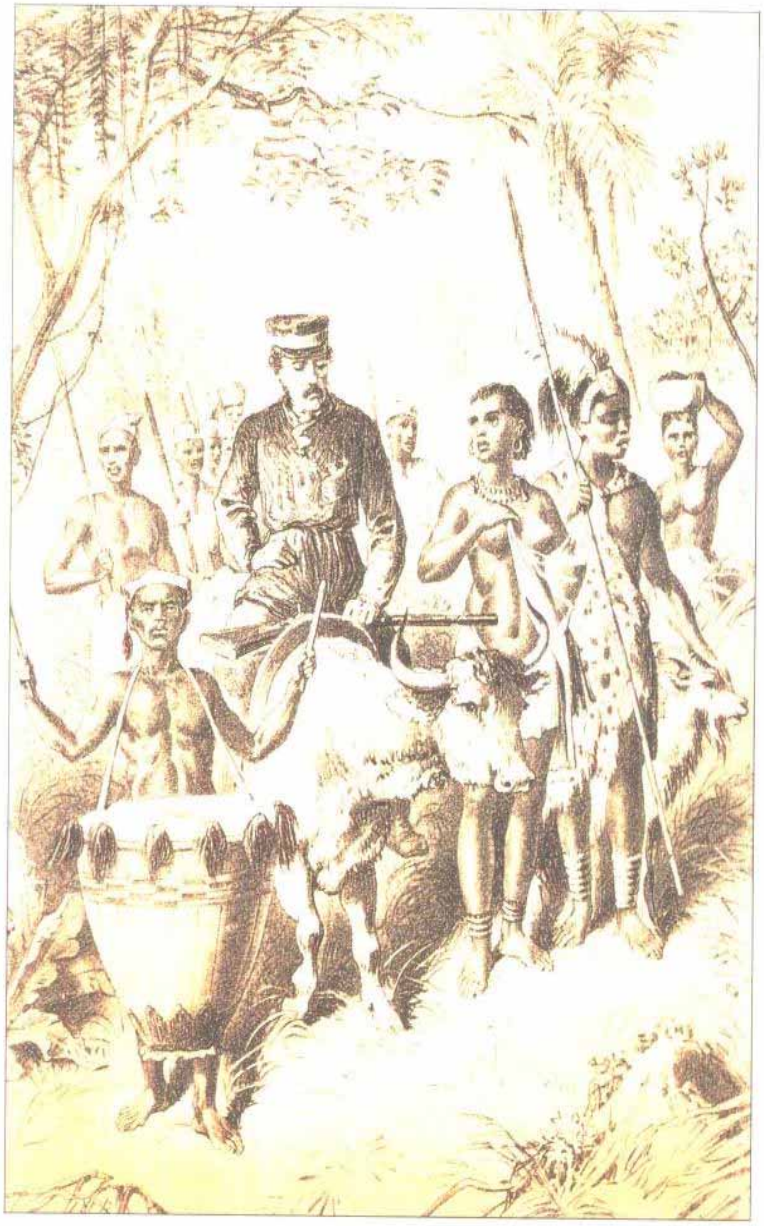
到 1900 年，4600 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90% 以上都被欧洲列强瓜分，成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就占领的土地面积而言，法国和不列颠是主要的帝国领主，其次是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有东部埃塞俄比亚和西部的利比里亚保持着独立，没有被欧洲人控制。“灾难的太阳在西方升起，”一位非洲诗人写道，“基督教的灾难像乌云一样降临。”

在利文斯敦进行其英勇旅行的 19 世纪中叶，非洲只有两个地区在较大范围内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一个是阿尔及利亚，1830 年被法国占领；另一个是开普（即后来的南非），不列颠帝国于 1806 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得它，目的是保护它在东方日益发展的帝国海路交通。在阿尔及利亚，约有 17 万白人殖民者，大部分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马尔他居民。差不多有相同数量的白人居住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他们大部分曾经有一些财产，甚至比较富有，但后来因破产而成为穷苦的农民。另一支值得注意的白人群体是居住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约 3000 葡萄牙人。

在非洲西海岸，法国人和不列颠人在沿海地区零零散散地建立了一些欧洲贸易移民区，但这仅是少数白人殖民者的家，其中多数建于 18 世纪，即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全盛期。后来，商人转向出口棕榈油、菜籽油和木材。还有 3 个几乎全由解放了的黑奴组成的殖民地：其中有位于塞拉利昂的弗里敦，1801 年成为不列颠殖民地；位于加蓬河口的利伯维尔，1849 年由法国人建立；以及独立的利比里亚共和国，1821 年由美国慈善团体创立。

不列颠强大的海军控制着海岸线，但它设在西非的海军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但已大大减少了的非洲的奴隶贸易，并且保护商业贸易事业。但是西部非洲所有的欧洲移民都在近海岸占领区内居住，只有

19 世纪中叶前，非洲（相当于欧洲面积 3 倍的大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其气候、地形、疾病等多种自然因素而一直与外部世界相隔绝。渐渐地，技术和医疗的进步使欧洲人战胜了这些障碍。19 世纪 60 年代医药的丰富，如奎宁的使用（左下角图），大大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在探险者和传教士的召唤下，贸易商和移民竞相赶到他们认为可获最高利润的地区。19 世纪末，90% 以上的非洲大陆被欧洲帝国主义者瓜分。



一幅 1878 年的版画描绘了利文斯敦在他的一次英勇的旅程中骑着他的那头叫做辛巴德的牛。尽管这个苏格兰传教士曾声称"我在牛背上思考"，但他在非洲的辛苦工作不仅限于思考。在旅途中，他依靠月光判断所在位置；他一生在非洲大陆内穿行了约 5 万公里，忍受着风湿热、疟疾和痢疾的折磨。在他的努力下，未被标明的地图填上了内容，而且，他还传播了基督教信仰。到 1873 年他去世的时候（可能死于痔疮的恶化），他的旅行笔记出版，使他成为西方世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在塞内加尔，外国势力企图伸展到内陆——法国人对塞内加尔河谷地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活动，并且强迫当地居民种植出口农作物。

在东非，阿拉伯人同非洲土著居民抵抗任何来自于欧洲的侵略。约公元 1000 年，在东非沿海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使这里发展起了一种被称为"斯瓦希里文化"的非洲—阿拉伯文化。16 世纪初，斯瓦希里人在沿海的贸易中心曾被葡萄牙人所控制，这些贸易中心将非洲内陆运来的黄金、象牙和奴隶运抵印度洋彼岸。但是这些葡萄牙新殖民者在向赞比西河下游以远地区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受挫，只在莫桑比克省建立了脆弱的控制。

17 世纪中叶，斯瓦希里人依靠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的军事援助，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驱逐葡萄牙人，但结果是他们被更强有力的统治者所征服。到 19 世纪 20 年代，阿曼的阿拉伯人控制了北起肯尼亚，南至坦桑尼亚的大片原属斯瓦希里人控制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到来预示着印度洋上奴隶贸易额的巨幅增长。1832 年，握有全权的阿曼苏丹赛义德·宰德把首都从阿曼的马斯喀特迁到气候温和的桑给巴尔后，这种增长更加势不可挡，且更引人注目。

在赛义德·宰德统治期间，每年约有数以 10 万计的东非人被卖到海外各处成为奴隶，同时还有另一些东非人被送到桑给巴尔从事丁香的种植。结果，反对奴隶制的分遣舰队（其中主要是不列颠人）在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活跃。1856 年赛义德·宰德去世后，桑给巴尔被纳入不列颠的统治之下。

此间，欧洲人很难成功地深入非洲内部。由于赤道地区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更重要的是疟疾和黄热病这类地方病的阻碍——这些地方病经常使许多没有免疫力的传教士、探险家和贸易商致死，欧洲人的内迁势头经常被阻止。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在中美洲也未曾遇到过此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尤其重要的是，非洲的土著部落势力，特别是位于西非的土著部落的抵制，迫使白人移民者把自己限制在沿海圈出的居住区内。与欧洲人的普遍认识相反，中非居住的不是没有法纪的野

蛮人组成的游牧部族，而是组织良好的、拥有足以抵抗外来入侵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人民。

在非洲西海岸，欧洲移民的存在和他们在贸易中获利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怎样同非洲的统治者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些统治者要求一定数量的税收和贸易优先权，作为他们给予白人帮助的交换条件。甚至在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中，西非人都控制着商业的主动权，他们要求欧洲人留在海岸上等候他们传送战俘。他们用奴隶交换欧洲人手中的枪炮，当奴隶贸易缩小到只能通过小规模非法运输进行的时候，他们仍能开发自己多样的自然资源而不依赖欧洲经济。19世纪中叶，法国沿塞内加尔河向上游地区的进犯被穆斯林改革者阿尔—哈吉·奥马尔制止。不列颠出现在黄金海岸的北部和东北部，逼近了达荷美和阿散蒂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当时两国的人口已经达到百万。

在大陆的另一头，除了极少数葡萄牙贸易商，只有两个德国人进入了非洲腹地，这二人都是以蒙巴萨为基地的传教士。1848年，约翰·雷布曼到达了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山；一年之后，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发现了同样覆盖着白雪的肯尼亚山。在遥远的伦敦，他们被称为说谎者或乐于愚弄人者，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认为在距赤道那么近的地区是不可能出现雪的。

由于在西非和东非受到阻碍，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地更多卷入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事务——但在这一阶段，他们并不卷入商业或军事冲突。1859年，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独立国家摩洛哥为打败西班牙入侵者而向不列颠借贷，从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位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突尼斯，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也背上沉重的外债，于是，19世纪60年代一个由法国、意大利和英联邦的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财政管理责任者。

欧洲经济在埃及的渗透，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自1805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就职后，这一过程迅速加快。自16世纪起，以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奥斯曼人就是埃及的统治者，而阿里想着手创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阿里使他的军队现代化，并使用法国工程师修建运河网络以及贮水浇灌工程。1822年，他被一个法国农业专家说服，开始种植棉花，这种出口农产品的种植将使埃及与繁荣的欧洲经济联系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者执政期间，不列颠修建了自开罗到亚历山大的第一条非洲铁路，而法国前任领事斐迪南·莱塞普斯也得到了一项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许可，这条运河将使地中海上的塞得港和红海上的苏伊士接通。

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埃及比以往更加紧密地同欧洲连在一起。开罗的西化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他们争相在此地定居、创立自己的事业。由于托马斯·库克的成功，崭露头角的旅游事业开始发展起来，这个英国人想出一个主意，让欧洲人乘豪华汽艇沿尼罗

河参观位于卢克索的古埃及圣殿。1863 年即位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哈蒂夫·伊斯梅尔骄傲地宣布："我的国家已不再是非洲国家；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

然而，埃及只是在朝着失去经济独立的方向前进。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当世界棉花市场的主要供应商美国处于内战的破坏中时，埃及的棉花年贸易额增长了 4 倍；但 60 年代末，美国经济恢复，埃及的棉花市场崩溃了。为了实现其国家发展规划，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从欧洲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在当时，这是他无力偿还的。1875 年，不列颠从伊斯梅尔手中购买了苏伊士运河一半的股权；法国则拥有另一半。1876 年，伊斯梅尔在债权人逼迫下，同意由英法共管其境况不佳的国家财政。



即使到这一时期，进入非洲的那些欧洲政府的兴趣也仅限于保护现有的商业收入。他们一直相信撒哈拉沙漠腹地是难以达到的、危险的和无价值的地区，不是殖民者理想的去处。尽管政治家们望而生畏，私人公司和个人却越来越积极地接受非洲腹地的挑战。

阿尔及利亚爱国者阿卜德·卡达尔在被流放之前把他的弯刀交给法国政府的将军奥马尔公爵。1830 年，在阿尔及尔港的市长痛打了法国领事之后，法国占领了这一港口。但是，当法国想把殖民统治扩大到整个国家时，阿卜德·卡达尔号召山上的穆斯林部落进行圣战，向外国殖民者驻地发动持续进攻。直到 1847 年卡达尔被俘乃至被流放之后，持续不断的反抗依然存在，这迫使法国侨民只能蜷缩在由新建的法国军团防守着的堡垒区内。1871 年，阿尔及利亚事实上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必须再过 8 年之后，这里的军事管制才能被文职行政管理机构所取代。

100 多年来，传教士和探险家们（绝大多数是不列颠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曾经把其注意力集中于非洲的四大河系——尼罗河、尼日尔河、赞比西河和刚果河，因为这些水道为深入内地提供了最方便的途径。19 世纪 50 年代，不列颠探险家中产生了探求最后一大地理秘密的热情——寻找尼罗河源头。早在 80 年前，即 1770 年，一个叫做詹姆斯·布鲁斯的苏格兰贵族探险家已经探明，尼罗河的北部支流青尼罗河，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地 1800 米处。而寻找尼罗河另一条更长的支流——白尼罗河的源头，则在 1857 年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这一年，不列颠皇家地理协会赞助了由一个 35 岁的、有着超凡能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的军官理查德·伯顿领导的探险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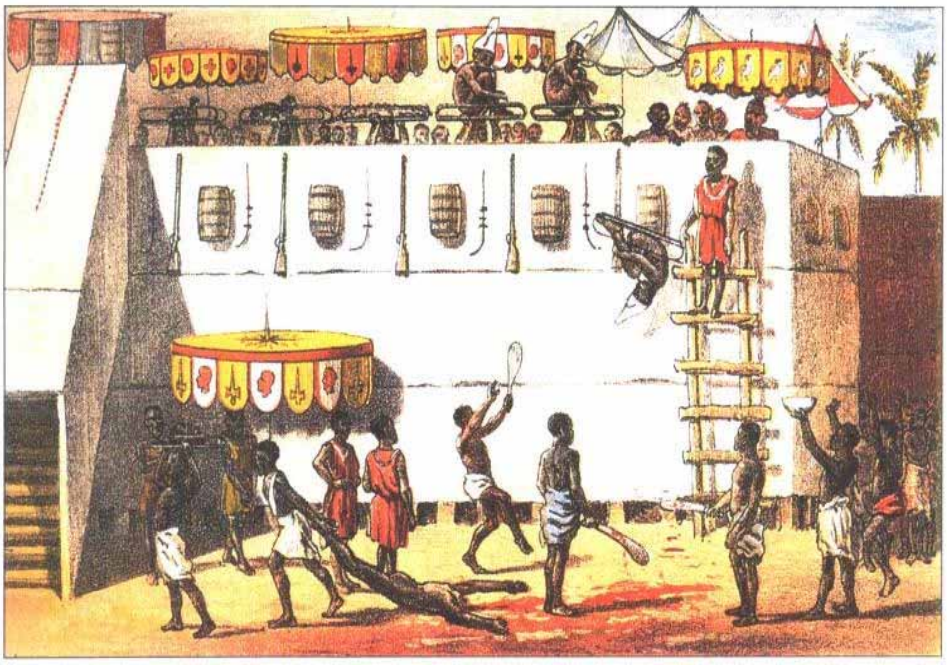
在另一名军官约翰·翰宁·斯皮克的陪同下，伯顿带领一队由 130 名当地人组成的挑夫队伍从桑给巴尔向西出发，穿过了今天坦桑尼亚的中心地带，到达了坦噶尼喀湖，成为第一批看到如此巨大开阔水域的欧洲人。之后，由于伯顿发高烧病倒在帐篷内，斯皮克向北挺进，在那里，他穿过了第二个更大的湖。他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给这个湖命名，并

且得出结论，这就应该是“尼罗河的源头”。

但是，斯皮克的结论受到了伯顿的激烈反对，伯顿更倾向于认为坦噶尼喀湖是尼罗河的真正源头。1860 年，斯皮克领导了第二次探险，从桑给巴尔到维多利亚湖进行了 3 年的旅行，之后顺尼罗河弯曲的河道下行。他从开罗发回电报说：“尼罗河的问题解决了。”但斯皮克没有进行环游非洲最大的湖维多利亚湖的航行，就不容置疑地确认：没有河流注入维多利亚湖。他与伯顿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1864 年 9 月，在斯皮克与伯顿要举行公开辩论的前夕，斯皮克在英国农村猎鸟时去世。有人认为，他是自杀，以免他的关于尼罗河的论断会因其科学根据不足而被当众推翻并被嘲笑，但是他的死亡经鉴定确认为狩猎事故。

皇家地理协会此时只好试图劝说当时著名的、最受人尊敬的探险家利文斯敦去继续寻找尼罗河源头。这时，利文斯敦已经整整 3 年杳无音信，纽约先驱者报社的一个名叫亨利·莫尔顿·斯坦利的年轻记者被派去寻找失踪的英雄。斯坦利记下他的经历：1871 年 11 月，他费尽千难万险在乌基基找到了利文斯敦，这是阿拉伯人在坦噶尼喀湖东岸建立的一个奴隶站。尽管利文斯敦已病入膏肓，自称已经是“一具骨骼”，但仍不肯放弃他一生的追求。他认为尼罗河源头可能比伯顿和斯皮克所假设的还要向南深入些，而且他已经坚信，位于坦噶尼喀湖西南方向的另一条大河卢瓦拉巴河，才是尼罗河真正的源头。在辞别斯坦利后，利文斯敦沿着这条路线开始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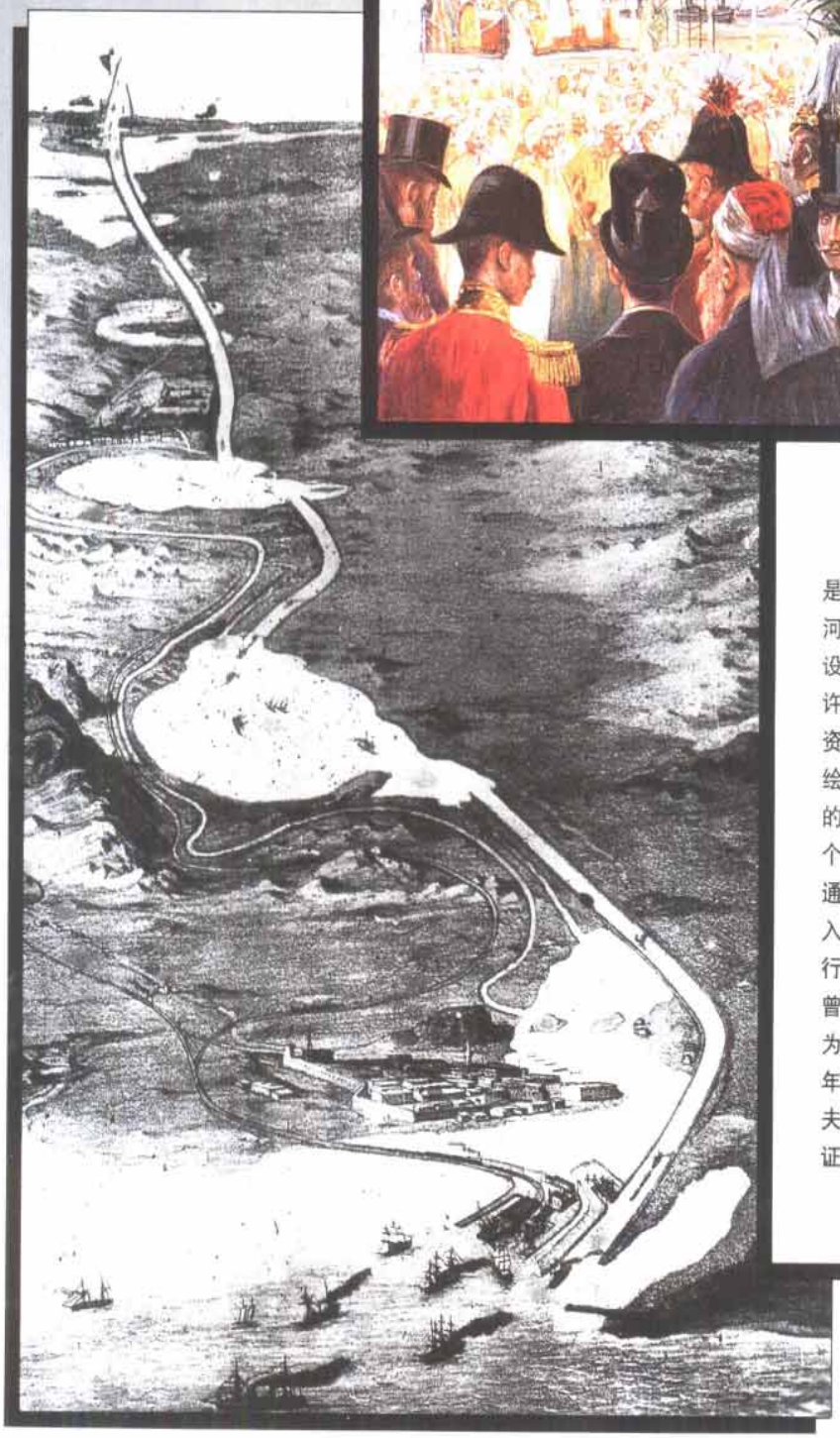
一个用作人祭的牺牲者跌倒在等候行刑的刽子手面前，这幅 1874 年的绘画出自于西非的达荷美王国（位于今贝宁）。为了使民众畏惧而进行的这种一年一度的不人道的祭礼，成为法国人 1892 吞并达荷美王国的借口，它把达荷美纳入自己迅速扩张的西非帝国中。但达荷美王国的士兵是善战的，法国的征服战争花费了两年时间。法国军队为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宣称他们的敌手是由德国军官领导的。

1873 年 5 月 1 日，在今赞比亚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利文斯敦的非洲仆人发现他们的主人已经死去了，他的头抵在膝盖上，好像还在祷告。他们忠诚地取出利文斯敦的心脏和内脏，在一棵树下将它们火化，而利文斯敦的尸体则最后被送回不列颠，葬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利文斯敦去世时年仅 60 岁。他在非洲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这些年里，他纵横非洲达 5 万余公里，制作了非洲中部水系图，找到了赞比西河的源头，到达了刚果河上游，穿过了喀拉哈里沙漠，首次揭示了尼亚萨湖的存在。作为传教士，他可能并不很成功，他并没有使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但在他一生中，利文斯敦不遗余力地反对奴隶制，他比其他

帝国的生命线





这个世纪最主要的技术成就之一，就是开掘了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这一工程是法国人斐迪南·莱塞普斯设计的，他从埃及总督哈蒂夫那儿获得了许可，又在1859年创立了一家公司来筹集资金。10年以后完成的水道由一位当代人绘制出来，如左图所示。在跨过苏伊士地峡的160公里长的路程中，该运河经过了3个主要湖泊。开凿运河的支出是巨大的，仅通航典礼（上图）就耗资200万英镑，但收入也同样巨大：由不列颠到印度之间的航行时间由3个月降至不到3周。而一开始曾对该项工程冷嘲热讽的英国，现在则认为对它的控制是英帝国安全的保障。1875年，他们终于能够从破产的埃及总督哈蒂夫手中买到了对该运河的控股权，以此保证了他们通向东方的生命线。

探险者更为用心地理解非洲人民的文化，他曾经十分刻苦地学习非洲语言，并仔细地记载非洲的习俗。

相反，比利文斯敦小30岁的亨利·莫尔顿·斯坦利对非洲却没有个人感情。“我全身心地厌恶这块土地。”他曾经写道。然而他极端崇拜利文斯敦，而且决定去完成他所崇拜的英雄最后未完成的使命；他自己的旅行将导致欧洲人在中部非洲的殖民活动。1874年，斯坦利带着一只12米长的轻便游艇进行了一次探险，这条游艇将有助于他考察那些大湖，最后揭开白尼罗河的神秘面纱。斯坦利由维多利亚湖的源头卡格拉河出发，找到了位于布隆迪南部群山间约2500米高处的一个水源，此处距坦噶尼喀湖约50公里。于是，他继续寻找下去，终于发现了维多利亚湖西侧的爱德华湖，并为之命名。此后，1876年11月，他带领700名助手，自坦噶尼喀湖西部尼扬维出发，沿着图上未标明的卢瓦拉巴河向北航行。在这次航程中，斯坦利有两次不得不放弃他的努力，任凭浪潮把他们冲上岸：第一次是由于7个狂吼的大瀑布的阻碍，后来该瀑布被命名为斯坦利瀑布；在河面变宽进入斯坦利湖后，又遇到12个以上的大瀑布，后来被命名为利文斯敦瀑布。在途中，他遭到一些武装分子的攻击，他所率领的队伍也因人员逃亡、疾病和饥饿损失了数百人。但他通过这次航行证明了卢瓦拉巴河与尼罗河毫无联系，而且，事实上它是全长5000多公里、发源于坦噶尼喀湖南部的刚果河的一部分。

在3年之内，斯坦利为填补非洲地图的大片空白而取得的成就，超越了在他之前所有的探险家。他还取得了外交上的显著成功　当他到达维多利亚湖北端的乌干达王国时，他劝说统治者允许欧洲人在这个国家建一个永久性的基督教传教据点。作为协议结果，1876年，英国安立甘宗的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都到达这里。英国安立甘宗的传教活动是使英国在东非内地建立永久性的机构的开端，但间接地导致英国成为乌干达的宗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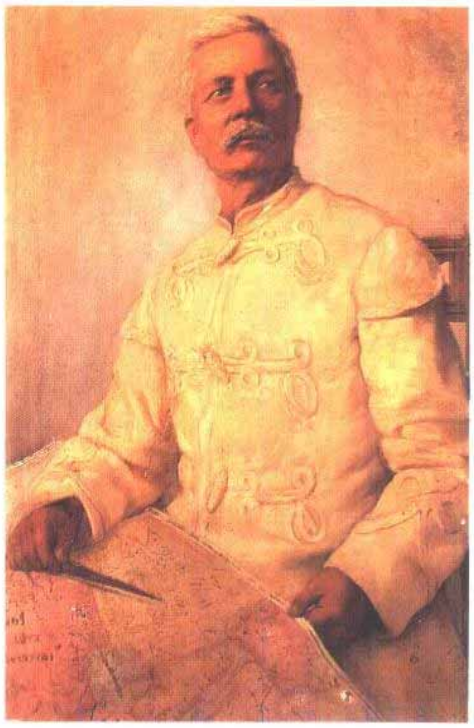
斯坦利的野心是要“把欧洲文明送入未开化的非洲”，主要是想通过刚果河水系达到这一目的。他建议道，如果不列颠政府能组织并投资建设绕过斯坦利湖和河口间大瀑布的公路或铁路，“通向非洲西部中心地带的商业大道”将向他们开放。但他对进行这一工程计划的所有论证都被不列颠政府置若罔闻，他只能另找一个准备认真听取他的建议的欧洲统治者。



法国探险家皮埃尔·萨伏日南·德·布拉柴伯爵在这幅艺术肖像上留下了极浪漫的形象。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伯爵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相信，非洲大陆是法国文化的最佳扩张地。出售这类照片的目的在于为各种非洲大陆的探险募集捐款。19世纪80年代，布拉柴使用这笔捐款在刚果河北部的大片地区进行了探险活动。

比利时是1831年从荷兰分出的独立国家，是欧洲几个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于1865年登基之后，却不肯安于自己作为一个小国君主的角色。他已经提出了一项在遥远的中国建立比利时殖民地的庞大计划，而现在则把

他的目光盯住了中非的刚果河谷地。利奥波德的计划受到了他的政府阁员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他于1876年9月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旨在推动非洲不同人种和科学进步的协会。作为协会主席，利奥波德可以不经比利时政府同意，随意参与非洲事务，而且不会很快引起欧洲各国的怀疑。



1879年8月，斯坦利回到非洲，这一次，他带着利奥波德提供的资金开始在刚果河流域修建环利文斯敦瀑布的公路。他还在从刚果河口到斯坦利瀑布间约1600公里的沿岸地区修建了贸易站，并同非洲的土著首领们签订了400多个条约，以便在刚果河谷地内建立自由黑人联邦共和国。表面上，这个联邦是独立的非洲黑人国家，实际上，斯坦利是在刚果河流域为利奥波德的私人王国奠定基础。

此时，刚果河流域已开始引起其他欧洲野心家的注意。在斯坦利修建环利文斯敦瀑布的公路时，一个出生于意大利的26岁的法国军官皮埃尔·萨伏日南·德·布拉柴伯爵带领的探险队逆水而上，到达了远至刚果河上游的斯坦利湖区。那里并没有任何政府权威，德·布拉柴就说服当地的一个首领在协议上画押，准许法国人在其村庄上建立基地，此地即现在的布拉柴维尔。这个地方首领同意将他的土地和人民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法国政府最初不愿意正式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但1882年，埃及政治事态的发展使法国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埃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军官们发起了一个军事民族主义运动，想使埃及摆脱所有的外来影响。民族主义者的领袖阿赫迈德·阿拉比上校依靠强有力的支持，迫使埃及总督哈蒂夫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政府军务大臣。埃及的主要债权人英联邦和法国害怕这些民族主义者会取消债务，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他们也担心欧洲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两国于1882年5月联合起来，向亚历山大派出了一支舰队，名义上是为了疏散难民，实际上是为了展示实力并阻止暴乱的发生。英法海军的出现只是起到了挑衅的作用，6月11日，大约50个欧洲人在亚历山大的一次暴乱中被杀。

不列颠和法国卷入了一场旨在保卫它们在埃及利益的军事冲突，武力冲突仅仅进行了11个小时，法国国内出现的危机就迫使法国将参与这次冒险的军队撤回，不列颠只好独自应战。8月，不列颠远征军在开罗东北80公里处

生于威尔士的美国记者亨利·莫尔顿·斯坦利身穿自由刚果州的制服，此州是斯坦利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名义创建的。这幅肖像是斯坦利的妻子所绘制。斯坦利是当时最伟大的冒险家，他解开了许多非洲地理之谜，并直接诱使欧洲国家转向非洲大陆，开发这里的商业潜力。他的伟大业绩为他赢得了“布拉·马塔利”（开山者）的非洲名字，而且给他带来了名誉和财富，1899 年，他还被英国政府授予骑士身份。在西方，斯坦利被广泛认可的业绩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即他在 1887 年从穆斯林的叛乱中把苏丹的埃及总督营救出来的一次历险，这一故事在孩子们的棋盘游戏中得到了永远的保存（下图）。

的泰尔－克比尔打败了阿赫迈德·阿拉比的军队。

不列颠在战斗结束后对开罗的占领，只是想在埃及能够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新政府之前，保护欧洲的财政利益和保卫苏伊士运河。但是，情况很快就一目了然，如果英国不想放弃埃及，使之落入埃及民族主义者手中，就不可能迅速地撤退。此外，在解决积重难返的诸多管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同时，不列颠还继承了一个额外的包袱：在苏丹的一个自称为“马赫迪”的穆斯林领袖阿赫迈德·伊本·赛义德·阿卜杜拉挑起的战争威胁面前，承担保护埃及的责任。马赫迪是穆斯林人民长久以来盼望的“一个先知式的导师”，身负传教的神圣使命，要恢复穆斯林社会的真实信仰的纯洁性。

在埃及重建一个有清偿债务能力的国家要用 7 年时间，而不列颠最后



设法解决苏丹的马赫迪国家则还要用 9 年时间。此前很久以来，埃及是保持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平衡的重要战略因素。它太重要了，乃至不列颠此时已不能有撤军的打算了。由此，1882 年不列颠开始的对埃及的“临时”占领注定要持续 70 年之久，在一种不成文的体系中，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非正式保护”。

尽管这种发展在 1882 年不可能预料得到，但是，埃及的冲突粉碎了不列颠与法国在非洲的权力平衡，并且导致欧洲势力卷入争夺非洲的新的领域。一直对不列颠占领埃及心怀嫉妒的法国人，现在决定在西非扩大它的帝国。1882 年 11 月，法国政府批准了由德·布拉柴起草的条约，并资助他开始新的刚果探险。接下来，这一事件使得葡萄牙突然想起他们曾在 15 世纪末深入到刚果河流域，因此，他们有优先占有刚果河的权利。不列颠为避免法国人主刚果河流域，同葡萄牙人签订了《英葡条约》，该条约声称：英国人承认葡萄牙人对整个刚果河流域拥有控制权，作为回报，葡萄牙将保证英国在此地进行自由贸易。1883 年，由于始料不及的德国的介入，使得对非洲控制权的竞争逐步激化，也日益复杂。

1883 年末到 1885 年初，德国宣布对西南非洲未划界的地区多哥兰、喀麦隆和东非实行保护。这是又一次未经政府授权的人们所推动的政府行为。在一次表面上是为了科技和商业目的对喀麦隆进行的考察中，一个名为古斯塔夫·纳赫提加尔的探险者与当地土著首领签约，获得了他们的领地。另一个德国内科医生卡尔·彼德斯博士建立了私人组成的德国殖民协会，然后就与今坦桑尼亚的非洲土著首领们达成了协议。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对建立一个非洲帝国并没有确定的打算，但由于国内的政治党派的压力，他同意承认德国在非洲的占领地的官方地位，而且，他也认识到非洲的殖民地是在欧洲内部转移法国的敌意的手段之一，因为此时的法国仍处在 1871 年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激愤之中。

欧洲各国在最初涌入非洲时并没有一致的战略，随着他们越来越陷入逐步升级的敌对状态，列强们发现，它们此时迫切需要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因此，1884 年 11 月，在俾斯麦建议下，由 14 国参加的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这次由相关利益者参加的会议之首要目的是解决刚果的直接前途问题，但它实际的成就是订下了更快且更广泛的夺取非洲地盘的计划。



机关枪是殖民扩张中杀人武器的代表。1884 年，一位美国工程师希拉姆·马克沁改进了这种轻型的单管枪。这种枪利用每次射击产生的气体压力来推进自动上膛装置，它的射程超过 2200 米，且每秒可发射 11 发子弹。马克沁枪彻底击垮了非洲军队：1899 年，320 名配备此枪的法国士兵击溃了多达 1.2 万名士兵的乍得武装力量。



这是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座宫殿中的木雕门，描绘了 1895 年约鲁巴国王接见不列颠政府派来的专员的情景。约鲁巴国王所统治的国家，是 1900 年不列颠政府建立其尼日利亚保护国时所吞并的 3 个国家之一。这一合并起来的国土，其面积远远大于任何西欧国家，并且在这片土地上有 200 种不同的语言。这一切都巩固了英国在一向由法国占统治地位的西非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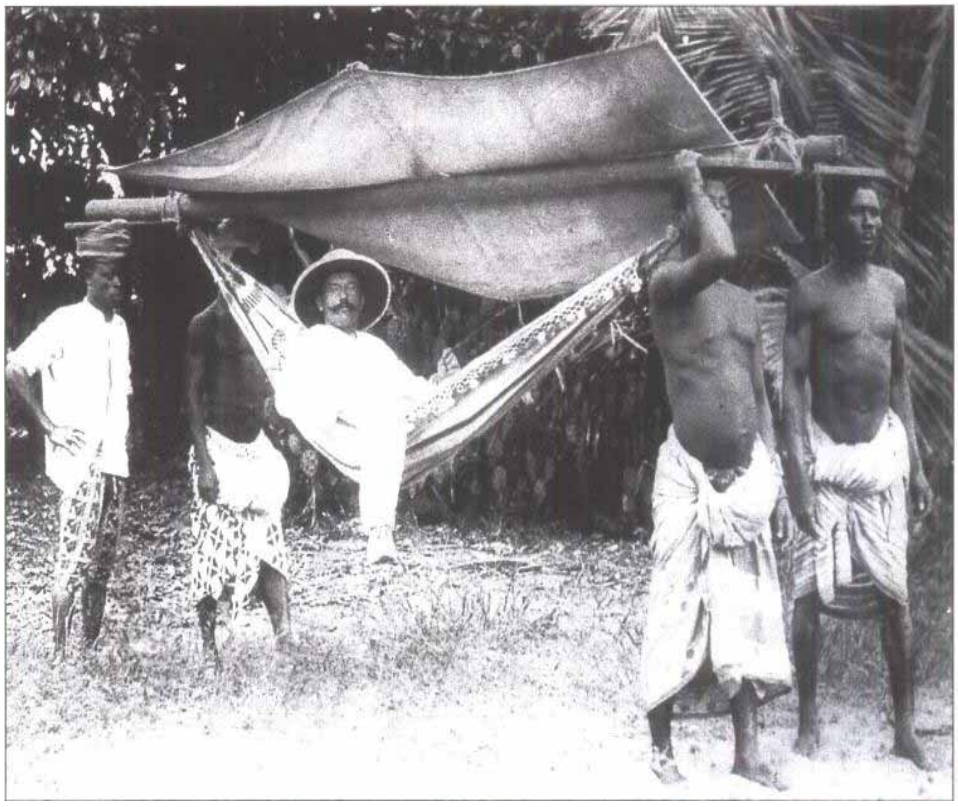
柏林会议一致赞成的解决方案是设法放缓殖民化的脚步，降低欧洲列强间正面冲突的危险性。中部非洲的许多地区被宣布为自由贸易区，这就粉碎了想建立受保护市场的那些国家的幻想。对所有关于沿海地域的归属问题引起的争执，则根据“有效占领”原则来决定，即必须在该地建有管理机构，这就增加了管理一个殖民地的费用。但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拥有海岸地区的国家同时有权控制内地并任意扩大殖民地的边界，其前提是他们不妨碍相邻殖民地的利益。欧洲人对非洲的占领被认可，对大陆的瓜分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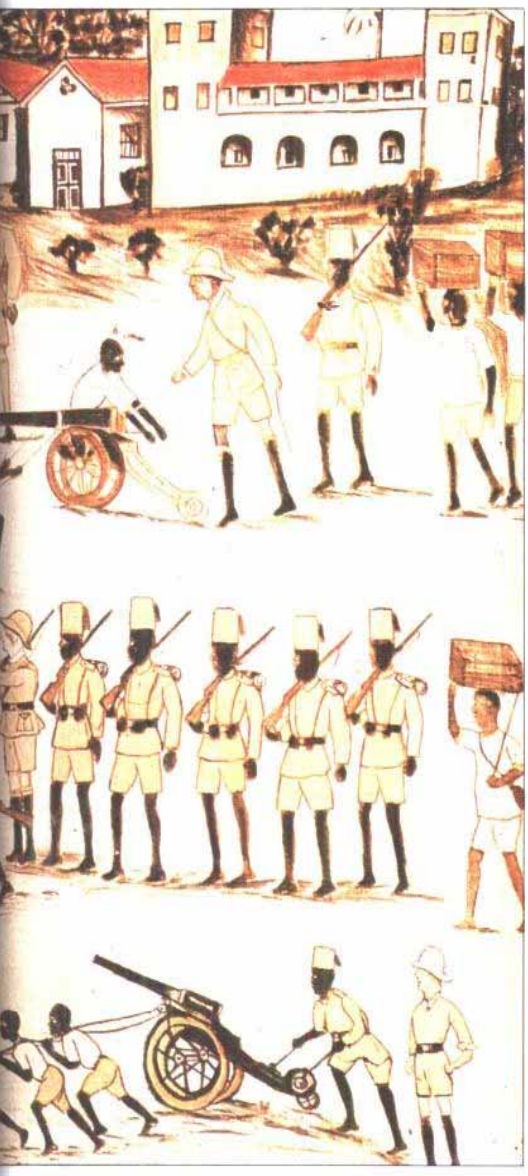
柏林会议的直接受益者是利奥波德二世。尽管会议确认了法国和葡萄牙对刚果盆地一些地区的统辖权，但仍有深入非洲腹地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归自由刚果州，利奥波德的协会承担着管理自由刚果的职责。利奥波德不是以比利时国王的名义，而是以他个人名义统治这块殖民地，因此他坚持“我在刚果的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他通过开发当地的野生橡胶积聚了巨额财富，而且通过他所任用的总督和从地方上招



这幅画出自一位东非艺术家之手，它描述了武器装备极其原始的武士与由欧洲军官率领的全副武装的斯瓦希里军队(也是黑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厮杀，地点是在德国的保护国坦噶尼喀。此时刚刚开始的对这片土地的占领，与德国大多数其他占领地一样，是由一个商业公司进行的，但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到19世纪末，小规模的政府才建立起来。

一位西非多哥兰保护国的德国官员采用这种欧洲官员们喜爱的，却使抬轿人疲劳的旅行方式。驯服的多哥兰已经与欧洲有了频繁的商业交往，是非洲的德国保护国中一个尚未受到广泛暴力冲击的地方。





募的宪兵队进行恐怖的暴力统治。他完全不顾及柏林决议，建立了垄断的贸易组织，并且采用强制劳动的生产体系。对劳动者施行断肢酷刑和人身折磨的事件时常发生，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死在这个从未到过非洲的统治者手中。

条约外交是其他欧洲列强最常采用的在非洲行使权力的手段。在非洲同盟军的强大支持下，英国军队于1874年与阿散蒂的人民在黄金海岸北部进行了战争，而法国在从塞内加尔向东扩张时，同穆斯林国家在苏丹西部发生了长期冲突，但鉴于商业和战略的考虑，英法殖民主义者们更倾向于采用和平方式吞并。在欧洲的会议室，外交家们只是在不十分精确的地图上划分非洲的土地，而不是使他们各自的军队冒着危险在战场上发生冲突。而在非洲本土，那些与本地首领签订的条约使贸易公司代表监管了大批被保护者，于是这一地区的管理就成为一小撮行政人员的职责。

在西非地区，给欧洲的贸易商提供的巨大潜在利润超过了非洲所有其他地区，因此，英国政府试图阻挠法国在尼日尔河流域的扩张，并尽可能用最简便的方式，即采用给予授权的商人协会——皇家尼日尔公司以支持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公司代理人在同非洲首领谈判时都携带着印好的标准化空白条约文本，这些文本将由翻译者填写并加以解释，然后签字。它的第一段写道："我们，在此签名的首领们，……为了改善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今天向皇家尼日尔公司（特许有限公司）永远割让我们国家自……到……的土地。"

1886年，德国、不列颠和法国在东非召开了边界问题会议，把今天的坦噶尼喀地区划给德国，同时把大约相当于今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地区划归不列颠的势力范围。法国的利益限于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和在非洲之角上的吉布提据点。如果不冒风险事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发展方面的投资，东非大陆内地是不可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但19世纪80年代末，一种新的考虑又使不列颠政府对这一地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任何一国控制了乌干达地区的尼罗河上游地带，都有可能切断英联邦埃及的生命源泉。于是，当德国企业家卡尔·彼德斯开始在维多利亚湖与当地首领签订一些协议时，一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外交活动开始积极进行。1890年，通过《赫尔格兰条约》的签订，德国承认不列颠领有乌干达，不列颠承认德国在蒙巴萨以南到维多利亚湖东北一线(现在坎耶与坦噶尼喀的边界线)地区的活动。1894年，乌干达被正式宣布为不列颠的保护国，随后，不列颠政府同意拨款修建从蒙巴萨到维多利亚湖的铁路。

1895年12月，维多利亚地区最后一项大工程开始施工。修建乌干达铁路需要从印度输入3000名劳工，并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的无树大草原以及丛林地带铺设1000多公里长的铁轨。为了给这项工程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政府鼓励白人向肯尼亚高原上移民从事农业生产，因为这一地区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同样大规模的工程也在德属东非进行，在这里，中央铁路从坦加的海岸发端，慢慢伸入内地。

到此时为止，欧洲列强贪婪地瓜分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却未曾在他们内部发生军事冲突。复杂的外交结盟避免了一些公开的对抗，例如，法国和德国支持了葡萄牙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占领，以此方式阻止不列颠在南部非洲的扩张。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系列因素使欧洲国家间竞争尖锐化，和平外交构成的安全网已岌岌可危。随着白人移民的增多，不同地区的殖民管理机构开始关注对非洲劳力的控制问题。此时，苏丹西部和东部沿海的非洲人大量购买欧洲武器，导致非洲敌对政权间的、以及非洲人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增多。欧洲的首都中，出现了一群新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他们的殖民野心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商业和战略方面的需要。

在非洲西部和北部，法国和不列颠都陷入了充满失败与苦难的致命游戏中。法国军队于19世纪80年代初击败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穆斯林政权，梦想建立一个横贯大陆西部与东部的帝国；英国试图控制从开普直到开罗的南北相连的条形地带。在一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时期，两个在非洲拥有最大势力范围的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对峙似乎已无法避免。

1896年3月，一支由1.7万名士兵组成的强大的意大利军队想要攻占埃塞俄比亚，被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率领的以法国武器装备的军队彻底击败。战争结束后，一些意大利人被围困在东部苏丹的据点中，

面临着马赫迪派武装进攻的严重危险。得到其德国盟友有力支持的意大利，请求其他欧洲国家给予帮助。不列颠担心法国会从尼罗河西部扩张过来，遂派基钦纳率领一支英国—埃及联军入侵苏丹。

这场以展示实力开始的较量发展成一场重要战争。10 多年前，即在 1885 年，当查尔斯·戈登将军所指挥的驻于喀土穆的不列颠守军被马赫



胜利的埃塞俄比亚军官们全副武装，在欧洲摄影家面前摆姿势。埃塞俄比亚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好的武装军队，也是非洲为数不多的未被殖民地化的几个国家之一。1885 年，意大利人掠夺了埃塞俄比亚在红海地区的土地，建立了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几年之后，又向内陆推进殖民。然而，埃塞俄比亚国王已经从欧洲请来了军事顾问，以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多购于意大利）装备了自己的军队。经过几次失败后，意大利军队被歼灭。于是，1896 年，意大利人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作为交换，他们保持了在沿海移民地区的权力。

迪派消灭后，不列颠就认为再次征服苏丹没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但是，埃及现在是富裕的，而且，保卫尼罗河的上游也成为不列颠在非洲的永久利益所在。基钦纳越是向腹地深入，看起来越是有必要完全摧毁马赫迪派的城邦。

决定性的战役于 1898 年 9 月在恩图曼城外进行，这个小镇隔着尼罗河与喀土穆相望，1895 年死去的马赫迪就葬在喀土穆。2 万名装备着马克沁机关枪的强大军队在基钦纳率领下打败了马赫迪军队，歼灭 1.1 万人，伤 1.6 万人。为了彻底消灭马赫迪国家，基钦纳破坏了马赫迪的坟墓，挖出尸体送到伦敦的外科学院供研究之用。

在不列颠，这次大屠杀被称为胜利。这是在维多利亚女王庆祝了她在

位 60 周年庆典的一年以后，帝国的荣誉达到了顶峰；尽管苏丹是以埃及的名义被征服的，但仍被看做英帝国的新扩增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在恩图曼之战 6 周前，让·瓦普提斯特·马尔尚上尉率领另外 6 名法国官员及 120 名塞内加尔士兵完成了从法属刚果到尼罗河上游沿岸地区的长达 5000 公里的远征。在喀土穆南约 650 公里处，三色旗在一个由许多泥筑棚屋构成的被称为法硕达的小镇上空飘扬。

恩图曼大捷后，基钦纳命令部队溯刚果河向上游进军，驱逐遇到的任何法国军队。因而，在法硕达，他的强大军队与马尔尚为数不多的士兵遭遇。两个指挥官一见面就彼此仰慕。然而，在他们共同进餐、饮酒之后，马尔尚仍强硬地坚持：尽管他似乎处于毫无胜利希望的境遇，但在得到来自巴黎的新指示前仍不会撤退。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以生命捍卫



这幅油画展现的是恩图曼战役的情景：疯狂的不列颠枪骑兵正刺杀一群苦修僧——他们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曾发誓要把埃及人从苏丹赶出去。1898 年 9 月 2 日，经过 5 小时的战斗，一支由赫尔伯特·基钦纳将军率领的英埃联军大获全胜：1.1 万名苦修僧横尸沙场，而基钦纳的军队只损失了 40 人。战役临近尾声时出现异常状况。几百名苦修僧组织了最后的抵抗，320 名不列颠骑兵遭到攻击。这时，从前方的壕沟中突然又冲出 2000 名隐藏的武士狙击英埃联军。英埃联军拼命抗击，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仅仅两分钟内，英埃联军有 119 匹战马和 72 名士兵伤亡。

这块刚被宣布为法国所有的土地。

英法军队相遇的消息传到欧洲，法国和不列颠的报纸都表现得义愤填膺。法国坚持，在两军相遇的那个地区并没有国际上承认的政府，因此任何一个能够在此地建立“有效占领”的国家都可以占有它。不列颠辩称，苏丹是属于埃及人的，只是埃及暂时没有能力在那里行使权力。

在两个月内，担心这两个主要的欧洲大国会发生战争的恐慌情绪日益增长。但到了最后，法国政府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以及在非洲缺少支援，败下阵来。按照1899年3月的《英法宣言》，法国被排除在整个尼罗河谷地之外。随后不久，法国从法属刚果、阿尔及利亚以及尼日尔河上游三个方向推进，即将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随着英国与埃及共同控制的苏丹得到人们的承认，打破了法国穿越



非洲建立一个连结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法兰西帝国的美梦。

对于法国和不列颠之间几乎为之大动干戈的那块土地，不列颠驻埃及的总领事却认为是“难以管理的耗费巨大的大片无用之地”。这一时期，沙文主义理论成为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过程中最具煽动性的因素之一。但在对非洲争夺的最后阶段，还有1/4的大陆没有被占领时，经济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就在这片地区，为夺取实际利益、捍卫国家的声望而进行的斗争，第一次导致白种人之间的公开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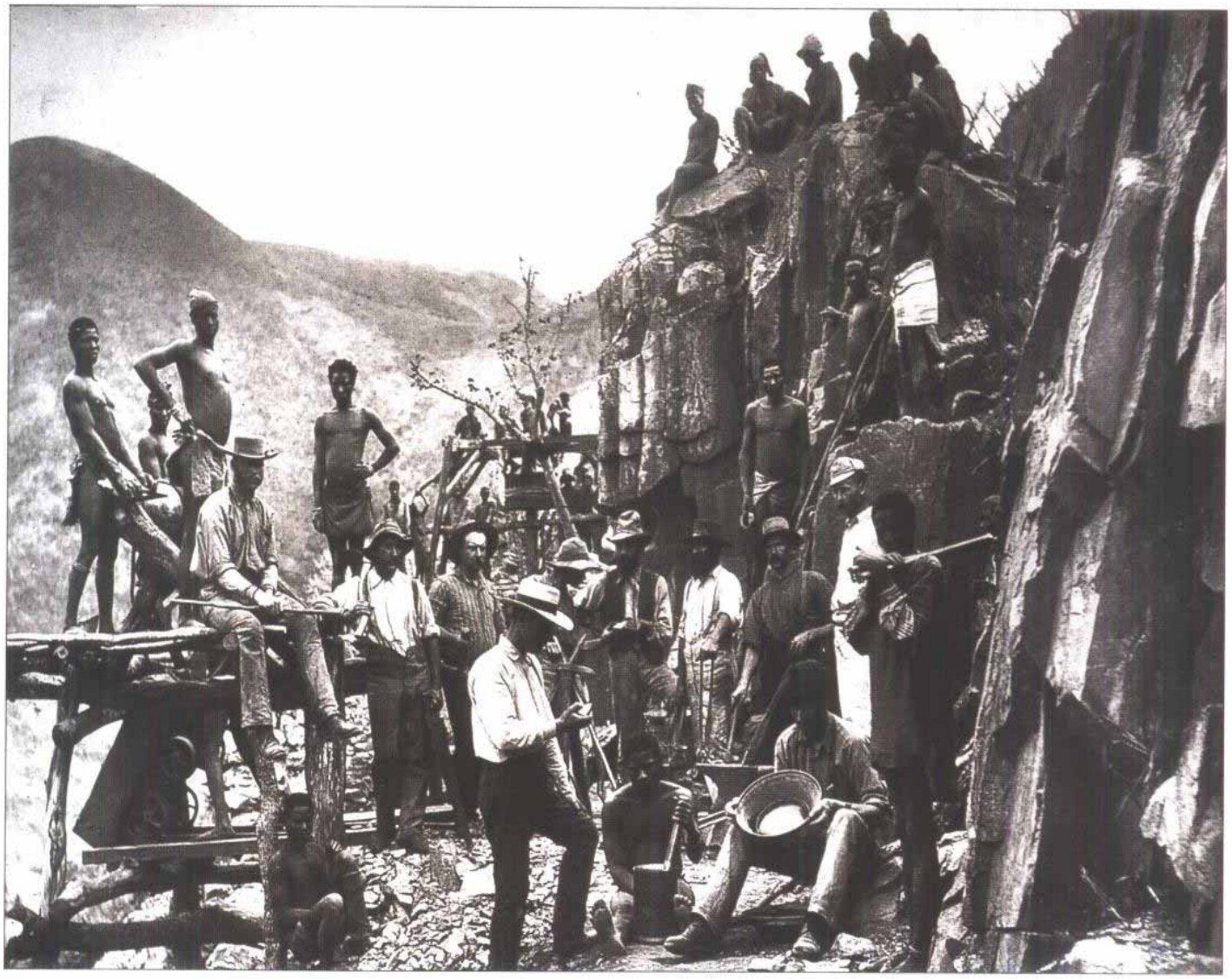
19世纪中叶，在气候温和的非洲南部地区，在英联邦的殖民区开普和纳塔尔之间，是布尔人的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以及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布尔(荷兰语中“农民”之意)殖民者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到达开普定居的荷兰移民和那些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入这片地区的新教难民的后代。不列颠人在开普的出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保护通向印度航线的需要，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区的欲望。但这里丰富矿藏的发现又勾起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

1866年，当一个15岁的男孩在南非的开普殖民地以北很远地区的奥兰治河岸散步时，最先发现这里的钻石矿。很快，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流域以及在布尔人德彼尔兄弟经营的农场中都发现了钻石。几年之内，这一地区，即金伯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产地。

在所有主要的钻石产地都住着非洲—欧洲人的混血后代格里夸人，特别是拓荒者布尔人和科



不列颠的最有雄心的帝国建设者塞西尔·罗得斯的一幅漫画，他不知羞耻地梦想看到自好望角到开罗之间的广大非洲土地都成为英国的辖区。长年奔波于英国牛津大学和金伯利的钻石矿之间的罗得斯，在他30岁时同时得到了古典文学的学位和全世界最庞大的一笔私人财富。虽然他的帝国野心没有成功——据说他的临终遗言为“才做了那么一点，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他对南非的巨大影响，使得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这样评价他：“当罗得斯站在好望角半岛上时，他的影子落在赞比亚。”



此照片摄于1888年，第一次德兰士瓦－威特沃德斯兰德大罢工两年之后，共和黄金矿业公司的黑人、白人雇员一起合影。这种原始的采矿业只需很少的资金：仅仅需要支付基本的工具费用和很少的非洲劳工的工资。随着矿井越来越深入兰德地区，这项事业就需要昂贵的机械和众多的人力来完成，而这些东西只能由像罗得斯这样的百万富翁来投资。到1900年，德兰士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地。令布尔人懊恼的是，每个矿藏的拥有者都是来自非洲外部的“外侨”。

伊科伊牧人。他们的土地拥有权受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以及刚刚来到这一地区的那些冒险者的挑战，这些后来者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然而，最后是不列颠人于1873年吞并了盛产钻石的地区，即后来被称为“西格里夸兰”的地区。

4年以后，不列颠的殖民大臣卡那封勋爵宣布兼并德兰士瓦。他的初衷是以此推进他在南非建立一个在不列颠统治下的联邦国家的梦想的实现，就像在加拿大所做过的那样。尽管布尔人缺少与不列颠帝国相抗衡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还是有许多非洲国家联合起来，拿起了武器。

不列颠试图安抚这一地区最有力量的祖鲁人，要他们解散军队，并许诺英国人将把布尔人占领的祖鲁人土地归还给他们。这一建议遭到拒绝。1879年1月，英联邦军队穿过纳塔尔边界线，试图阻止祖鲁军队的军事行动，在伊桑德卢瓦纳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在附近的罗克矿场，一队英国士兵被4000祖鲁人包围，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又经过6个月，



这幅水彩画表现的是不列颠骑兵在散乱的祖鲁人尸体间疾驰，去援助罗克矿场的守军。英联邦吞并南非祖鲁人的土地，实际上是一次大受创伤的战役。1879年，当不列颠士兵开进祖鲁人的土地，想迫使好战的祖鲁人放弃武力反抗时，面对的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敌手。1月22日，不列颠的一支大军在伊桑德卢瓦纳战役被消灭；当天下午，有4000名祖鲁人武士袭击位于罗克矿场的临时医院，这所医院中约有80名驻军保卫着30名生病的军人。经过12小时的残酷激战，被围困的驻军一直把敌人挡在海湾地带，直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精疲力尽的祖鲁人才撤退。

不列颠才取得一场主要的胜利，得以实现和平移民。

与此同时，在祖鲁人胜利的鼓舞下，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迅速变得好战，1880年12月，他们发动了自己的独立战争。德兰士瓦境内只有不列颠的一个营，已被击败。1881年2月，布尔人在纳塔尔边境的马约巴山消灭了一支500人的不列颠军队。伦敦的不列颠政府此时采取了一种调和态度，同意使德兰士瓦人保持内部自治，但在涉及所有外国列强和非洲人民的外事问题上，不列颠保持控制权。

德兰士瓦的这次共和主义复兴运动的背后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保路斯·克留格尔，他在德兰士瓦被英国兼并成为附属地时是一位副总统。作为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传统主义者、一个执着信奉加尔文教派基本信条的信徒，克留格尔还证明了自己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的精明的外交技巧能够使他在其最强有力的对手英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最后20年席卷非洲时，得到相应的尊敬。

1883年克留格尔开始了他为期17年的总统生涯。同时，在开普殖民

地，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塞西尔·约翰·罗得斯。塞西尔·约翰·罗得斯在他17岁那年，即1870年第一次来到南非，当时他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温暖、空气流通的环境中疗养。罗得斯相信，每个年轻人都应实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他自己的愿望就是要推动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如果有上帝，”他曾说，“我认为他也会喜欢看到我尽可能地把非洲涂满不列颠的红色。”他的帝国主义野心在他1877年写的一份遗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这份遗嘱中，他设想建立一个联邦型的帝国，将整个非洲、荷兰、幼发拉底河谷、所有南美洲、马来群岛、中国和日本的沿海地区全都包括进来。他同时希望，美利坚合众国最后能被重新纳入不列颠帝国中，作为这一帝国联邦的完整的一部分，该联邦将如此之庞大，乃至于“从今以后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尽管他有许多过分的幻想，但在野蛮混乱的世界前沿金伯利钻石矿区，罗得斯展示了他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坚定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财富是权势的关键，因而他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他先与另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查尔斯·拉德合伙垄断了市场上的蒸汽泵，把泵租给那些因井下水泛滥而受到威胁的矿主。他还购买了一台制冰机，使金伯利的公共社交场所能够提供冷饮。更重要的是，他和拉德集中购买那些个人矿主的财产，他们中间许多人在将矿井挖至一定深度时，因挖出了坚硬的岩石而失望，有的因此破产。1880年，两人合创德彼尔矿业有限公司。随后，罗得斯击败了所有主要对手，最后控制了世界钻石产量的90%。

与此同时，当罗得斯于1881年在开普国会竞选成功后，就运用他的巨大的财富去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他获得了一批开普报纸的控制性股权，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舆论战，目的在于说服不列颠政府夺取自开普殖民地北端伸向赞比西河谷上游的贝专纳平原。1885年，贝专纳保护地建立，目的在于阻止布尔人在非洲的进一步扩张；同时也为了防止布尔人和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扩张，会成为不列颠在将来任何时间自开普向北扩张时的障碍。

克留格尔的年轻的共和国此时几乎完全被不列颠的土地包围。但突然地，力量的平衡戏剧性地向着有利于德兰士瓦的方向转变。1886年，位于比勒陀利亚南部高原上的威特沃德斯兰德（即通常被称为“兰德”的地区）发现了大量金矿。于是，一直是欧洲人控制下的最穷地区德兰士瓦一跃成为最富有的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克留格尔又梦想建立由布尔人领导的统一的白人南非国家。

罗得斯立刻接受挑战。1888年，他与马塔贝莱人的国王洛本古拉签订了一则条约，获得了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开矿的特权。接下来的一年里，他说服不列颠政府授予他新建的不列颠南非公司以正式的许可，允

布尔战争

不列颠在南部非洲的扩张野心与布尔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终于演变成1899年的战争。由于英军在欧洲接受的是正规的战斗训练，反应迟缓，因此被布尔人的游击战搞得手忙脚乱，而且被布尔人在战场上随时补充力量的能力所挫败。在经受了巨大损失之后，尤其在金伯利、莱迪史密斯和马弗京围攻中遭受屈辱的失败后，不列颠军队转而采取了打消耗战的战术，他们烧毁庄稼，将非战斗人员驱赶到集中的营地居住，在农村建立防御的堡垒。到1902年，军队的财富和人员都有所增多。然而他们仍需用45万人的兵力来征服不足8.8万人的军队。



图中是三代为独立而战的布尔武装士兵。所有超过14岁的布尔人都要投入战斗。虽然他们既没有统一制服，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们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使他们成为可畏的敌人。



一个哨兵在整齐的不列颠军营上方守望。他们不再穿传统的猩红色束腰外衣，因为这会使他成为南非草原明显的靶子，他穿的是军队新采用的土褐色卡其布的军装。

许他开发界限不很清楚的“赞比西亚”地区，该地区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其东北方向的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公司的广泛权力应包括制定自己的法律并强制推行它，并用自己的治安部队保持和平。

洛本古拉拱手让出了开矿权，用来换取一笔微薄的逐月提供的经费、1000支来复枪和1万发子弹。此时，他以为罗得斯的兴趣仅在于寻找金子。但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你曾经看过变色龙捕苍蝇吗?”1889年，他问一个传教士，“英国是变色龙，而我就是苍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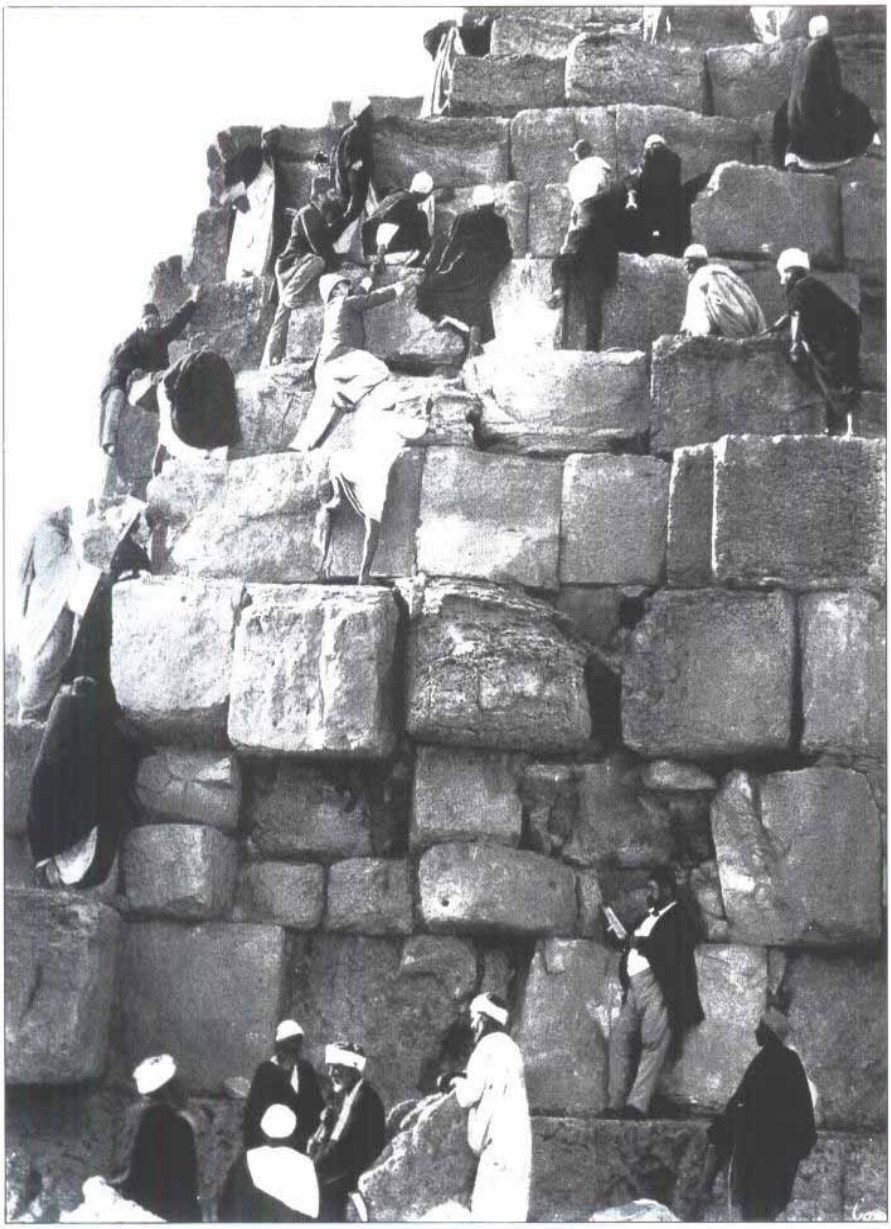
的确，不列颠得到了开矿权之后就对马塔贝莱王国发动了武装入侵。1890年，罗得斯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统，这一年6月，他派出由200个白人、150名黑人移民以及500个武装警察组成的以探查金矿为名的先遣军。9月，这些先遣者向北进军到达了相当远的一个地方，遂以当时不列颠首相的名字命名为索尔兹伯里，并在这里升起了不列颠国旗，以女王的名义占领了马绍纳兰。

人们无法证实马绍纳兰就是传说中所罗门国王埋宝藏的地方，尽管这曾是普遍看法，但罗得斯是不可阻挡的。在林德尔·斯塔尔·詹姆森这个苏格兰医生——在他讨人喜爱的个性下隐藏着残忍的意志——的帮助下，罗得斯决定坚持实现他的从开普到开罗全部由不列颠占领的美梦。1893年，当洛本古拉的武士恢复了对马绍纳兰的经常性袭击后，詹姆森命令他们完全撤出该地区。然后，他发动了对马塔贝莱人的全面战争，数以千计的马塔贝莱人死在这些开拓者的大炮和马克沁机关枪下。罗得斯最后得到了自己的殖民地，并将其定名为罗得西亚，并广泛地吸引了许多农民和采矿者移民，马塔贝莱人则成为这里的主要劳动力。

3年以后，马塔贝莱人和马绍纳兰人发动叛乱，向孤立的白人移民区发起进攻。罗得斯于1897年亲自解决了冲突，他与3个随从未带任何武器骑马进入马托波山寻找叛军首领，与之商讨和平解决方法。这是他最后立下的显著功绩。

1894年，通向德拉戈阿湾的铁路的完成，使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在贸易出口方面摆脱了不列颠人的控制。罗得斯将重获主动权的希望寄托于共和国内部可能发生的内乱。他煽动涌入德兰士瓦的数以万计的外国采矿者对共和国的不满。克留格尔十分担心这些南非的外来人，这些“外侨”会影响布尔人的传统生活，因此，他提出居住14年以上，年龄超过40岁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持续发展，最突出的是在“兰德”地区，因为在此地生活的5万白人中，有90%以上是“外侨”，而且其中约1/3是不列颠人。

罗得斯确信“外侨”的叛乱将在1895年12月28日爆发。他推理说，法律和秩序的混乱将给不列颠一个入侵德兰士瓦的合理理由。他准备了一支由斯塔尔·詹姆森率领的武装部队，驻扎在德兰士瓦与贝专纳的边境。但并没有发生叛乱。詹姆森不耐烦地决定推动形势发展。他率领478名不列颠南非公司的警察开进德兰士瓦，想进入约翰内斯堡，他希望在那儿



19 世纪 70 年代不列颠的旅行者在库克父子公司的挑夫陪同下，在冒险地攀登埃及大金字塔。19 世纪末，非洲成了欧洲有闲阶级的旅游胜地。许多旅游者在像库克公司这样的旅游公司安排下进行旅行冒险，对非洲大陆的风景和居民大为惊叹；还有许多人随旅行队去猎捕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殖民势力离开很久以后，他们的旅游部门仍保留在非洲大陆。

能得到大量支持。

詹姆森的部队在距约翰内斯堡 65 公里处的多伦克普遭到伏击，其士兵被捕。詹姆森本人被引渡回不列颠接受审讯，在那里，他被宣布犯有准备“对友好的国家进行军事征伐”的罪行，被判 15 个月监禁。罗得斯卷入这一事件表明了他在走下坡路，他被迫辞去总理（罗德斯于 1890 年任开普殖民地总理——译者）之职。

詹姆森发动的突袭尽管其本身微不足道，但却有深远的影响。它甚至向那些最不肯相信不列颠人的真实目的的布尔人证明，不列颠的政策是直接彻底地摧毁他们的共和国。间接地，这导致了英帝国内的反德浪潮，因为支持布尔人的威廉二世发电报给克留格尔，祝贺他在德兰士瓦的成功防御。这样，英帝国要求偿付他们的战争损失，并把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克留格尔的计划就很难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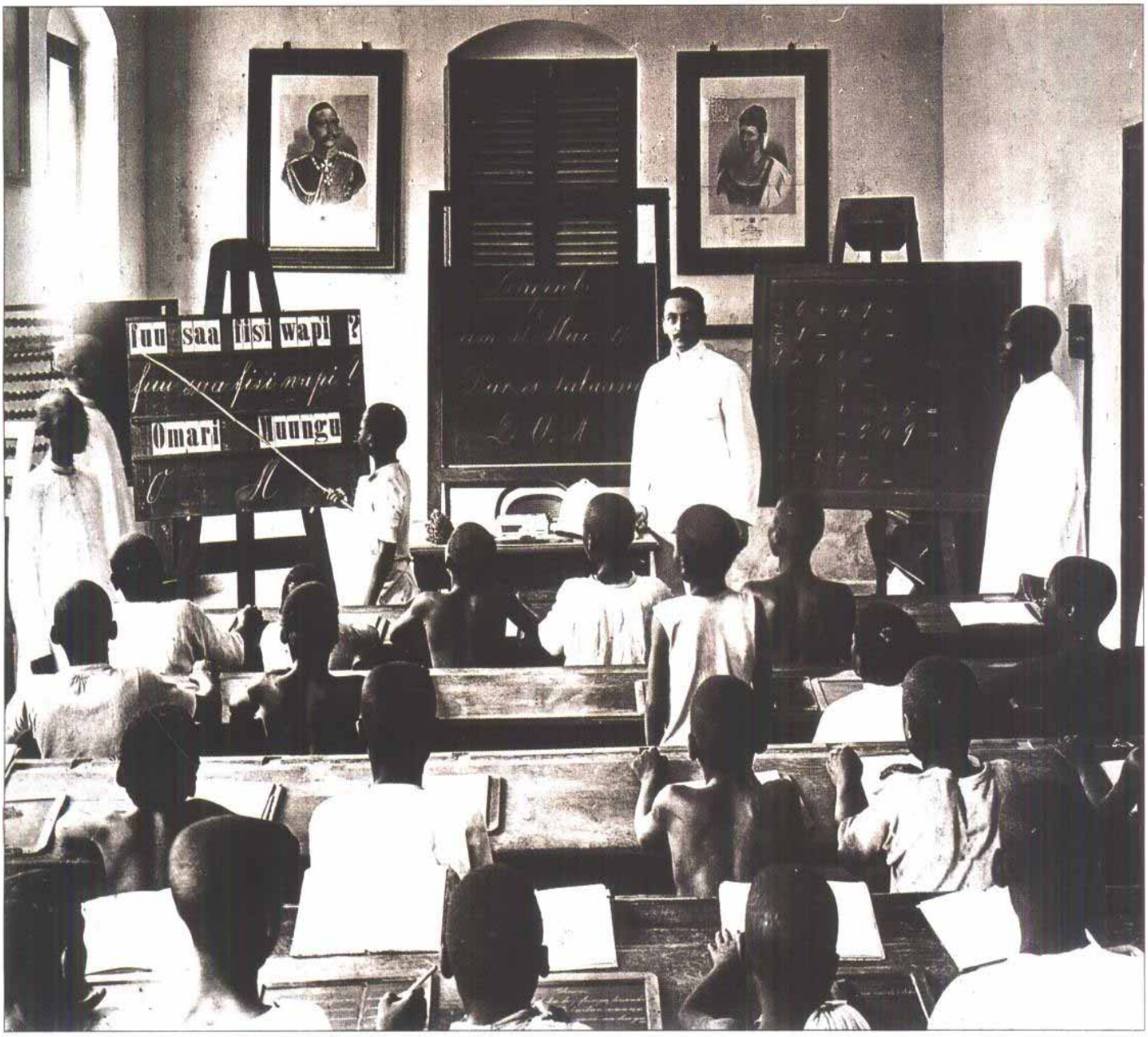
1897 年 4 月，阿尔弗烈德·米尔纳乘船到达非洲南部，受命担任开普的新首席特派员。米尔纳和不列颠殖民大臣张伯伦决心要求克留格尔实行越来越多的内部改革，并把克留格尔描绘成压迫人民的暴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克留格尔屈服。他们意识到只有战争才可能使德兰士瓦成为不列颠旗下的一个属地。但在交战之前，他们要将克留格尔的名声搞臭，以使不列颠的公众支持他们的行动。

在压力下，克留格尔一次又一次让步，但这永远不够。1878 年 6 月，他绝望地喊道：“你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他是正确的。1899 年 10 月 9 日，克留格尔要求所有在德兰士瓦边境驻扎的不列颠军队于 48 小时内撤出。在张伯伦的指示下，米尔纳答复道，这一要求“没有讨论的余地”。3 天以后，布尔人同时在马弗京、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发起进攻。最无意义的非洲战争开始了。不列颠希望战争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但它却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布尔民兵为自由而战，不断打败不列颠的正规军队。在战争后期，遭到布尔游击队打击的不列颠人采取了极端的办法，他们把支持布尔游击战士的农村居民，包括 15 万多妇女、儿童和非洲

工人拘留在一些叫做“集中营”的禁区内。在集中营内，由于缺少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卫生设施，有2.6万名囚徒死去。

1902年5月，在不列颠派出了数目远超过布尔人的援军后，布尔人被迫最后投降，但这一胜利的代价是，6000名不列颠士兵在战场上被杀，另外1.6万人因患伤寒和各种疾病而死去。最激进的帝国主义者罗得斯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去世，葬于他夺取的罗得西亚殖民地的马托波山。克留格尔则在战争初期从德兰士瓦逃往荷兰，两年后死去，葬于他的旧都比勒陀利亚。

1910年，正如不列颠的战争煽动者总是期望的那样，被吞并的布尔共



在威廉二世皇帝和他妻子的肖像下，一个斯瓦希里男学生领着他的全班同学上写作课。欧洲国家急切地想在他们的殖民地内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教育这些新征服者的责任几乎全交给了传教机构。对被征服者的教授方法是原始的，而且他们的学校并不像图中这个位于坦噶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学校那样设在一处坚固的房舍内，通常是在灌木丛生的地区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上课。但无论如何，教会学校是殖民主义者对处于他们统治下的非洲人开放的极少数途径之一。

和国正式与纳塔尔殖民地和开普殖民地联合建立了南非联邦。在这场战争中，曾有大量的非洲人参与双方的战斗并牺牲于战场，可现在，当所有白人讨论着关于他们祖国未来发展的时候，非洲人却根本没有发言权。更有甚者，在1913年的《国内土地法案》条款中，南非黑人（他们与白人的比例超过4:1）在南非联盟87%的国土上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其余的13%的土地上，包括一些在联盟最边缘的耕地上生活，并且不包括任何主要城镇和工业区。不列颠与布尔人殖民地间的战争诞生了将被证实为最具侵略性的殖民政体。

19世纪末期，在非洲地图上标志着欧洲控制地区的显眼的颜色，似乎已经足够清晰了，但它们也掩饰着大陆内部自身统治的混乱。许多欧洲人本来并不真正确定他们在非洲的争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非洲的奴隶制已被广泛地废除了，但代之而起的，却不是利文斯敦在欧洲人早期向非洲渗透时所定义的正统意义上的"文明"。1902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未来不列颠的首相（1898年曾在恩图曼作战时有出色表现）曾写道："征服和统治之间不可避免的缺口被贪婪的贸易商、不合适的传教、充满野心的士兵和撒谎的投机者所填满，这些人想方设法地进行着征服活动，其头脑中满是征服者的肮脏欲望。当我们将思索的眼睛停留在这些邪恶的因素上时，几乎无法相信经由这么肮脏的道路能达到任何正义的前景。"

凡属殖民地，基本是适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即使是普通的商人在计算他们的收支时，也一定会考虑到其付出的辛劳代价。但南非殖民地却不同，它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收益：欧洲对钻石没有很大需求，而非洲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出口市场。

对非洲这片土地的争夺，正如人们通常所总结过的，是任意的和贪婪的，而且经常是没有长期战略考虑的。看来，征服非洲的惟一目标似乎就是夺取土地，这在传统上就首先要依赖于帝国的实力，因此，一位在黄金海岸任职的行政官说："就像这个国家无人居住一样任意统治。"

但这里当然有人居住，而且其人数大大超过白人统治者；即使他们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利，这块大陆仍是他们的。欧洲文化只是被强加到有限的一些部门。大部分非洲人完全不受欧洲人引进的医院、学校、铁路和简单的工业的影响，这些设施几乎全是为殖民者的专有利益服务的。当欧洲统治者在20世纪初试图使他们的殖民地逐步实现自给自足，使他们的黑人臣民成为驯服的纳税人时，那些非洲人却在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并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他们绝大多数都抵制欧洲人想把他们变为赚工资的无产者的尝试，宁愿选择做一个农夫或者流动劳工，以此方式保持自己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存在，并公平地获得他们的劳动产品。那些农夫，虽然其最好的土地都被欧洲人征用了，但也证实了他们自己比夺取他们土地的那些殖民者更为优秀。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人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和难以理解，与他们刚进入这块大陆开始进行掠夺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民众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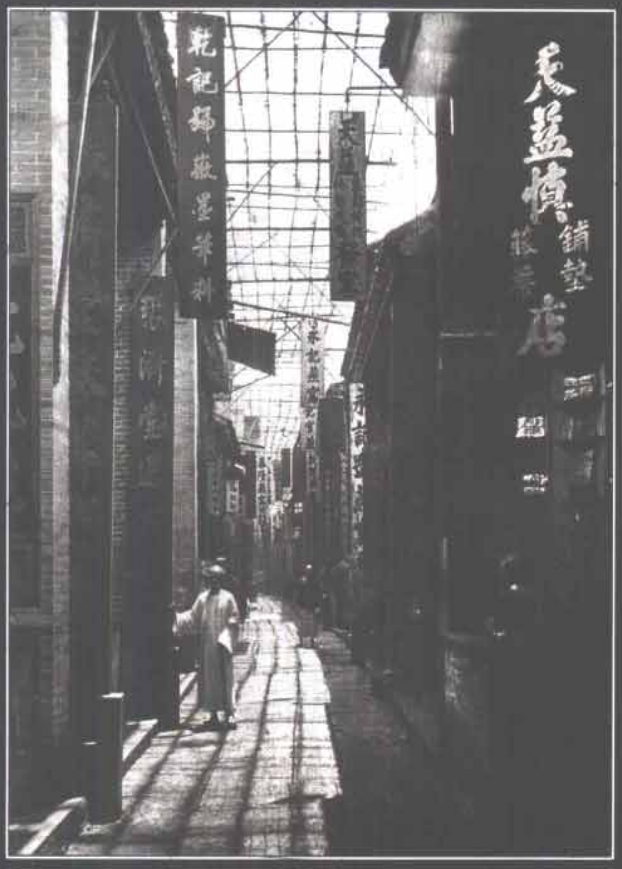
1859年，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在巴黎街道上率军行进时，忽然下令放缓速度，利用这一时间到一家照相馆拍照片。很快地，大家都竞相效仿，拍照片成了一种时尚，而且迅速传遍整个欧洲，甚至美洲。仅在伦敦，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已有250余家照相馆生意红火。

很多肖像被复制成名片，即长10厘米宽6厘米的小卡片，如上图所示。自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路易斯·雅克·达盖尔和英国的W·H·福克斯·塔尔博特进行了最早的实践活动之后，由于许多方面技术的完善，使这类卡片的批量制作成为可能。这类技术改革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感光材料的发展过程中，被称为火棉胶的感光材料的使用缩短了曝光时间；此外，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采取的在一张底片上照10张照片的技术的发明。

这些技术改革第一次使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制作肖像的乐趣，并留下永久的纪念。1861年，一家伦敦报纸对照相作过这样的评价："它摒弃了阶层和财产造成的许多狭隘区别，这使许多仅拥有10先令的穷人也可以要求与妻子和孩子合照一张栩栩如生的全家福，就像托马斯·劳伦斯博士为欧洲最显贵的领主所画的画像一般。"

摄影不仅仅局限在肖像摄影方面。如随后各页图所示，无畏的旅行者将他们在遥远的土地上摄制的景物和人像，展示给热切的观众；记者们拍下战争的现场及其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埃德维尔德·迈布里奇使用电池照相机拍下了运动中的人和动物，这一实验使艺术家和科学家知道了用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东西。

约在19世纪末，随着不需要掌握特殊知识技巧的轻型精密照相机的使用，摄影的普及化过程完成了。由于那些想留住生活美好记忆的人们都开始拍照片，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拍照片成了仅次于语言的、会给人带来交往和快乐的最方便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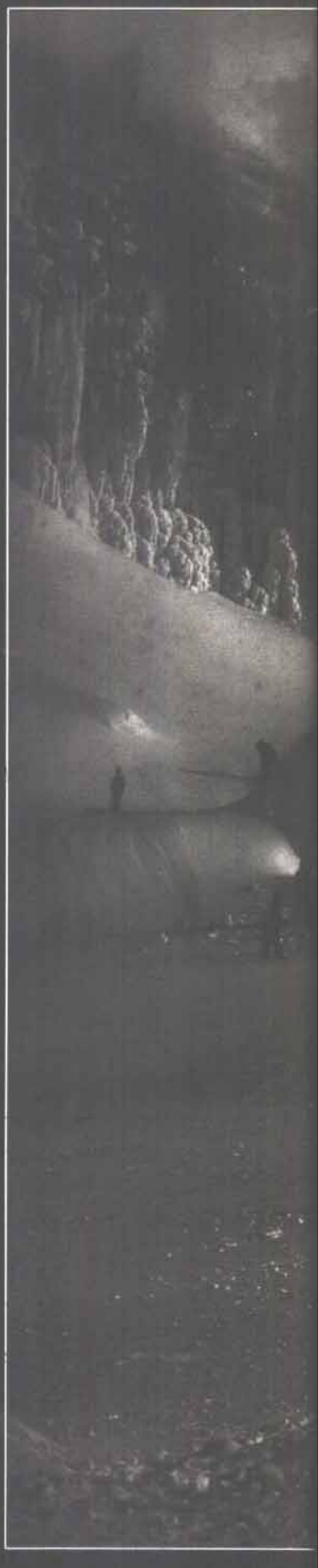


“我漫步穿过莱茵河的葡萄园，我坐在罗马的凯旋门下……刹那间，我又从查尔斯河岸来到了约旦河的浅滩，”美国作家奥利弗·温得尔·霍姆斯在他的立体照片集中这样写道。立体照片由摄影师从略为不同的视角上照的两张同一景观的照片合成，通过立体镜来观察，它们会呈现出三维的立体图像。为了使那些不直接参加旅行的人们满意，摄影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扛着他们的摄影器材穿过冰河和火热的沙漠。他们的成功是不稳定的：1857 年，英国摄影师弗朗西斯·弗里思描述了他在埃及印制照片时的情景：“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小暗室里，我的火棉胶在整片玻璃上□□起泡。”然而，除去这些偶发事件，弗里思和其他的先驱者们还是使大众看到了令人激动的美妙的风景、艺术以及各国的社会风俗。若没有他们的努力，人们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些的。

这张广州街道的照片于 1873 年翻印于一部 4 卷本的《中国社会图示纵览》中。摄影者为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他在中国游历了 5 年，用好奇的眼睛观察中国，既拍下了世俗的街道风光，也拍下了类似酷刑等耸人听闻的场面，还记录了一些旅行路线和城乡位置以期为欧洲殖民者所用。



这张背部纹身并人工着色的日本男人照片大约摄于 1880 年。拍摄这张照片是为了迎合西方大众越来越渴望了解异国异事的心理。



观光客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气势宏大令人惊叹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下。此时，在这冰雪覆盖的广阔空间里，一些飞泻的水流正变成冰柱。照片由尼尔森摄于 19 世纪 80 年代。这张照片与许多其他照片一样唤醒了美国公众对祖国美景的热爱，其对国家公园的建立有巨大贡献。





早在19世纪90年代前，当照片首次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时，作为目击者对事件的见证性记录，其震撼价值已为人们所公认，因为它们激发了公众对它们所作的报道的反响。美国内战期间，马休·布雷迪和其他人拍摄的照片表现了屠杀的场景，瓦解了传统的绘画作品对战争所持的英雄主义态度。佐治亚的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中骨瘦如柴的战俘照片，对于宣判战俘营长官死刑起了雄辩的物证作用。在不列颠，像托马斯·巴纳多一类的社会改革家用照片展现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们的生活。照片不仅仅可以作为消息的传导方式，而且可被用作说服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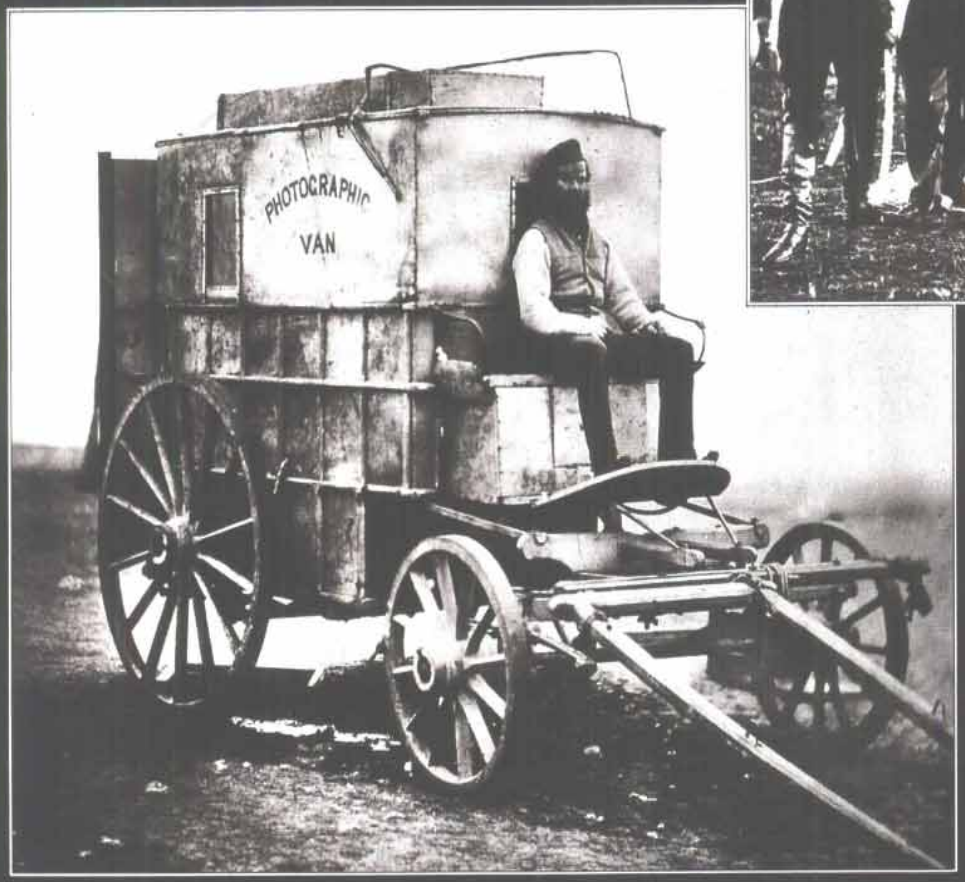


丹麦移民摄影家雅各布·瑞斯摄于1888年的照片揭示了纽约贫民窟的危险和肮脏。他的照片使公众开始关注城市贫民的绝望状况。



这是刽子手要对一个被逮捕的造反者行刑的场面。1900年左右美国人本杰明·威斯特·基尔贝恩摄于中国。





一个法国指挥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上图）在对他的部下进行部署。这张照片由罗杰尔·芬顿拍摄，他1885年带着两名助手乘着一辆用贩酒商的大货车（左图）改成的旅行车兼暗室到达克里米亚半岛。芬顿把相机的视角定位于远离战争恐怖的事件，他的照片常被用于驳斥那些反战思想。

日常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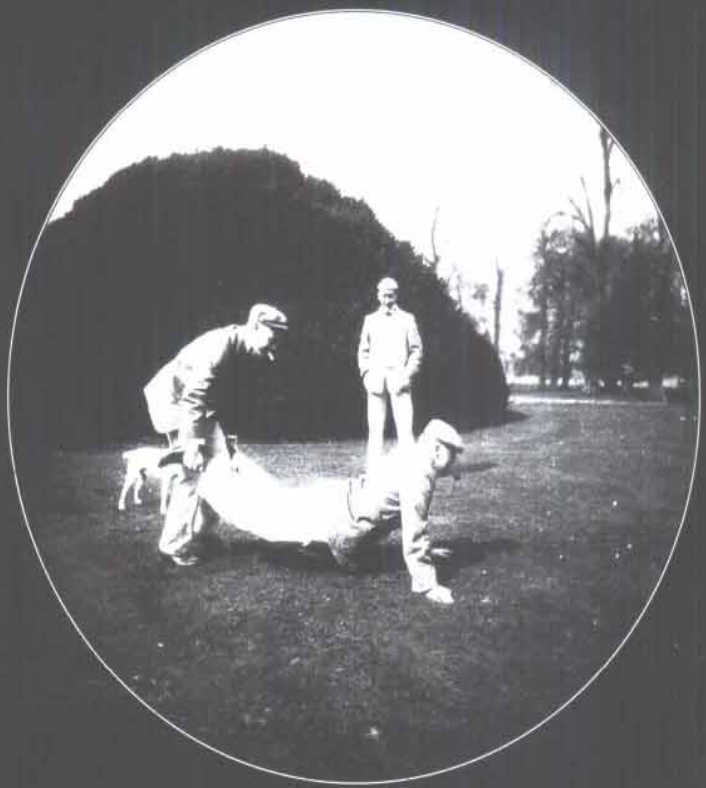
美国发明家乔治·伊斯曼于1888年制造的盒式的、没有任何装饰的柯达照相机将摄影推向了更广阔的大众。这种简便精确的照相机的广告标语是："你只需按钮，余下的我们来做。"此种相机可以滚动上卷，曝光100张后，相机持有者可将整个照相机交还制造商进行胶卷冲印。1900年，伊斯曼又推出了一种新的型号，即我们所知的布罗尼式相机。这种相机只需1美元就可以买到。此种相机一年内售出了10万多部。



第一部柯达手持式照相机长16.5厘米，宽8厘米。通过转动相机上方突出的手柄即可过卷。

下列照片所示的内容和主题（自左至右）是：出国旅游留念，在花园里闲逛，乘坐旅游小艇出游，小马和它自豪的主人。这些都是手持型照相机摄下的值得纪念的场面。这些照片都出自柯达公司头4年生产的相机。下列照片之所以切割成圆形是为了避开照片四角效果不佳的模糊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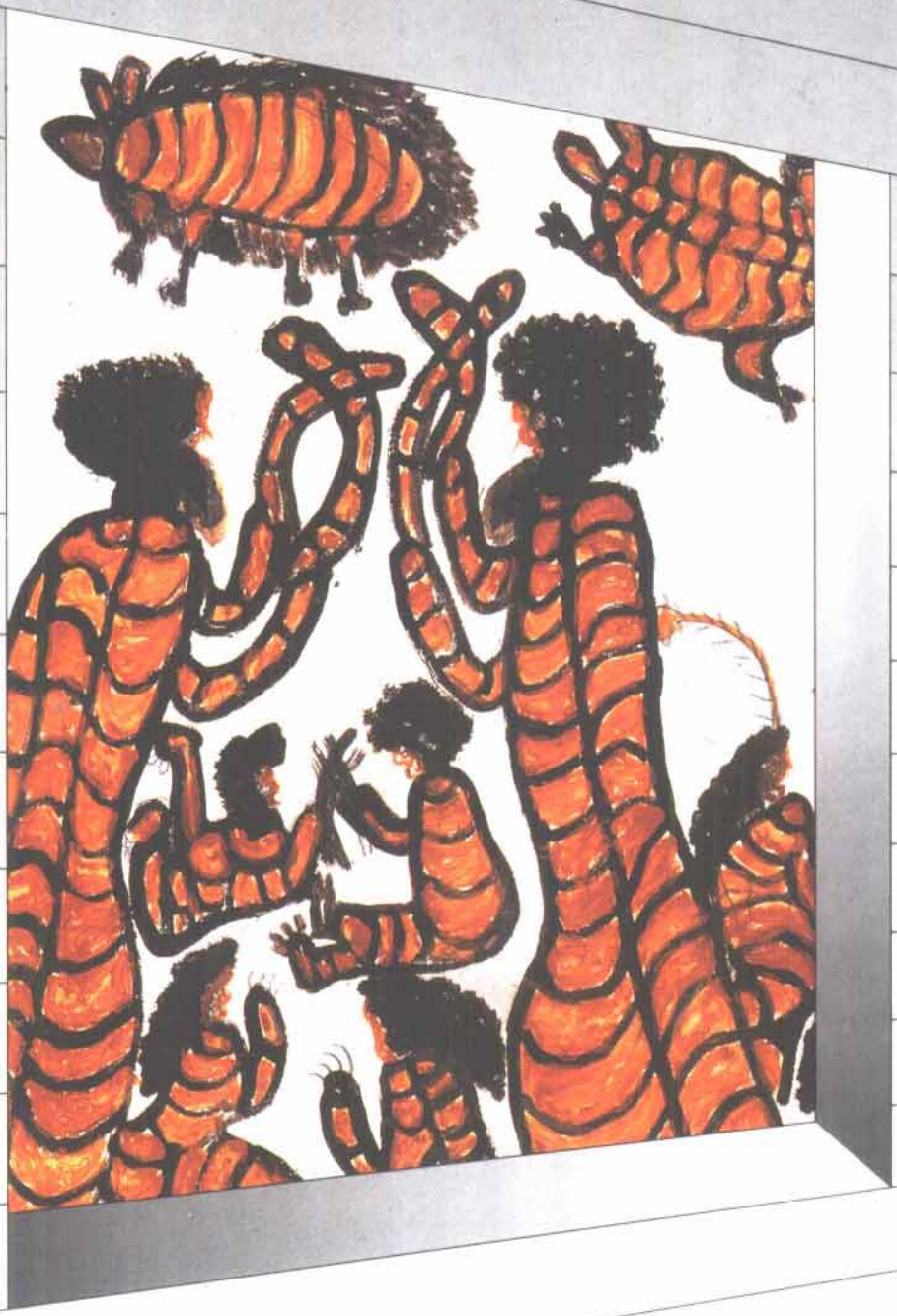




无意中被摄入镜头的一群人：一群观众在全神贯注地观看海滩上的艺人表演，两个穿得过多的女士在风景胜地、英国的诺福克海滨拎起她们的裙子。这些暗地里拍下的即时快照是由一个年轻的名叫保罗·马丁的业余摄影爱好者于1892年拍摄的，他把他的相机伪装成一个皮革制成的盒子，摄下了这些场景。







澳大利亚的形成

4

对于那些于19世纪中叶到达澳大利亚的不列颠移民来说，澳大利亚的许多东西都使人感到特别熟悉。他们在码头受到了说英语的人们的欢迎，许多人在那些与英国的城镇和郊区同样名称的居民点找到了住处，这些居民点有的以英国政治家的名字命名，有的以英国贵族的名字命名。教堂和城墙均属新哥特式建筑，看起来很难与英国相区分。但是，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实际距离大约2.3万公里，这种相似尽管显示出早期定居者与他们家乡之间深厚的感情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是不稳定的。在狭长的沿海定居点背后，是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的澳大利亚内陆沙漠。这里也没有特别古老的记录和多种形式的文化历史：没有古典建筑，没有文学，没有地方的风俗传统等，而这些恰恰是体现一个民族个性特点的东西。

1852年，一个生于澳大利亚的文学记者丹尼尔，极具挑战性地强调了他的这些移民同伴的尴尬处境。他的结论是："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没有一大串的诗人、政治家和战士，""但即将开始的未来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澳大利亚的定居者们决心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锻造出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特性。

尽管澳大利亚仍是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但不列颠在此进程中只是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1788年，首次到达澳大利亚的不列颠舰队载来的不是有劳动技术的意志坚强的冒险者，而是监狱中容不下的卑贱的犯人。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在一个尽可能偏远的区域建立一个刑罚的营地，而不是要建立殖民地。不列颠政府给私人公司颁发特许状，鼓励他们的投资计划，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宪法表示认可，但在这里定居的人们却率先开发了澳大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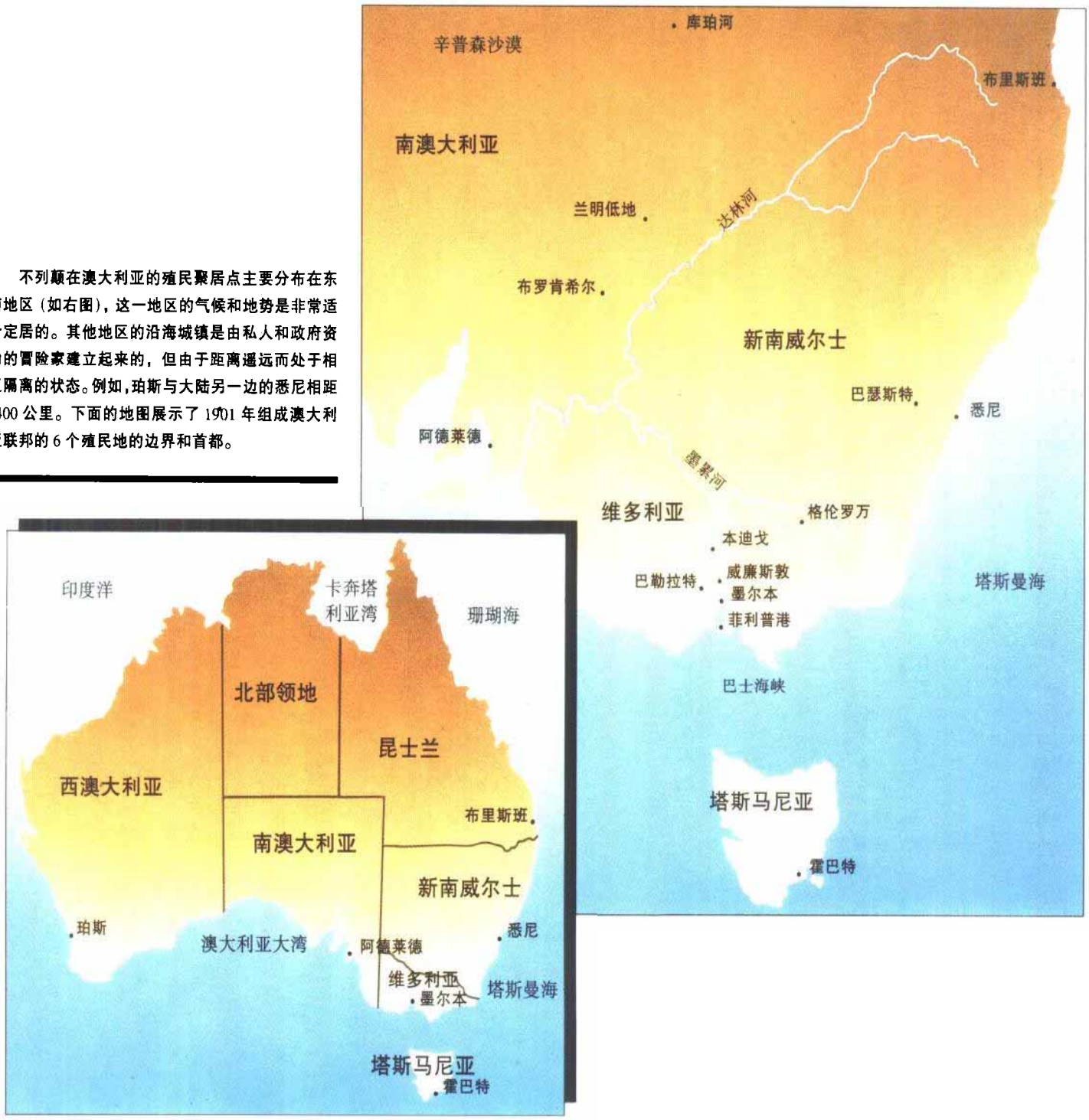
定居者们注定有着幸运和决心：在较早的年代，他们既没有先进的技术去改造环境，他们的祖国也没有大量财富投资于他们的冒险。尽管如此，他们仍创造了惊人的成就，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创造了由穷人变为富人的神话。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开端和最初60年内缓慢的发展，从1850年以后，澳大利亚就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到19世纪末，那些在澳大利亚的定居者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外来的殖民者，而是一个新生国家的自豪的公民。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或许是当时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具有最先进的社会民主的国家。它是一个让许多不列颠人有足够理由羡慕的国家。

最先在澳大利亚海岸登陆的欧洲人是1606年到达的荷兰航海家威莱姆·

这幅描绘部落庆典的图画上，两个穿着动物皮毛衣服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带刺的食蚁兽下面挥舞着飞去来器。作者威廉·巴拉克是他所在部落中最后一个幸存者，这个部落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境内。1853年一个欧洲移民用羊毛毯、衬衫、刀和镜子买下了这个部落的领地，19世纪60年代以后，巴拉克画出了大量类似的图画，以满足白人殖民者对于他们已经取而代之的古老的土著文化的好奇。

詹斯宗，两个世纪之后，这块大陆在欧洲地图上被命名为“新荷兰”。但荷兰人在这片大陆荒凉的西北海岸没有发现能够激起他们商业兴趣的东西。第一个用贪婪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的探险家是英国海员詹姆斯·库克。1770年库克正式宣布他对大陆东部海岸的占有，并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把这个地区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的兴趣与那些早期的荷兰探险家们不同：他看到巨大数量的鲸和海豹可以作为开发商业的资源，他相信这一地区将为不列颠与远东地区的贸易提供有效的海上基地，并且，他预言这片土地将提供丰富的木材、亚麻、大麻、沥青，这些资源对于皇家海军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不列颠政府当时正专注于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并不情愿从事新的殖民冒险。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美洲的殖民地赢得了独立。由于不列



不列颠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聚居点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如右图），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势是非常适合定居的。其他地区的沿海城镇是由私人和政府资助的冒险家建立起来的，但由于距离遥远而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例如，珀斯与大陆另一边的悉尼相距3400公里。下面的地图展示了1901年组成澳大利亚联邦的6个殖民地的边界和首都。

颠先前已将多余的罪犯装上船越过大西洋运到澳大利亚，因此，在美洲失败后，不列颠便把澳大利亚看作是代替美洲的商品倾销地。

许多到达澳大利亚的不列颠囚犯在1788年1月到达悉尼湾后的几年中，曾经希望自己已经被绞死而不是被运到世界的另一边。他们中的许多人身患疾病，愚昧无知，缺乏经营农业的知识。他们遭受饥荒和干旱的折磨，忍受着看守他们的士兵们对他们的野蛮虐待。总督阿瑟·菲利普很快召来了一些拥有农业耕作技术的自由移民。但是，最初要吸引人们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不列颠，最优秀的自耕农已经生活得很好。极少数想成为移民的人也宁可选择到美洲而不是到澳大利亚，因为不列颠距离美洲较近，海上航行的费用也较低。a



在这幅19世纪40年代出版的水彩画中，一个囚犯管理员与他的妻子和他的内侄女正一起监督那些在塔斯马尼亚政府农场上做工的囚犯，塔斯马尼亚在1855年之前被称为范迪门地区。囚犯们在做完18个月工程（包括清理土地、建筑道路和桥梁）后，其中大多数人被释放去做雇佣工作。由于当地的自由定居者反对劳动力的增加带来的竞争，于是，不列颠政府将囚犯运送至澳大利亚的行动于1868年最后终止。

慢慢地，情况发生了变化。到1792年，总督菲利普因病被迫返回不列颠时，他统治的新南威尔士移民区的生活几乎可以自给了，不再完全依靠从英国运来物资。1802年到1803年间，一个叫马休·弗林德斯的海军军官完成了环绕澳大利亚大陆的航行，他强调那些孤立的海岸地带已做了标记，在事实上属于一个独立的陆地，并暗示不列颠对整个大陆有最终权利要求。很快，新的定居点在菲利普港口（即接近后来的墨尔本城址处）和塔斯马尼亚岛上建立。1813年，一次攀登蓝山（位于悉尼西部）的探险活动，为日益发展的养羊业开辟了一个新的牧场，这

种羊的羊毛与捕鲸业和海豹捕猎业一起很快构成这一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柱。

4年后，一个失望的探险者在结束了到澳大利亚西部探寻牧场的活动后，得出结论说："从这个国家境内所有文明人的实际目的来考虑，147度经线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居住的。"当然，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事实：澳大利亚当地的土著居民们把这片土地作为自己的家园至少已有5万年了，是他们为白人殖民者的进步发展付出了代价。最早的欧洲移民在总督菲利普统治时期小心谨慎地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但是，在如此巨大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澳大利亚土著人是集体捕猎者，不像欧洲人那样从事农耕，在这些土著人看来，只要他们想这样做，那么无论什么时候猎杀一只羊都是自然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那些从事艰苦劳动的农民们所不能苟同的，这些农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生活资料被掠夺而无动于衷。于是，残杀土著居民的暴行时常发生，其中最恶名昭彰的是1838年在马雅尔·克利克残杀28名男子、女子和儿童的事件。有7个参与这场大屠杀的当事人被绞死。他们毫不在乎地承认自己杀害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居民，但却声称他们的行为不是犯罪，因为他们并不把被害者看成人。



总的来说，约有2万澳大利亚土著人被白人殖民者杀害。此外，许多土著人由于缺少自然的免疫力而死于随移民传入的疾病。随着土著居民开始迅速减少，并失去他们的土地，出生率也骤然下降。1788年至1900年间，他们的数量从75万人骤减至10万。

由于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大量自由移民的到来，澳大利亚保持了持续发展状态。1829年和1836年，有两次私人的殖民冒险活动（类似于那些17世纪在北美建立英国殖民据点的活动）建立了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殖民区，其首府分别是珀斯和阿德莱德。由于向新南威尔士运送囚犯的活动在1840年已经终止，新建的附属地和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去的维多利亚几乎没有来自不列颠的罪犯。不列颠政府同意了自由定居者提出的要求，由他们自己选出代表组成立法团。1842年，新南威尔士选举出第一个殖民地议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于1850年，昆士兰于1859年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议会。

在所有这6个殖民区定居地，新的移民数量激增。勇敢的拓荒者驱赶着他们的羊群来到无人圈占的处女地，那些已经购买了地产的人们称这些牧人们为"牧羊场主"，但是他们的成功却很快使那些诽谤和非议烟消云散了。以养羊为基础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850年为止，英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1760万公斤羊毛，大约是从德国进口羊毛量的5倍以上，而德国曾是英国羊毛的主

要供给者。在19世纪中期以后，殖民者们的收入已经相当稳定，其中很多人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已经不认为欧洲还是他们的家。但是，谁也没有预计到澳大利亚还将开发出巨大的财富，也没有预见到他们的社会将会经历迅猛的变化。

一个固执的投机者，新南威尔士的埃德华·哈格拉夫发现了这笔财富。他曾经做过许多工作：农夫、小店主、水手、航运代理人，还曾于1849年在加利福



尽管他们一直生活于荒凉寂寞中，塔斯马尼亚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在照相机前仍郑重其事地维护着他们团体的尊严。此照片摄于1858年。到1847年，当他们移居到霍巴特附近的澳伊斯特湾时，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从19世纪初的7000人锐减到47人，大多数人死于疾病和酗酒，而他们中间最后的血统纯正的幸存者，一个名叫特鲁甘尼尼的女人也死于1876年。

尼亚金矿采矿，但当他回到澳大利亚时，并不比当初离开时强多少。突然，他回想起在巴瑟斯特附近有一条小溪穿过蓝山，那里的地势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地势非常相似，于是他决定再来试一试。据有人讲述，1851年2月12日的早晨，哈格拉夫头戴礼帽身穿礼服，来到这一地区，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他可能会找到的东西将具有重大意义。他用锡盘盛满土，洗去砂子，然后就看到了他两年以前跨越世界去寻求的东西——黄金！

哈格拉夫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出，使人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悉尼的权威报纸希望"黄金矿不会大量存在"，如果真的大量存在的话，澳大利亚将面临"比地震和瘟疫更加可怕的灾难"。但是，当人们从一大块石英石中发现一块重40公斤的矿金时，当人们在墨尔本100公里处的巴勒拉特和本迪戈又发现了含金量更加丰富的矿藏后，"淘金热"的蔓延已不可扼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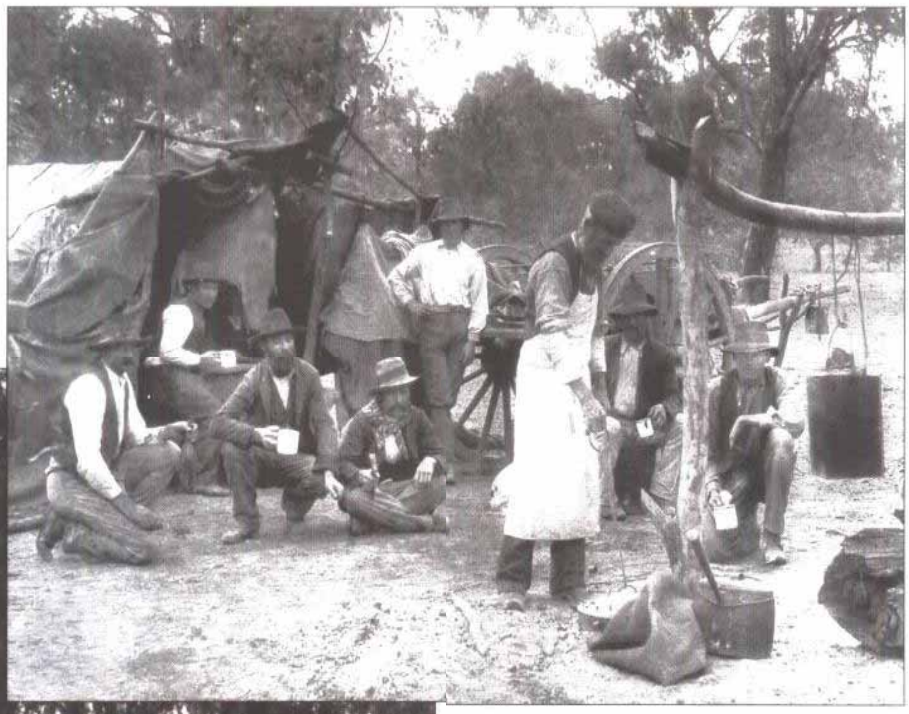
整个大陆，从东部的悉尼到西部的珀斯，从墨尔本的街道到新南威尔士的养羊基地，各个阶层的男人们纷纷抛弃了工作、房屋和家人，匆匆忙忙赶到金矿所在地。加入到他们中间来的，还有来自海外的探矿者，这些人几乎将他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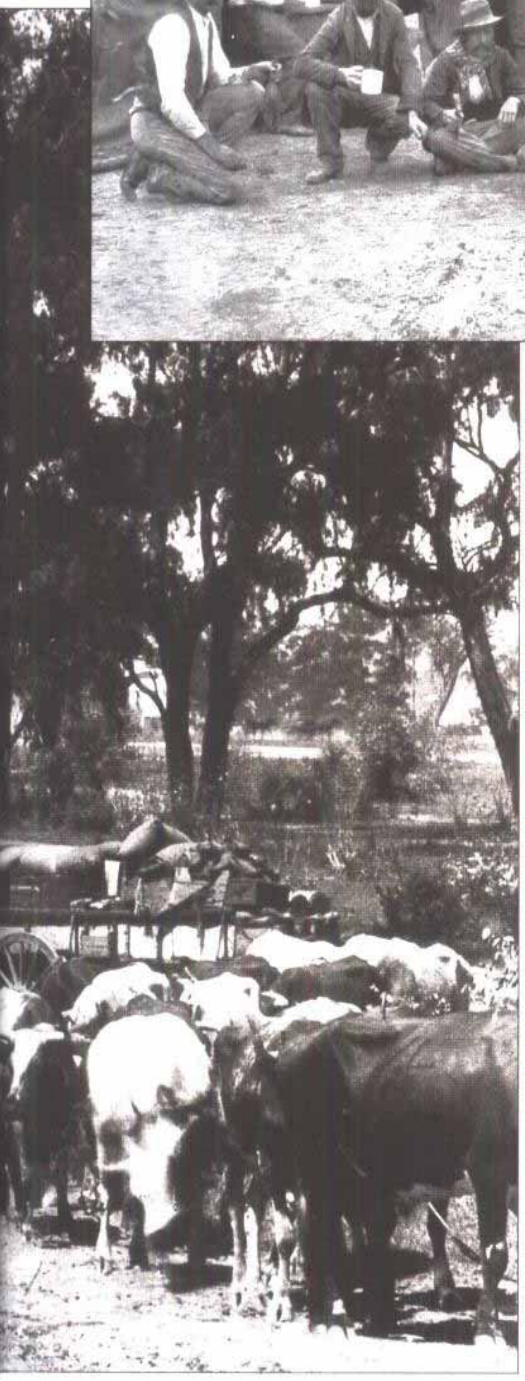
此照片是一名于1855年参与考察澳大利亚北部边界的探险队员贝恩斯所摄：一名澳大利亚土著人拿着他的带有倒钩的矛斜靠在大树旁。在远离大陆东南角殖民区的土著居民生活区，澳大利亚土著人保持着他们千万年不变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用矛和飞去来器猎取大袋鼠和鸸鹋；女人们采集种子、块根、蜂蜜和水果，有时也能抓到一些小动物，如蜥蜴和青蛙等等。

有的积蓄都投到奔赴澳大利亚的漫长旅途中。1852年，到达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在原有的9.5万人基础上增长了7倍；接下去的10年中，这片大陆上的人口增长了2倍，达到120万。

大多数移民来自不列颠，但也有许多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地。后来，由于对一些非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又召了一些来自中国的劳工。在来到澳大利亚寻求土地的一代开拓者，即澳大利亚"牧场主"之外，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即







"挖掘者"(矿工),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快致富,因此他们丝毫不关心矿工们的背景条件。向澳大利亚运送囚犯的活动最终被废除了,自由的航道通向希望的土地,到达澳大利亚已不算是一种惩罚。

但是,令报纸忧虑的事情很快发生了。黄金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动乱,因为大批劳动力朝采金地涌去,农业生产被忽视了。官方对于移民的流入并未作好准备,他们努力维持矿区的治安(这个并不受欢迎的工作通常由以前的囚犯们来担任),并至少需要建立一个临时机构来对付动荡局面的出现。经营采金地的费用以"牌照费"的方式转嫁给矿主们,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矿主都要付同样的费用。警察们则在每一笔收上来的费用中提成,那些没有能力或不肯交纳牌照费的人被视为罪犯。矿工们开始憎恨警察。

矿工们还有其他的不满。维多利亚的矿工没有财产,也就没有投票选举殖民地立法议会的权利。那些想将自己的收入投资于土地的人很快发现地价升高了。矿工们感到他们与警察、政府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是不公平的。

于是,在1854年,巴勒拉特爆发了冲突。一个名叫詹姆斯·斯科比的矿工喝醉了酒,与旅店老板和老板手下的一个强壮的伙计(这个伙计以前是警察)吵了起来。后来,人们发现斯科比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矿工们清楚地知道,是老板和他手下的人杀害了斯科比,但法官却拒绝予以起诉,反而将两人释放。矿工们此前就曾看到过法官们收取贿赂,营私舞弊,这次事件的发生更使他们忍无可忍。

矿工们首先烧毁了这两个罪犯所在的旅店。然后,矿工们连续召开了群众大会,有关斯科比死亡的问题很快引起人们的普遍反响,要求对这一惨案进行赔偿。11月11日,1万名"掘地者"投票选出了一个改革组织,为推行一个广泛的政治纲领而进行鼓动宣传。他们要求在采金地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取消可恨的"牌照费";他们还提出成年男子应该享有选举权,应该举行定期选举,为立法委员会的人员支付薪水,取缔在确定政治候选人资格时的财产限制。墨尔本政府当局向采金地派遣了大量军队并加倍征收费用。掘地者们则正式烧毁了执照,新的暴乱再次发生,更多愤怒的掘地者在尤里卡(在被烧毁的旅店附近)修筑起围栏。在领袖们的鼓舞下,他们发誓效忠于这次起义,不管当局采取何种措施,他们都将予以迎头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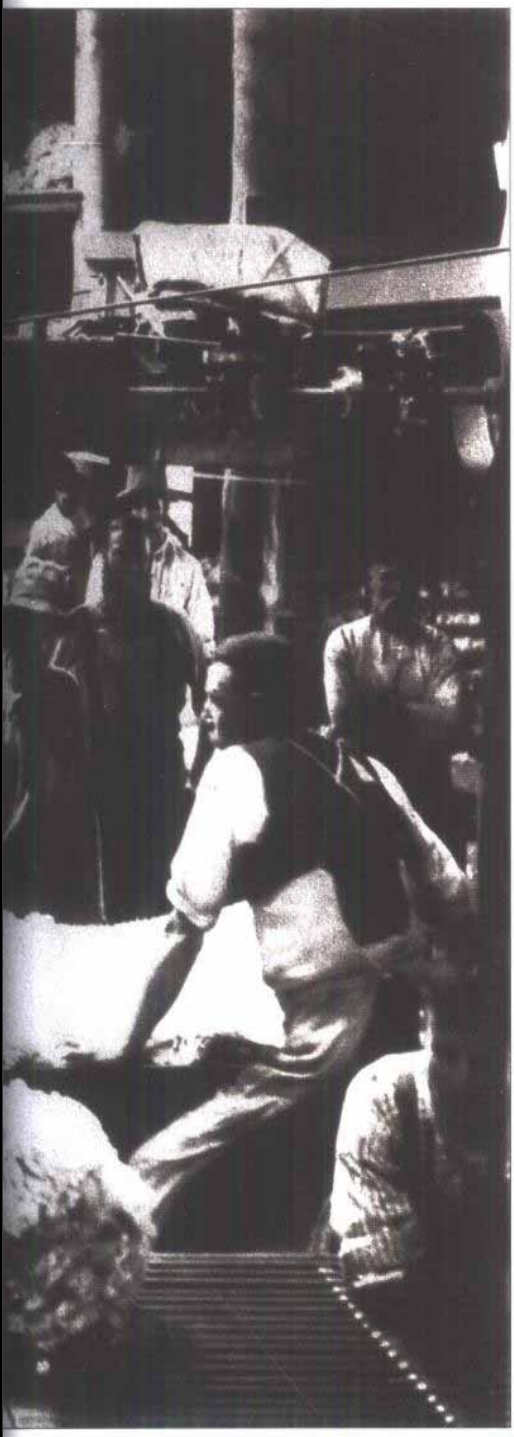
图中放牧者用绳子捆牢牛车上的给养,准备出发到一个孤立的牧羊站去。返回时,大车将装满成捆的羊毛。19世纪后半期,由于牧人们都在内陆放养羊群和牛群,那些赶车人、剪羊毛工和放牧者经常在偏僻的牧场站点与海岸诸港口之间长途跋涉,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的主要食物通常是硬烧饼,是一种未经发酵,在铁锅上烤熟的食品——人们通常在地上挖一个洞,其边壁铺上热木炭,把面团放在铁锅中,盖着盖儿烤制。在上面的照片中,赶车人紧握茶杯,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早餐。



新南威尔士的羊毛分类工人在工作棚中为了让摄影师拍照而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刚刚剪下来的羊毛被铺在用板条做成的桌子上，根据其质量分成各种等级；然后，将它们捆扎包装，运往纺织工厂，大多数运往英国的纺织厂。最好的羊毛是西班牙种的麦利诺羊毛，1797 年澳大利亚引进了第一批麦利诺羊的种羊，到 1890 年，澳大利亚已有 1 亿只这一品种的羊。

12 月 3 日，星期日，早晨，集结在矿区周围的军队指挥官命令尤里卡围栏内的 150 名矿工投降，遭到了拒绝，他便命令士兵发动进攻。经过 1 小时 15 分钟的激战，25 名“掘地者”牺牲，50 人受伤；军队中也有 2 名士兵死亡，12 人受伤。

矿工们虽然失败了，但却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政府对这场灾难作出了反应，答应了矿工们的绝大多数要求，“牌照费”很快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矿工们交纳的一笔相当低的“选举税”，它使纳税人有权参加维多利亚的选举。采金



地的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组，通过征收一种新的黄金出口税来保证国家的年收入。这些措施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工人的巨大胜利。尤里卡围栏中的英雄们以歌谣、民歌来庆祝这一胜利。

但是，矿工们的不满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为了增加利润，成千上万的中国廉价劳工被用于采矿业，使矿工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劳工们工作很努力，只是为了获取较低的工资；而且，他们把大部分钱寄回家乡，而不是投资于澳大利亚的开发。矿工们向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议会提出抗议，议会于是通过了法案，对于已经在采金地工作的中国人实行歧视性政策，并严格限制以后的移民活动。

于是，中国人开始进入南澳大利亚，经常是数百人一起成帮结队穿过内陆到达采金地。他们遇到了公开的敌视。1861 年，在新南威尔士的兰明低地（那里，中国社区内的人数在 1500 人左右），这种敌视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6 月 30 日，星期日，3000 名白人殖民者手持棍棒、锄头冲进中国营地，焚烧其帐篷，还剪掉了他们的辫子。警察和军队很晚才赶到现场，后来对主谋者进行了审判，但所有被告均无罪释放。中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和沮丧。采金地给人们提供了机会，但只给了另外一些人，而不是中国人。

尽管许多外国淘金者在淘金热结束后返回了家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留下来定居，他们对于房屋、工作、土地的要求给所有殖民地政府带来了巨大难题。大多数从政者毫无经验，缺乏公众服务的传统。结果，各殖民地区的政党只是倾向于顾及当地支持他们的人的短期利益，而不是整个澳大利亚的普遍利益。但逐渐地，实施必要的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

在拥挤的城市中，住房问题越来越严峻，但工人阶级已经习惯了那里艰苦的劳动和贫穷的生活。墨尔本的人口在 10 年间从 3.9 万剧增至 14 万，因此，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一个 14 口之家挤在 2 个房间里，平均每人仅占 3 平方米，是很普遍的现象。城外那些人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整户人家都住在用树皮搭起的棚屋里，以土地作为地面，用麻袋布当床，木制板条箱当家具。19 世纪 60 年代，澳大利亚东部约有 1/5 的白人生活在帐篷或是临时的居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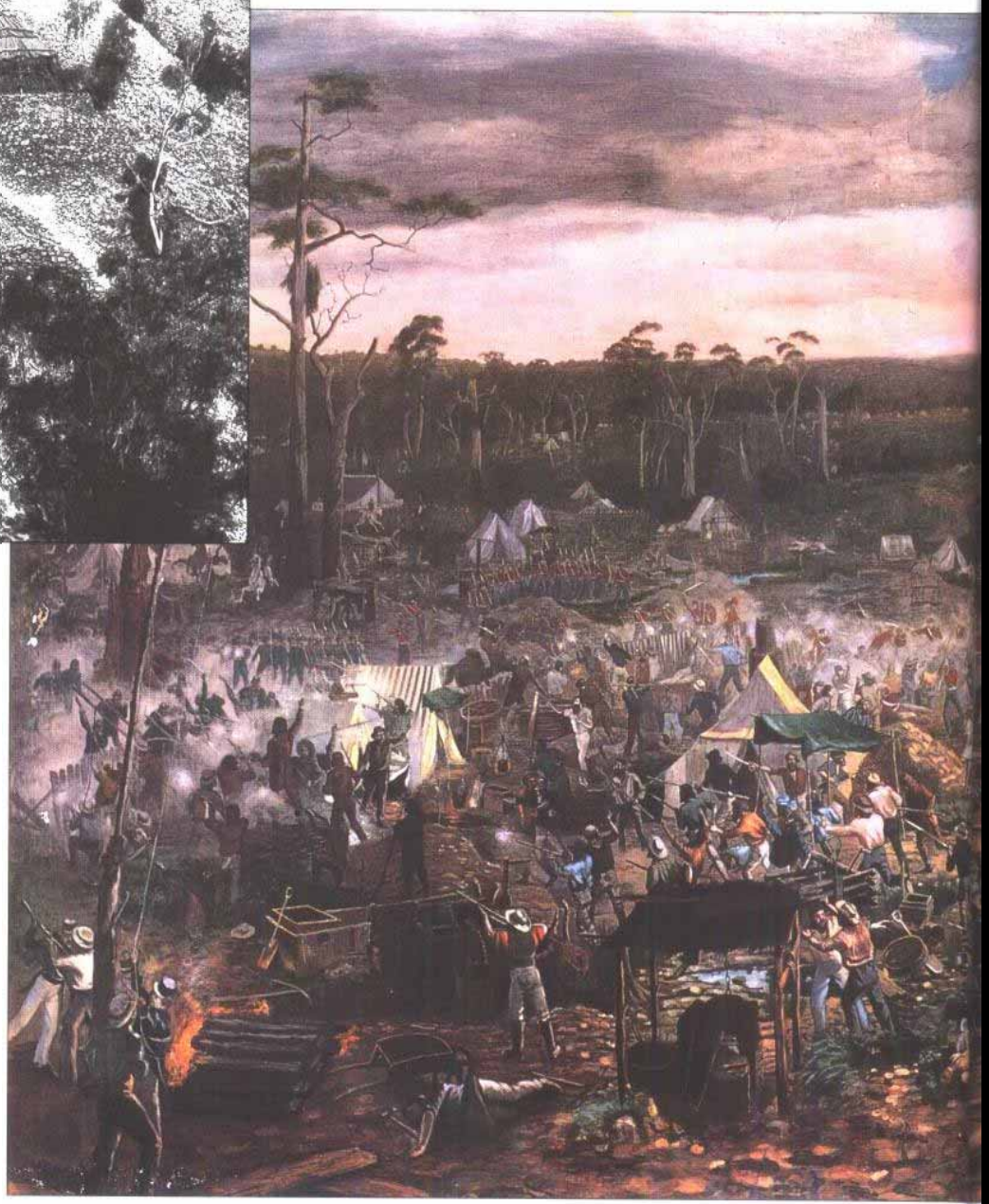
广泛的建筑计划减轻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痛苦，使城市发生了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成员本来基础也并不殷实，但他们都是具有努力工作和自我完善特点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列颠人，这时则开始在郊外建立起舒适的家园，其房舍通常饰以华丽的金属装饰边——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悉尼饰带”，经常与巴罗克式公共建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墨尔本，有一个著名的不列颠建筑师约瑟夫·里德，他在采金失败后转而在建筑界成名，设计了市政大厦、交易大厦和许多银行及教堂。他设计的建筑结实、厚重而安全，在建筑物的顶部通常设计巴罗克式穹顶，使之成为一个自信、坚定的社会的主要象征。

然而，在城市外围，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机会仍是很少的。所有最好的牧场已在 19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被牧场主们占有了，而当土地被偶尔拍卖时，价格已经远远超出新移民的财力所能支付的范围——尽管没有人同意这种说法。新移民提出，在这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国家里，出身和世袭的身份是无足轻重的，而土地必须被解脱出来，给所有的人以同等获得土地的机会。但是，牧场主们坚

持，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不能被夺走。缺少土地的居民开始鼓吹改革。同时，他们收集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提案。例如，在维多利亚，牧场主们虽然占有1250万公顷的土地，却不能实现殖民地粮食自给。在大陆上，羊群成千上万，到1890年已增至1亿只，但羊群仍然在增长。最肥沃的农田并未得到合理的使用。

农场主反驳道：羊毛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物，是经济的主要支柱。同时，他们借助自己在议会中的影响，宣扬开放土地将带来一系列问题，从生产过剩、资金不足到效率低下乃至经济崩溃等。但是，议员们一个一个地屈服了。19世纪60年代，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都通过了法律，规定：任何人只要按照公价交纳一小笔购地押金，即可得到土地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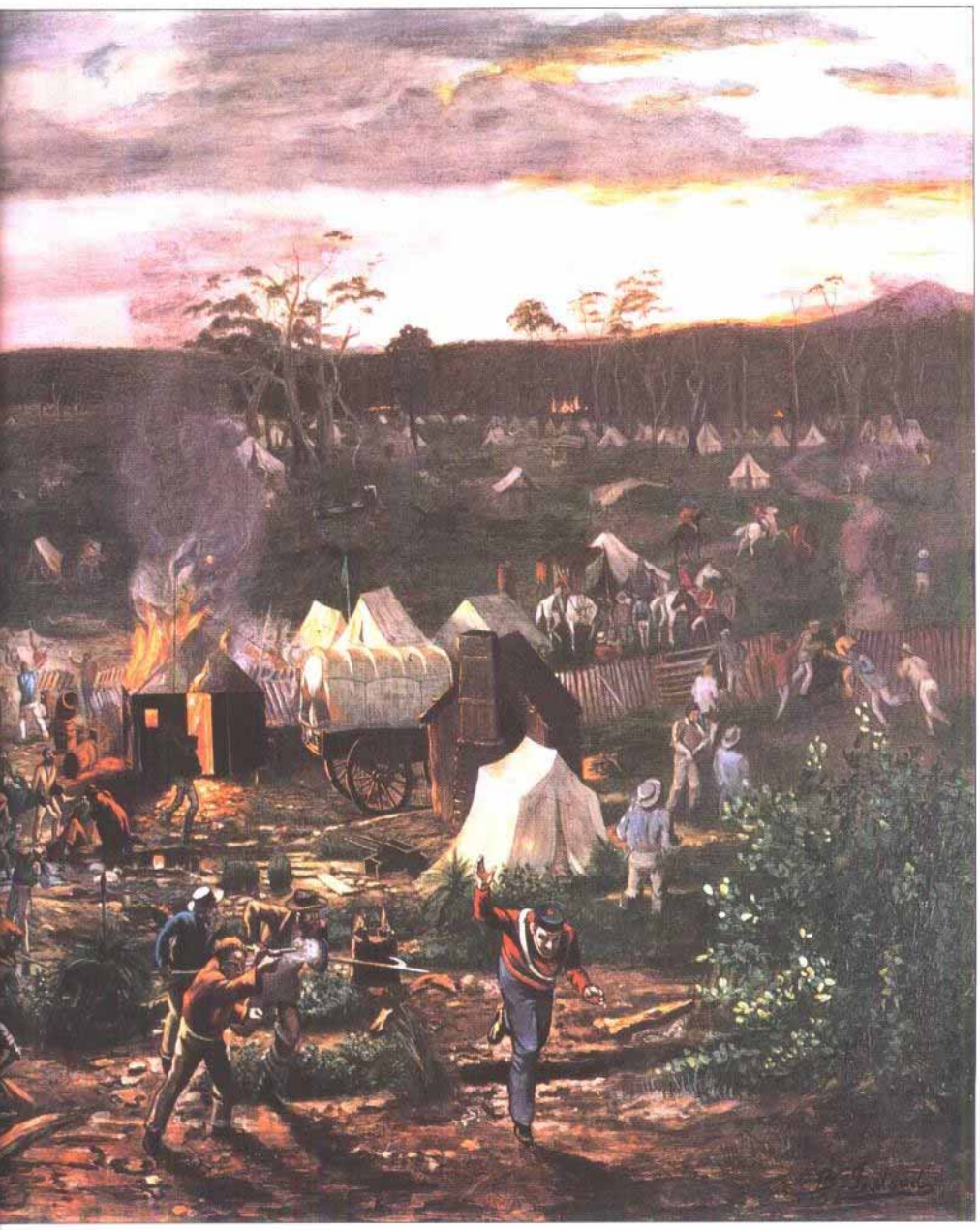


在新南威尔士的山坡上，用树皮覆盖的茅屋遮住了那些淘金人挖凿的矿井（上图），马匹拉动的绞车将矿石和巨大的岩石从矿坑中提出来。“掘地者”希望自己能很快发财，却从不在意自己的工作是否安全或是否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却非常痛恨殖民当局征收牌照费。右边这幅图画描述了在矿工们烧毁了他们的执照并拒绝投降后，军队袭击维多利亚尤里卡围栏的情景。

用权，而购地款的拖欠部分将在以后几年内付清，不必交纳利息，惟一的前提是土地被用来栽种庄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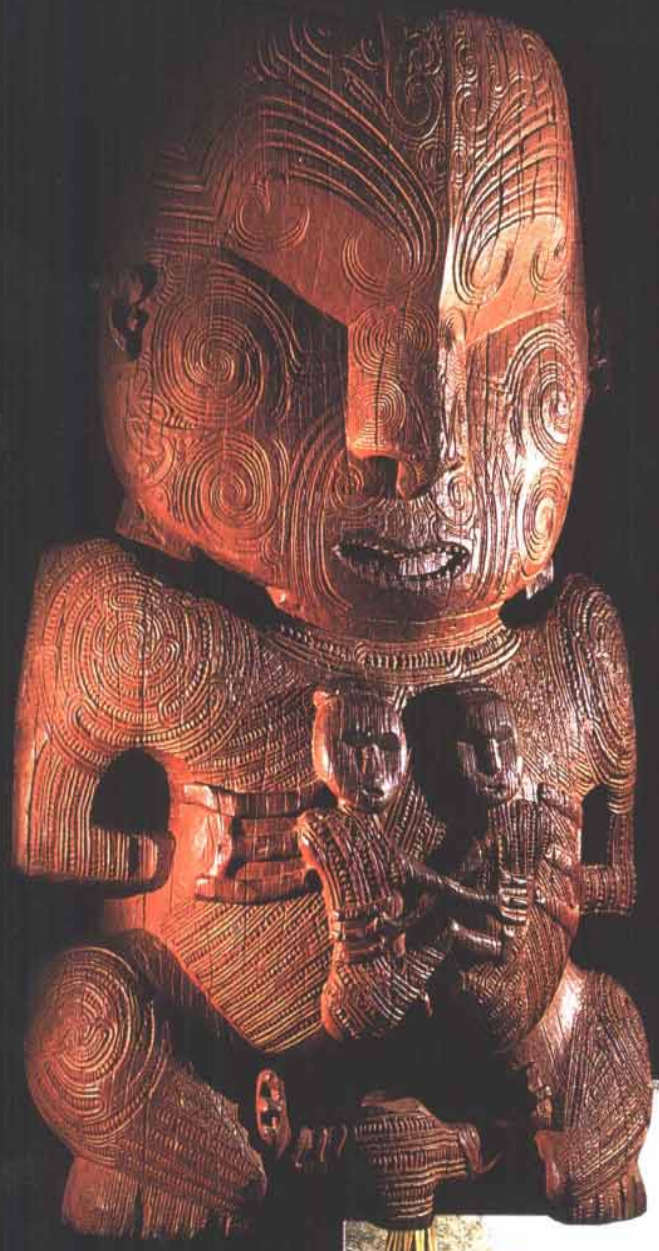
政府的意图本来是让穷人来有效地利用土地，但结果并非如此。在新南威尔士，牧场主与欲购土地的人在对于原始牧场的占有权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贿赂、暴力乃至朋友和亲属们互相造假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牧场主们则把他们的财产投到一家匿名的公司，然后再申请新的土地。在其他地区，这一制度运行得稍好一些。到1869年为止，维多利亚约有3万人购到小块农田；在南澳大利亚，大量土地找到了它们的新主人。但新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总是经营得很好。1862—1870年，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干旱或洪水。自然灾害使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银行，有的甚至放弃了土地。

运输是另外一个问题。距离遥远加之道路崎岖，使得许多小土地所有者不能将产品运到市场。1854年，从威廉斯敦到维多利亚的墨尔本间，建成了澳大利亚第一条铁路，但在接下去的20年中，却只铺设了1500公里的铁路。由于各殖民地之间缺乏协调统一，许多铁路线上实行不同的度量标准，结果这种混乱状态在这个国家内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一些殖民地还建立起贸易关税来互相抗衡，而不是谈判协商制定贸易政策。



直到19世纪70年代，殖民政府才在英国投资者的支持下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这项计划包括铺设一条1.6万公里长的铁路。伴随铁路而来的是贸易邮车、电报线以及其他一些交通工具的进步。铁丝网栏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有着特别的作用，它常被用于较重要的基地和铁路两边。使用它来圈占大片土地成本很低，而且也可以防止羊群侵入网栏圈内。到1880年，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大多数地区架设了铁丝网栏，加之墨累河的水利灌溉系统使得周边的土地能够得到较经济的灌溉和耕种，澳大利亚人开始认识到，有效的经营同样可以使得他们的土地成为宝贵的资源。

从此，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健全的、自力更生的社会，它的活力来自



毛利人的岛屿

不列颠人企图在肥沃的新西兰殖民，新西兰距离澳大利亚东南部1500公里，不列颠人的活动受到了在那里定居达千年之久的毛利人的坚决反抗。

毛利人住在坚固的村庄里，村子的入口处刻有木雕装饰柱，如左图所示那位身上刻有花纹的首领那样。村庄周围的土地是公有的。1840年，“英国—怀唐伊条约”签订时，大约500个毛利人首领表示承认英国的统治，想以此方式换取他们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但英国的行政官员和私人定居者们对于吞并地方居民的财产并不在意，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爆发了可怕的战争。

逐渐地，不列颠的火器占了优势，白人定居者增加。到19世纪末，冷冻肉、黄油、干酪的出口将新西兰与不列颠帝国的经济体系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1866年，英军袭击了北岛（西沙列岛之一——译者）的毛利人村庄，一个受伤的士兵被他的战友们从战场上抬下来。1860年在这里爆发了持续10年的战争，起因是不列颠政府没有求得至高无上的毛利人首领的同意就试图购买土地。

一种生存的需要，它相信从野蛮和蒙昧中夺取生活资料的拓荒者与那些聚集在伦敦豪华客厅中受过教育的绅士们相比，至少应该是平等的。澳大利亚要求它的英雄们拥有的最高尚品德是有力量、有勇气向野蛮因素挑战，有按照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拘泥于现有权威的规定而生活的决心。

考验这些高尚品德的最适合的场所是内地的偏远地区和内陆沙漠，那里的绵延不绝的荒凉环境在向先驱者们挑战。1860 年，维多利亚政府希望开拓新的牧场，并宣布将奖励第一个由南至北穿越澳大利亚的人。8 月 20 日，墨尔本 1.5 万名群众目送一支由 25 只从印度进口的骆驼和 12 个人组成的探险队出发。这支队伍由罗伯特·奥哈拉·布尔克带领，他是一个爱尔兰勇士，毫无探险经验；另一个是威廉·约翰·威尔斯，一个英国勘测者。他们俩都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淘金潮中来到澳大利亚的。以前已有探险者进行过探险，但布尔克和威尔斯的名字将载入史册。

按计划他们将分段穿越大陆，先遣小队每天出发准备营地，在那里等待其余的探险队员和补给物资。在穿越澳大利亚的旅途接近一半时，在库珀河岸，布尔克决定放弃大部分物资，与威尔斯及两个同伴——查尔斯·格雷和约翰·金继续前进。干燥的内陆沙漠气温在每天中午可达 55℃，而到了晚上则降至 0℃以下。布尔克一行人在 1861 年 2 月最后到达了弗林德斯河的潮汐侵陆水域，这里距离澳大利亚北海岸的卡奔塔利亚湾很近。鉴于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4 个人转而踏上归途。

两个月后，布尔克、威尔斯和金耗尽给养，蹒跚地回到库珀河的营地，这里离卡奔塔利亚湾约 1600 公里；格雷已经在途中死去了。在他们到达营地几小时前，探险队的其他队员已经离开了营地。布尔克写了一个纸条："我们明天将继续缓慢地沿库珀河南下到阿德莱德，我们非常虚弱。"他把纸条放进瓶子里，埋在树下。他和金开始启程向南，两天后，布尔克精疲力尽而亡。金返回库珀河找威尔斯，威尔斯已死在那里。当巡逻队到达的时候，布尔克和威尔斯的尸体已变成了白骨；金被一队土著居民解救而得以生存下来。

探险者的命运引发了他们的同胞们的想象力，那一年 12 月，巡逻队的首领报告说："至少已经有 5 个画家画出了我掩埋布尔克时的历史场面。"人们为他们作了悲歌，建了纪念碑，两个人的遗骨被送回墨尔本，并在 1862 年 1 月举行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首次国葬。

布尔克和威尔斯被认为是为公共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澳大利亚人民却更崇拜当时那些粗暴的不法之徒，就是在边界上抢劫，被人们称之为"山贼"的一伙匪徒。最初，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服刑者的监禁地逃出来的犯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选择了非法的生活作为致富的最简易途径。

"山贼"能够很巧妙地对付警察——由于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加之警察们的无能，常常对这些人无能为力，这使他们常常受到那些遭到警察暴力侵害的人们的欢迎。在边远地区的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与这些帮助"山贼"的



在S·T·吉尔的一幅水彩画中，探险者罗伯特·奥哈拉·布尔克和威廉·约翰·威尔斯在澳大利亚境内的库珀河向同伴们告别，当时是1860年12月。尽管他们受到警告说，在盛夏灼热天气里跋涉会十分危险，布尔克和威尔斯仍坚持和另两个同伴约翰·金和查尔斯·格雷朝北部海岸前进。他们只带了一匹马、6只骆驼以及仅够12周用的补给品。第二年春天，一个巡逻队找到他们时，只有约翰·金活着，其他人都因饥饿而死。

人并不一致，但由于害怕受到报复，只好保持沉默。人们用图书、戏剧、歌谣来纪念那些未必是英雄的人物，孩子们也以他们的事迹作为游戏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是奈德·凯利，他原来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偷牛小贼，后来成为银行劫匪和杀人凶手。他在澳大利亚的许多穷苦人中赢得了罗宾汉般的地位。1880年凯利在维多利亚的格伦罗万镇被捕，尽管有上千人签名请愿要求赦免他，但他仍于11月被绞死在墨尔本，当时他只有25岁。

凯利是他的同类人中的最后一个，因为在一个遍布电报和铁路的世界里，“山贼”们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到1880年，生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居民在数量上已经胜过外来移民，他们的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经济在膨胀，人民有了新的关注热点，并对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有了新的构想。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是物质的丰富产生了人们的自信，但是，物质的丰富足以使殖民地人民度过暂时的危机，并充分认识他们所生活于此的这片大陆的潜力。

英国人认为，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是向澳大利亚投资的最好时机，澳大利亚人也是这样认为。而且，他们的收入有了新的来源：在昆士兰发现了大量铅矿和储量巨大的银矿，在新南威尔士的布罗肯希尔也发现了铅矿、锌矿。煤矿资源也很丰富，煤的产量在20年间总产量达到以前的3倍，满足了新的火车和轮船对能量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方面的实践使得小麦的抗旱能力得

到提高，并证实了在昆士兰北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建立甘蔗工业的可能性。

在这种经济繁荣中，普通工人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少于那些大农场主和商人企业家，同时，工会作为一个重要力量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政治活动中。19世纪前半期奇缺的技术工人此时已经获得高工资，并形成了行业联合会来保障他们的优势。到1855年，墨尔本工会建筑工人中的石匠、木匠和其他工人已经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1870年，工会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19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会和劳工团体建立起来。1879年，首届殖民地间的工会联合大会在悉尼召开。矿工联合会和剪羊毛工人工会则成功地改善了工作条件，与那些较早建立起来的工会同行并驾齐驱，而且在殖民议会中也建立了委员会，为通过保障工人罢工权利的法规而奔走游说。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1872年走访了澳大利亚，他很确信地说，澳大利亚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比英国好得多，典型的工人"比英国劳工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因此，与英国工人相比，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于墨尔本这个城市，他热情地赞叹道："或许在世界上没有像这样的城镇，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工人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他不但生活舒适，而且在周围的人群中有较高的地位，有可观的报酬，远高于在英国本土能获得的收入。"这一消息传到海外，很自然地，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天堂"。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与其他许多领域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由于那些以早期移民的斗争和人们在灌木丛中的艰辛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的出现，使城市文化生活丰富起来。风景画家们为日益都市化的社会描绘荒郊野外的写生图。学生们进入了悉尼和墨尔本的大学学习，这两所大学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其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在1875年，一所新的大学在阿德莱德成立。在体育运动方面，一支澳大利亚板球队击败了来墨尔本访问的英国板球队。5年后，他们在伦敦又取得了同样的胜利。所有这些成绩都归功于一个统一国家的观念。澳大利亚仍然忠实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澳大利亚的军队曾经在1885年勇敢地参加了对苏丹的战斗，后来又参加了对波尔人的战斗，但是，他们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有自己的灵魂和意志的民族群体向女王尽忠的。

然而，澳大利亚的成功同时也引起了新的社会和旧的反动传统势力的冲突。似乎是因为这个国家前进得太远了。一个导致殖民地分裂并引起工会反对雇主的事件是，种植园主们从太平洋南海岛输入了5万名当地出生的土著到北部昆士兰蔗糖种植园工作。种植园主们坚持认为白人劳动者不适合这种工作，但是把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做法既不受工会的欢迎(他们反对奴隶贸易活动)，也不受其它殖民地的欢迎(这些殖民地已经颁布法令禁止有色人种移入)。这些由岛上输入的劳工本身也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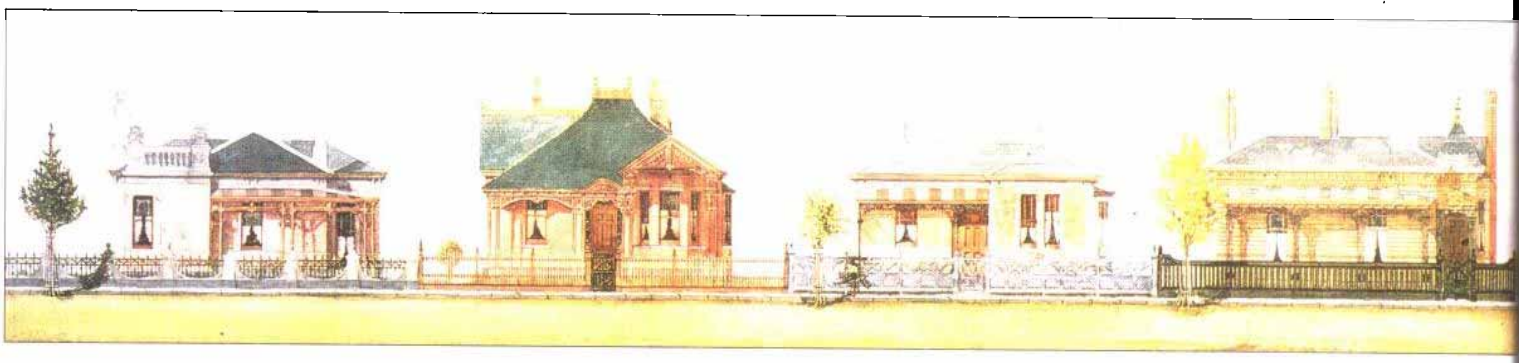


这套粗糙的没有头盔的铠甲是1880年6月银行劫匪凯利在维多利亚的格伦罗万与警察交火时穿的。当他们藏身的旅馆被烧着时，他的同伙被烧死了。凯利大步冲向他的攻击者，由于脚、手、胳膊中弹而倒下被俘，几个月后他被审判并被绞死。

临着同样的敌意和种族偏见，就像20年前中国人在采金地所忍受的偏见一样。

更不幸的是，澳大利亚繁荣的基础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牢固。这片殖民地上的人民在繁荣时期总共借了约2亿英镑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英国，而大多数借款都用在不明智的投资上。在城市，政府官员和个体市民用这些钱建造宏伟的建筑；在乡村，农场主们将贷款用于购买那些不适于耕种的土地，由于他们所欠的贷款远远超出他们的偿还能力，只能希望雨水能够使劣质的土地变成绿洲。

上天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1890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导致一家大规模的伦敦银行倒闭，对其他英国和澳大利亚银行产生严重的影响，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同年，由于一名工会官员被悉尼港口的科琳娜商船开除，他的同志们立即举行了罢工，而且，作为澳大利亚“同志之



1861年亨利·布恩画了一幅有关维多利亚首都墨尔本的画，描绘的是居民在宽阔的街道上散步（对页），远处地平线上是高大的英国风格的新哥特教堂的塔楼和尖顶。这里最早的建筑建于1837年，即当这里的殖民者从土著居民的手中买到这块土地两年之后。到1900年，维多利亚已经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这里有居民约50万。其中更富裕的人住在独立的乡村别墅中，这些别墅的风格与上图中一位建筑师的设计颇为相似。

情”的典型表现，大批矿工和剪羊毛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到9月中旬，约有5万人停止了工作，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6周后，政府获得了胜利。公众舆论倒向雇主一方，面对几乎来自全民的反对，罢工者放弃了。但企业的困境并未结束，罢工后很快又出现了经济萧条现象。这时，工会受到了广泛的指责，但问题的根源在于阿根廷危机后企业的经营缺乏自信。1891年和1892年，在墨尔本和悉尼，大约有40家土地和金融公司破产，所有的公共建筑和大多数私人建筑骤然停工。银行提高了利率以保持英国投资的流动，但是，惊恐的储户们却开始撤回存在银行的资金。1893年1月，联邦银行关闭，中止了所有的交易，很快，另外12家银行也被迫采取了类似行动。

维多利亚的情形更糟，在那里，墨尔本从此不再据有作为澳大利亚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他殖民地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新南威尔士靠着其羊毛经济抵制了这一危机的深化，然而经济的衰退状态仍然很严重，导致了普遍的失业。全国都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对于那些相信美好的时光永存的人们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对于澳大利亚的自信心的这次冲击，使许多人集中考虑建立联邦的问题，即将6个殖民地联合为一个国家，他们认为这样可能带来优势。这种思

想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却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19世纪90年代，两个重要原因促成了联邦的建立：第一，事实已经表明，各孤立的殖民地已不再有能力独立应付经济危机；第二，澳大利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欧洲殖民大国之间的竞争对于这片大陆的海岸是一个潜在的威胁。1853年，法国占领了太平洋岛屿新喀里多尼亚，从那里到澳大利亚只有10天的航程；1884年，德国霸占了新几内亚的东部地区；1887年，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统治新赫布里底岛，几家澳大利亚报纸认为，可以推测，一场欧洲战争的结果，是俄国将试图侵入澳洲大陆。在澳大利亚驻守的最后一支英国部队已经于1870年撤离。如果殖民地想要成功地抵制这种入侵，那么，很明显，他们将





不得不把他们各邦微弱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使用。

对联邦的支持并不是毫无疑义的。大多数中间阶级主要赞成废除殖民地间的关税，并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来限制工会的势力。但工会对于后一个设想并不十分热情，因为他们害怕官方与雇主之间结成联盟。一个新南威尔士的政治家概括了各殖民地间的对抗，认为成立联邦将意味着他所在的殖民地（唯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新南威尔士）被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就像一个清醒未醉酒的人不得不与醉汉为伍一样。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人倾向于支持成立联邦，他们把联邦看作是对大城市既得利益的打击；许多城市居民自然持反对意见。这个问题越深入讨论下去，澳大利亚人的分歧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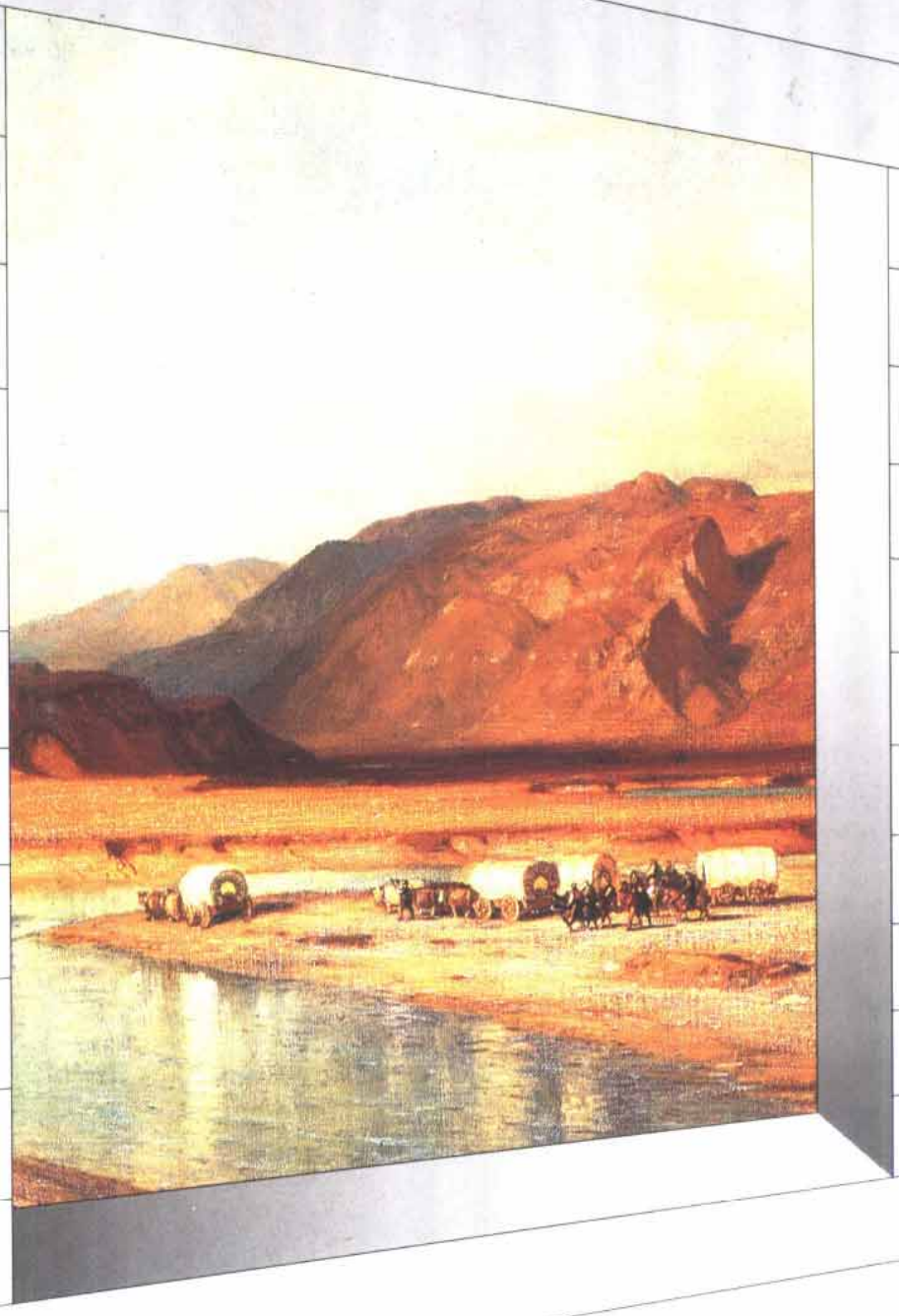
但是，联邦的观点已经生根。1895 年，殖民地的总督建议应由 6 个殖民地的代表共同起草制定一部联邦宪法。这个会议于 1897 年 3 月召开，经过一年的系列讨论，宪法草案的条款定型。它包括：国家的最高元首仍然是英国女王，女王在大陆的代理人——总督的签字是确认所有立法的依据。但政府要在议会两院的监督指导下工作，参议院由 6 个州(即以前的 6 个殖民地)各选 6 名代表组成；众议院则从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中通过普选产生。妇女们于 1902 年获得了选举权，但在两个殖民地内，她们早已有了这一权利。最后，宪法同意将在新南威尔士建立新的首都。

经过两次公民投票后，西澳大利亚仍然拒绝接受这些议案，但最后，殖民地各邦还是达成了妥协，他们派出所有各邦的代表去伦敦向英国政府提交他们的法案。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不列颠帝国所占有的各片领地并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对于武力征服获得的领土，帝国维持绝对的控制，但对于移民们自愿定居于其上的土地，从一开始就准备允许它们建立自治政府。加拿大已经在 1867 年获得自治。此外，当时的澳大利亚军队正与英国军队在南非与波尔人战争中并肩作战，因此，英国政府并不愿意疏远澳大利亚人民。

1900 年 9 月，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澳大利亚的新宪法，在 1901 年新年的那一天，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庆祝活动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开始。澳大利亚首任首席检察官阿尔弗烈德·迪金报告说："在长时间的全民欢腾和喧闹声中，悉尼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月夜。""在街道上，汽笛声、钟声、铜锣声、手风琴演奏的声音、吵闹声和厨房烹调器具的铿锵声混合在一起，发出了超自然的声响，淹没了所有的音乐声。"

450 万澳大利亚公民当然有许多事情要庆祝。曾在相互隔离极其遥远的孤立城镇和农场勇敢奋斗的人们，使这片孤立的大陆上的荒凉原野成为果实累累的沃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将一个地理上的实体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不列颠帝国的自治领地，他们的国家虽在防御、对外关系方面隶属于不列颠帝国，但在所有其它地方，澳大利亚人已将他们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汤姆·罗伯特所绘的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牧场主在 1 月间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奋力拦截四散的羊群的情景。这幅画绘成于 1891 年，那一年，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在关注着工业的动荡局面和经济萧条的最初迹象。尽管画中有许多过时的东西，如木制栅栏（这种木制栅栏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已经被有刺的铁丝围栏所取代），罗伯特的画却使人们追忆过去那个粗犷的、自由自在的时代，人们认为那是个逝去了的黄金时代。



美国的分裂

5

1848 年春天的一天，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小移民区旧金山的人们被这样一个场景惊呆了：一个兴奋不已的商店主手里拿着一个装满闪闪发光物的瓶子，沿着泥泞的大街奔跑着，同时还大声喊道："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这个向萨克拉门托河谷下游地区的伐木者和居民们出售粮食的商店主萨姆·布拉南并不是第一个通报这一惊人发现的人，早在 1 月里，在亚美利肯河建立一个新锯木厂的工人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有金矿，而且，尽管他们的老板竭力想在他的锯木厂完工前始终保守秘密，但消息还是传开了。然而现在，随着天气转暖，布拉南在拥挤不堪的围观者中挥舞着帽子，人群沸腾起来了。

农民和工匠们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前往亚美利肯河。学校老师解散了学生，商人关闭了商店，并在他们离弃的房门上贴了告示："淘金去了！"《加利福尼亚报》的主编宣称：由于他的所有读者都跑到了萨克拉门托峡谷，他打算停止发行此报。他不无痛心地说："田里的作物只种了一半，房子只盖了一半，除了制造铁铲和镐头外，任何别的事情都被忽视了。"这件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一地区是几个月前美国与其近邻墨西哥进行战争后刚刚获得的）以外很远的地方。附近的俄勒冈地区大约 2/3 的健壮男子如潮水般涌向新金矿所在地，来自美国东部、南美洲、欧洲的一些冒险者迅速加入了这股潮流。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有近 8 万人，乘着木制的四轮马车穿越美国西部的荒野，或是经历昂贵的长途海上航行，来到这块土地上。

在淘金时代的早期，一些冒险者们拼命地工作，能够在一周内赚取数千美元。大多数采矿者们的发现不那么乐观，但他们仍然能赚到使用任何其他诚实手段也赚不到的钱财。平均每天的黄金开采量大约是 30 克金矿粉末，其价值是东部劳工们一天工资的 20 倍。但想发财的人不必一定去卖力挥动镐头或去河里淘金。那些制造镐头、铁铲、滤网和矿井口绞车的工匠们为了满足需求而奋力地工作。一些狡猾的商人则经营一些欺骗性的小发明，如所谓"探金尺"，他们极力宣传说，这种东西十分可靠，能使人们不必冒险或劳累就能找到珍贵的黄金。有胆识的商人们到金矿现场开设零售商店，能随意抬高物价；而他们的那些住在采金区外的同行们，要骑上骡子或马走整整两天的路才可以到达金矿，就没有这种优势。有故事传出

在塞缪尔·科尔曼画的这幅图中，一队木制四轮马车在通往落基山脉的途中，在怀俄明州的梅迪辛博河浅滩涉水过河。通过这种理想化的艺术形象，那些艰难的拓荒者们成为开发美国西部的象征，与那些掳掠成性的印第安人及好战的牛仔们一起写进了美国民间传说。到 19 世纪末，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使这块土地发生巨变，这些艺术形象增加了人们对古旧事物的怀念。



到1861年，美国所得的新领土已经扩展到大陆西端（见上图）。由于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各州（涂绿色区）与工业化北方各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年，在东部（见附插图）爆发了武装冲突。然而，即使是内战的创伤也未能减缓人们移居西部领地的进程。联邦一些新州的形成，使美国西部的边界很快发生了改变。

来说，在采金地，矿工们得用一口袋金矿粉去换一个鸡蛋。

由于淘金热在1849年达到顶峰，因此，这些成群结队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们后来被称为“四九淘金者”。但黄金并不是吸引那些移民由联邦原有的各州出发，跨越横亘于美国大陆中部的大河谷、大草原、沙漠和山脉地区向西部进发的惟一魔力。1845年，一位政治记者曾预言，“上天注定了美国领土要囊括整个北美大陆”，而各个党派的政治家们都把这一段话奉为信条。

通过谈判、战争或对牧民们占地行为的认可，美国已经逐渐将北美最初13州边界以外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外国竞争者的力量排挤了出去。在西北部，英国和美国在1846年达成了协议，沿北纬49度划分俄勒冈的延伸地带，对墨西哥战争的胜利使联邦进而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及新墨西哥。现在只有土著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在美国现有东部各州到太平洋东海岸之间的地区。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扩张的势头还在美国社会内部激起了另外一些潮流。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因素是那些以黑人奴隶劳动为经济基础的一些州和憎恨奴隶制的州之间的争论。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后的十多年里，美国大陆东部地区的南方各州声言要从联邦中分离出来，南部各州和北部各州的军队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内战，这次内战夺走了62万人的生命。但这次战争的结果确保了北美共和国的统一，并且给西部地区的发展释放出了新的活力。到1890年，对国内印第安人部落的限制也最终被打破了。“边界”——划定固定区域的界线——不再存在了。由于将大量的资本用于工业、交通和信息建设方面，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在大陆两端，美国国民们以一种自豪而又热情的态度正视着整个世界。

鉴于北美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已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河谷，最后到达太平洋海岸，那些迫切需要土地的人们开始沿着猎人们、矿场的看门人、商人和淘金者开辟出的这条道路向西方移民，形成一股移民浪潮。这些将来的农民（他们原是东部各州不安分的本地人、从欧洲新来的野心家等）把他们的全家以及他们的希望塞进又长又窄的帆布篷木制马车里，结伴而行；为了安全，这些马车都被联成长长的一列。最富有的人可能拥有三到四辆这样的马车，车里装满了工具、食物补给和为西部新家准备的家具，其中有床垫、厨房用具及旅途中能用得上的各种其他用品。系在马车上的一头奶牛可以提供鲜牛奶，精明的家庭主妇们很快注意到，马车与车辙凹槽的撞击，能够使她们将一桶奶油充分搅拌制成黄油。穷一些的移民们仅仅只有一辆油布封顶的牛车，车上仅装有几袋粮食、一些工具，或许还有一些换洗衣服。

靠着这样简单的装备，加上路途的条件以及天气情况，这些跋涉者们一天可望行走2至10公里。泥泞的道路，或者仅仅是由于道路的崎岖，迫使这些旅行者们不得不抛掉一些财物，好使车马能继续前进。当一个到达了加利福尼亚的“四九淘金者”听到他的先驱们告诉他哪些物品应该抛弃



1849年淘金热时期的一个憔悴的采矿者，正在加利福尼亚一条山间溪流的浅滩上看着他锡盘里闪闪发光的黄金。用淘盘法淘金是很耗费时间的，矿工们很快发明了更为复杂的装置，如一种装有过滤器的摇动的木盒，这种过滤器能把碎石里的重颗粒分离出来。到1853年，则由一群群矿工用高压水力喷枪冲刷河岸的砾石，使之流入下面的淘金盒里，金子就是在淘金盒里分离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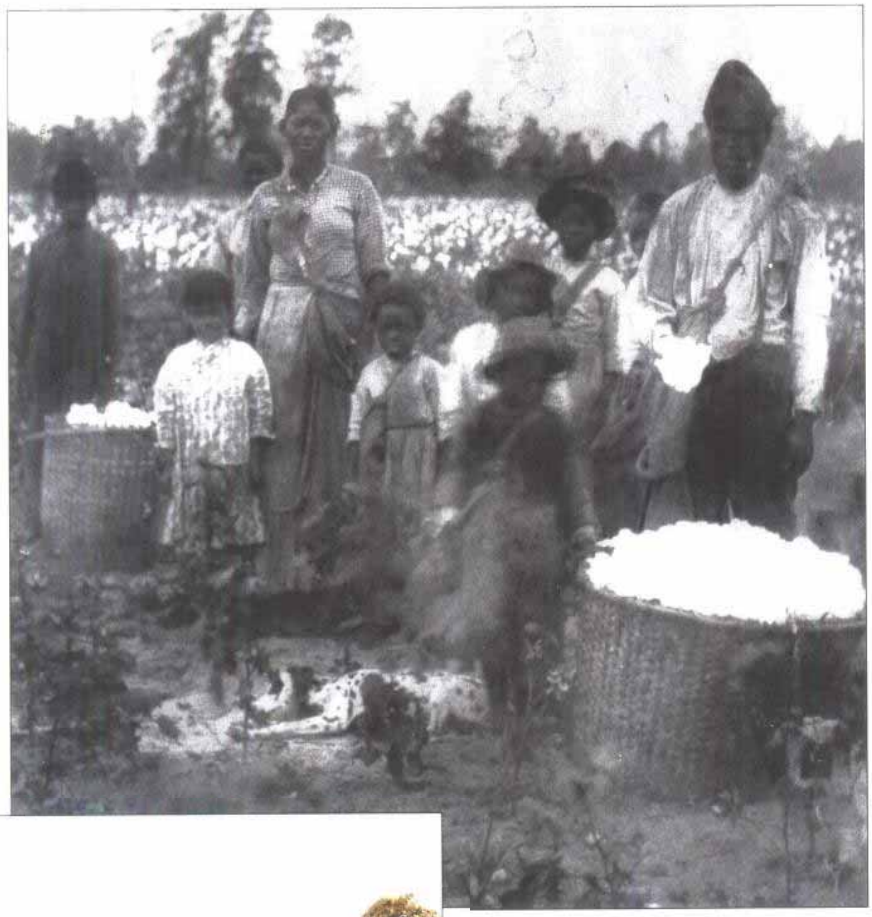
时，竟然感到莫名惊讶：其中有“洗金器，大头针和缝衣针，扫帚和刷子，牛皮鞋和马靴，鞋楦和皮革，玻璃珠和玳瑁，竖琴、戒指和手镯，便于携带的镜子和书，印花汗衫和熟丝衬衫等”。尽管路途如此严酷，最坏的问题却是长达一个月的乏闷旅途。“我不懂，”加利福尼亚边界上的一个拓荒者抱怨道，“全能的上帝制造这么多地方是为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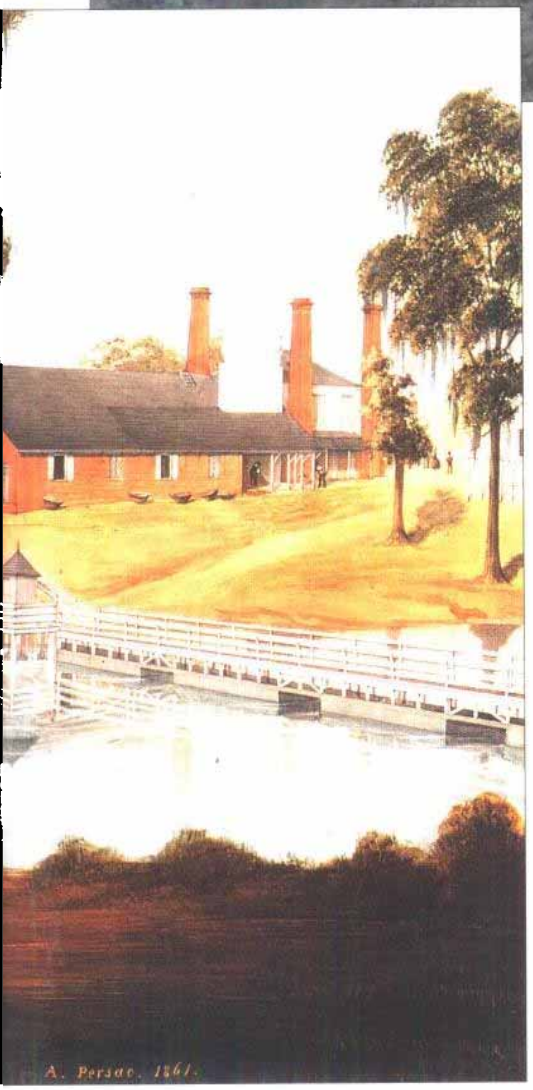
在那些最早和最狂热的西行者中间，有一些是摩门教信徒，摩门教是一个将基督教教义美国化的新教派。这些教徒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这些信仰中包含了一种回到圣经家长制时期一夫多妻制实践中去的思想，因此他们被凶恶的暴徒们赶走，离开了自己在东部的家园。1846 年他们发动了一次谨慎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移居到了盐湖城盆地的荒漠地带。由于其宗教情绪的力量和其领袖布里格姆·杨的领导才能，他们在两年近乎饥荒的生活中幸存了下来，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在其新家园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种植了第一批农作物——蔬菜和谷物。

一位作者于 1845 年为这些西行移民写了一部指导性手册，为他们描述了一幅极其光辉灿烂而又诱人的“持续发展的，有着全球性企业以及前所未有的商业活动的巨幅宏图……那些肥沃的山谷因承受不住它们丰富的

1861 年的一幅画上，南方的绅士们在一条宁静的河边散步，孔雀在路易斯安那大厦前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美国南方各州的约 900 万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得起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许多白人也只是拥有几百公顷土地的贫苦的小农场主，而在种植烟草、甘蔗和棉花的大种植园里，则有大约 400 万黑人奴隶在从事劳动(对页)。







产品的巨大重量而呻吟着；那些大河里将有数不清的汽船……整个国家将被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和运河联系起来”。作者的梦想不久以后真的实现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大为拓展的新地区，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及联邦政府本身，都以极大的热情去建立广泛的交通系统和信息网。新的技术改进了水陆旅行的条件：人们所掌握的用碎石铺路的新技术，铺就了光滑平坦的公路，使车辆能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正常通行；强有力的蒸汽发动机驱动着船只在河道上及新开凿的、联系着纽约城和西北部地区的运河中快速航行，蒸汽机还使满载货物和乘客的火车穿越了美国的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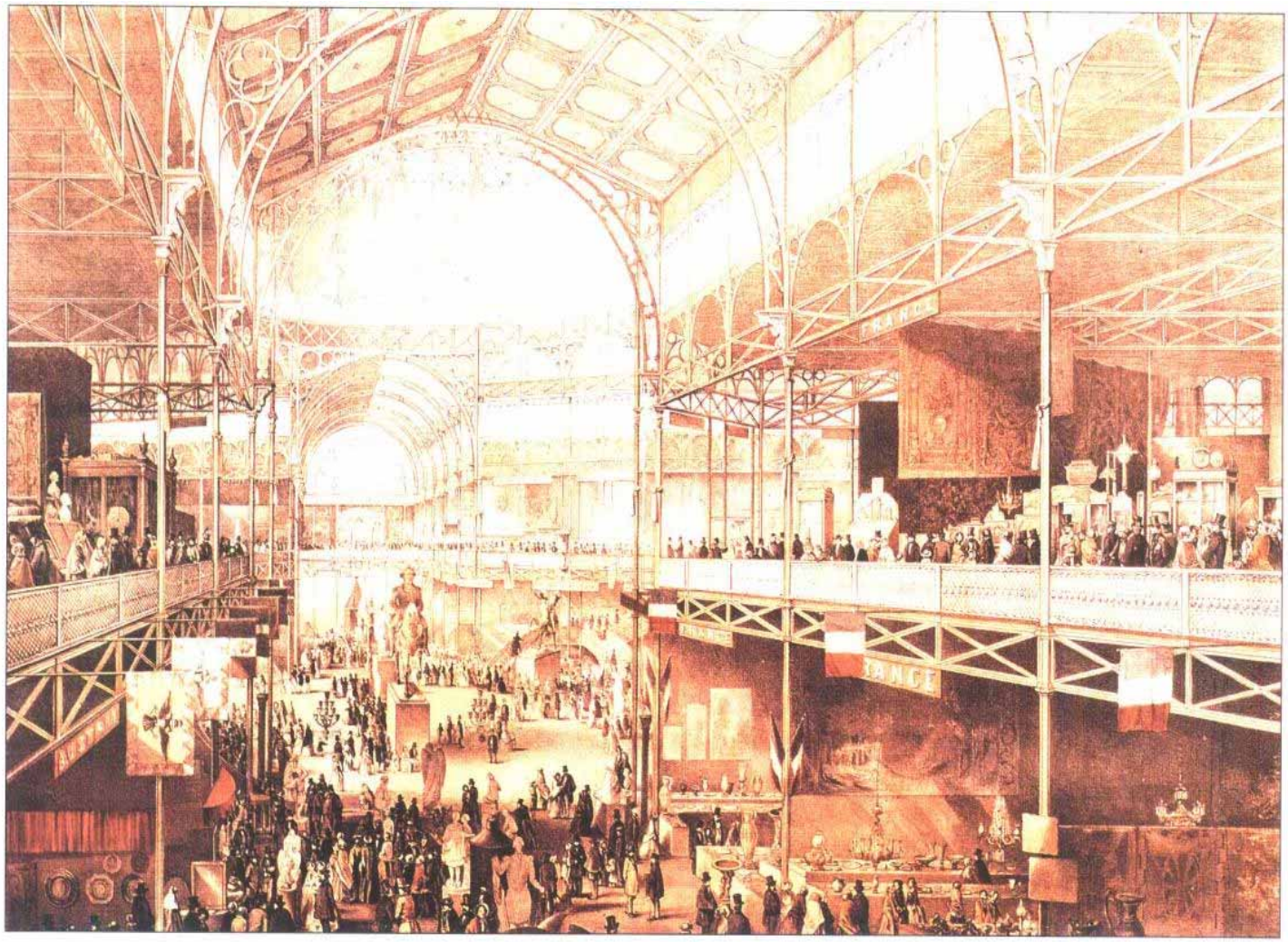
无数钢铁大桥横跨水面，在巍巍群山间，人们用威力极大的炸药炸开了火车通行的隧道。到1850年，美国铁路公司已修建铁路1.4万多公里，在随后的100年间，铁路又增加到大约5万公里，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庞大的铁路系统形成了。过去，从辛辛那提到纽约的运输需要两个月，而现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完成。而且，随着铁路的发展，电报网也建立起来，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了。美国发明家萨姆尔·莫尔斯发明的电报，自1844年以后，将有关订购、价格、供给和需求等方面的数字，在一瞬间内传遍整个国家。通过这种比军事征服和外交谈判更为有力的方式，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控制横贯美洲大陆的整个疆域。

由于农业和商业企业的繁荣，美国的贸易据点已经深入到诸多小镇，西部地区的新市民开始注重制定法律和建立政府的问题。从堪萨斯到加利福尼亚，各城市的领导者都起草了自己的宪法，以争取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从1815年到1850年间，联邦平均每3年接受一个新州。世界其他国家惊奇地看着它们眼前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庞大：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美国已超过了它以前的母国英国，变成了西方世界三大人口稠密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原有的强国——法国和俄国，1840年，美国国内仅有1700万人口，到1860年，人口数就已急剧膨胀到将近3200万。

最密集的人口仍然集中在美国北部拥挤的城市和繁荣的小镇中，此处所谓的北部，是指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界上的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各州，这条线是以18世纪最早发现这个地区的人而命名的。

交通革命使偏僻的乡村脱离了低水平的经济生活：农阿华或密苏里的农民们现在能够把他们的庄稼或牲畜卖到很远的市场去，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新泽西或马萨诸塞工厂批量生产出来的廉价工业品。北方城市不仅是工业生产的中枢而且是经济中心。在这里，大资本家和银行家们联合起来，协商着共同经营之大计，制定着能够影响到千百公里以外的美国人生活的投资计划。

南部的种植园在此期间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供应市场的75%，烟草生产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棉花和烟草与南方其他一些重要的农作物，如南卡罗来纳的大米及南路易斯安那的蔗糖，占有美国出口量的3/5。但是，棉花种植区的大贵族地主是在用中世纪贵族的专制统治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种植园，这个地区的小农场主几乎享受不到北方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所能够提供的改善经济环境的机会。南方没有几家工厂，也很少吸引投资，没有州级学校体制，仅仅只有一小部分铁路和信息网。而且，南方从事其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方式与北方各州有着深刻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并不在



图中是参观纽约克利斯托尔宫展览时熙熙攘攘的人群，该展览会于1853年开幕，展出了美国生产的种类繁多、品种丰富的商品，其中大部分产品由北部工厂生产。外国参观者对美国机器生产的精密仪器如枪机、钟表及手枪等印象尤为深刻。两年后展览关闭，这座楼房仅仅在半小时的时间里就被烧为灰烬。

于南方是否存在主要工业和中心城市，而是在于，南方的农业经济是以黑人奴隶的无偿劳动为基础的，这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在南方农场主（不论是靠自己辛勤劳作的小土地持有者，还是占有数百名奴隶的种植园主）看来，在经营土地时不使用奴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奴隶制将被引入新西部的可能性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两种观点的冲突，使美国面临着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最后导致了美国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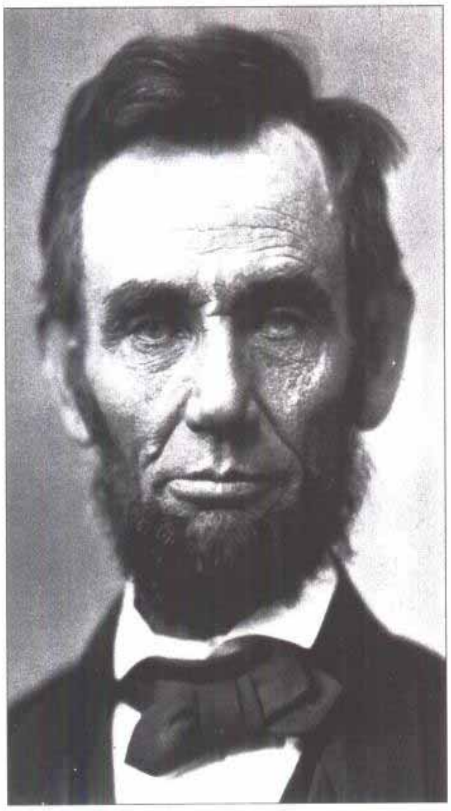
在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在上升。大多数北方白人也像他们的南方同胞一样，怀有种族偏见。但是在“人权”、“自由”这些曾激励着共和国创建者们的理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北方人并不赞成应该使一个种族对另一种族行使无限权力的主张。由于一些反奴隶制度的文学作品，如西奥多·韦尔德于1839年出版的多次重印的畅销书《美国的奴隶制度》和哈里特·比彻·斯托夫人1852年出版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发行，使北方的市民们知道了美国还有这种落后的不公正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可以像牲畜一样卖掉。这些作品表明，尽管个别奴隶主也许是仁慈的，但奴隶制这种制度本身是非人道的。韦尔德引用了南方报纸上一则典型的广告：“出售黑人。女，24岁，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另一个3岁。单卖或一起出卖视买方意愿而定。”

但是对奴隶制的反对除道德原因外，也同样有其经济原因，特别当北方人关注着正准备成为州的西部领地的时候，尤其如此。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工作多，劳力少。北方移民担心南方人将带入一些不必支付工资的奴隶，这就会使自己面临不公平竞争。反过来，新迁入的南方人则反对北方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害怕北方人会迫使自己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他们通常不如北方对手富有，但他们拥有的奴隶却往往是其惟一的经济资源。

在国会中，南北各州的代表们就西部领地进入联邦的条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激进派主张取消奴隶制，而反对派则认为，各新建州的居民应该有权利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在本州内允许奴隶制存在。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并不全是北方人，实际上，南方也有敌视奴隶制的；同样，也有北方人反对联邦政府限制奴隶制的任何努力。经过多年尖锐的争论和幕后谈判，人们有时能达成协议，但随之又将其推翻或加以修订。

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决定，各州和各领地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在本州保留奴隶制。一年内，这种自决权就引发了一场危机。注定要变为堪萨斯州的地区成为护奴派和废奴派两大势力的中间地区。两派各自组建了政府，双方的暴力分子间发生了冲突，策划了暴动，还暗杀对方的首脑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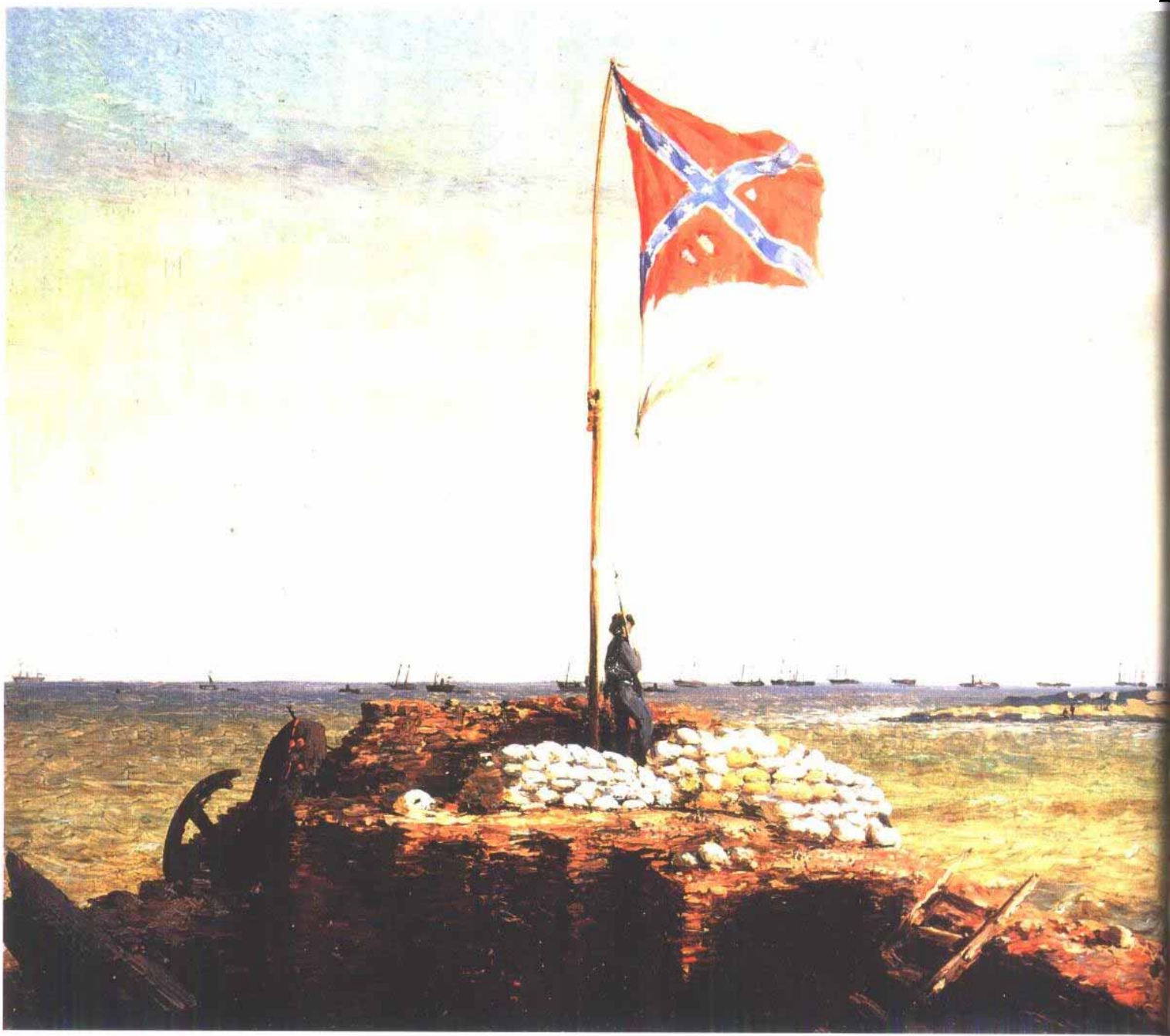
骚乱向东蔓延到美国的首都。在那里，南北方立法者们唇枪舌剑，就



这幅林肯照片摄于1861年，即他当选总统两年后。从照片上可看出林肯面临着严峻的压力。以正直和高度理想主义而著称的林肯宣称：“如果奴隶制无罪，就再也没有罪恶了。”但同时他也承认：“若我们处于南方诸州的地位，也会像他们一样。”当美国南北方发生分裂时，林肯则以重新统一共和国为自己的目标。

在一名孤独的哨兵的守卫下，一片破旧的南方联盟旗帜在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要塞中被摧毁的战壕的掩体上空飘扬。此要塞在南部七州宣布脱离联邦两个月后——即1861年4月被南方夺取，标志着内战开始。士兵画家康拉德·查普曼在派来封锁南方沿岸的联邦舰队的炮火下画了这幅画的草图，此图背景上的船只就是这支联邦舰队。

"堪萨斯血案"互相指责　1856年5月，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对护奴派进行了长达两天的猛烈抨击，他谴责南方人图谋"强奸西部这块处女地，强迫她投入可恶的奴隶制的怀抱"。演讲四天后，萨姆纳在参议院受到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的猛烈攻击。布鲁克是一位参议员的侄子，他的叔叔尤其受到萨姆纳的辱骂。布鲁克为维护其叔叔的名誉对萨姆纳进行报复，野蛮地用顶部镶金的手杖猛击萨姆纳，使他受



了重伤，3年以后才得康复。“我给了他大约30下最重的鞭挞，”布鲁克回忆道：“到最后，他竟像小牛一样吼叫起来……我的手杖完全打断了，只剩下手杖柄。”

反对奴隶制的立法者很震惊，但他们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说，这种行为是一个惯于用皮鞭加锁链行使权力的南方奴隶主的典型行为。然而奴隶制的拥护派们几乎不掩饰他们的心满意足。在南部许多地方，布鲁克像英雄一般被人赞美，奉承的信件雪片一般向他飞去，为了取代那根打断了的手杖，人们还给他寄去金子包头的手杖作为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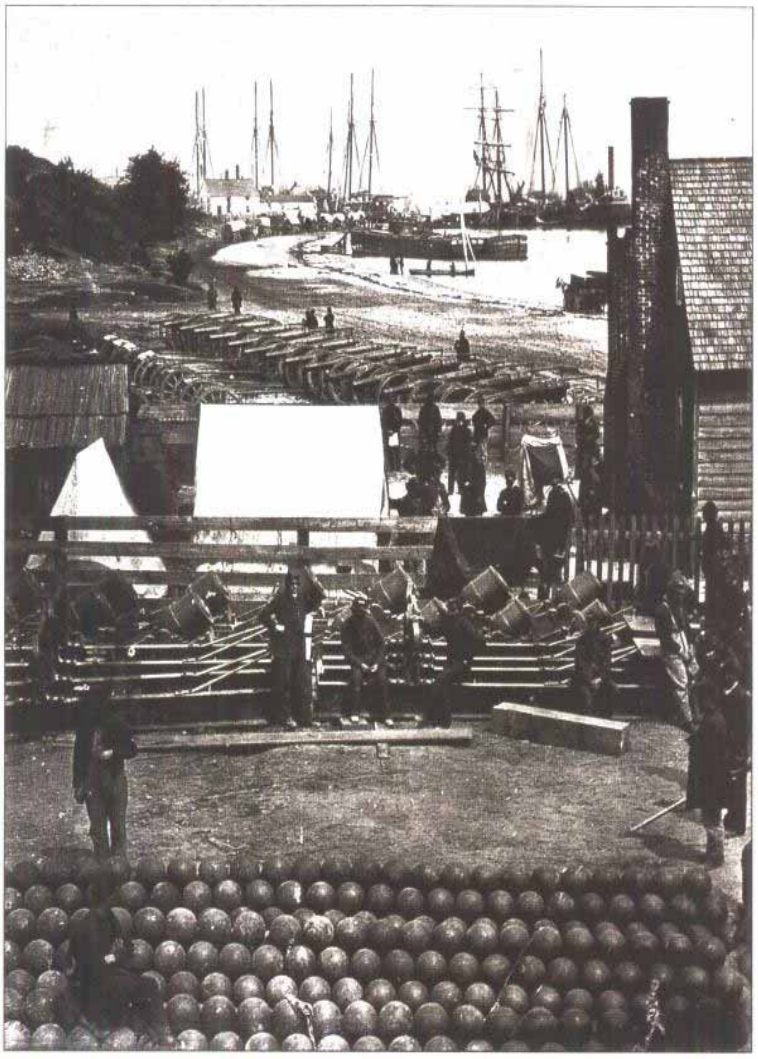
奴隶制问题成为南北方分裂争端中最紧张的问题。废奴主义者对《逃亡奴隶法》这类妥协性立法日益敌视。《逃亡奴隶法》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西部领地以自由州而非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时为安抚南方奴隶主而通过的。此法规定，即使逃亡奴隶已经设法进入北方自由州，仍是其主人的财产，并且允许奴隶主派遣代理人追回其丢失的财产。在此法案规定下，当一名叫安东尼·伯恩斯的逃亡奴隶被捕获并经北方城市波士顿送回南方时，波士顿市民将镇中建筑蒙上黑色，并在教堂里敲起了丧钟。军队排列在街道两旁，以防伯恩斯乘船驶往南方前被人解救出去。

1857年，当法庭对德雷德·斯科特的奴隶诉讼案作出一项涉及宪法问题的判决时，更激怒了那些废奴主义者。斯科特原为奴隶，19世纪30年代，他的主人（一名军医）曾将他带出了南方，在北方居住多年后，他要求其主人的遗孀允许他获得自由。经过长时间的一连串的法庭审理和上诉，此案最终交由美国最高法院即共和国最高司法机关来审理。但这个法庭是由多数南方法官所控制的，最后判决是：斯科特是黑人种族一员，不是公民，因此无权受共和国宪法的保护。

1859年，反对奴隶制的英勇斗士约翰·布朗，率领5名黑人和17名白人攻打弗吉尼亚州哈普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火库。他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以发动一次广泛的奴隶起义。但是其计划失败了，布朗也被绞死。像布朗一样同情黑人的许多人称他为殉道者，但是对于南方来说，布朗的突袭是南北方分裂进而深化的又一象征。现在一些南方人相信，联邦已“老”而不中用了，南方和北方人民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兴趣和不同的愿望，它们各自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召开会议讨论脱离共和国的可能性。一位佐治亚州分裂主义分子宣称道：“我们要么留在联邦内当奴隶，要么脱离联邦而做自由人。”



1860年的总统竞选是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完成的。早在两年前，两党候选人曾在伊利诺斯州竞选参议院议席时对垒。在那场竞争中，民主党候选人斯特芬·道格拉斯击败了其对手共和党的亚伯拉罕·林肯，因为人们认为道格拉斯只是反对联邦政府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各州，而不是支持奴隶制度本身，而林肯则是伊利诺斯州一名成功的律师，他持坚决的反奴隶制立场。现在许多南方人警告说，如果共和党获胜，脱离联邦可能是他们的惟一出路。



在弗吉尼亚岬城的联邦军火库，野战炮和军火弹药等待着运往前线。北方的工业实力使联邦军队在军械上远远优于南方联盟部队，后者不得不冒着联邦海军炮火的封锁从英法购买军事供给。

林肯当选总统后一个月，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几星期内，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紧随其后。在许多地区，最好战的分离主义者并不是拥有大种植园的保守的显赫人士，而是穷困的只能勉强度日的农民。他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公民权，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北方对这些州脱离联邦的权利进行质疑。“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林肯宣布道，“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少数人是否有权在他们选择的任何时候分裂政府？”

1861年2月，7个脱离州的代表给出了回答——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他们起草了成立新的南方联盟的计划。这个联盟将拥有自己的国会、宪法和政府。新共和国建立的前提是其公民有权拥有奴隶，黑人种族是劣等种族。联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宣称：“它奠基于以下伟大的真理之上：即黑人、白人不平等；奴隶制……是天然的、正常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新政府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这种自然的、哲学的和道德的伟大真理为基础的。”当新当选的联盟总统、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出现在蒙哥马利的街道上，面对欢喜的人群致辞时，等候的乐队奏起“迪克西”这一流行旋律。这一曲子将成为南方联盟非正式国歌。戴维斯向听众宣布：“妥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南方决定保留它的地位，让所有反对它的人来尝尝我们武器弹药的厉害吧！”

戴维斯并非说说而已。当其它南方各州在考虑着脱离联邦将意味着什么这一恼人的问题时，当北方人在辩论是否为保持联邦统一而战斗时，南方联盟已开始进行军事准备。4月12日破晓前，南方军队炮击驻守在南卡罗来纳萨姆特要塞上的一支孤立的联邦守军。炮击持续了33小时，直到指挥官投降。

林肯总统立即作出反应，他召集了7.5万名联邦民兵临时服役，并宣布要镇压叛乱。几周内，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州宣布脱离联邦加入南方联盟。现在，林肯和戴维斯都清楚，他们之间发生的争执已经不是短期的内政分歧了。

卷入冲突的双方都没有能充分作好战争的准备。联邦政府只有一小支步兵，其中有许多南部出生的军官和士兵，在战争一开始，他们就退出来加入了南方联盟。在美国西点军校受过训的军官们开始用他们在课堂上学

到的战略和策略来与旧日的同窗作战；那些在墨西哥战争中曾第一次尝到打仗滋味的职业军人有可能在瞄准器的另一端发现过去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双方军队主要依靠的都是临时应征的志愿军。

在联邦政府一方，小镇的民兵和新组成的城市大部队联合在一起，其中有许多人完全由移民组成，他们把自己家乡的战斗习俗和传统带到了这里。除了来自纽约的完全由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苏格兰兵团外，还有完全由爱尔兰人和完全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兵团。南方联盟在萨姆特要塞陷落时已集合了一支由6万名志愿兵组成的军队，但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武器装备各不相同；受过锻炼的部队老兵和那些用杀猪刀及射杀松鼠的猎枪武装起来的来自山区的男孩子们一起行军。那些自己有马的士兵们带着马参战，组成骑兵队或组成用马拉炮车的炮兵部队。许多贵族的子弟带着自己的奴隶们参战，由奴隶们为他们做饭或擦拭武器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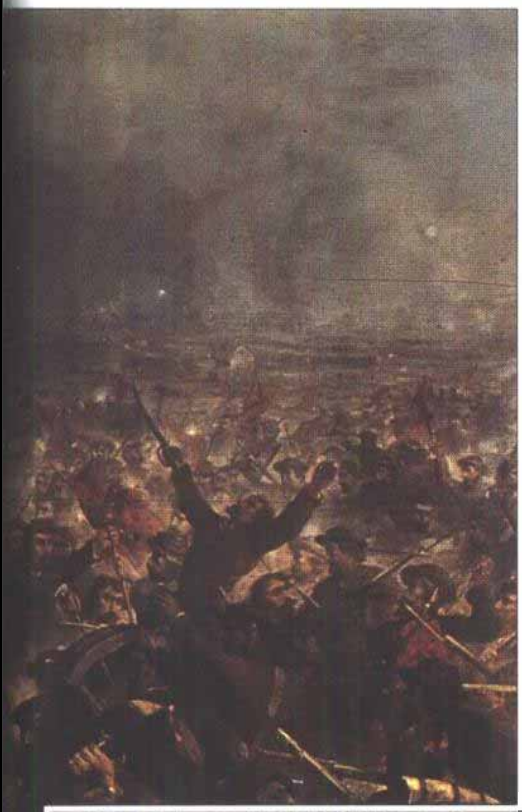
南方联盟的新兵们第一次接受战火的洗礼。拿起武器为南方联盟而战斗的军事志愿者与北方军队的数量比例几乎超过了2：1，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保卫家园及亲人而战”，这一现实需要是他们从军的力量所在。



南方人狂热地相信，他们是在为维护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斗，但由于供给和武装方面的原因，他们在一进入战斗时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1860年，北部生产的武器和军火占全国军火生产总数的97%，还有绝大多数的纺织品、靴子和鞋等物品；而且北部有比南部先进得多的铁路、公路和运河系统，拥有能改善和扩大这种交通网的工业技术。为了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南方联盟的领导们提出了建立工厂的规划并派人到国外购买军火及供给。南方联盟希望从英国获得一定的援助，据称，如果战争的混乱状态使美国南部的棉花不能运抵英格兰北部的纺织厂，英国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动摇。负责将民用船只改建为战地用船的詹姆斯·布洛克则劝说英国的造船厂准备新的铁壳船只，以准备为南部新建的海军服务。

当双方正努力使各自的经济立足于战争的需要时，将军们开始提出他们的战略计划。北部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提出了所谓的“蟒蛇计划”，即像蛇那样缠住南部军队，使之窒息。也就是说，不是直接侵入南部进行破坏，因为那样会使





联邦在战后耗费大笔钱财来修复战争创伤，他建议切断通往南方的水路，使军舰形成的封锁线阻止欧洲的供应船只沿大西洋海岸登陆，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支炮艇支队和陆军组成的警戒线将从西侧包围南方联盟。但北方政治家和民众对这一计划不满意，他们要求采取更有力的进攻行动——实行一次迅速的突然袭击，以镇压叛乱的南方。

南方联盟的总指挥提出了一种被杰斐逊·戴维斯称作“进攻性防御”的战略。他们希望联合所有的分散力量，集中打击敌人的任何一次入侵，同时再发起一次使北方处于防御地位的进攻。但是要使策略有效，就需要说服那些处于南北方交界处的州加入它们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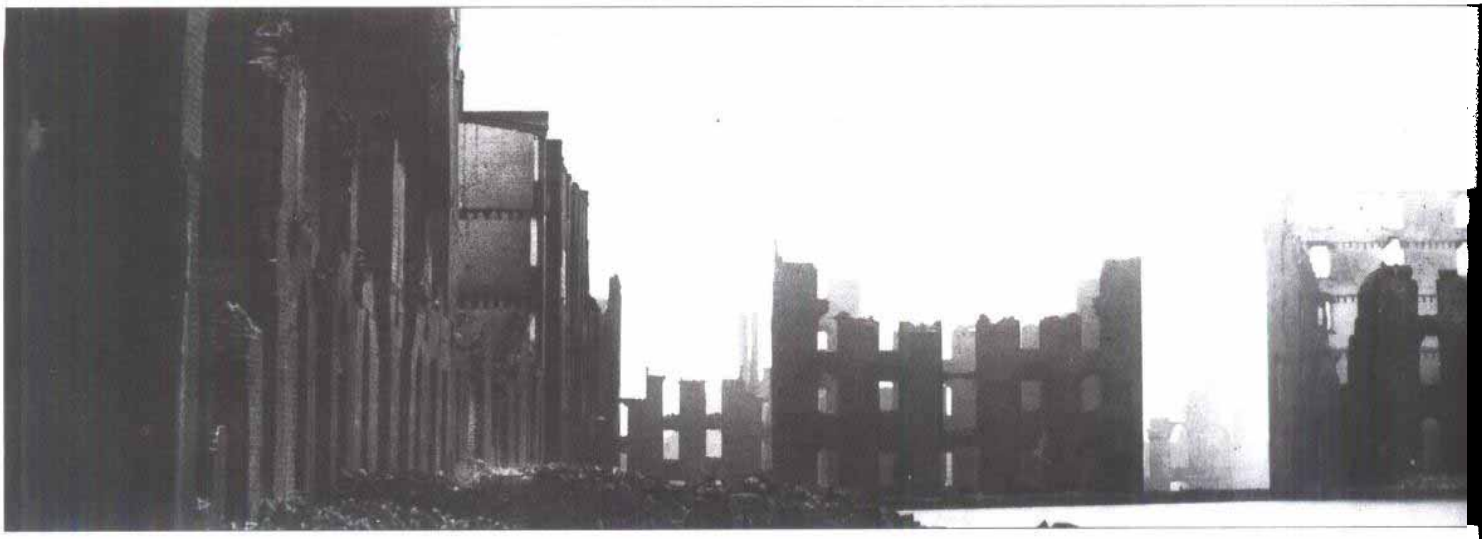
马里兰、密苏里、肯塔基三州在历史和文化上与南方各州联系比较密切，但从经济上考虑，他们又反对脱离联邦。马里兰州是联邦军队进军南部的通道，在战略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怎样，它都是许多联邦政府支持者的家园，这些人认识到他们的财富将依赖于同北方的交流联系；然而，将近三分之一的马里兰白人却在战斗中站在叛军一方。在密苏里，一个支持南方联盟的派别建立了自己的立法机关，但是这些脱离主义者很快被逐出了这个州。大多数密苏里白人都在北方联邦的军队中参战。肯塔基州与三个奴隶州及三个自由州交界，于是保持了一种不稳定的中立状态，有时甚至居中调停。但在年底以前这里将成为战场，被双方军队所占据。这个州的立法机关仍是亲联邦的，但他们的州长和其他政治家却脱离出来成立了隶属于南方联盟的临时政府。甚至连弗吉尼亚这个南方联盟的政治中心——里士满所处的州，也因内部分歧而分裂了。该州西部大部分郡不愿意加入脱离主义者一边，它们自己分离出来并成为联邦一个独立的州。





彼得·弗雷德里克·罗瑟梅尔画出了1863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发生的葛底斯堡战役的详细情景。一位联邦士兵挥舞着步枪的枪托，抵挡南方士兵步枪上的刺刀。经过3天激烈恐怖的战斗后，据统计有5万多人失踪、受伤或死亡(上图)。联邦的胜利阻止了南部军队侵入北部的最后尝试。第二年11月，在该战场上建立公墓时的一篇献辞中，林肯总统宣誓道：“这些逝去的人们不应无谓地死去。在这个由神的旨意而建立的国家，自由将会获得新生。”

口头上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861年7月，即南方军队进攻萨姆特要塞后的三个月。战斗在弗吉尼亚南部一个南方联盟称其为马纳萨斯，北方军队称其为布尔溪的地方打响。许多北方人曾相信他们的军队只需进军弗吉尼亚，就能将南部这群叛乱的乌合之众打败。但这些乐观主义



南方联盟首府里士满城内，烧毁了的仓库残垣像墓碑一样耸立在那里，这是联邦军队于1865年4月3日占领该城后烧毁的。两天后，当林肯走在满是废墟瓦砾的街头时，成群的新获自由的被解放奴隶在欢呼声中将他包围了。

者很快从他们的自满情绪中惊醒。南部军队成功地挡住了联邦军队的反复进攻；当北部军队开始感到疲乏，援兵也没有来到时，他们被一次猛烈的反攻击溃了。南方联盟的军队第一次朝着他们的敌人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这就是后来所知的“叛乱者之吼”，迫使他们惊慌失措地退却，1200多名北方士兵成为战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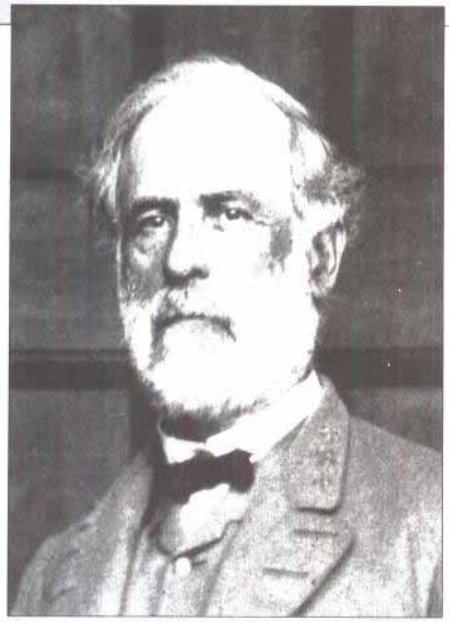
与内战期间的其他后来的战役相比，这次战役中双方参战者和伤亡者人数都不多，但在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给予南方军队的精神鼓励却是巨大的。从弗吉尼亚到亚拉巴马，报纸的编辑们大肆渲染这次胜利，并驱使南部军队毁灭北方的城市，他们宣称北部军队是一支挥霍浪费的军队。里士满一家报纸载道：“对整个美国大陆的统治，现在应该不加限制地转到更有才能的南方人手里”，“不能胜任这个帝国统治的北方佬倒台了，统治国家的力量就在南方。我们不得不接管国家的统治权。我们必须掌握我们新的命运”。

在北方军队里，大多数人们的热情冷却了。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还没有被摧毁。林肯总统下令部队征兵100万，服三年兵役。从农村到工厂小镇，志愿军们蜂拥而至。对南方的战争变成了一次“十字军”讨伐运动。

北部制造商和金融家们加倍地努力，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广告劝说个人和团体购买战争债券，这能有效地为政府提供每年所需战争费用的2/3。由于男人们纷纷出发去前线作战，雇主们投资于开发新形式的机械化技术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早在战争刚开始时就已在干扰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继续破坏着美国经济：工人们抱怨他们的工资已远远低于其基本生活需要。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喧嚣声中也掩盖不了日益增长的工业方面的动乱，这将导致罢工浪潮在战争结束前席卷全国。

南部经济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局面，南部许多财产诸如土地和奴隶都处于冻结状态。当战争爆发时，南部居民手中只有大约1/10的货币在流通。大多数南部种植园主都欠着北方银行的贷款。而且，南方联盟没有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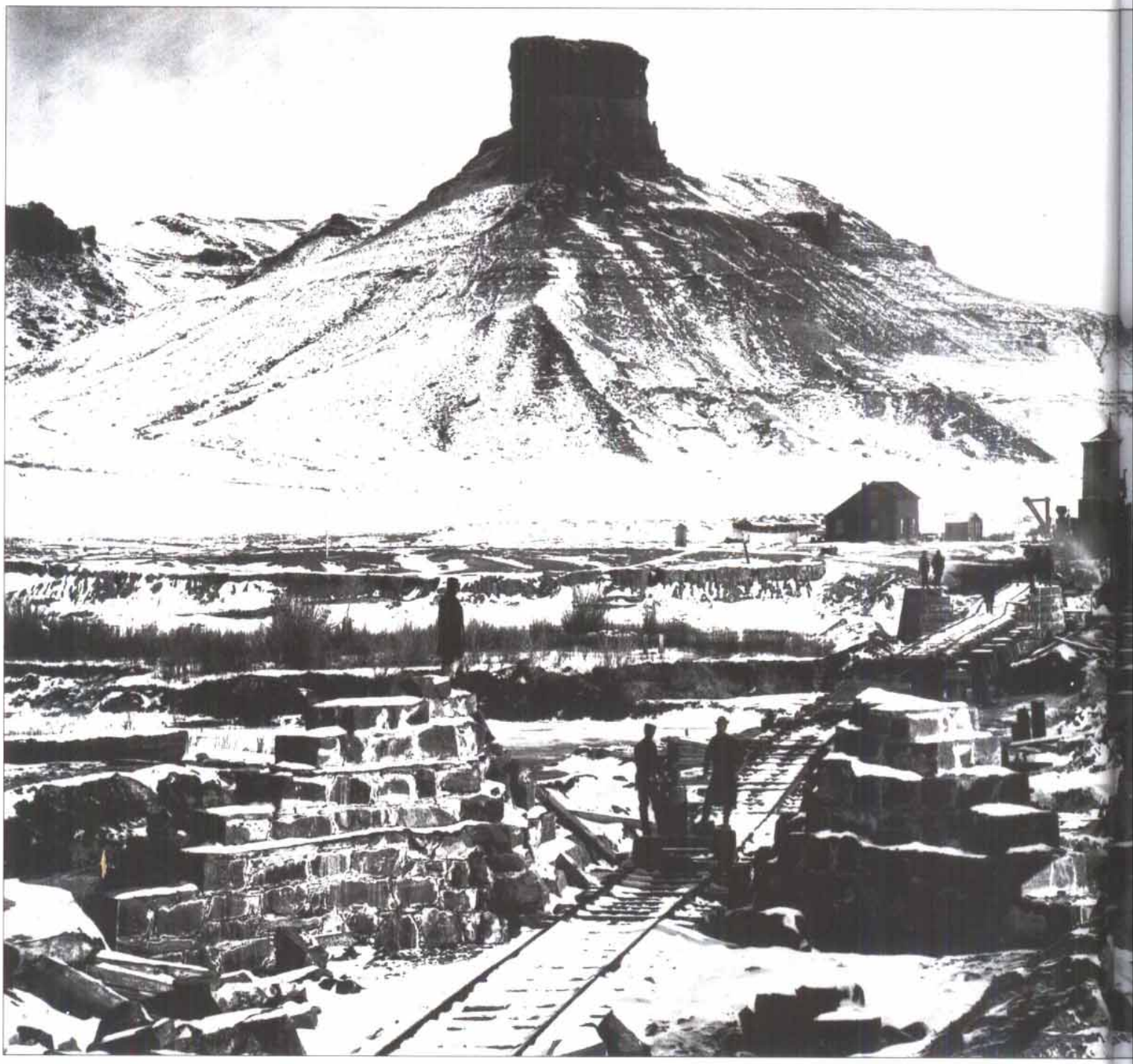
罗伯特·E·李将军照片，摄于他向北方军队统帅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后的第11天。照片中，罗伯特·E·李仍然保持着他受到广泛尊敬的风度与体面。他反对奴隶制和分离主义，但由于对其家庭出身的忠诚，使他仍成为南方最为成功的总司令。恢复其平民生活后，他鼓励他的后人以一种和解的态度来修复战争的创伤。

收体制，这里的人民（过去他们只负担极轻的赋税）会强烈地抵制任何一种税收。而在北方，战争债券已经发行而且发展势头很好，那些手头没有现金的认购者被要求以其即将收获的庄稼作经济抵押。最后，抵押物的金额总数远大于实际所应偿付的数量；南方联盟以同样的方式只收到了不到一半的资金。由于通货膨胀，南部美元的价值一天天下降，当战争结束时，它仅仅相当于其原来价值的1%。对最穷困的那些白人的打击尤其严重，尽管他们最初曾是积极的脱离主义者，但现在他们最先意识到了应该脱离这个派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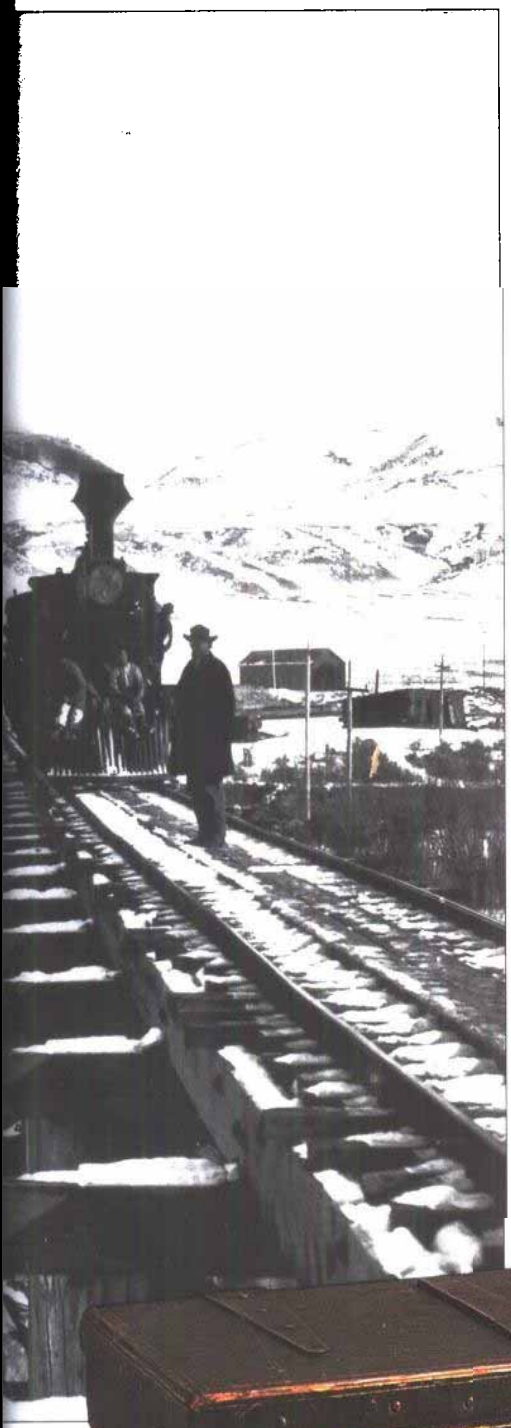
北部对南部实行禁止出口及阻止南部棉花、蔗糖和其他庄稼作物进入欧洲市场的海上封锁，使南部的经济更加紧缩。南部的反应则是建立了一支偷越封锁的舰队，由勇敢的南方人和有钱的英国士兵组成，他们把棉花运到英国，然后在船舱里装满武器和弹药向西航行运回美国。“打猎、猎野猪、越野赛马、大型围猎、打水球，每一样我都做过一些，”一个狂热的英国冒险者说道，“从事这每一种活动都会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但没有哪一件能够比得上越过封锁这么惊险！”

1862年冬天，战争转到了水上。在大西洋沿岸，联邦海军对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穷追不舍，直至将其捕获。在内陆，联邦铁甲战舰沿着大的内河水系向南方联盟的西翼进军。联邦的陆军和海军沿着田纳西河、坎伯兰河和密西西比河水路航行，直插南方联盟土地上。尽管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受到驻在沿河堡垒内的叛军们的攻击，但他们一往无前。在这条西部战线上，联邦战士在示罗战役中浴血奋战获得了胜利，士气极其高涨。在阴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双方进行了2天激烈战斗，共有2万多人在这场战役中受伤或死亡。几天后，北方军队夺取了密西西比河沿岸至关重要的出口——同时也是南部最重要的港口——新奥尔良。

但是好战的南方军队，在战斗中变得更坚强有力，加上其战斗武器的功能逐渐提高，他们仍坚持不愿屈服。在1862年的夏天和秋天，尤其在北部前线，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残杀：9月，北弗吉尼亚州的



在怀俄明州的岩城堡垒下面，一辆太平洋联邦铁路的火车头正通过一座在冰雪覆盖的河上新修起的大桥。1869 年，一条铁路将内布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联系起来，刺激了西北部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产品的运输费用，加快了运输的速度。铺路工人的工资置于车箱里的保险箱中（插图）运来，这种保险箱是 1852 年建立的威尔斯·法哥公司制造的。





南方联盟军队与波托马克河的北方军队在南方人称之为夏普斯堡而北方人称作安提塔姆的地方交战，由罗伯特·E·李将军率领的南方军队进入了联邦统辖的地区，并且占领了马里兰州的一个据点，该据点离共和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相当近。在北部守将乔治·B·麦克累伦看来，林肯总统的命令是再直接而简单不过了："消灭叛军！"

但是，麦克累伦没有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批评他的人们认为，由于麦克累伦在战略性的关键时刻缺乏果断的行动，与其说是他夺取了安提塔姆，不如说是他使自己的敌人失去了它。而且，他指挥的这次战斗的破坏性是前所未有的。据后来的估计，仅在一天的时间里，在安提塔姆伤亡的士兵总数是1812年墨西哥战争以及1898年美西战争伤亡数总和的两倍。甚至当浓烟散尽后，从战场上刮过来的血腥味也使双方意识到战争已达到了转折点。麦克累伦仅仅只是设法赶走了他的对手而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害，但南方联盟的乐观主义情绪也因此而被击得粉碎。杰斐逊·戴维斯长期以来希望大不列颠能够成为自己强大的同盟国，但现在看来，英国政府并不愿意回到看来要失败的一方中去。

安提塔姆战役后的第5天，林肯果断地发布了对南方实行道义上挑战的决定。而仅仅在一个月以前，他还在强调："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挽救联邦，既不是拯救也不是破坏奴隶制。"这一陈述表达了许多北方人所持有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解放奴隶，而是惩罚那些想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叛乱者。一些人甚至还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使黑人享有与白人同样的权利和优待，并且希望将这些奴隶送回到他们祖先的非洲家乡去；一些政治家们发布危言耸听的言论来煽动对黑奴的偏见，而且他们担心黑人聚集在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就林肯个人而言，他也曾一直对国内完全消除种族隔离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相信各种族应该分开居住，但是现在，安提塔姆一役使他清醒了。林肯意识到，只有在他确立最新目标时加上废除奴隶制这一目标，战争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在9月22日，他颁布了《解放宣言》草案，允诺废除各叛乱州的奴隶制，除非这些州能加入联邦一方。紧接着，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了正式的《解放宣言》，宣言声明：南方的奴隶将得到解放，一旦北方联邦军队进入叛乱区，就解除他们的奴隶枷锁。于是，林肯将这场内战变成了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从而得到了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列颠早在1833年就通过了它的废奴宣言，这样，它就不再可能为南方利益而进行干涉。北方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南方人的继续顽抗似乎已经是徒劳无益的

平原上的印第安人：被毁掉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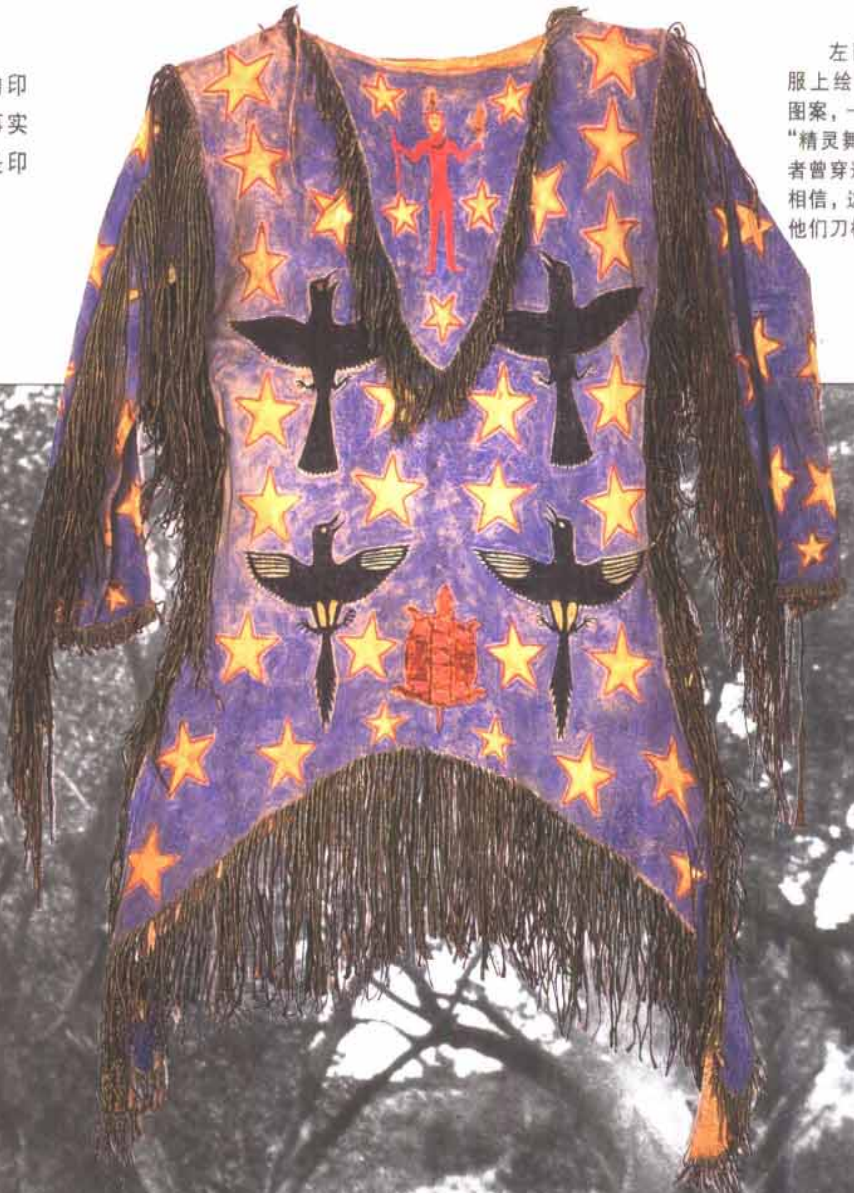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和美国西部白人移民间巨大的文化隔阂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和平共处。在绵延伸展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并向南到墨西哥的广阔的高原上，印第安人过着游猎生活，他们的房子就是野牛皮做的轻便帐篷——下图所示就是俄克拉荷马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阿拉帕霍营地。而白人本质上是农民，定居村镇，并且从印第安人手中抢夺土地，使之变成自己的居住地。

美国政府试图将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地中。在保留地中，印第安人不能猎获迁徙的野牛，只能依靠官方施舍的牛肉生活。通过使用新获得的武器和17世纪从西属墨西哥引进的快马，印第安人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游击战。1876年在蒙大拿的小比格霍恩，苏族印第安勇士歼灭了乔治·卡斯特中校率领的有200多士兵的部队。

19世纪80年代，许多印第安部落接受了一种新宗教，这种宗教宣传世界再生和死者复活。但是1890年，在南达科他州的翁由德尼湾，美国军队试图强行禁止这种宗教教徒举行一种叫做“精灵舞”的



宗教仪式而杀死了 200 多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事实证明，对付枪炮和冰冷的武器，即使是印第安祖先也是无能为力的。



左图中的鹿皮衣服上绘有幻想的神秘图案，一名阿拉帕霍跳“精灵舞”的宗教信仰者曾穿过它。印第安人相信，这样的衬衫将使他们刀枪不入。

了。解放黑奴的宣言鼓励大批奴隶离开他们南部的主人，并创了北方军队征集黑人新兵的新局面。

尽管联邦海军保持着征募各种族人士兵的传统，但在这样补充的军队中，却从来没有属于少数民族的住在北方城市的自由黑人。而现在，在13万由黑人组成的军队中，要获得同等报酬还得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斗争。在温和手段失败后，黑人士兵发起了争取工资的抗争——他们整整两年不接受一分钱工资，直到总统同意结束这种差异才结束。林肯别无选择：因为黑人的参与对于战争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次战争中，黑人军团总是首当其冲，其伤亡率也高。在南北战争期间，三分之一的黑人士兵死亡或受伤——是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白人战友的两倍。

由于北方军队数量的增加，使南方军队遭到了两次更加严重的失败：1863年夏天，南方军队对北方的又一次入侵在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战役中遭到惨败；而在西线，在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要塞，南方军队在长时间受到猛烈围攻后，被迫投降。当时的观察家们已经发现，南方军队事实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北方军队也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

1864年初，在维克斯堡获胜而受到嘉奖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被林肯任命为联邦最高总司令。当格兰特向弗吉尼亚军队的罗伯特·E·李将军发动进攻时，他的下属将领威廉·谢尔曼领导了一支突击队由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南下，一路毁坏作为南部军队补给线的铁路和公路。9月，谢尔曼夺取了亚特兰大，当地居民惊慌地逃走。

对于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北方军队和完全失去希望的饥饿的南方军队来说，亚特兰大的陷落是战争结束的信号。1865年初，杰斐逊·戴维斯开始与北方代表进行谨慎而带有试探性的谈判，想探讨一下可能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谈判时提出的一些条款表现了林肯的强硬态度：国家权力应立即交由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南方不仅要接受暂时停战条件，而且所有反联邦的力量必须立即遣送回家。戴维斯的原意是希望取得一些更灵活的谈判条件。于是战争继续进行，拖到春季，直到李将军遗憾地报告，被围困的南方首都里士满应该缴枪了，战争才最后结束。4月9日，由于供给线的切断，食物供给断绝，李将军别无选择，只得向格兰特投降，投降仪式是在里士满以西120公里的阿波马托克斯郡府举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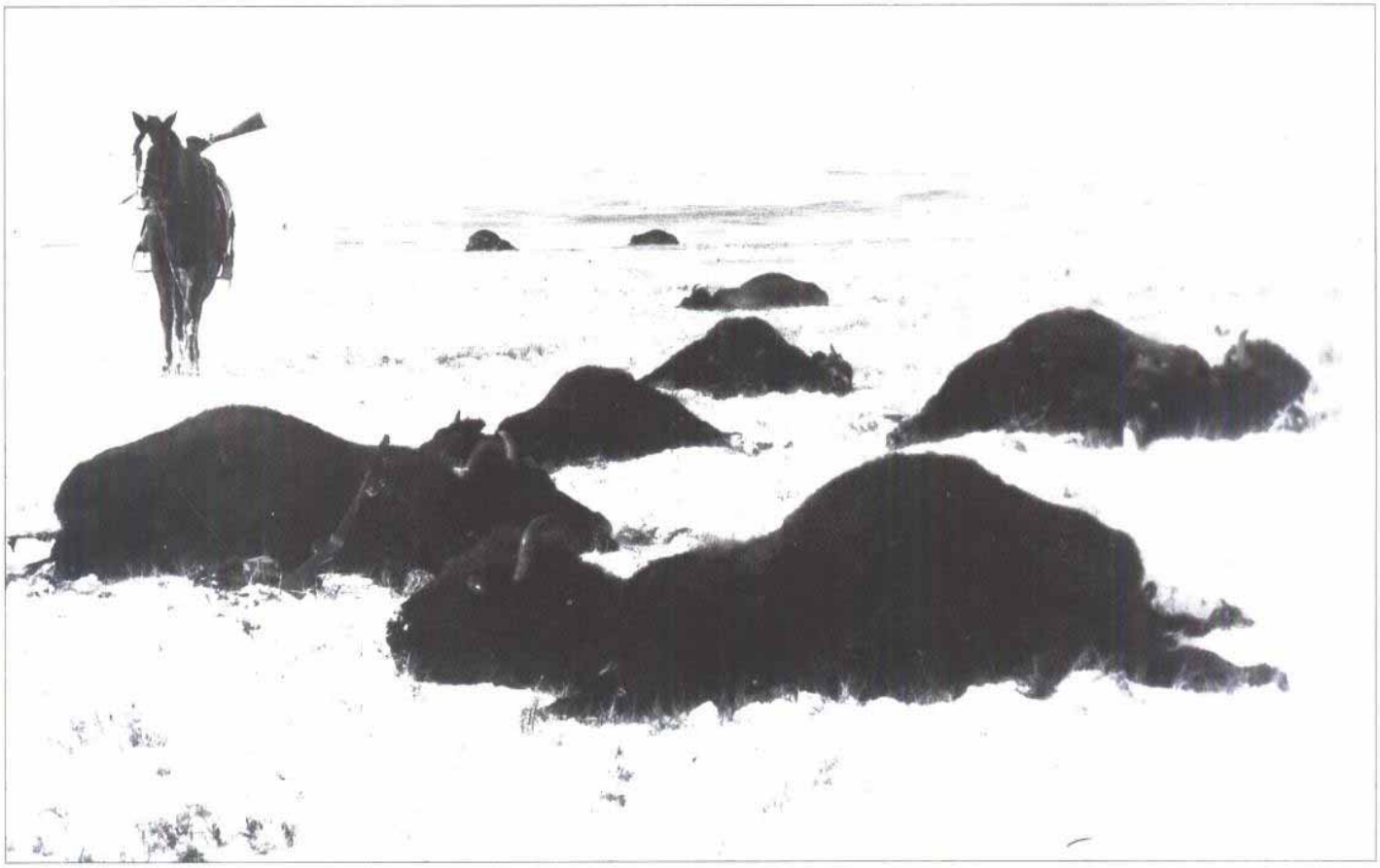
格兰特并没有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表示，“在这个曾经如此长时间如此勇敢地进行战斗的敌人失败之际”，他只是觉得很悲哀，“这个对手为了他的事业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尽管这个事业，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人最不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禁止他的军队因自满而大肆渲染他们的快乐，要求他们必须尊重他的敌人。在和平条款中，南部士兵得到了许诺，他们不会因其叛国罪而受到惩罚。为了尊重李将军个人的要求，格兰特同意南方士兵保留自己的马匹，“以使他们与其家属能度过下一个冬天”。

在阿波马托克斯郡府的仪式结束时，李将军被介绍给格兰特的印第安血统的军事秘书，他说："很高兴，我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们都是美国人，"秘书回答道。几天后，当南方联盟的军队士兵们走进联邦的营房，放下他们的武器和旗帜时，这种同胞的情感以一种感人肺腑的方式表达出来。当这些因失败而垂头丧气的士兵排队前行时，军号吹起来了，胜利者们向败在他们手下的同胞们致以光荣的敬礼。

在北方城市的大街上，男女老少欢歌笑语，高兴得流着泪祈祷上苍。4月11日，林肯站在华盛顿白宫的阳台上演讲，宣布了使南方各州回归联邦的计划。但就在他演讲的时候，倾听演讲的狂喜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转向其同伴并预言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个反对者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他是一名演员，也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南方同情者。4月14日，耶稣受难纪念日的晚上，华盛顿福特剧院上演一场深受人喜爱的喜剧。演出期间，布斯进入总统包厢，向总统开枪，打穿了总统的头部。虽然布斯自己跳到舞台上时摔断了一条腿，他还是逃跑了。但他很快被捕获，在拒捕时被击毙。林肯总统被送到剧院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于15日凌晨逝世。庆祝内战胜利的节日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图中被射死的野牛证明了斜靠在马鞍上的步枪有致命的威力。捕猎者经常组成狩猎队伍，使用着有望远瞄准器装置、射程达500米的武器射杀动物。19世纪60年代，北美地区有这种野牛1500万头之多，到世纪末时已经减少至几百头。随着野牛群出没之地区持续缩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以野牛肉为主食并使用牛皮制帐篷和毛毯的印第安居民也减少了。





1893 年 9 月 16 日正午，一声枪响后几秒钟，热切的移民们骑着马冲出去夺占他们的自由土地。在这一系列“向土地冲击”中的最后一次，10 万多拓荒者和移民们来到俄克拉荷马，一窝蜂地涌到政府从切罗基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 260 万公顷土地上碰运气。每一位将要成为农民的人，都可以获得一块 65 公顷的土地，其前提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 5 年并从事这块土地的耕作。

现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已经使用武力重新实现了统一。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男子死去，农场和种植园荒芜了，公路和铁路变成一片废墟，许多地区的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人们热切而激烈地争论着重建的政策。联邦政府是应该像对待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南方，使他们因敢于反叛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应该欢迎它重回联邦，并且投入资源帮助其救治战争的创伤？南部同盟各州的军事管制应该何时结束并将其权力交回文官管理？是否应该允许前同盟领导人出任政府官员？并且，那些现在被迫在通常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自谋生路的被释奴隶们，他们将会怎么样？

从理论上讲，被释奴隶应该从北方的胜利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其境



况却仍是当时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曾经摆脱了奴隶枷锁获得自由的废奴主义领袖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在回忆他们当时的悲惨境遇时说："这个世界从未见过任何人像400万南方奴隶这样自由到一无所有……，他们是自由的！自由地挨饿，自由地承受主人的冷酷残暴……，他们是自由的！无家可归，无面包可果腹，无地可耕。"

国会采取了迅速行动。新建立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给黑人以完全公民权，责成联邦政府负责保障公民的权利，重建州政府并建立"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来帮助解放的奴隶生活，使之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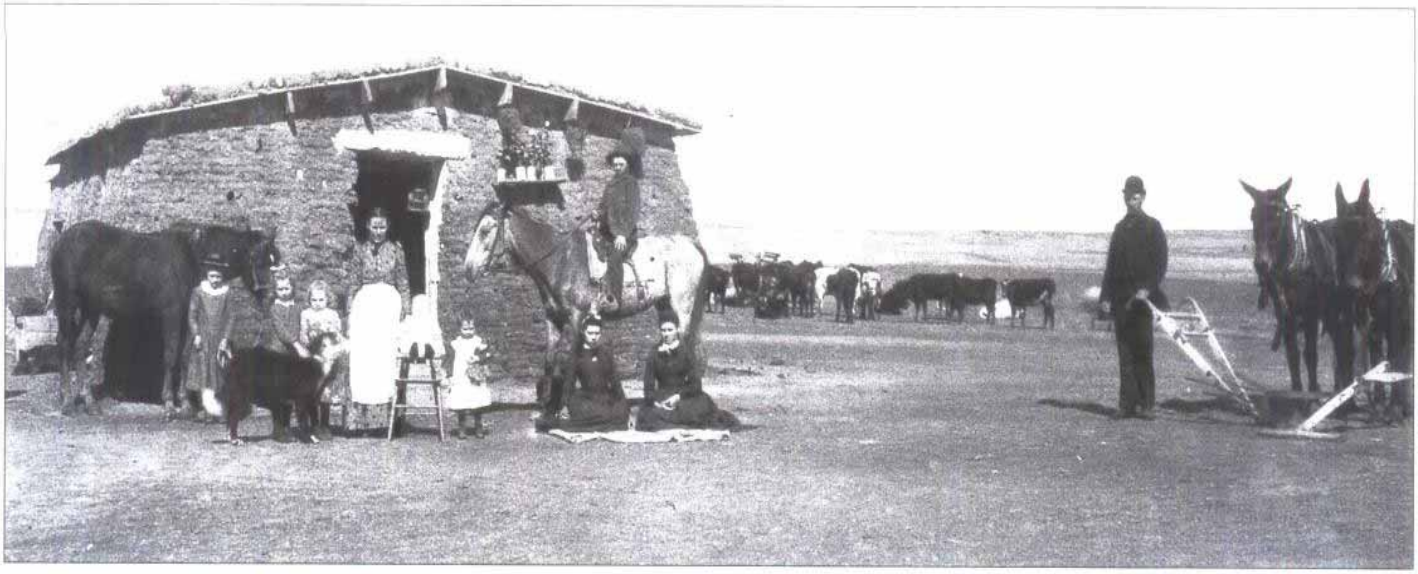
但是获得这些成就是很艰难的，而且时常难以维持长久。参众两院中的激进派发现他们在与新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对抗。约翰逊毫不掩饰他的种族偏见，宣称："这是白人的国家，上帝作证，只要我是总统，这个国家的政府就应该为白人服务。"这激起了国会中反对派的愤怒，他们提出了总统弹劾案。约翰逊受到了审讯，众议院作陪审团，但在最后一刻，7名参议员心存疑虑，未能投票要求总统辞职。

战败的保守的南方市民也不愿意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们蔑视地称那些从前反对脱离联邦，现在又在社会重建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南方白人为"无赖"。他们更厌恶涌入南方的北方人。这些北方人中有政府官员、商业和金融机构代理人、教师和技术人员。这些北方人被称为"皮包客"，因为他们来到南方时只携带一只装有全部财产的旅行袋。这些人中，不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带着救世主般的热情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建设一个新南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主义者，想在瞬息万变而混乱无秩序的环境中乘机轻松赚钱。当官方和私人企业家大规模进行市政工程建设、兴修铁路，在原来缺乏任何一种州级教育机构的地区创办学校时，其资金周转速度之迅速是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由于南方依然依赖农业，因而急需劳动力种植和收割庄稼。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大批从前的奴隶。但是南方农场主和种植园主发现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只有收获了庄稼，他们才有现金付工资；但是如果没有劳力耕种土地，也就不会有庄稼。

在许多地区，种植园主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将他们的土地分成小块，原来的奴隶可以在这种土地上自己从事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分成制"。但是这些新佃农除了劳力外一无所有，所以地主还得给他们提供简陋住房和必需的农具。这些必需资料是赊租的，其价值时常等于或超过佃农们从事耕种所得到的收成，因而这常常迫使佃农终身负债。

在许多地区，"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提出了土地分配计划，于是有谣言流传说，每个被解放的家庭都将分得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是这些计划通常是以短期贷款形式支付而不是直接赠送土地和家畜。并且，只有极少数领到这些生产资料的人有相当的财力，能在这笔生产启动



图中，西堪萨斯州的一个拓荒者全家穿着节日的服装在他们的宅地前摆着姿式照相。由于这个大平原上没有树木，他们的房子都用干燥的草皮垒成，牛粪则是他们的燃料。草皮下面的肥沃土壤滋养着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但许多农民却因干旱、水灾或草原火灾而破产。

贷款到期后买下这些财产。

被释奴隶更受到他们的悲惨出身造成的先天不足的影响。因为奴隶主曾经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很少给奴隶提供新技术或发展其才能的机会。以前的奴隶中最有前途的一种是那些设法学到某种手艺者，另一种是通过“地下铁路”的隐秘途径和安全之家逃到北方获得新生者。“地下铁路”是由奴隶、自由黑人和一些白人废奴主义者组成的地下联络网。早在内战开始前，已有大约 50 万黑人逃离奴隶制魔爪。少数享有特权的黑人已经能够学习医学、法律和神学，他们居住在纽约、辛辛那提甚至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的黑人职员和商人居民小区中。在南方，他们当中的最富有者自己也成了奴隶主。

统治南方社会的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者一致决定不能给予他们的黑人邻居以完全的公民权，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联邦战后重建计划实际上结束了，早年开始的允许黑人投票或担任公职的决策已成往事。各州县制定了限制黑人公民权的严格立法。三 K 党这样的秘密种族组织开始进行恐怖活动，他们私刑处死所谓的“捣乱者”，烧毁房屋，杀死家畜，想以此迫使黑人不再反抗，不再提出任何不受欢迎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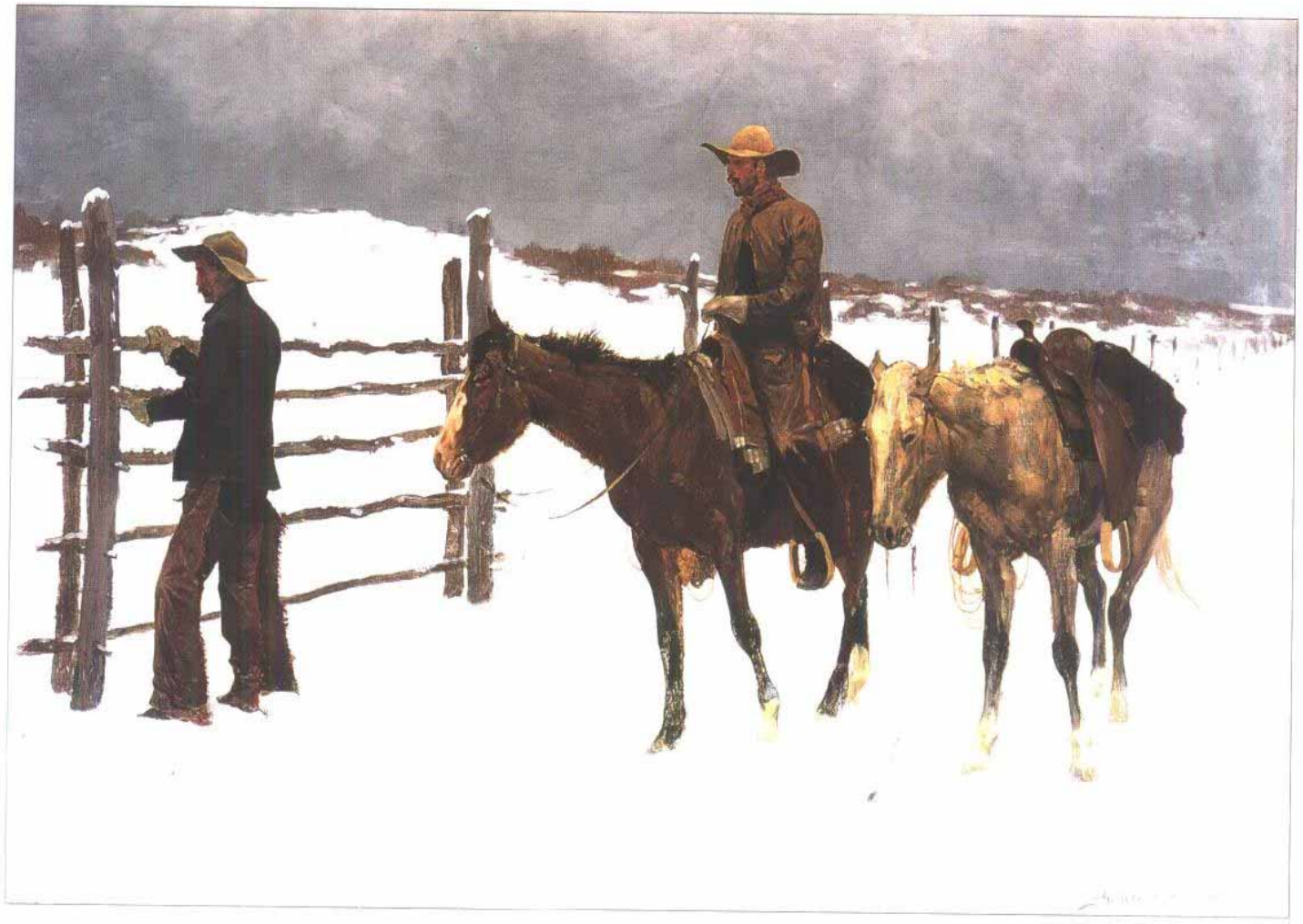
即便当战争在东部扩展的时候，美国征服和控制整个大陆的努力仍在继续。在战争过去后的年代里，美国的议员们和企业家们为使美国恢复以前的繁荣而全力以赴，而在席卷整个国家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潮流中，被抛在一边的有色人种不仅仅是南方被解放的黑奴。

内战期间，由于一向反对联邦政府向西部投资建设铁路的南方议员不再出席国会，联邦政府于 1862 年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令》。联邦的土地和资金被交付一个投资者基金组织，协助该组织在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及旧金山海湾之间修筑一条铁路。1863 年，一支主要由中国输入的劳工队伍已经开始铺设自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向东延伸的太平洋中央铁路，而另一支爱尔兰移民劳工（后来又增加了那些复员军人）则由东向西铺设

太平洋联邦铁路。1869 年 5 月 10 日，这两条铁路线在犹他州的普罗芒托利海角接轨，在接轨仪式上，伴随着钟声和礼炮声，建筑者钉了最后一枚象征性的“金钉”。

一般地，铁路的出现，会使一个社区形成，或者会使某一个社区分离，而且在决定铁路的路线时，在各建筑铁路的公司、投机商人和政治家之间进行了许多幕后的交易。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城镇，如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等，通过电报和铁路与东部的市场、银行及股票交易所建立了联系，很快发展成能够自给自足的城市。铁路的建设使移民们前往西部的艰难旅程大大地简化了，结果，西部许多州的人口迅速膨胀。例如，在 1870 年和 1880 年之间，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居民数增长到原来的 3 倍。

在战争期间颁布的另一个法令《宅地法》，确立了授予移民土地的规则，鼓励移民们定居。这则法令规定，任何一个希望占有、改造和耕种一块土地的申请占地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完全无偿地占有由联邦政府提供的一块 65 公顷的份地，5 年以后归耕作者所有。到 19 世纪末，



在弗雷德里克·雷明顿作的一幅画上，一个下了马的牛仔正准备在有刺须的铁丝网上立几根木杆，建一个围栏的门。这种方法是 1874 年由约瑟夫·格利登发明的。在铁丝网上装刺须给宅地主人提供了一种便宜的方法以保护他们的庄稼免受那些散牧牲畜的侵害。那些散牧牲畜的主人，即从事自由放牧的牛仔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圈起来，并定居下来做牧场主。


BANCA
NAZIONE



图中是1895年纽约的桑树街，这里拥挤着无数商人、店主、搬运工、二轮马车和四人马车。19世纪下半叶，每年约有50万移民涌向美国，给北方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充实了西部农业地带的居民。在纽约东海岸的主要港口曼哈顿区，200万人口中的3/4仅仅住在4.3万间拥挤、肮脏的公寓里。许多新到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建立了讲自己母语的商店，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成为他们的祖国在异乡的一个缩影。

已经有大约50万个家庭获得了这种土地，3200万公顷的荒地变成了农场。

但就在这些美国的新居民在西部建立自己家园的同时，这里原来居住的古老居民却被新来者取代而且被驱逐出去。当地的美洲土著部落，原来就已经越来越被限制在日渐缩小的地区内，现在，又有许多新来的白人，把他们贪婪的眼光投向印第安保留地的牧场和猎区。长期有效的条约被当局撕毁了，尤其是当这些地区涉及到新修建的铁路线时，这些土著部落被迫卖掉或交出他们的土地，用以换取后来印第安人很快就不再信任的那些含糊不清的承诺。“白人给了我们很多承诺，”苏族印第安人首领雷德·克劳德回忆道，“我都已记不清了，但他们一概没有遵守；只有一条，他们做到了，这就是他们真的如其所愿，夺去了我们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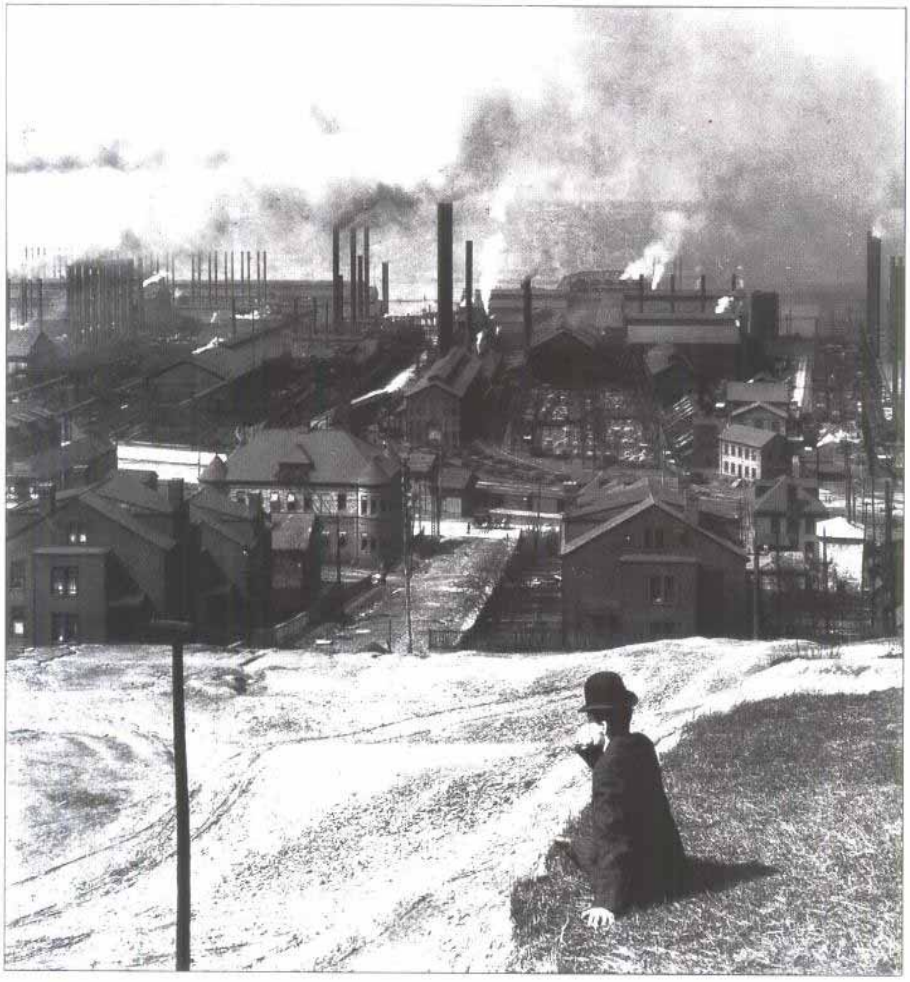
印第安各部族的首领们在当地的议事机构集合，商讨如何抵抗白人的入侵。政府将部落限制在保留地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基奥瓦印第安人的沙坦塔以雄辩的口才对白人入侵者说：“我听说你们要我们住在保留地上，我不愿意住在那里，我喜欢在整个大草原上漫游。只有在大草原上我才觉得自由和幸福，如果让我定居下来，我会变得苍白无力地死去。”但白人并不允许沙坦塔保持他的祖先的传统。1878年，被关在得克萨斯一个监狱医院里的沙坦塔从很高的窗户上跳下来自杀了。

19世纪70至80年代期间，印第安人的抵抗战争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杰罗尼莫领导的美国西南部阿帕契印第安人的伟大战争最后失败时为止。那些美国军队的枪炮和牛仔及铁路工人没有能够实现的目标，由白人猎手们的子弹解决了。大批的野牛几乎完全被消灭，而印第安人正是依赖着这些野牛的存在获得他们的食物、帐篷和蔽体的衣物，剩下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由于饥饿而不得不服从白人的意志。

在整个北部和西部，大的城镇现在开始将他们周围土地上的全部财力和能量吸引过来，而且，当时最重要的原始资本——金融资本不断增值，并用作新的投资。现在，既然基本的交通与通讯网已经形成，美国已经准备好将边疆扩张的过程转变为经济增长过程。在追求更高利润的活动中，美国企业家们最终被证明他们与土地开拓者们一样残酷无情，也与他们一样最终将获得成功。

随着雄心勃勃的乡村移民及国外移民的进入，西部城镇的人口急剧膨胀，金融家和企业家为适应这种增长的需要而投入了资金。公共事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学校和医院拔地而起，城市排水系统建立起来，供水设备得到了改善。投资的机会成倍地增加了。政治首领们为了使公共事业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成为精于投机、并善于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政客，有时甚至会将伦理道德观念置于一旁。

公众对这种新的城市的操作手段感到吃惊，但同时也对此发生了兴趣。1871年有一位叫威廉·特威德的首领



一位孤独的观察者面对坐落于宾夕法尼亚的全美国最大的荷摩斯特钢铁厂的厂区发呆。该厂由苏格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建立，这个工厂有自己的火车线和汽船运输煤和铁矿石，雇用的移民劳工每天工作 12 小时，一周工作 7 天。1892 年长达 5 个月的胜利罢工，有效地破坏了长达 30 年的钢铁行业的垄断。1901 年，卡内基将他的公司卖给美国钢铁有限公司，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用来建立大学、中学，并建立了一笔慈善基金，资助曾在他厂里工作过的工人。

就在纽约被曝光，他是一位无忧无虑的专制者，曾以各种各样的慈善捐款，买得他所在地区的爱尔兰移民对他的忠诚。这样，每当大选之时，他们都会投他的票。他还建立了一个腐败的亲信圈子，人们称之为“特威德圈”，其中有那些精于虚报预算然后分取小费的建筑承包商，有将获利项目当作礼品的政府官员，也有对犯法行为视而不见的公安监察官，还有一些打手专门用来镇压反对派。

特威德垮台了，但特威德之类的政客却仍然众多，从波士顿到芝加哥，再到西部更远的新兴城市中，这类事情数不胜数。新的头目将要上台掌权，只不过他变得更肥，更骄横不堪，然后再被一次行政改革所罢免，这种改革经常自称是清洁城市政治环境的一把“新扫帚”。但是，管理这样一个日益扩大的城市中心的错综复杂性，远不是那些理想的初学者们所能应付得了的，改革不久，另一批政治首领们——通常在一开始时要比他的前任略为谨慎——将会出来重新控制这种局面。

每一个新的城市统治者和开发者集团，在他们自己的小王国里统治、经营期间，都很快学会了在社会上层最有效地培养有影响的同盟者、压制排挤竞争者的手段。但这样一个完全由少数财团和实业家组成的关系网的体系，其易受伤害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这些政治首领们的权力开始面临挑战。

1873 年，金融家杰伊·库克的庞大银行的倒闭引起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导致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业机构破产，并激起了一场强大的罢工浪潮。工会为保护其成员的生活挺身而出；在南部和西部，农场主们也组成同样的联盟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城市中，富于战斗性的记者们揭露了贫困地区的地主及许多雇主对穷人的无耻剥削。

1877 年，美国第一次尝试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行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以经济需要为由，屡次降低工人们的工资。自发的工人罢工以快速火车的速度沿着铁路线蔓延，他们的觉醒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在费城、匹兹堡、芝加哥和旧金山，由公司出钱的警察组织对工人进行镇压，城市普通市民参与了双方的活动，抢劫者利用街头发生暴力事件的机会进行抢劫。联邦军队

也被召集前来镇压这些暴乱，驱散群众。这次武装镇压使紧张不安的商人们消除了疑虑，他们确信政府是牢牢站在他们一边的，但他们的这种欣慰只是暂时的。

1886年，在芝加哥的一次地方性罢工中，一群德意志民族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抗议性集会，城市警察赶去阻止这次集会。一颗炸弹突然爆炸了，炸死1人，炸伤6人。警察冲进人群，至少有7人死于他们的警棍之下，尽管没有查出投弹者，但8个无政府主义者被包围，他们被交付法庭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一个颇有号召力的院外活动集团宣称，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正在受到有害的移民煽动者和不安分的工人们的威胁。那些多从社会的富人区抽调的法官们



1898年，集结在弗罗里达州坦帕湾的美国军队正准备乘船前往古巴。美国军队支持古巴人民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要求，他们夺取了圣地亚哥，并在菲律宾群岛打败了西班牙舰队。在四个月的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这时的美国已是世界舞台上担任着非同寻常角色的帝国主义国家。

不得不更加严厉地对付那些侵犯财产所有权和向现有社会秩序挑战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选民现在开始对根据财富多少确定公民权利的前提提出了质疑。经济权力似乎越来越牢固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国会不得不对公众的压力作出反应，起草了有关立法，对大垄断企业“托拉斯”的最不得人心的定价及压制竞争行为加以限制。然而，这个法令实际上是更强烈地反对劳工联合而不是反对雇主。一个新兴政党人民党，在19世纪90年代享受了短时间的成功，他们在政坛上批评国家的大型公司以及它们提供财政贷款和分配物品的体制。

随着经济继续经历增长和下降的反复循环，工人和其雇主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1893年的经济萧条造成极大的破坏。许多农业地区被洪灾、虫灾及风沙毁坏了，但那些设法取得收成的农民却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着谷物价格的紧缩。城市里1/4的非熟练工人失去了工作。1894年，一个名叫雅各·考克西的改革者率领几千名失业工人从美国北部和西部向华盛顿进军，他向态度明显很冷淡的政府声称，这次行动是“步行请愿”。这一进军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气氛却是紧张的：考克西的队伍每到一个地方都与武装军队和地方治安警察发生冲突，最后被遣散。

同一年，普尔曼公司的工人——即火车车厢制造工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其管理部门的罢工。为了支持他们的罢工行动，美国铁路工会组织了抵制普尔曼客车在铁路上运行的行动，整个国家的铁路运输系统开始处于瘫痪状态。具有改革思想的伊利诺斯州州长不愿看到他的国家用军队来镇压罢工，反对政府对罢工进行镇压，但美国最高司法部长否定了他，并派出了联邦军队。

通过这些行动，资本家确信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然而他们也认识到，一个规模如此大、诸事如此繁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服从旨在影响工商业发展的立法。为了进一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更加精于按自己的利益操纵国家的政治体制，并向那些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候选人提供巨额财政资助。铁路巨头柯林斯·哈廷顿就是运用这种手段的典型。在他与新墨西哥州长会晤后，写信给他的一个合伙人，说：“我见过了阿克斯特尔，他说，如果我们交给他一张清单，写明我们希望通过的那些法规，他将设法使它们通过而不需要花很多钱。”

然而，即使公民们不喜欢大公司那种使用其财力的方式，也仍然能感受到它们的能量和成功。对大多数人来说，谋生越来越容易，成功的机会也增加了。当许多财富都集中到那些由百万富翁组成的国家级的贵族手中时，大量的资本也就投资到了公共机构上，使这些公共机构在广泛范围内服务于社会。由私人投资和地方当局及联邦国家拨款而建立的学院和大学建立起来，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即使是最穷的外

屹立在纽约港内约100米高的自由女神像于1886年10月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揭幕。这座巨大的钢骨结构、表面覆以铜片的雕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他们将其拆解开用船装载越过了大西洋。对于那些在20世纪早期仍然在往美国迁移的数百万欧洲移民来说，这是他们进入这个已成为世界最强国的国家时看到的第一景观，而且他们把改善生活的愿望也托付给了她。


Edward Moran 1886

国移民也达到了富裕水平，教育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打破了内心里对都市社会的望尘莫及的情感。

国家直属企业的价值得到了证实：它们用铁路和电报线把整个大陆连接起来了，在地下开矿，加强了与发达世界任何方面都相称的工业。随着大片的荒僻地区被开发或居住，工业资本家和他们的银行家们开始向外寻找新的领地。美国将要在更大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越过太平洋，彼岸的新市场在向他们召唤。欧洲国家正在中国新开放的港口城市谋取商业和政治影响，美国也决定不再站在这块丰厚的经济资源之外观望。1898 年，美国得到了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使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到东方之间的生命线上有了一个可用的基地。与此同时，在更近处，美国的领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加勒比海邻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了有可能在巴拿马地带开一条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的运河后，这一地区就更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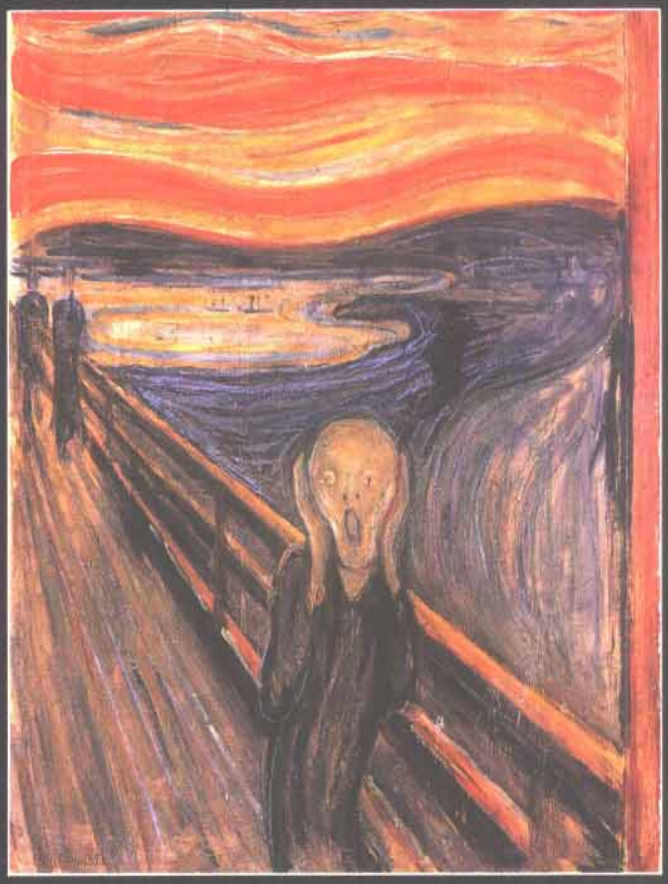
为了扩大和保护它的海上利益，美国政府在海军建设上又投入了新的力量。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美国的海军比许多拉美共和国的海军还要小；到这一世纪末，它已是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由于有了新造船只和随之而来的信心，北美共和国于 1898 年开始了第一次海上军事冒险，发动了一场打击衰亡中的西班牙帝国的战争。

获得胜利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那些对此行动最乐观的支持者也感到惊讶，战争的胜利给美国带来了丰厚的战利品——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群岛、关岛、加勒比海上的波多黎各，以及美国对羽翼未丰的古巴共和国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古巴自身要求独立的呼声也很明显是受了美国对西班牙战争的鼓舞。在整个美洲，美国现在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强国，加之它在太平洋上又建立了战略立足点，美国已经具有随时利用任何潜在的贸易机会进入远东的优势地位。

一些国民对这一概念感到畏惧：美国本身是从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幼童”，现在却成为一个将其国旗和军舰插在离本土很远处的强大帝国。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议员欣喜地说道：“现在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且，随着对菲律宾的占领，这个统治世界的国家是，而且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世界的贸易必将属于我们，而且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对贝弗里奇和他的许多其他同胞们来说，驱使美国向外发展的动力就是那种驱使美国人跨过草原、山脉和沙漠，向命运挑战之精神的延伸。半个世纪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他们曾经经历了那险些使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暴风雨的洗礼，并由此看到，即使在动乱时期，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他们的事业已经获得了丰收的硕果。激励着他们向外发展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机遇，而且还由于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设计出了所有可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最好的模式，这种模式必将传播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焦虑的潜流



19世纪最后10年中，匈牙利的犹太裔作家马克斯·诺尔道写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是担心迫在眉睫的毁灭和消亡”。

对于那些在1899年12月31日集聚于欧洲所有公共场所，庆祝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的一个世纪之结束的公民们来说，这种情感无疑是“异端”的。就健康、长寿及物质享受而言，他们的生活质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由技术进步产生的财富和权力使得欧洲能够控制其它所有的文明，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这些欢庆新世纪的人群周围却有一些可怕的孤独者。用1900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这些孤独者，“一定是领悟到了现代意识的最勇敢的人，而且一定是这种现代意识，能够关注那些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能发生的所有那些疾病、毒害和危险。”他们的这种情感最强烈地反映在当时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于1893年画的《呐喊》（右图）和一些艺术家们描绘的苦恼忧患的形象中，这些艺术品将在下一页展示。

欧洲人在19世纪90年代面临的这种忧患，最集中地表现在维也纳城，作家卡尔·克劳斯戏称这个城市是“世界末日的实验站”。在腐朽的奥匈帝国的首都，过分虚饰的高贵的和刻板的礼节，几乎掩盖不住反犹主义的潮流和经济危机及激进的民族主义造成的紧张状态。那个时代的气氛被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描述为“尴尬的、有脂粉味的、淫荡的、不健康的……每个地方的被压迫者都在寻找着捷径、可以钻的空子和迂回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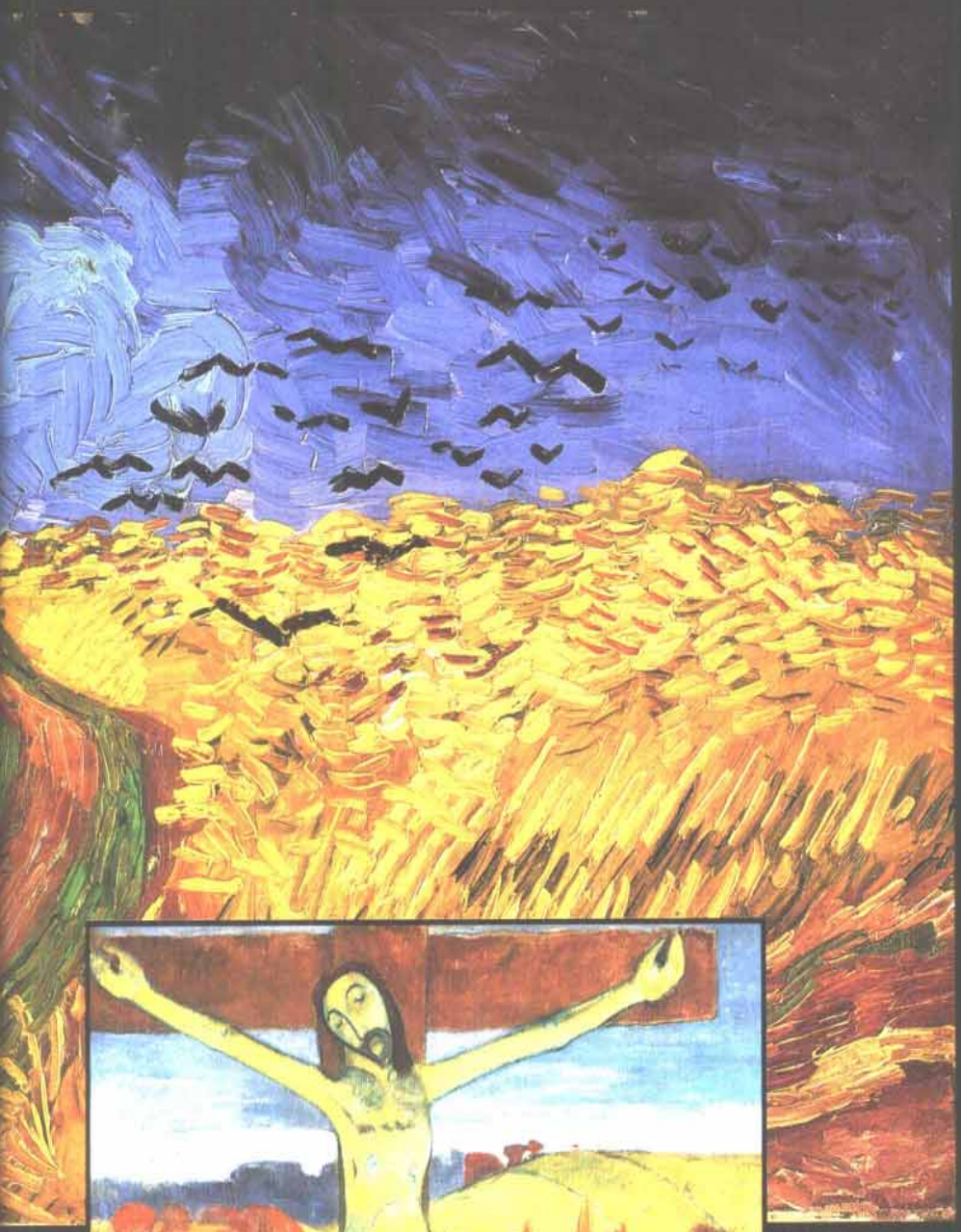
这种发泄，包括荒诞不经的、歇斯底里的和疯狂的方式，被一位最有影响的天才犹太人文学家和学者、一位精神病学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揭示了本质。弗洛伊德关于“文明不适症”的开创性精神分析学，以及他关于支配行为的“下意识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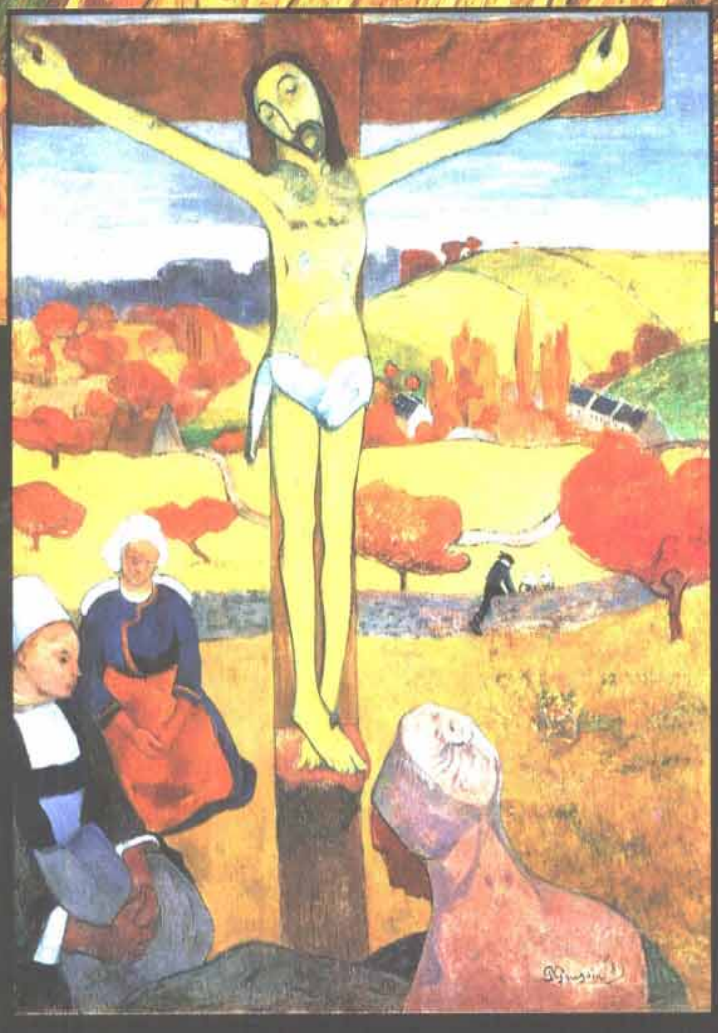
《乌鸦和玉米地》(1890年)体现了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名言:"真正的艺术家不画事物的本来样子,而是画他对事物的感觉。"梵高在法兰西北部的奥弗尔完成这幅画后,在数星期内自杀。



比利时画家詹姆斯·恩索尔所作的《阴谋》,画的是诸多面具一样滑稽的脸,喜剧成分和恐惧成分各半,使观赏者感到极不自在。







在《黄色的耶稣》(1889年)这幅画中，保罗·戈甘将一幅基督肖像置于布列塔尼乡村人普通生活的背景中，展现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这幅基督肖像是以法国蓬塔旺附近小教堂的木雕像为原型的。

的理论，揭示了这一世纪医学和教育的所有成就都无法减缓的一种不适。这些情绪使得人们比以往更难以保持19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类理性是影响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且它是自由民主政治的主要源泉。

在整个欧洲，其他信条也在瓦解。1873年4月9日，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黑色星期五”，柏林和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的崩溃，引起了一场席卷全欧的经济萧条。由于19世纪中叶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而刺激起来的大宗投资，曾导致工业生产能力的高涨，但现在已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成千上万的人群失去了工作。更极端的社会主义运动使用罢工及越来越多的暴力手段，打击了中产阶级的信心和扩张主义者的设想。埃米尔·左拉所写的关于法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尖刻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查尔斯·布思描绘伦敦穷人生活的17卷本著作，引起了人们对于进步和繁荣后面被忽视的东西的关注。很多人认为，这些事实给政治分析学家马克思提供了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就预言了它的命运。

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的挑战，他指出人类最初来到这个世界时，曾是“一个有尾巴的、有尖耳朵的多毛的四足动物”，人类现在的形象是经过上万年的进化演变而来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伪装下，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念，被赤裸裸地应用于政治，似乎能证明侵略性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并且使任何改变社会不平等的企图都成为徒劳之举。鉴于探索物质构成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极其微小的逊原子粒在空间任意地漂浮，人们已经知道，即使是最坚固的物质也可能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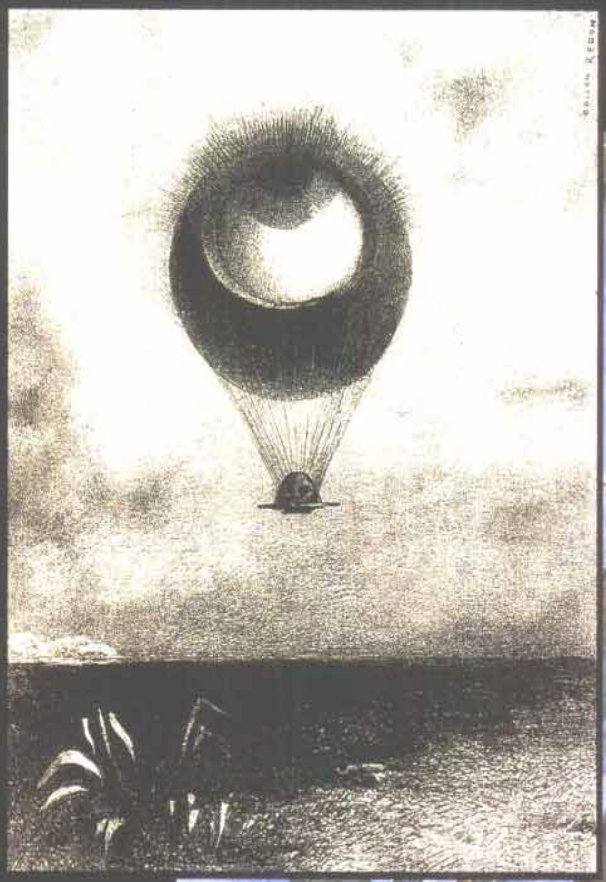
对这种信仰危机的反应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最极端的是法国社会学奠基者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作品《自杀》(1897年)中所作的分析，他在书里展示了个体的人怎样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分裂的影响。画家保罗·戈甘认为西方社会道德已完全败坏，于是在1891年离开法国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而诗人亚瑟·兰波则在19岁时放弃了他的艺术，在中东流浪并成为一个军火走私者。

许多人已意识到他们已从旧的禁忌中解脱出来，并转向直接的享乐——世纪末也为这种娱乐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们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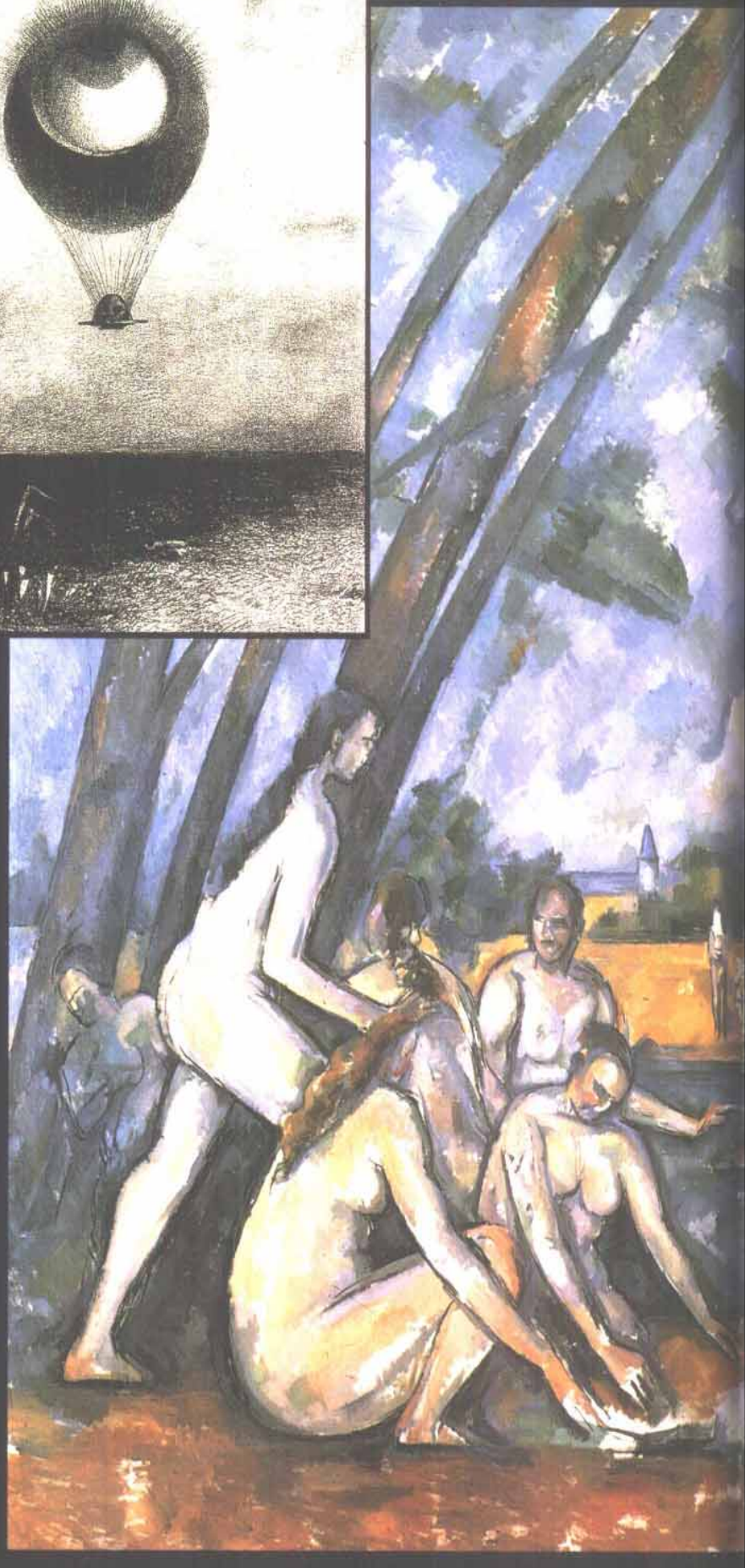
在点着汽油灯或电灯的欧洲大都市灯火煜煜的音乐厅或音乐餐馆内消遣，也可以沉溺在更为情趣横生的文学作品、诙谐滑稽的讽刺剧和杂志中消磨时光。在伦敦，上流社会都仿效维多利亚的长子、堕落而声名狼藉的阿尔伯特·爱德华，他有一群可以排成长队的情妇，把他的时间消耗在舞会、赌博、射击、游艇及更多的聚会上。但那些敢于触犯法律者仍然须付出代价。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事件曝光，被送进监狱关了两年；乔治·萧伯纳于 1894 年写的一部关于滑铁卢车站酒吧女成为妓女的戏剧一直被禁演，直到 1925 年才允许在舞台上演出。但是社会上仍然弥漫着一种以禁止该剧为乐的态度及试图限制人们自由的渴望。

当然，对于各类艺术家来说，社会和审美价值方面的信念的丧失，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困惑。诗人斯特凡·马拉美摒弃了严格的韵律而用纯粹的象征性语言来创作。维也纳的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古斯塔夫·马勒及巴黎的克劳德·德彪西用一种新的和声法和音乐结构来作曲。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包括奥古斯特·勒努瓦和克洛德·莫奈在内的一批法国画家开创了一种被称作印象派的革命性画风，在这种风格中，艺术家对其创作对象的体验用一种鲜亮的色彩和直接明快的笔调展示在画布上。

印象派画家忠实于人类经验中能动而瞬变的本质，他们向统治西方艺术界长达 5 个世纪之久的固定原则提出了挑战，并为 19 世纪 90 年代更具表现力、更富于情感的艺术风格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些艺术家们多受到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冷遇和嘲弄：旧习惯很难消亡，享有这个时代物质繁荣的大多数人，至少在公共场合仍能对他们先辈们的观念保持固执的信仰。但这些艺术家作品中的形象——张开大嘴痛苦地发出无声呐喊的人，飞过迎风摇曳的玉米上空的乌鸦，越过被屠杀者赤裸裸的躯体欢呼战争的精灵——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形象。它们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是一种新的非同寻常的现代观念发出的呼声——它体现了一种焦虑、不安、对未来世界带着恐惧也带着希望这样一种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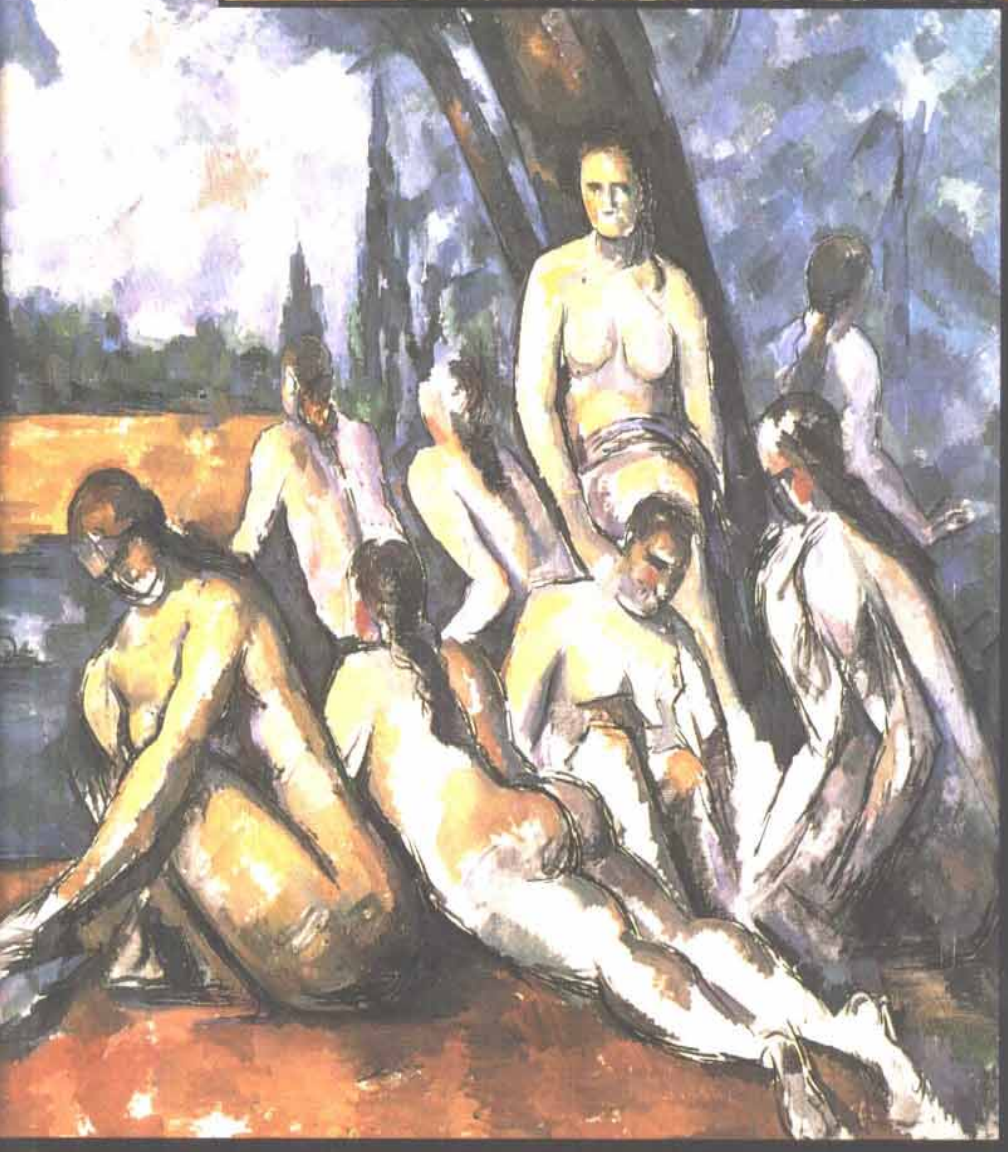


在 1882 年的一幅版画上，奥迪伦·雷东试图把精神提高到“神秘主义的领域，进入无法解决的忧患”中。





1894 年，在亨利·卢梭的《战争》一图展出时的附带的目录中，这个自学成才的画家加进了这样一句话："她以令人恐怖的方式通过每一个地方，使得每个地方都产生绝望、哭泣和毁灭。"



保罗·塞尚的油画《伟大的沐浴者》(1898—1905 年) 中的一部分，画中的人物和自然背景被融合在一个穹形的空间内，体现了这位画家决心以一种新的方式将他所描绘的自然环境和他一直追求的秩序及和谐融为一体的构思。

	公元 1850 年 – 1860 年	公元 1860 年 – 1870 年
印度	德里东北部米路德爆发了印度人民起义，迅速传遍北印度和中印度(1857 年)。 1858 年镇压了人民起义后，不列颠政府接替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通过建设公共工程如铁路、灌溉工程等得到巩固，印度民政公务署配合了这一系列建筑活动。
德国	赫尔穆斯·冯·毛奇成为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开始建立现代化普鲁士军队。	威廉继位为普鲁士王(1861 年)。奥托·冯·俾斯麦被指定为普鲁士的首相(1862 年)。 普鲁士和奥地利与丹麦人进行战争；1864 年的胜利使两国共管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 在萨多瓦打败了奥地利之后 (1866 年)，俾斯麦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联邦包括美因河以北的所有德意志邦国。
非洲	苏格兰传教士和探险家大卫·利文斯敦自西向东横穿非洲大陆 (1854 – 1856 年)，号召欧洲人在传播基督教过程中增加商业活动和移民。 在西非，法国向塞内加尔河上游前进 (1854 年)。不列颠控制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以阻止阿拉伯人的黑奴贸易(1856 年)。	在南非发现钻石(1866 年)。 苏伊士运河通航，将地中海上的埃及港口塞得港与红海联系起来 (1869)。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选举了他们的第一届立法议会 (1850 年)，随后，新南威尔士于 1842 年仿而效之。 在新南威尔士发现黄金 (1851 年)，去澳大利亚的移民增加。 地方军队攻击罢工的淘金工人在维多利亚尤里卡建立的保护围栏，杀死 25 人(1854 年)。	罗伯特·奥哈拉·布尔克和威廉·约翰·威尔斯完成了第一次南北穿越澳大利亚内陆的旅行 (1861 年)，但在回程中死于饥饿。 不列颠停止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1868 年)。
美国	堪萨斯州发生了护奴派和废奴派两派势力的冲突(1855 年)。最高法院在审理德雷德·斯科特讼案时，宣布美国宪法不保护黑人权益(1857 年)。 反对奴隶制的强硬者攻击了政府在弗吉尼亚哈普斯渡口的武器库。其首领约翰·布朗被判谋反罪处以绞刑。 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1860 年)。 南卡罗来纳州和另外 6 个南方州宣布退出联邦。	南方联盟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宪法(1861 年)。内战爆发。 联邦军队在安提塔姆取得胜利后，林肯宣布了《解放宣言草案》，许诺将解放所有的奴隶(1862 年)。南方联盟对北方的最后一次进攻在葛底斯堡失败(1863 年)。 南方联盟的首府里士满被北方军队占领；南方联盟投降(1865 年)。林肯被暗杀。 太平洋联邦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竣工，将内布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州联系起来(1869 年)。

公元 1870 年 – 1880 年	公元 1880 年 – 1890 年	公元 1890 年 – 1900 年
1876 年雨季的暴雨造成印度的饥荒，南印度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她是印度女王(1876 年)。	一伙信奉印度教的中产阶级文职人员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 (1885 年)，要求在政府机关中更广泛地雇用印度人。	1896 年和 1899 年的饥荒造成印度西部和中部的大批饥民死亡。 1897 年两名不列颠官员被暗杀，标志着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 寇松勋爵被指定为印度总督(1898 年)。
德意志军队打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军队(1870 年)后占领巴黎。俾斯麦巩固了与南德意志各邦国的联合后，威廉登基，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柏林股票交易所崩溃 (1873 年)，宣告了全欧洲经济萧条时期的到来。	俾斯麦在非洲建立德国保护区 (1883 – 1885)。 威廉皇帝驾崩(1888 年)；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即位，3 个月后逝世，威廉皇帝的长孙威廉二世继位。	俾斯麦企图说服皇帝威廉二世接受他的反社会主义计划失败，辞去了宰相职务(1890 年)。 俾斯麦去世(1898 年)。
美国记者和探险家 H · M · 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边的乌基基发现了生病的利文斯敦(1871 年)。1873 年利文斯敦去世。 斯坦利发现了白尼罗河的源头在布隆迪(1874 年)。在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赞助下，他建立了刚果河谷沿岸的贸易港口(1879年)。 不列颠侵入西非阿散蒂的领土(1874 年)。 在南非的伊桑德卢瓦纳战役中，不列颠被祖鲁人打败(1879 年)。	不列颠控制了埃及政府(1882 年)。1885 年，不列颠战士在苏丹喀土穆战役中被马赫迪的军队打败。 1884 年柏林会议之后，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主持下成立了刚果自由州。德意志宣布多哥兰、喀麦隆、西南非洲和东非地区为德国保护区。 在南非，英国兼并了贝专纳 (1885 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了黄金(1886 年)。	《赫尔格兰条约》(1890 年) 限定了英国与德国在东非保护地的边界。 不列颠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塞西尔 · 罗得斯入侵马塔贝莱和马绍纳兰(1890 年)。 不列颠在恩图曼打败了马赫迪军队 (1898 年)；苏丹处于英国和埃及联合统治下。 经过 20 余年的战争，法国征服了西苏丹(1898 年)。 在南非，不列颠和布尔人之间爆发了战争(1899 年)。
维多利亚的建筑工人建立了工会，得到合法地位(1870 年)。 维多利亚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872 年)。	抢劫银行的山贼奈德 · 凯利被处以绞刑(1880 年)。	悉尼的码头工人罢工并同武装警察发生冲突(1890 年)。 严重的殖民地经济危机导致许多公司和银行倒闭(1890 – 1893 年)。 英国国会通过了使澳大利亚 6 个殖民地合并为一个澳大利亚联邦并建立联邦议会的提案。
银行家杰伊 · 库克的银行倒闭，引起全国性经济萧条(1873 年)。 苏族印第安人在小比格霍恩战役中打败由乔治 · 卡斯特中校领导的联邦军队(1876 年)。 罢工的铁路工人与铁路公司雇佣的治安警察发生冲突，军队平息了这次暴乱(1877 年)。 托马斯 · A · 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1879 年)。	芝加哥罢工和暴动后，8 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处以死刑(1886 年)。	美国军队在南达科他的翁迪德湾屠杀 200 名印第安人 (1890 年)，结束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战争 。 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在华盛顿游行，要求改革立法(1894 年)。 美国支持古巴革命导致了与西班牙的战争(1898 年)。西班牙割让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给美国，并承认古巴独立。

索　引

A

Aborigines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111(110图)，114,115,123

Adelaide　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城市)，114,125

Afhanistan　阿富汗，地图 10－11，17,30－31

Africa　非洲：英法宣言(1899 年)，93；柏林会议，86,88；大部开发，75,78－79,80－81,83；《赫尔格兰条约》(1890 年)，90；铁路，79,90,99；皇家尼日尔公司，89；旅游，79－80,100；运输，83，参见 Suez Canal 以及非洲各国家和其他国家名称

Agriculture　农业，9；商品，65,66－67，参见 Australia；Food；American

Alexander　亚历山大(俄国沙皇)，51

Algeria　阿尔及利亚，地图 10－11，77；艾卜德·卡达尔，80

Alsace　阿尔萨斯(德国行省)，56

Angola　安哥拉，地图 10－11，地图 76,77,90

Antietam/Sharpsburg　安提塔姆/夏普斯堡，(1862 年战役)，145,146

Argentina　阿根廷：金融危机，126；肉类出口，69,70

Armies　军队：澳地利，47；东印度公司，16；印度，26,28,29；普鲁士，47,48,51

Arts　艺术：澳大利亚，125；作曲，166；19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观念，163,164－165；166－167；音乐厅，166；绘画，163，164－165，166－167；戏剧，166；诗歌，165－166；作家，165

Ashanti　阿散蒂(非洲)，地图 76,79,89

Assam　阿萨姆，地图 10－11，17,34

Australia　澳大利亚，农业和土地，119－121，124－125,126；艺术，125；不列颠的早期罪犯和早期移民，111；地图 112,113,114；土匪(犯罪者)，123－124；中国移民，116，119；有色人和移民，125－126；迁移罪犯停止，114，117；经济，114－115,120,124－125；经济衰退，126－127；无事卡围栏，117－118,120－121；开发，111－112，113，114，123；穿越澳大利亚南北，123，124；联邦(共同体)，111；地图 112,126－127,129；围栏，121，128；食品出口，58,70；金子和"挖地者"，115－117,120,165；暴乱和改革，117－119,120－121；住房，119，126－127；移民(自由的)111，114－115,116－117,119；骚乱，121；矿产，124；土生土长者，115,124；政治，119；人口，116,119；运动，125；牧人，128；罢工，126；运输，121；工会，125，126,129；大学，125；使用罐头和冷藏技术，58,65,70；羊毛和出口，58，114，115，116－117，118－119,120,126

Austria　奥地利，地图 44,50；三皇同盟，62；双头鹰同盟，59；与匈牙利合并，52,59，62；被排除于关税同盟之外，45,49,51；德意志联邦，44,49,50,51；哈布斯堡帝国，43，45－46，47；与俄巴第关系，43,50；石勒苏益格，51，七周战争(与普鲁士)，51－52

B

Baden　巴登(德意志邦国)，53,55

Bahadur Shah Ⅱ　巴哈都尔沙二世，18,22,24－25

Banerja　巴内杰亚，萨兰德纳斯(印度民族主义者)，29,34

Barak　巴拉克，威廉(澳大利亚二著名艺术家)，111

Barnardo　巴纳多，托马斯博士(英国社会改革家)，107

Bavaria　巴伐利亚(德意志邦国)，地图 44，51，53,55

Bechuanaland　贝专纳(非洲)，地图 10－11,97

Beeton　比顿，伊沙贝拉(英国烹调书的作者)，72

Belgium　比利时，非洲占领地，地图 10－11,77,83

Benares　贝拿勒斯(印度城市)，地图 10－11,15

Bengal　孟加拉(印度行省)，地图 10－11,13,14,22；军队的补充，18；民族主义，30；分割，34；纺织业，13,16,33,34

Bentinck　班廷克，威廉勋爵(总督)，16－17

Berlin　柏林(德意志首都)，44；地图 44；会议(1878 年)，59；犹太人，58；自由改革者，45,46；股票交易(股单)，58,165

Bismark　俾斯麦，奥托·冯(德意志宰相)，9，12，42，43；与非洲的领土，86；柏林会议，59，三皇同盟，59,62；双头同盟，59；坎姆斯电报，54；家庭和早期生涯，49；普法战争，53，54，55；和平协定，55－56；统治，56－57；文化斗争，57；军费，49－50，52；北德意志联邦，53；海外帝国，62；革命，49－55；退休，64；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51；与社会主义，57－59，62－64；社会保险体系 59；西班牙王位问题，53－54；贸易保护主义，58；与奥地利的战争，51－52

Boers　布尔人，94，95－96，97，98－99，100－102,125,129

Boer War　布尔战争，98－99,100－101,125,129

Bohemia　波希米亚，43，地图 44,45

Bombay　孟买(印度)，地图 10－11，13，14；印度国大党，30；纺织业，33；维多利亚车站(图片)23；

Booth　布斯，查尔斯(不列颠作者)，165

Brady　布雷迪，马休(美国摄影家)，107；

Brazza　布拉萨，皮埃尔·萨伐日奇·德(法国探险家)，83,84,86

Brazzaville　布拉萨维尔(刚果)，地图 76,84

Britain　不列颠：非洲领地，9，地图 10－11；地图 76,77,79,82,83,84－86,88－89,90,91－93；与澳大利亚，迁移罪犯和移民，111,112－113，停止迁移罪犯，114，117；澳大利亚羊毛进口，115,118－119；与俾斯麦，57；布尔战争，98－99,100－101；棉布生产与贸易，16,29,34,141,145；俄勒区的划分，133；东非远界会议，89；帝国，地图 10－11,17；财政危机，126；《印度法案》，14；新海布里底斯(太平洋)，127 页；与新西兰，122；近日点亚，87；进口冷藏肉食，70；《管理法案》，14；与奥地，95,96；与美国大战，141,147；与法国在印度的战争，13－14；参见 India,Indian Muting

Brown　布朗，约翰(美国废奴主义者)，139

Bull Run/Manassas　布尔溪/马纳萨斯(战役，1861 年)，143－144

Burke　布尔克，罗伯特·奥玛拉(爱尔兰探险家)，123,124

Burma　缅甸，地图 10－11,17

Burton　伯顿，理查德(英国探险家)80,81

C

Calcutta　加尔各答(印度港口)，3，8，地图 10－11,13,23,27,29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美国州)，131,133,139

Cameroons　喀麦隆(非洲)，地图，10－11,86

Canning　坎宁，勋爵(总督)，18,26,27

Cawnpore　坎普尔(印度城市)屠杀，地图 10－11,16,23－24,25

Cezanne　塞尚，保罗，法国画家，166－167

Chicago　芝加哥(美国城市)，66,72,73

Christian　区 克里斯蒂安九世(丹麦国王)，51

Clive　克利夫，罗伯特(不列颠官员)，14

Coal　煤，澳大利亚矿产，124；印度，27；西普鲁士煤矿，44,47

Congo　刚果，地区和河流名(非洲)，地图 10－11；地图 76,83－84；86,88；刚果自由邦，85,88

Cook　库克，鲍姆斯(不列颠航海者)，112

Cook，Thomas　库克，托马斯(不列颠旅游管理者)，79－80,100

Cornwallis　朴威利斯勋爵(总督)，14

Cotton　棉花，棉布(生产和贸易)埃及，79；英国，16,29,34,141,145；印度(孟加拉)，13,16,29,33,34；美国，80,136,145

Curzon 寇松，勋爵(印度总督)，9,33,34

D

Daguerre　达盖尔，路易斯·雅克(法国摄影家)，103

Dahomey　达荷美(非洲国家)地图 10－11，地图 76,79,81

Dalhousie　大贺肯，勋爵，17,18

Darwin　达尔文，查尔斯(生物学家)，165

Davis　戴维斯，杰斐逊(美国南方联盟的总统)，140,143,147,150

De Beer　德波尔兄弟(钻石矿)，94,97

De Lesseps　莱塞普斯，斐迪南，79,82

Delhi　德里，(印度城市)，地图 10－11,15,32；印度暴动，22,23,24－25

Doornkop　多伦克普(战役)99

Douglas　道格拉斯，弗里德里希(美国废奴主义者)，152－153

Durkheim　迪尔凯姆，埃米尔(法国社会学家)，165

E

East Africa　东非，地图 10－11,89,90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8，12，13，14，15,17；吸收印度人参与管理，17；军队，16,26；受雇者生活方式，17；取缔公司商船，16；取缔公司，26

Eastman　伊斯曼，乔治(美国发明家)，108

Edison　爱迪生，托马斯(美国发明家)，35,37,39

Egypt　埃及，地图 10－11，地图 76,79－80,84,85,90,91,100

Electricity　电力，35－41，166；德国发电量，64；参见 Telegraph

Ensor　恩索尔，詹姆斯(比利时艺术家)164

Erfurt 埃尔福特(德意志),地图 44,47
Essen 埃森(德意志),工厂,56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非洲),地图 76,77,90,91

F
Faraday 法拉第,迈克尔(不列颠科学家),35
Farmer 法默,花尼(美国烹调作者),72
Fashoda 法绍达,地图 76,92
Fencing 铁剑围栏,121,128,155
Fenton 芬顿,罗杰尔,摄影家,107
Ferdinand 斐迪南(奥地利皇帝),45
Flinders 弗林德斯,马休(探险者),113
Food 食品,罐装,65,70-71,72;谷类作物,66-67;肉类,65,68-69,70;新的食物商品,72-73;消毒,65;冷藏,65,70,122。参见 Agriculture
Fort Sumter 萨姆特要塞(1861 年战役),138-139,140,141
Fox Talbot 福克斯,塔博特·W. H.(英国摄影家),103
France 法国:非洲领地,9;地图 10-11;地图 76,77,79,80,81,83,84,85-86,88,89-90,91,92-93;东非领地协议,89;帝国,地图 10-11;普法战争,53,54-55;殖民,55-56,62;中立的许诺,51;太平洋岛屿领地,127;与普鲁士的贸易协定,51;在印度的战争,13-14
Frankfurt 法兰克福:联邦议会,44,45,47,51;法兰克福同会,45,46-47;犹太人,58;电灯,38-39;股市崩溃,165;条约(1871 年),56
Franz Josef 弗兰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51
Fredirick Ⅲ 弗里德里希三世(德意志国王),48,62,63
Frederick Willian Ⅳ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45,46,47,48,49
Freetown 弗里敦(塞拉利昂),地图,76,77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心理学家),165
Frith 弗里思,弗朗西斯(英国摄影家),104

G
Garibaldi 加里波第,朱塞皮(意大利),革命家,50
Gas 煤气,煤气灯,166;煤气炉,72
Gauguin 戈甘,保罗(法国画家),165
Gdansk 格但斯克(普鲁士港口),44,地图 44
German 德国:非洲领地,9,地图 10-11,62,77,86,88-89,90,97,101;反犹主义思潮,58;军队,64;同盟议会,53,56;中央党,57,58;东非边界会议,89;经济,58;教育,59;政府,57-58;工业,44,45,47,48,56,58,59,64;帝国主义,64;民族主义,44-45,57,61;民族自由党,57,58;海军,62,64;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图 10-11,62,127;保护主义,58;国民议会,53,56,57,64;社会民主党,57-58;邦国,43,44,地图 44,46-47,55,64。参见 Bismarck, Prussia
Gettysburg 盖茨斯堡(1863 年战役),142-143,150
Glidden 格利登,约瑟夫(美国发明家),155
Gokhale 哥克海勒,哥帕尔·克利希那(印度民族主义者),31,34
Gold 黄金,澳大利亚,115-119,120-121,165;加利福尼亚,131,133,165;南非,95,97,99
Grant 格兰特,尤利西斯·S(美国北方联邦军指挥官),150

H
Hamburg 汉堡(德国城市),犹太人,58
Hanover 汉诺威(德意志邦国),51,52,55
Hastings 黑斯廷斯,瓦伦(总裁)14
Hindus and Hinduism 印度人和印度教,15,18,23,24,32;在印度国大党大,30;与民族主义,34;改革运动,17;寡夫习俗,17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地图 44,51
Hungary 匈牙利,43,45,46,47,52

I
India 印度,地图 10-11,12;阿布杜尔·卡里姆(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侍从),19;军队,18,26,28,29;不列颠司法系统,24,28,29,34;不列颠生活方式,8,17,27,28-29;不列颠拉贾统治,26,34;不列颠居民,12-13;不列颠的文化压迫,16-17;地区官员,24,28;土邦王公的觐见仪式,33;不列颠的经济影响,16,27-28,29;对饥荒的救助,25,28,33;政府,26,33;印度人参与司法审判,29;印度文职公务署(ICS),10,14,24,28,29-30;印度国大党,30,31,32-33,34;工业,27-28;灌溉系统,25,27,28,33,34;民族主义,29-34;土邦王公,10,20,21,23,27,33;改革运动,17;宗教和不列颠,16-17,18,27;不列颠的土地兼并,17,18;塞杀派(图片),14,17;总督,26
Indian Mutihy 印度人民起义,10,15,16,18-19,22,26
Industry 工业,165,参见 coal; Cotton; Electricity; Food; Gas; Germany; Gold; India; Textile industri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ndhlwana 伊桑德卢瓦纳(1879 年战役),95
Italy 意大利:非洲领土,地图,10-11,77,79,90-91;双头鹰同盟,59;行省,43;普鲁士协议,51;北方的起义,47;"复苏"运动,50

J
Jameson, Leaden 詹姆森,林德尔·斯塔尔,99-100
Johnson 约翰逊,安德鲁(美国总统),153

K
Kabul 喀布尔(阿富汗),巴拉希萨尔堡垒,地图 10-11,30-31
Kanus 堪萨斯(美国州),137-138,154-155
Kunus 堪萨斯市,股市,68-69
Kelly 凯利,奈德(澳大利亚罪犯),124,125
Kilburn 基尔贝恩,本杰明·威斯琦(美国摄影家)107
Kimberley 金伯利(非洲),地图 76,94,97,98,100
Kitchener 基钦纳,根·赫尔伯特,91,92
Kruger 克鲁格尔,保路斯(德兰士瓦总统),96,97,100,101
Krupp 克虏伯,阿尔弗列德和弗里德里希(德意志工业企业家),56;家族,58

L
Ladysmith 莱迪史密斯(非洲),98,100
Lee 李,罗伯特·E.(南方联盟将军),145,150
Leichhardt 莱希哈特,路德维希(探险者),123
Leopold Ⅱ 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国王),83,84,88
Lhasa 拉萨(西藏首府),地图 10-11,33
Liberia 利比里亚(非洲),地图 76,77
Libreville 利伯维尔(加蓬),地图 76,77
Lincoln 林肯,亚伯拉罕(美国总统),137,139,140,147,150,151
Little Bighorn 小比格霍恩(1876 年战役),148
Livingstone 利文斯敦,大卫博士(苏格兰探险者),75,77,78,81
Lombardy 伦巴第,43,50
London 伦敦,21,40,103;穷人的情况,165
Lorraine 洛林(德意志行省),56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参见 Napoleon Ⅲ
Louis Philippe 路易·菲利浦(法国国王)45,
Lucknow 勒克瑙(印度城市)暴乱,地图 10-11,23,24
Ludwig Ⅱ 路德维希二世

M
McCormick 麦克科密克,居鲁士(德国发明家),65
Madras 马德拉斯(印度城市),地图 10-11,13,14;饥饿,25
Mafeking 马弗京(非洲),98,100
Manassas 马纳萨斯,见布尔溪
Marathas 马拉塔(印度国家),地图 10-11,13,15,32
Marchand 马尔尚,让·瓦普提斯特(法军上尉),92
Martin 马丁,保罗(摄影家),109
Maxim 马克沁,希拉姆(美国机械师),86
Medicine 医药,76
Meerut 米辟德(印度),地图 10-11,18,19,22
Mejuba Hill 马约巴山(1881 年战役),96
Melbourne 墨尔本(澳大利亚首都),119,123,125,126-127
Metternich 梅特涅亲王(奥地利政治家),44,45
Metz 梅斯(战役,1881),地图,44,55
Milner 米尔纳,阿尔弗列德(开普的最高指挥官),100
Missionaries 传教士:在非洲,74,75,79,80,83,101;在印度,15,18,27
Moltke 毛奇,赫尔穆斯·冯将军(德国总参谋长)46,48,53,54
Mornington 莫宁顿勋爵,见威莱斯莱侯爵,
Morocco 摩洛哥(非洲)地图,76,79
Morse 莫尔斯,萨姆尔(美国发明家),135

Mozambique 莫桑比克(非洲),地图10－11,地图76,77,78,90
Mughal rulers 莫卧儿统治者,13,14,15,亦见:巴哈都尔沙二世
Munch, Edvard 蒙克,爱德华,挪威画家,163
Muslims 穆斯林,34,习惯法,24;与印度国大党,30,31;穆斯林同盟,31;反对英国的起义,18－19,22
Muybridge 迈布里奇,埃德维尔德(摄影家),103
Mysor 迈索尔(印度),地图10－11,15

N
Napoleon Ⅲ 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45,55;照片,103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奥地利,44－45;教皇指责,57;在欧洲,9;德意志,9,57,61;印度,29－34;波兰,51
Netherlands 荷兰,海外领域,地图10－11
Neuschwanstein Castle 纽施凡斯泰恩城堡(巴伐利亚),61
Newcastle－upon－Tyne 等恩河畔纽卡斯尔(英格兰)兵站,36－37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国家),112,113,114,119,120,121,124,126,129;采矿者的窝棚,120
Newyork 纽约,154,156－157;克利斯托尔宫,136;电力,37,38;贫民区,107;自由女神像,161
New Zealand 新西兰,地图10－11,122
Nicholas 尼古拉一世(俄罗斯沙皇),46
Nielson, H. 尼尔森,H.104－105
Nigeria 尼日利亚(非洲),地图10－11,87
Nile 尼罗河,80－81,83
Nizam of Hyderabad 海德拉巴的尼查姆(印度土邦王公),21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北德意志联邦44,53

O
Olmütz 奥尔默茨,条约(1850),47
Omdurman 恩图曼(1898年战役)地图76,91,92－93(图),102
Oudh 奥德(印度土邦)地图10－11,15,17

P
Pacific 太平洋群岛领地,62,127;美国,9,159,162
Pakistan 巴基斯坦,31
Paris 巴黎,公社,54;电力,35,40,41;普法战争,包围,43,52,53,54,55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钢铁工业,158
Perth 珀斯(澳大利亚城市)114
Peters 彼德斯,卡尔(德意志医生),86,90
Philip 菲利普,阿瑟(新南威尔士总督),113,114
Photography 摄影,59,103,115,117,118－119,137,145;山地者的记录,106－107;饥饿的人群,25;利达炬机,108－109;巴黎公社,54;立体照片,104
Pitt 皮特,威廉(不列颠首相),14
Plassey 普拉西(1757年战役),地图10－11,14,22
Poland 波兰,44,地图44;起义,46,51
Poona 浦那(印度),地图10－11,32
Port Phillip 菲利普港(澳大利亚)114
Potugal 葡萄牙,与非洲,9;地图10－11,77,78,86,88
Prague 布拉格,条约,52
Prussia 普鲁士,军队和军事改革,47,48,49,51－52;联邦议会代表,53;经济,58;选举议会,46;同盟议会,47;普法战争,52,53,54－55;以及和平的建立,55－56,62;德意志联邦,44,45,47,49,51,52;联合前的政府和社会,45,46;民族主义,49,50,51;地区,41－44,地图44;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51;与奥地利的战争(见七周战争),51－52
西普鲁士,44,地图44;关税同盟,45,参见俾斯麦;德意志
Punjab 旁遮普(印度行省),地图10－11,17,23,27;地区官员,24
Psychiatry 163,165,精神病学

Q
Queensland 昆士兰(澳大利亚州),114,120,121,124,125

R
Railway 铁路:非洲,79,90,99;澳大利亚,121,124;德意志铁路和装备,56;印度,21－22,27－28,33,34;普鲁士,47－48;美国,135,136,141,146－147,151,153,154－155,158,160,162
Redon 雷东,奥迪伦(法国画家),166
Reed 里德,约瑟夫(英国建筑师),119
Rhodes 罗得斯,塞西尔(不列颠企业家),94,96－97,99－100,101
Rhodesia 罗得西亚,地图10－11,地图76,99,101
Rochmond 里士满(包围),144－145,150
Riis 瑞斯,雅各布(美国摄影家),107
Ripon 里蓬,爵士(总督),29－30
Rorke's 罗克矿场(1879年袭攻),95,96
Rousseau 卢梭,亨利(法国艺术家),167
Roy 罗伊,拉姆·莫衡(印度改革家),17
Russia 俄罗斯,三皇同盟,59,62;与德意志,57,59;谷物,58,66;商品化农业,66;与亚洲北部,9;与普鲁士,45,46

S
Sadowa 萨多瓦,(1866年战役),地图44,51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南非)地图,76,99
San Francisco 三藩山(美国城市),131,155,158
Saxony 萨克森(德意志邦国),51,53,64
Sayyid 赛义德,辛德(阿曼苏丹),78
Schleswig 石勒苏伊格(公爵领地),地图44,51,52
Sedan 色当,地图44,55
Senegal 塞内加尔(非洲),地图10－11,78
Sharpsburg 夏普斯堡,见安提塔姆
Sherman 谢尔曼,威廉(联邦将军),150
Shiloh 示罗,(1862年战役),145
Siemens 西门子,沃纳·冯(德国科学家),35;电动机,41
Silesia 西里西亚(德意志邦国),44,地图44,64
Simla 西姆拉(喜马拉雅山城市),地图10－12,23,26
Sind 信德(印度行省),地图10－11,17,27
Slavery 奴隶:非洲,75,77,78,79,81,102;美国,133,135,137－140,141,144,和奴隶解放,147,150,152－154
Socialism 社会主义,法国,54(图);德国,57,58,59,62,64;罢工和暴动,165Sociology 社会学,165
South America 南美洲,65,69,70
South Australia 南澳大利亚(州),114,120,121
Southern Africa 南非,地图76,77,94－102;金矿,95,97,99;詹姆森的进攻,99－100;《国内土地法案》,102
Spain 西班牙:利奥波德,53－54;海外领地,地图10－11;美西战争,9,159,162
Speke 斯皮克,约翰·翰宁(不列颠探险家),80－81
Stanley 斯坦利,亨利·莫尔顿(探险家),81,83,84,85
Sturt, 斯图尔特,查尔斯(探险家),123
Sudan 苏丹,地图10－11,85,90－93,125
Suez Canel 苏伊士运河,27,28,地图76,79,80,82,84
Swahili land 斯瓦希里人生活地区(非洲),78,88－89;101
Swan 斯旺,约瑟夫(不列颠发明家),39
Sydney 悉尼(澳大利亚城市),125,126
Syed Ahmad Khan 赛义德·阿赫迈德·汗(印度知识分子),30－31

T
Tanganyike 坦噶尼喀(非洲),88－89,89,湖,80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113,114;澳大利亚之著,115
Technology 技术,见农业;电力;围栏、食物;煤气;摄影;电报;武器
Telegraph 电报,40;奥地利,121;德意志,54;印度,27;美国,135;155,162
Tell el Kebir 泰尔·克比尔(1882年战役),84
Tesla 特斯拉,尼古拉(科学家),36－37
Textile 纺织工业,见奥地利;孟加拉;孟买;不列颠;棉布
Thomson 汤姆森,约翰(英格兰摄影家),104
Tilak 铁拉克,布尔·干加特(印度民族主义者),31－32,33
Tipu Sahib 提普,赛义德(印度苏丹),14
Togoland 多哥兰(非洲)地图10－11,地图76,86,89
Transport 运输,见铁路;及各国家名称下提示
Transvaal 德兰士瓦(南非),94－97,99,100;黄金,95,97
Tunisia 突尼斯,(非洲省),79

U

Uganda 乌干达(非洲),地图 76,83,89,90

United Provinces 联合行省(印度)10－11,2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农业,58,66,67;地图 132,136,137,153,154,155,160;美国印第安人,133,148－149,151,157;铁刺围栏(与牛仔),155;生牛,68－69;中国劳工,154;内战,107;地图 132,133,140－145,147,150－151;南方联盟,140;考克西的进军,160;禁条,158,160;经济增长和城市膨胀,157－160,162;教育,160,162;电力,35,36,37,38;"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153;"宅地法",155;移民,154,156－157,158,161,162;工业,136,141,162;"司土地内北"152－153;摩门教徒,134;海军,141,145,147,162;北方各州,133,135－136,137,139,140;海外和太平洋领地,9;地图 10－11,159,162;摄影,103,104－105,107,108;拓荒者,152－153,154;人口,65,135;人民党,160;内战后重建,151－154;铁路,135,136,141,151,153,158,160,162;联邦太平洋铁路,146－147,154－155;南方农民,135,136－137,140,分成耕作制,153;南方绅士,134－135;南方各州,与联邦分离,133,139－140,143,153;和内战后的南方各州,152－153;美西战争(1898),9,147,159,162;罢工和暴力,158,159,160;运输,133,135,136,141,151,157;联邦,133,135,137,139－140;工会,158,160;牛车队伍和移民,130,133－135;威尔斯·法哥,147;西部各州,130,133－135,137,139,155,157,参见 Cotton;Gold;Slavery;Telegraph

V

Vicksburg 维克斯堡(1863 年包围),150

Victoria 维多利亚(澳大利亚州),114,117,119,120,121,126

Victoria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19;阿尔伯特·爱德华(她的儿子),166

Vienna 维也纳,163;会议(1815),44;股市崩溃,58;和约(1864),51

W

Wagner 瓦格纳,理查德(德意志作曲家)《诸神格林》60,61

Weapons 武器,德利士新型步枪,47,48,51,54;非洲人使用的火器,90;法国莱福枪和机关枪,54－55;克虏伯制造商,56;马克沁机关枪,86,91,99;美国内战,141;埃塞俄比亚人使用的武器,91

Wellesley, Arthur 威莱斯莱·亚瑟,14,15

Wellesley, Marquis 威莱斯莱勋爵(总督),14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州),114

Wilberforce 威尔伯福斯,威廉,引用,16

William I 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46,48,49,51,52,53,54,55;称帝,43,55,56,57;逝世,62

WilliamII 威廉二世(德国皇帝),63,64;战舰皇家,62

Wills 威尔斯,威廉·约翰(英国探险家),123,124

Wurttemberg 符腾堡(德意志邦国),地图 44,53

Z

Zanzibar 桑给巴尔(非洲)地图,76,78

Zollverein 关税同盟,45,47,49,50

参考文献

GENERAL

Anderson, M. S., The Ascendancy of Europe 1815 – 1914. London und New York: Longman, 1985.

Bayly, Christopher, ed.,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Amazon, 1989.

Briggs, Asa, e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0.

Coe, Brian, The Birth of Photography. London: Ash und Grant, 1976. = **Coe,** Brian, and Paul Gates. The Snapshot Photograph: The Rise of Popular Photography 1888 – 1939. London: Ash and Grant, 1977.

Ford, Colin, ed., The Story of Popular Photography.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1989.

Fraser, W. Hamish. The Coming of the Mass Market, 1850 – 1914. London: Macmillan, 1981.

Grenville, J. A. S., Europe Reshaped 1848 – 1878. London: Harvester Prese, 1976.

Headrick, Daniel R.,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ennessey, R. A. S.. The Electric Revolution. London: Oriel Press, 1972.

Hobhouse, Henry, Forces of Change.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9.

House, John, and Mary Anne Stevens, eds., Post – Impressionism: Cross – Currents in Eur opean Painting.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and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9.

Huggett, Frank E., The Land Question and European Socie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1975.

Jeffrey, Ian, Photography: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cdonald, Gus, Camera: A Victorian Eyewitness. London: B. T. Batsford, 1979.

Morris, James:

Farewell the Trumpets. London: Penguin, 1979.

Heaven's Command. London: Penguin, 1979.

Pax Britannica. London: Penguin, 1979.

Mosse, W. E., Liberal Europe: The Age of Bourgeois Realism 1848 – 1875.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Stone, Norman, Europe Transformed 1878 – 1919. London: Fontana, 1983.

INDIA

Bayly, Christopher,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 –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rown, Judith,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Edwardes, Michael, The Sahibs and the Lotus: the British in India. London: Constable, 1988.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Great Mutiny: India 1857. London: Penguin, 1980.

Kulke, Hermann, and Rothermund Dietmar, A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Croom Helm, 1986.

Mason, Philip,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London: Pan, 1987.

Moon, Sir Penderel, The 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ation of India. London: Duckworth, 1989.

Mourhouse, Geoffrey, India Britannica. London: Harvill Press, 1983.

Smith, Vincent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Spear, Percival, A History of India, Vol. 2. London: Penguin, 1989.

Trevelyan, Raleigh, The Golden Oriole: Childhood, Family and Friends in India. London: Secker & Wurburg, 1987.

Watson, Francis,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Thames und Hudson. 1974.

Wolpert, Stanley, A New History of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orswick, Clark, ed., Princely India: Photographs by Raja Deen Dayal 1884 – 1910.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0.

Worswick, Clark, and Ainslie Embree, The Last Empire: Photography in British India 1855 – 1911. London: Gordon Fraser, 1976.

GERMANY

Blunt, Wilfrid, The Dream King. London: Penguin, 1973.

Bohme, Helmut, 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Select Documents. Trans. by Agatha Ram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raig, Gordon A., Germany 1866 –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rankshaw, Edward, Bismarck. London: Macmillan, 1981.

Dahrendorf, Ral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Designs for the Dream King: The Castles and Palaces of Ludwig II of Buvaria. Londo n: Debrett' s Peerage, 1978.

Glaser, Hermann. Die Kultur der Wilhelminischen Zeit. Frankfurt: S. Fischer Verlag, 1984.

Horne, Alistair, The Fall of Paris: 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 – 1. London: Macmill an, 1965.

Howard, Michael, The Franco – Prussian War. London: Rupert Hart – Davis, 1962.

Kent, George O., Bismarck and His Time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flanze, Otto,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Rosinski, Herbert, The German Arm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6. = **Simon,** W. M.. Germany in the Age of Bismarck. London: Allen & Unwin, 1970.

Steinberg, Jonathan,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London: Macdonald. 1965.

Stern, Fritz, Gold and I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Taylor, A. J. P.,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5.

Wehler, Hans – Ulrich, The German Empire 1871 – 1918. Trans. By Kim Traynor. Leamington Spa, England, and Dover, N. H.: Berg Publishers, 1985.

AFRICA

Ajayi, J., and M.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 Harlow, Essex: Longman, 1985.

Chamberlain, M. E.,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74. = **Crowder,** Michael, The Story of Nigeria. London: Faber & Faber, 1962.

Davidson, Basil. Africa in History. London: Grafton, 1974.

Flint, John E.,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Forbath, Peter. The River Congo.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2.

Furstner, Alexander Sydney Kanya,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Ganz, L. H., and Peter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1.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Hargreaves, John D., Prelude to the Partition of West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1966.

Hargreaves, John D., West Africa Partitioned. Vols. 1 & 2.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4 and 1985.

Hibbert, Christopher. Africa Explored. London: Penguin, 1982.

Huxley, Elspeth, Livingstone and His African Journey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4.

Jeal, Tim, Livingstone. London: Heinemann, 1973.

Kinross, Lord, Between Two Seas: 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 John Murray, 1968.

Lewis, David Levering, The Race to Fashoda: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African Resistance in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Bloomsbury, 1988.

Lewis, Roy, and Yvonne Foy, The British in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McEvedy, Colin, The Penguin Atlas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80.

Monti, Nicolas, ed., Africa Then: Photographs 1840 – 1918.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Murray, Jocelyn, ed., Cultural Atlas of Africa. Oxford: Phaidon, 1981.

Oliver, Roland, and Anthony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Oliver, Roland, and Michael, Crowder, eds.,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Oliver, Roland, and J. D. Fage,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Penguin, 1988.

Oliver, Roland, and G. N. Sanderson,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enrose, E. F., ed..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75.

Robinson, R., and J.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Rotberg, Robert I., The Founder: Cecil Rhodes and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lade, Ruth M., King Leopold's Congo.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USTRALIA

Broome, Richard, Aboriginal Australians: Black Response to White Dominance 1788 – 1980. Sydney: Allen & Unwin, 1982.

Burgmann, Verity, and Jenny Lee, eds., A People's History of Australia since 1788. Fitzro, Australia: McPhee Gribble, 1987.

Carroll, John, ed., Intruders in the Bush: The Australian Quest for Identit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Hirst, J. B., Convict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A History of Early New South Wales. Sydney: Allen & Unwin, 1982.

Hughes, Robert, The Fatal Shore: A History of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s to Australia 1787 – 1868.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7.

Inglis, K. S., The Australian Colonists: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 History 1788 – 1870.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4.

Kingston, Beverley, ed.,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 3.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nge, G. J. R., Industrial Awakening: Geography of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 1788 to 1890. Sydne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McQueen, Humphrey, New Britannia. Ringwood, Australia: Penguin, 1970.

Moore, David, and Rodney Hall, Australia: Image of a Nation 1850 – 1950. Sydney: William Collins, 1883.

Shaw, A. G. L., The 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Faber & Faber, 1983. = **Ward,** Russel,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hite, Richard, Inventing Australia: Images and Identity 1788 – 1980. Sydney: Allen & Unwin, 1981.

THE UNITED STATES

Billington, R. A., The Far Western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 1956.

Brock, W. R., Conflic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1844 – 1877. London: Penguin. 1976.

Brogan, Hugh, 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Penguin, 1986.

Cruden, Robert, The Negro in
Reconstr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69.

Davis, Christopher, North American Indian. London: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1969.

Debo,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DeVoto, B., The Year of Decision: 1846.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6.

Dulles, F. R., 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 New York: Harper, 1955.

Franklin, J. H., The Militant South. London: Methuen, 1975.

Garraty, John A., and Robert A. Mc Caughe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Josephson, M., The Robber Baron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2.

Kirkland, Edward C., 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ur and Public Policy 1860 – 189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Macpherson, J. M., Battle Cry of Freedo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ndelbaum, S., Boss Tweed's New York. London: John Wiley, 1965.

Miller, D. T., 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Oxford: Facts on File, 1988.

Perlot, J. N., Gold Seek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ansom, Roger L.,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nkewitz, R. M., Vigilantes in GoldRush San Francisc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Waldman, Carl, Atla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Oxford: Facts on File, 1985.

Wiebe, R. H., The Search for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67.

Woodward, Comer Vann,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 – 1913. Baton Rouge, La.: Lou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